



HISTORY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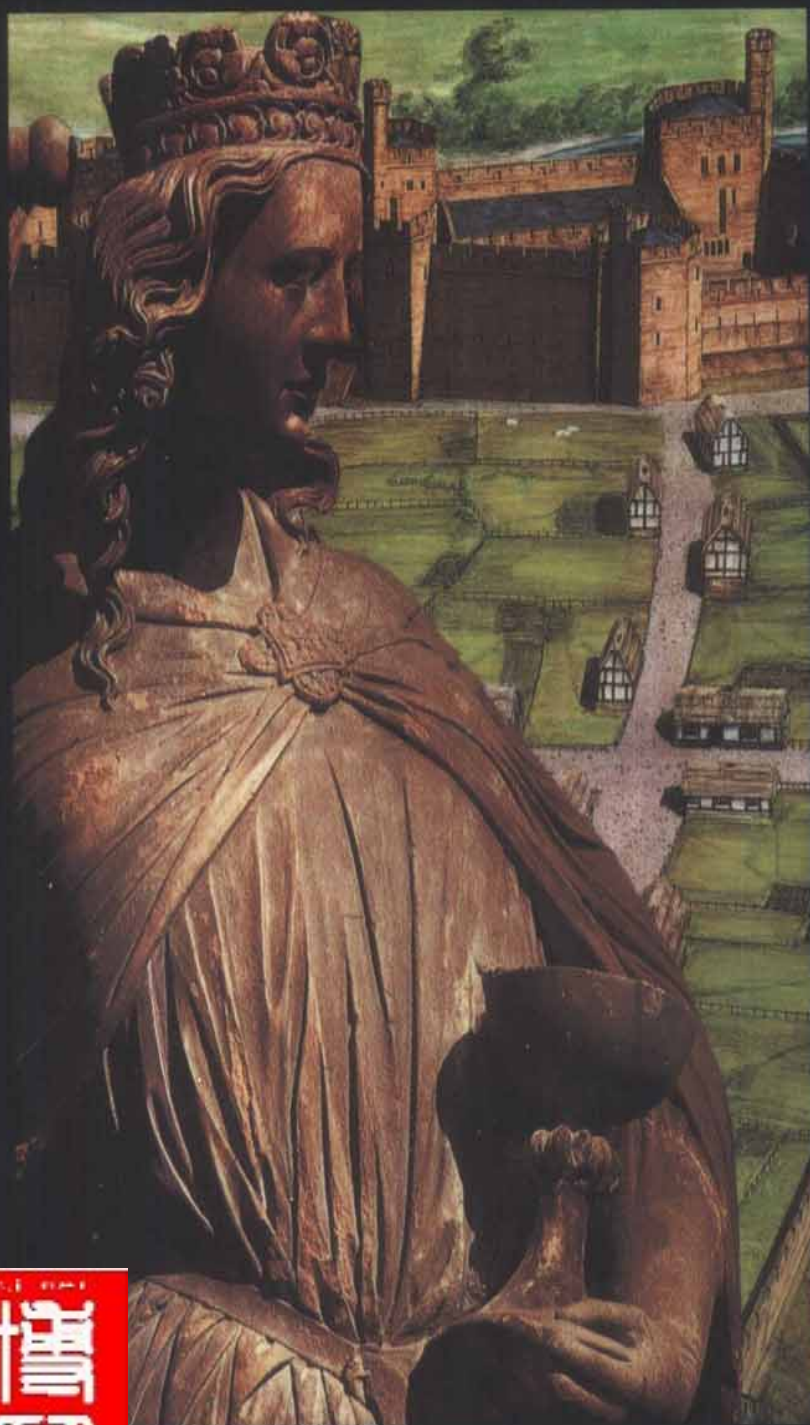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蒙古征服

公元1200年—1300年

大漠中的游牧部落 / 日本幕府的兴起 / 埃及的“奴隶”苏丹
西方的战乱 / 波罗的海十字军 / 欧洲的新君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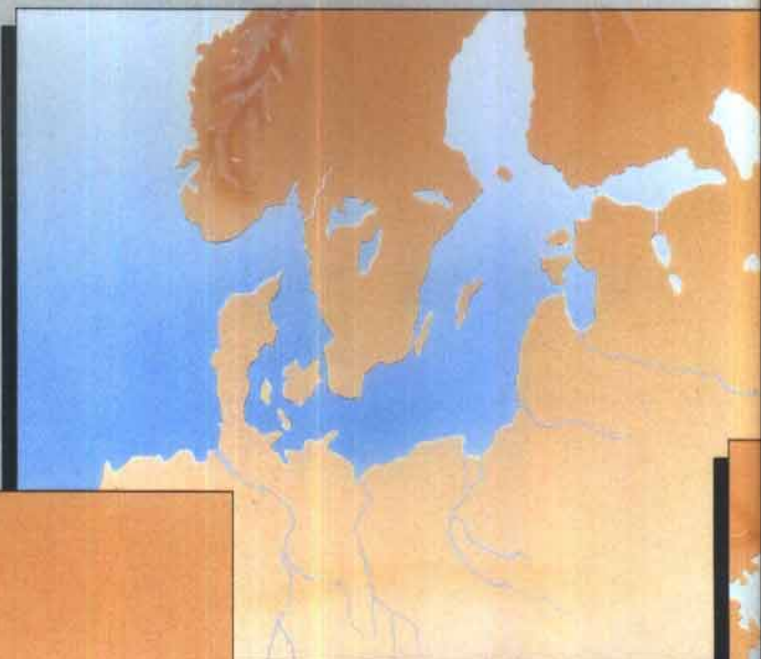
典藏
博覽

人类文明史图鉴

蒙古征服

公元 1200 年 13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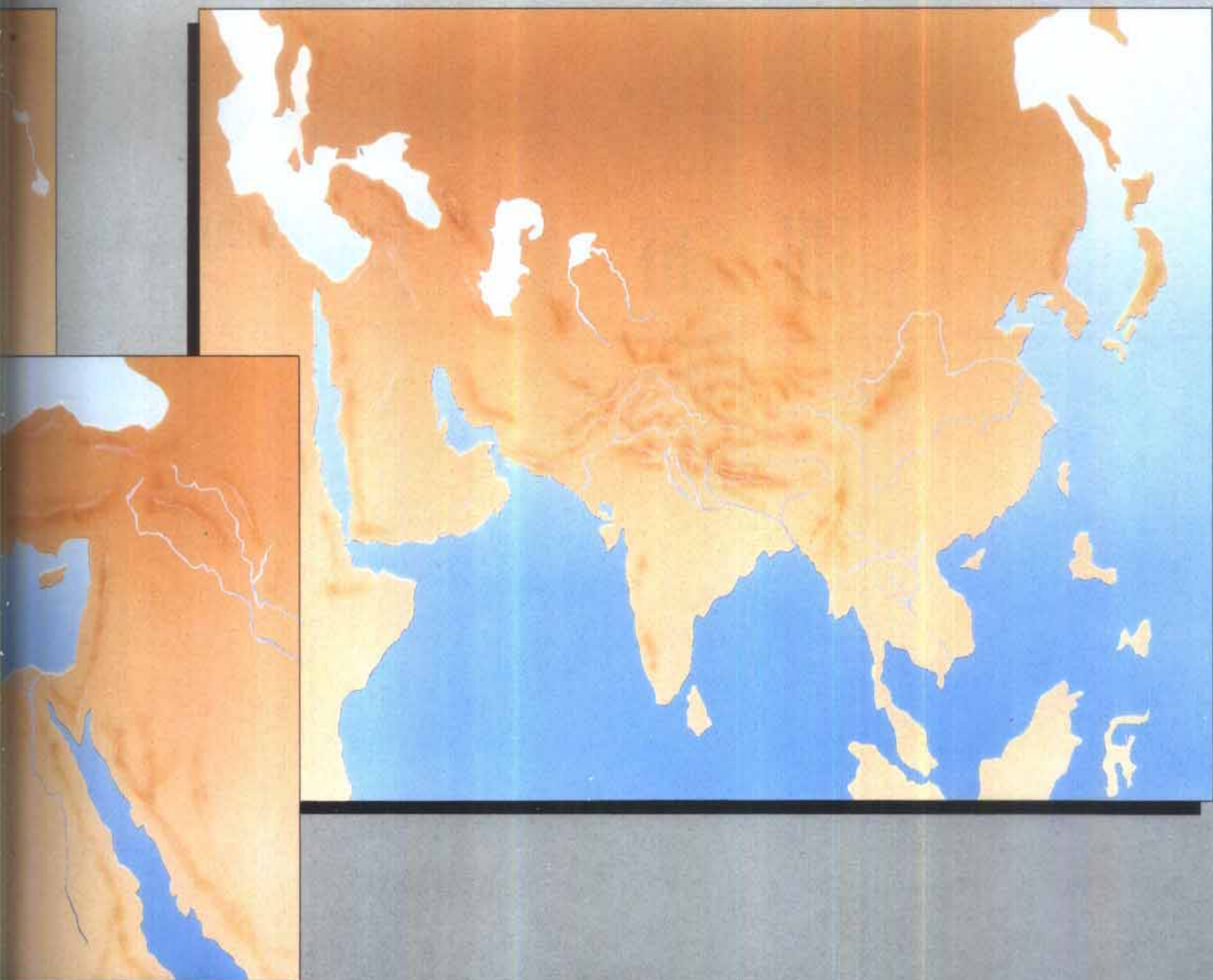
波罗的海



西欧

公元 1200 年—1300 年

中亚和远东



非洲和中东



人类文明史图鉴

蒙古征服

公元 1200 年 — 1300 年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主编(欧洲): 苏·乔安娜
欧洲部执行编辑: 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 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 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 亚尼莎·克莱默
副主编: 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 托尼·阿伦

《蒙古征服》编务:

编辑: 费尔格斯·弗莱明
策划: 玛丽·斯塔普尔斯
撰稿: 克里斯·达尔曼
研究人员: 卡罗琳·卢卡斯(组长)
玛丽—路易丝·柯拉德
审稿: 黛安娜·希尔、克里斯汀·诺布尔
策划助理: 雷切尔·古布森
编辑助理: 莫莉·苏瑟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 帕特丽夏·默里
图片统筹: 阿曼达·辛德利

编辑制作:

主任: 莫琳·凯利
制作助理: 萨曼莎·希尔
编辑部: 塞雷萨·约翰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里·帕克, 伊利诺斯州厄巴纳—香槟
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夫·贝利, 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当代印度史高级讲师

西欧:

克里斯托弗·吉文·威尔逊, 法夫市圣安德鲁斯大学中世纪史讲师。
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 运勒姆大学历史学教授

波罗的海:

埃里克·克里斯琴森, 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

中亚与远东:

I·J·麦克马伦, 牛津大学日语讲师。
D·S·M·威廉姆斯, 伦敦大学斯拉夫与东欧研究院亚洲部分之俄罗斯史讲师。

非洲与中东:

罗伯特·欧文,《中世纪的中东》著者。

特约撰稿人:

温泽·乔尔顿; 约翰·科特莱尔; 埃伦·加尔福特; 阿伦·洛西安; 黛博拉·汤普森(文献); 斯蒂芬·罗杰斯(研究)。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格(波恩);
玛丽亚·文森查·阿洛瓦西(巴黎);
安·纳尔森·安·怀斯(罗马);
迪克·贝里(东京)。

中文译者:

王斌 金文宇 王晋瑞 胡晓飞

责任编辑:

王海利

目录

1 大漠中的游牧部落 9

2 日本幕府的兴起 33

3 埃及的“奴隶”苏丹 59

短论:书稿制作 81

4 西方的战乱 89

5 波罗的海十字军 109

短论:哥特式建筑的鼎盛时期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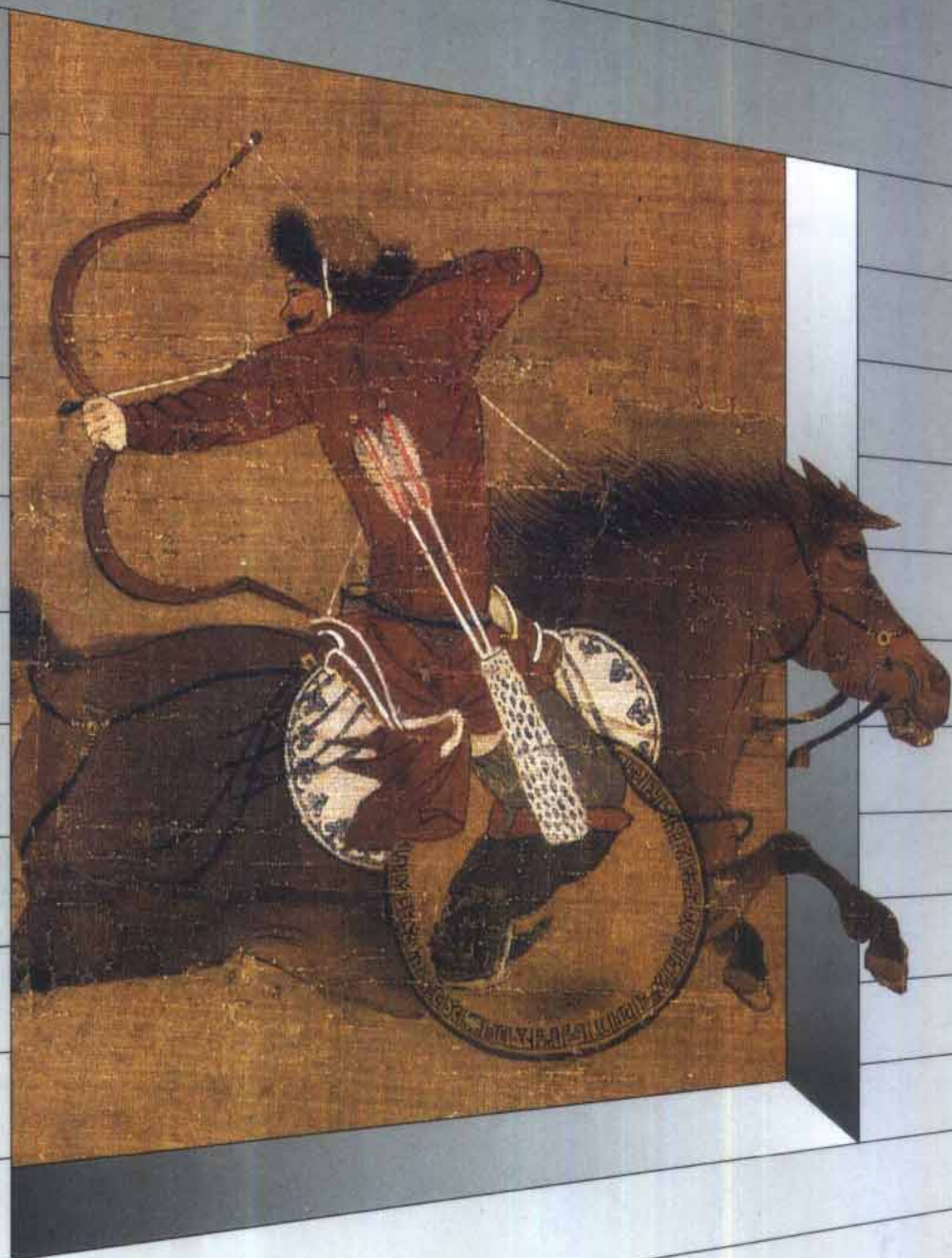
6 欧洲的新君主制 139

短论:一个征服者的城堡 162

大事年表 168

索引 170

参考文献 173



大漠中的游牧部落

1 “我乃天主的连枷。尔等若非身犯大罪错，天主断不会降诸尔等惩罚如我。”1219年，蒙古首领成吉思汗正在中业布哈拉的大清真寺中对难民训话。但是听者寥寥无几。此前他的士兵焚烧了外城，并聚拢居民以作攻袭城堡的人墙。30 000守城者全部被杀，幸存的百姓则财物尽失，入侵者若再度攻击，便把他们赶在前面。

自13世纪最初10年起，约50年间，横跨欧亚大陆的诸多城市皆遭受了布哈拉同样的厄运——从东方的中国和朝鲜，到波斯、伊拉克和土耳其斯坦，直到西方的保加利亚、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中都（今北京）的豪华宫殿被夷为平地；伊斯兰文化的光辉首都撒马尔罕与巴格达遭到毁坏；全俄罗斯最繁华的城市基辅则成为灰烬。当时，为人类所知的世界有一半在这种空前凶残的攻袭下颤抖。

在其帝国之外，蒙古人引起了普遍的恐慌。基督教西方的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称之为可憎的撒旦民族。“他们穿越高加索险固的山岩，如同魔鬼般从塔罗斯地狱中涌出。他们蝗虫一样漫过大地，给欧洲东部带来了可怕的劫难，纵火、屠杀，使之一片荒凉。”匈牙利以西的国家得以免遭此劫则纯属偶然。

蒙古虽未入侵西方，西方正经历的变革却也几乎同样剧烈。在德国、意大利和西西里，神圣罗马帝国的教皇和皇帝因不睦而分庭抗礼。在这场冲突中，当时最具英明远见的君主之一腓特烈二世建立了辉煌的西西里皇廷。1250年腓特烈二世死后，其帝国分裂为若干公国，经6个世纪以后这些公国才再度被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组成法国与英国的封建领地则走着相反的道路。14世纪初，这两国已初具今日规模，正在体味强有力的君主统治下中央集权政府制的甜头，英国还诞生了民主议会。在蒙古耗尾旗被视为有“鬼怪嘴脸、灰色长须”的恶魔的东北欧冻土地带，基督教骑士团体中的条顿骑士团正在清除波罗的海南岸的异教居民。到该世纪末，这些武装僧侣已在普鲁士、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的土地上建成了一个富强的军事政权。

穆斯林们视蒙古人为“遭天谴的”，其暴行也确实毁灭了古老的波斯与土耳其文明。蒙古军在巴勒斯坦才真正遭遇败绩，取胜的马穆鲁克王朝由突厥裔奴隶兵组成，他们后来把巴勒斯坦建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其帝国在中东也最为强

于骑马飞驰之际扭身射箭，蒙古猎手的灵活、火力使他们在欧亚战场上成了无敌的草原士兵。作战时，每个蒙古人均携带两张以木为架、构以筋骨的弓，一张近距施射，一张射程300米开外。其箭袋可放多达60支箭，有些足以射穿铠甲，有些头部装有哨子以便发出信号。他们能把弓的一端踩在马镫上来弯弓上弦，并能于驰骋之中按照马速适时放箭，准确命中。

盛。在日本，新兴的武士阶级继把皇权统治搁置一边并建立了军事封建制后，也成功地遏制了蒙古的扩张。

不过，蒙古人在不足 50 年里还是营造了空前庞大的帝国，这要归功于铁木真的军事天才和鼓动才能。从无名酋长到成吉思汗（“大地之主”）之尊，他在神圣使命感的驱使下一统各分崩离析的游牧部落为蒙古民族，创建了足以征服世界的大军。

铁木真出生的 12 世纪 60 年代初，蒙古人只在海拔 900 到 1 500 米高的广袤的中亚高原上活动，西有阿尔泰山与天山山脉阻隔，东有大兴安岭拦路。这片土地又天然分为三级：与西伯利亚冻土带边缘处大森林接壤的巨大的外蒙古北方平原；以连绵约 1 900 公里的戈壁沙漠为主的中间地带；内蒙古的南方草原。

草原以东是西藏唐古特游牧部落约于 990 年建立的佛国西夏。再往东是分地而治的中国——起于满洲的半游牧林区部落女真族于 1115 年建立北方的金朝；南方宋朝已历 200 年，称得上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国度。

蒙古与中国之间横亘着石筑的长城，自东方海岸的山海关至戈壁沙漠的酒泉蜿蜒蛇行近 2 400 公里。从战略观点看，守军有多强，长城才有多强；有时，入侵者凭借政治骗术或守军将领叛变，也曾无需动武便登上了长城。然而长城的象征意义却从未减弱过。不管王朝如何兴衰起落，在中国人看来长城始终是文明的最后分野：长城外便是野蛮人之地，根本无文化及艺

1207 年成吉思汗所部人马自蒙古本土起兵，半个世纪之内即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全盛期的蒙古疆域包括整个俄罗斯、几乎整个亚洲大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分为四支——波斯伊儿可汗部、俄罗斯金帐部、中亚察合台部，及由蒙古腹地与中国组成的大汗部。蒙古军队还渗入了欧洲、印度与东南亚丛林，只是在巴勒斯坦和日本才受挫中止。



术品味可言。

同中国人相比,蒙古人无疑粗俗野蛮。宋、金大兴土木建造城郭,农业经济繁荣昌盛之时,蒙古人还是蜗居帐篷的游牧之众,其原始的生活方式要听命于严酷的气候条件。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马背上。为利用夏季短暂的草木生长期,他们要驱赶牛群、绵羊和山羊北上,漫长难捱的冬季一到又要南迁,以此谋生。沙漠与草原只能勉强养活他们,不同部落之间为生存而交战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盘散沙般的蒙古各部落总计约有 200 万人,算不得大种族,各部落首领被称为汗,每一部落又分为若干有共同祖先的氏族。历史上他们也曾统一过。12 世纪初,勃儿只斤族的喀布尔汗建立了一个大的蒙古政权,但与金交战失败后统一便灰飞烟灭了。到 60 年代,蒙古人再度分崩离析,部、族之间因数代世仇而缠斗不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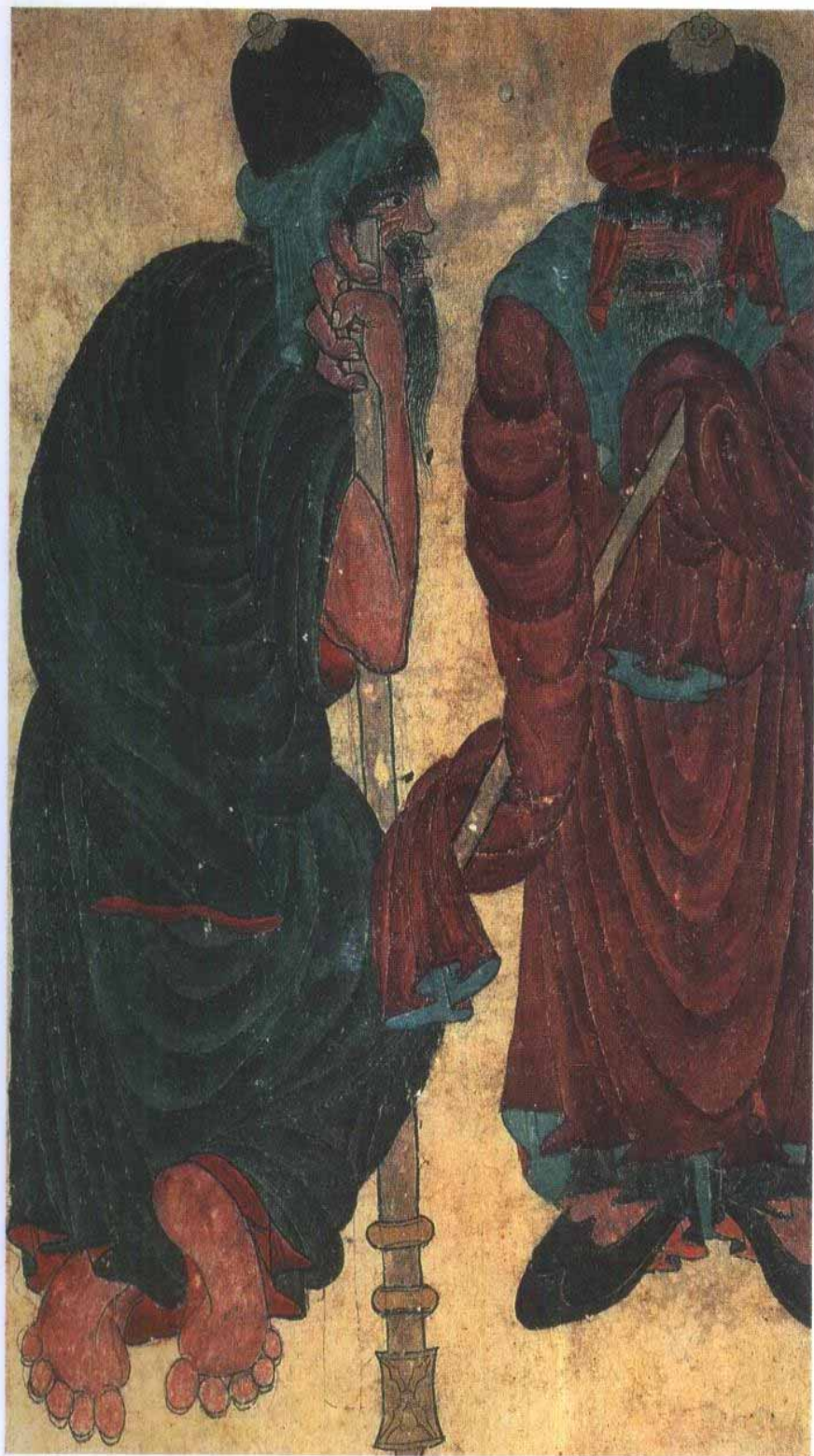
喀布尔汗的后裔(可能是曾孙)铁木真降生于一个有着权力传统的氏族。据传,他在出生之际手攥血块,因而吉祥如意。但在童年时期他似乎注定要默默无闻。在他九岁那年,父亲也速该族长因为与蒙古塔塔儿部的古老世仇而被该部毒死。随后他的氏族抛弃了他、他的母亲、五个弟弟和同父异母弟弟。一时,在上斡难河的恶劣地区他们挣扎于极端穷困之中,仅以莓果和土拨鼠、榛睡鼠等小动物果腹。

撰写于 13 世纪的《蒙古秘史》是说明铁木真是蒙古族的唯一信息来源。该书成于 1240 年,可能是由当时的一位蒙古大法官所作,书中讲述了铁木真的先祖以及蒙古人的早期生活,并列举了他少年时的种种壮举以突出其勇敢。这位编年史家未说明铁木真的家业如何复兴,但他首先一定是得到了有同情心的族人赠送的马匹和牲畜。对所有蒙古人来说,他们的牧群提供着生活必需品:食物、饮料、衣服和临时毡房。但是没有马就无法放牧。无论战争或平时,蒙古人的成败取决于他们马匹的多少和养马、驯马、骑马能力的高低。蒙古青年不论男女都从小被培养成了骑马好手:孩子学步之前就被捆在马背上并非稀罕事。

作为族长之子,铁木真肯定很早就被教授了骑马之术;3 岁起还要学习使用弓箭,达到立于奔马之上张弓射箭的程度——这种功夫后来使蒙古骑兵在全亚洲所向披靡。

铁木真与其他蒙古氏族尤其是蔑儿乞部宿仇在身,因此亟需精通此类作战本领。他的父亲曾用暴力从该族抢得自己未来的妻子。多年后蔑儿乞部人报了仇,抢走了新娘孛儿帖,把她配给了本族武士。铁木真最终寻到了这些绑架

和图中正在交谈的两个蒙古人一样，蒙古游牧部落在干草原上勉强度日。他们主要吃羊肉、牛肉或野鸟，加上凝乳、黄油与奶酪；他们最爱喝的乳酒由马奶发酵制成。牲畜也给他们提供了原材料，以便做衣服、马鞍、马镫、弓袋、箭袋，甚至建家——把畜毛砸实加油做成的毛毡是造圆形的蒙古包所必不可少的。



者，把他们杀光，接着又打败了整个蔑儿乞部。9个月后孛儿帖产下一子，其父不明，但铁木真还是视同己出，给他取名术赤。

至此，铁木真这个远近闻名的武士和天生的领袖已聚拢了大量人马。他率20 000余众，凭借他所具有的杰出智略与极端冷酷着手消灭对手。战胜鞑靼人后，他处死了所有身高超过牛车轴高度的鞑靼男子。大股骑兵打败泰赤乌族后，他把该族首领均活活煮死。铁木真意在消除传统的部族分裂，由他统一蒙古部落，为此便要翦除敢于挑战的敌手。

到1203年，铁木真已完全控制了蒙古中部和东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挺兵西进，击败了颇具实力的乃蛮部落，从而征服了草原地区。此外，他还俘获了组织部落联军向他挑战的武士头目札木合，从而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与铁木真挑战的。札木合是铁木真的同胞兄弟，曾与铁木真共同对付蔑儿乞部，少年时两人关系很好。但铁木真俘获他后，却丝毫未感情用事，而是令人在札木合的胸口堆放石块慢慢把他压死。这样滴血未出；否则（至少铁木真这样认为），札木合的灵魂会逃走，到一定时期后会再回来缠住铁木真。

如同大多数蒙古人一样，铁木真笃信宗教。他们崇拜的神“永恒蓝天”，是掌管来自北西伯利亚平原的善、恶力量的万能神灵。蒙古人的泛灵教义认为，火、流水和风中居住着强有力的神灵；对这些神灵不得有丝毫亵渎。因此把刀扔进火中，向河流中小便，在流水中洗衣，或只是在流水中洗洗餐具，都是严重的冒犯，要挨打受罚，有时乃至被处死。

蒙古人向各种神灵偶像祷告，最常见的是土地女神娜迟盖，据信她司青草、庄稼与药草；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动物神或图腾（青狼即铁木真家传说中的祖先）。他们也信神遇、梦境和幻像，由先知、招魂人、占星人、术士、巫医等萨满教僧来解析。

蒙古人崇拜祖先之灵，他们小孩子要记住其祖先的名字，不负他们的英名，并把他们的事迹代代相传，这对孩子来说乃是神圣的职责。从这种孩提时代的灌输中，铁木真受到了神圣使命感的驱使，坚信他命中注定要仿效喀布尔汗统一蒙古部落。1206年他大功告成。在斡难河畔的忽里台，即草原所有部落首领大会上，他被拥戴为成吉思汗——众汗之汗，或蒙古民众的“一统君主”。

在45岁时，成吉思汗已非止蒙古民族的至高统领了。由于他业绩赫赫，当时的萨满之长宣布他是永恒蓝天派到人间的代表，是天国的真正福赐，人们也就普遍认为他的使命就是征服和统治世界。对铁木真神圣身份的界定否定了与蒙古旗鼓相当的主权国家的存在，它们都要承认成吉思汗的无上权威。它们可以奉行自己的宗教形式，但其中稍有不从成吉思汗命令之处就会被视为违逆天意。

据载成吉思汗曾说过：“人之最大快乐乃是胜利：征服敌军，追其入众，夺其财产，拆其家人，馭其马匹，淫其妻女。”然而他并非只是一种破坏力，他还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依照蒙古人的标准又是头等的管理者和立法者。他不仅建立了当时最高效的战争机器，而且在国内化混乱为秩序和团结：自相残杀的世仇争斗陡然停止了。原有的对本部落的效忠被对统一的人民和君主的忠诚所代替。以成吉思汗及其亲属为顶点的新的权力金字塔被树立起来，下面是约95名统领下级指挥官的高级将官，负责各自领地内的法制、税收与征兵事务。

同时，成吉思汗下令记录全部法律案件的审理过程，结成案例，以此作为法官断案的根据。这些案例规定了蒙古民族的至高道德标准，包括禁止世仇血斗、通奸、鸡奸、偷窃、作伪证、叛变、行妖术、不遵王命及在流水中洗浴——最后一点体现了蒙古人的泛灵信仰。违犯者大多被处以死刑。不过，这条法令则较为宽和，因为只要承认大汗的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因其宗教信仰而被处死。

成吉思汗训练有素的新型蒙古民族完全是为战争而建的。它不是建立在农业定居点的基础之上，而是把游牧猎人群体分为百人、千人、万人的军事制单位。这些人生性好战，他们不为物质财产操心，也无需腾出时间进行耕种收

割。世仇争斗的历史也使得战争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蒙古人不作战时也在为战争而训练。成吉思汗有一次宣布，“蒙古人无战事时要投入到狩猎中去。其目的不只在追逐猎物，更在训练兵士，使其气力不衰，弓马不废。”因此，每年冬季，所有强壮的蒙古人都要准备进行一场大围猎，方圆数千公里，人数成千上万。这种年度盛事不只为接下来难捱的几个月储备了肉食，而且也可当作精心策划的军事演习。猎手们被编成团队，依据表现得到个人能力评价。

对表现突出的年轻猎手——武士来说，最高嘉奖就是被提拔到 10 000 余人的精锐专职部队——大汗的御林军中去。作战时，御林军总是分布在队伍中央，只在不得已的最后一击才出动。其成员因武艺高超而备受尊敬，据信每个人在紧急时都足以统领任何兵马。

以上是蒙古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族直系亲属之外的提拔一律视功劳而定，功劳又因军事才能而定。成吉思汗杰出的用人才能也很重要。他的儿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和拖雷都受过指挥训练；其所选的将领也都才能过人，忠诚不二。

大汗即帝位一年尚不到便聚拢了几十万人的军队，个个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1207 年，因国内牧场不足，骨子里嗜战成性的这些新近编制好的蒙古游牧人转向扩张，冲出了草原。他们凶猛无情，挟台风之力扫过西夏唐古特国。接下来，他们为金朝的巨大财富和其都城中都所诱，径直穿过戈壁沙漠东进。

他们面前躺卧着无垠的稻米平原，属世界上最富庶的农业区之一，平原上座座雄伟的城市拥有当时最先进文明的艺术与科学奇迹。但是蒙古骑兵游牧成性，并未想想占据这片丰饶土地的种种好处。他们过不得定居的生活。他们为占领而征战，为一时缴获战利品而征战。

不过，蒙古人远非愚昧的野人那样只知动用蛮力。在野外打仗时他们老谋深算，分成三路进军，反击前佯装撤退。他们精明地与金国边界的非蒙古部落结盟，巧妙地利用间谍、中立商人和不满的中国官员收集情报。而且他们会利用从敌人处获得的新材料和技术加强自己的战争机器。最重要的是，在被俘虏的中国技师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攻城的手段：射石机与投石机等投射石块的大机器；装在竖直架子上的巨大的弩；可装在长弓的竹筒火箭里发射的黑火药。

然而，最初缺少攻城器械是蒙古军的一大弱点。在西夏国他们曾被其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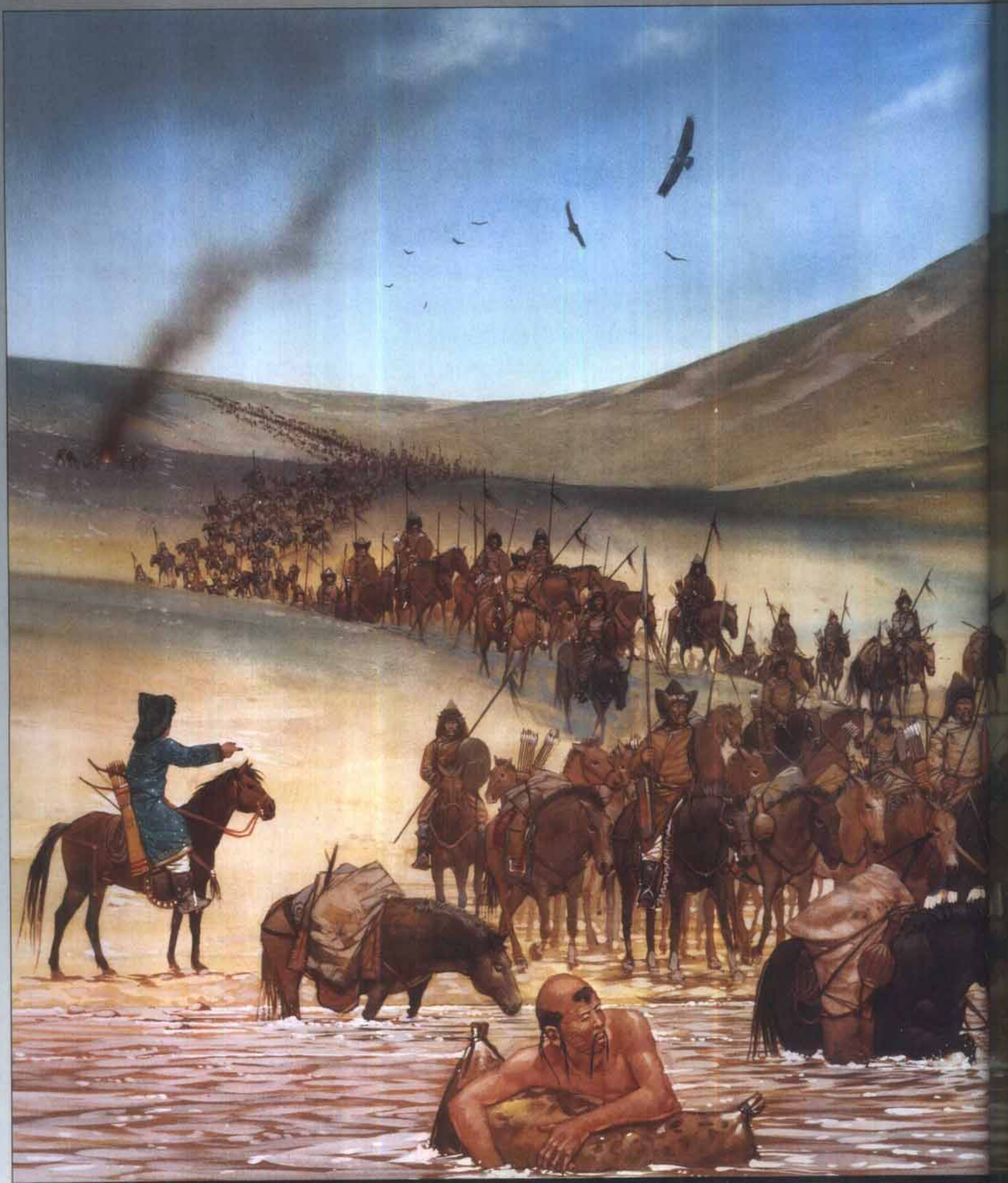
典型的蒙古包如图所示，直径约 4.5 米，由柳树杆和格子块与生牛皮捆在一起做成，再蒙上几层油毡。层数依天气而定；最外层经常用石灰或骨粉刷白。里面地上铺着毡子、兽皮或毯子，格子上装着牛角以挂肉和武器。一家之主一律面南而坐，正对着蒙古包的入口，坐在中央炉子后的椅子上，女眷在东，男眷在西。大多蒙古包搭起来都很快，可由驮马载着，但是大将用的有时太大，要一直竖着，大牛车才运得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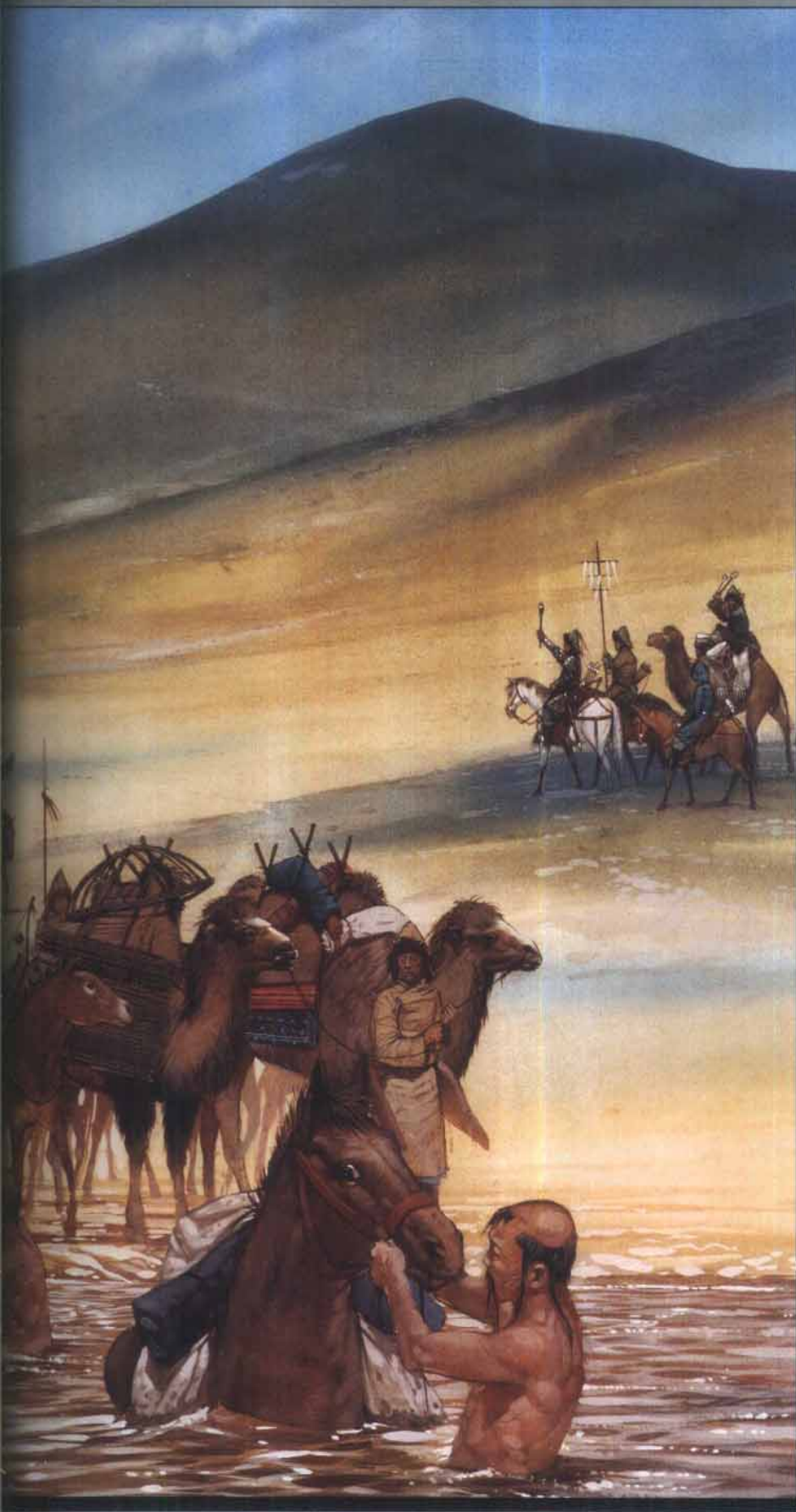
城宁夏这一堡垒长期阻滞。同样，难以应付的长城也曾让他们止步不前。成吉思汗在北方的野狐岭虎视眈眈有两年，金帝则纳礼拖延。大汗要的更多，得到的也更多：1 000 名青年男女，3 000 匹马，大量黄金、珠宝和丝绸。后来，他一听说金国皇宫在黄河边的开封设了总部，便下令全线出击。

蒙古部众完全靠人多突破了长城，攻守双方都付出了惊人的代价。1215 年 5 月，他们攻入中都的城墙，帝都变成了废墟——宫殿被抢得空空如也，所有房屋被夷为平地，全城人口所剩无几。用蒙古人自己的《秘史》中的话说，这是一场“辉煌的屠杀”；其纪念碑，如同后来的旅行家们所描绘的，是堆积成山的人骨和马骨。

留在中都的金朝官员只有几个幸免于难。其中有一个 25 岁的耶律楚材，是拥有蒙古血统的贵族，其尊严之态和对金之忠给成吉思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汗因此予其职位在身边陪侍。这个年轻的士大夫被接受后很快成了成吉思汗的一名主要谋臣，对蒙古领导层起了节制的作用。他劝阻了不必要的破坏，建议不要把北中国的耕地变成牧场，并阐明了如果农业与采盐业、金属采







蒙古骑兵分成大队行进，经常拉开数公里，靠一种由旗帜、烟火与火把组成的精密信号系统协调动作。战场上用骆驼驮着的一种大铜鼓来敲响冲锋鼓，挥舞牦尾旗来传令。

每个士兵作战装备都很充足，携带弓、箭袋、厚皮蒙面的柳条盾、套马索，左前臂内侧绑着匕首。另外还有一只大皮鞍囊，用来装食物、备用衣物和工具，并可充气作救生衣，如本图蒙古军涉河时所用。轻骑兵配有一柄短剑、两三支标枪，穿紧身多层衣或漆皮连缀的胸衣。重骑兵则身披铠甲，穿牛皮或皮包铁片做的胸衣，手执弯刀、战斧或狼牙棒、带钩长矛（以便把敌人拖下马鞍）。

整个大队之后是庞大有序的供应队——运装备和粮草的牛车；操作攻城器械的中国技师；架桥、修桥技师；搞精神宣传并疗伤的萨满僧侣；分类登记战利品的官员；一队女工，她们不仅准备食物与装备，而且还参与扫尾工作，如割断负伤敌人的喉管。

行进中的军队

执杖指挥官在由船链成的浮桥上观察战斗进行情况。这张波斯图虽只表现了交战的一方，描绘的却极可能是蒙古人横跨底格里斯河攻陷巴格达的情形。此类胜利的取得要归功于蒙古人使用的中国的围城机械，经特地调整，可由驮马分件运送。撒马尔罕城陷后应用了先进的花拉子密机械学，使这些机器如虎添翼。弩炮（下左）装上了配重体，射程从100米提高到了300米开外。这种炮也用于野外作战：1241年4月11日，在七门弩炮的炮队隆隆炮火掩护下，蒙古人渡过了匈牙利境内的绍约河。

矿业持续繁荣的话，蒙古如何可从税收与贸易中获利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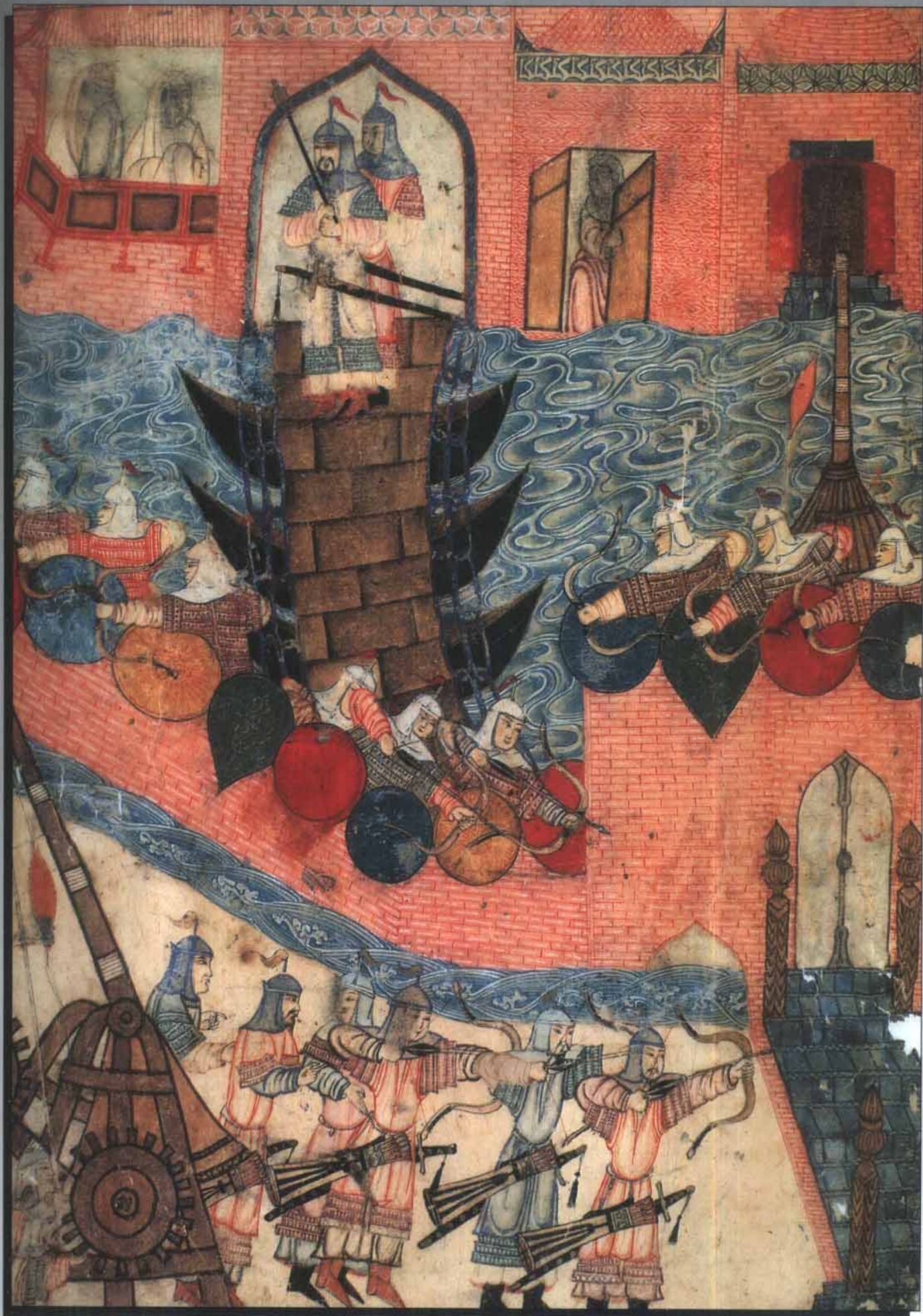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虽然听取了他的大多劝告，自己却从未再涉足中原，而是撤回到了他在外蒙古的大本营帐篷中。他的将领木桦黎逐渐在接下来的17年中，把整个中国北部置于蒙古控制之下。成吉思汗自己开始关注西方，向边界的伊斯兰世界国家发起了攻势。

1217年他的将领哲别征服了夹在西藏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邻国哈拉鲁，它当时在一个乃蛮族流亡首领统治之下。接下来蒙古人与花拉子模国内的西方新邻居建立了贸易关系。花拉子模在突厥人统治下，包括土耳其斯坦、波斯、阿富汗大部及北印度一部分。若非花拉子模国王穆罕默德沙的极端挑衅，蒙古人或许会再度折而向东。1218年，一支受成吉思汗保护的庞大的穆斯林商队遭到花拉子模边境城镇奥特拉尔总督的抢劫，商人被谋害。可能该总督把商队看作了刺探情报的掩护（这是司空见惯的蒙古伎俩），或是其贪心在作怪。反正大汗要求引渡其人。穆罕默德沙非但拒绝了，而且砍下了一名派往其撒马尔罕宫廷的蒙古使者的头，以示蔑视。

此举促成了蒙古人进入西亚，由此激起的不可抗拒的怒潮漫到了东欧。为了报仇，成吉思汗征募了所有17到60岁的蒙古男子入伍，亲自率领约200 000人向花拉子模进发，包括中国来的约10 000名围城技师，这些人建造操作的大机械弩炮现在变得必不可少。在花拉子模，没有士兵敢与蒙古骑兵在城外作战，抵抗集中在设防的城市，尤其是布哈拉、撒马尔罕、内沙布尔、梅尔夫、赫拉特、巴尔赫与古尔根。但是没有一座躲得过成吉思汗的震怒。在一场持续仅三年的战争中，足有数百万男女老幼死于刀剑之下。

正是在这场对穆罕默德沙的战争中，蒙古人获得了无比残暴的名声。他们在自己人中惩处懦夫，奖励勇士，对所有的外人做法却恰恰相反。任何城市持久的英勇抵抗只能带来蒙古人更大的报复。他们攻陷座座城池，屠杀其民众，或在围攻其它城市时把这些人赶在前面作人墙。当察合台与窝阔台所部军队最终俘虏了冒犯蒙古人的奥特拉尔镇总督时，他们往其眼睛和喉咙里灌银水，把他弄死了。

确实，蒙古人一味把屠杀作为消除反抗的手段。敢反抗的城市中的居民有时被蒙古军围在一起杀戮，蒙古军按令要割掉一定数量的耳朵，成袋拿回去作为完成定额的依据。内沙布尔陷落后，幸存者全部被砍了头，男女老幼的头骨堆成了三座金字塔。连狗与猫也被杀死；该城就这么不复存在了。在花拉子模全境，蒙古军的凶残行径不胜枚举；当时的历史学家记录下了惊人的死亡数字：梅尔夫700 000；赫拉特1 600 000；内沙布尔1 747 000。假如这些数字经过了夸张，那么蒙



古人只会更加满意；他们通常先派奸细到要攻打的城市中去制造恐慌。

同时，哲别与速不台这两个将领率军把穆罕默德沙一直追到了里海；穆罕默德沙因胸膜炎死在那里一个近海小岛上。追击途中蒙古军横行于波斯西北部，击溃了亚美尼亚国王乔治四世派遣的一支万人大军，然后向南行进，打败了格鲁吉亚人、伏尔加草原的钦察突厥人和上伏尔加河的保加尔人。至1223年，蒙古军已牢牢地盘踞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虽人数上处于劣势，仍打退了一次次反击。

至此，蒙古人暂时停止了这种在20个国家大获全胜的西进。现在，成吉思汗专注于一个新的、紧迫的目标：镇压无视他发出的同花拉子模动武的号召、现在又公然反叛的西夏唐古特人。这是他最后一次军事行动。1227年，他在节节胜利之后等待唐古特王的觐见时发高烧而死去。

此时距成吉思汗最初率蒙古人走出贫瘠的家园仅仅20年。其间他打破了中亚伊斯兰势力，消除了强有力的金国。他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征服世界。现在他一死，这一使命便落在了他后代的身上。

成吉思汗已将其帝国分为从属的可汗封地，由其儿孙统治，统一听命于爱子窝阔台。不过在两年后蒙古的忽里台上窝阔台才被选为大汗。于是，蒙古的战争机器又积极活动起来，破坏力不减当年。

窝阔台统治下的最初几年，蒙古人完成了对中国北部的征服，征服了朝鲜，对中国南部宋朝统治者宣战，进军到了波斯北部、伊拉克北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接着，在1236年，东欧成了这支15万人军队的首选目标。大军名义上由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指挥，实则主要依赖资深将领速不台的作战天赋，意在稳固拔都的继承地。成吉思汗之子术赤死后，拔都与其兄弟窝儿达一起分得四个可汗地中的西部一个。窝儿达得的是西西伯利亚，拔都所得的是伏尔加河外界限未确定的一片地区。蒙古在该地区的权力尚需全面维护。

拔都所部北征西讨，击败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保加尔人和南方草原的库曼人，然后侵入了基督教的罗斯。在一场闪电式的冬季战役中，他们征服了罗斯托夫、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1238年才暂停作战转而休整。1240年12月，他们攻陷并摧毁了基辅，继而于1241年4月在利格尼茨打败了一支波兰军队，劫掠了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然后向南占领了匈牙利全境。

看来蒙古人已摆好架式要横扫中欧和西欧分裂的基督教诸国了。但是在1241年12月，对欧攻势突然停止了。因饮酒和纵欲过度而身体长期受损的窝阔台大汗死在了哈刺和林，他在西蒙古建立的首都。该选新的汗了，因此所有的蒙古首领都被招到了忽里台之上。游牧民侵略者涌回了草原。

窝阔台的儿子贵由暂时作了大汗，但在1251年大汗位传给了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蒙哥。在蒙哥的精明领导下，8年内蒙古的统治向东西方均有扩张。在其

吃苦耐劳的伴侣

一位中国画家眼中
所见的蒙古猎手与其坐
骑站在一起，彼此均矮小
粗壮、不可分离；旁边是
倒地的猎物。

因勇敢顽强而在全亚洲备受重视的蒙古马，无论平时或战时都是其主人最宝贵的财富。它们的高度约当 14 至 15 只手的宽度，身体粗壮，额宽腿短，数量多达 10 000 匹或更多的马匹组成庞大的马群野生在一起，蒙古人用弹性长杆末端连着的套索从中捕获看中的坐骑。

这些骏马得到了至为细心的照顾，小时候被养驯，3 岁才可以骑，路途特别长时要数次换新马，以便马匹能尽可能得到休息。成吉思汗对马的待遇定下了严格的规矩，如其中一条是，禁止牵戴着嚼子的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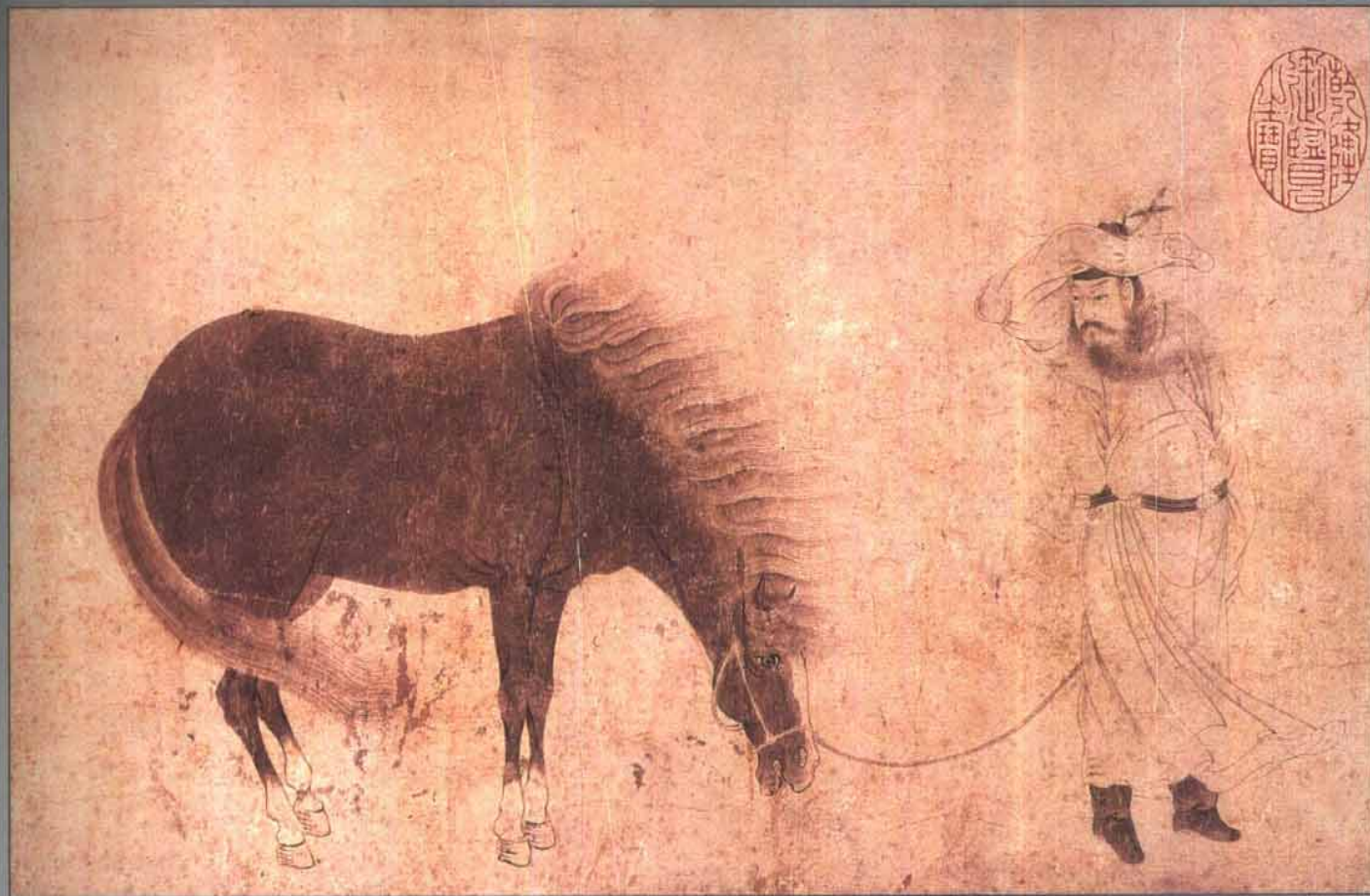
正是这种马的素质和高明的用马之道造就了蒙古人军事上的优势。尽管蒙古军人数通常不多，他们在战场上的机动性却使得他们的人数看上去翻了一番。而他们前进的速度能让最警惕的敌人吃惊。行军时，每个士兵身后至少有三匹马跟着，通过定时换马可连续奔驰数天，进食就在马鞍上，当食物不足时才歇一歇，在最弱的马身上割开一条血管喝马血。据说拔都汗的先头部队是以每天 100 公里的速度挺进到匈牙利的。

战时之外，马匹在礼仪规矩和民间传说中也扮演着显著的角色。虽然可以宰食瘦弱的马，但绝不可以宰食在战场上骑过的马。有些蒙古人崇拜速度与耐力非凡的坐骑，最后会把其皮毛与头骨当做神圣的遗物保存起来。事实上，据西方传教士约翰（普拉诺·卡皮尼的）称，大酋长死后按惯例要葬在母马、种马和小马的旁边，以便他在来世可以养育马匹。



在一轴 13 世纪晚期的日本画中，忽必烈汗的士兵被描绘成穿着豪华的中国式长袍，手持中国式乐器。然而，虽然采纳了异国风俗，这些士兵还是骑在蒙古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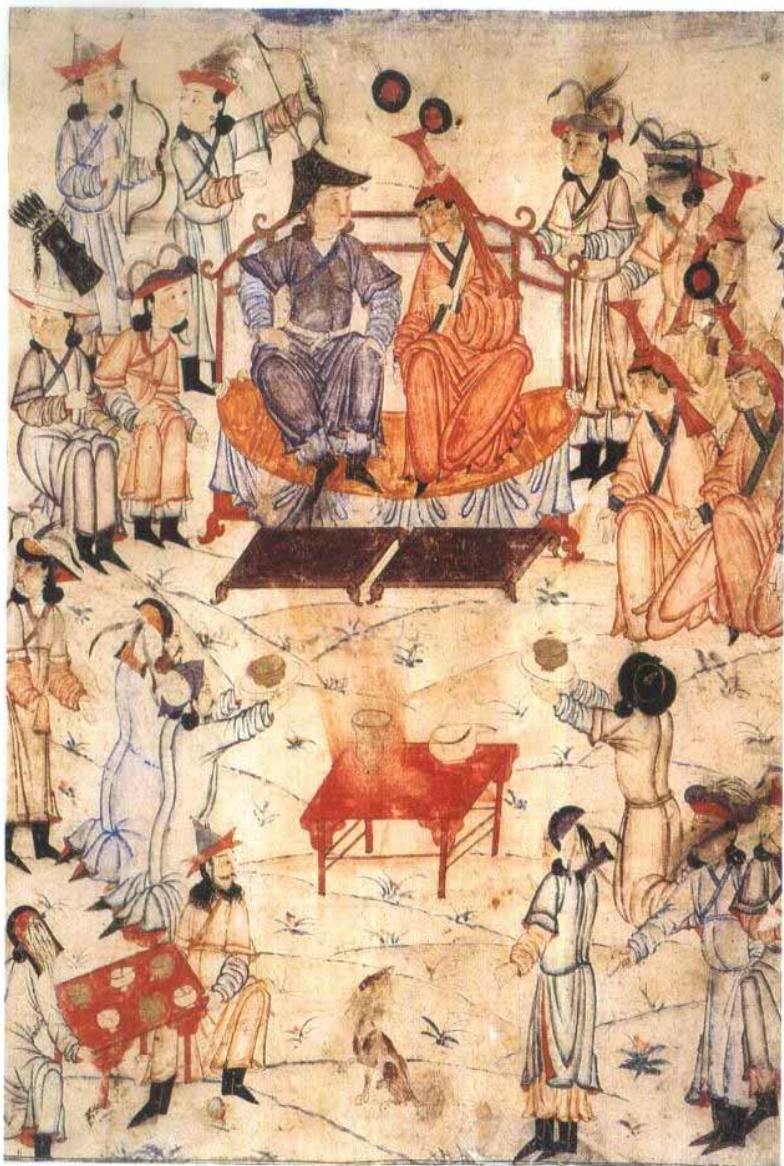




在忽必烈汗的首席画师赵孟頫所画的这幅画中，一匹马与马夫体会着北风的刺骨。有些中国画家拒绝为蒙古征服者服务；没有拒绝的则发现他们所托庇之人除了要有关马匹的画外很少要其他东西。



在这张波斯小幅画中，展现了穿着蒙古铠甲的冲突双方部队。画家在此描绘的是更修长、更快速的马，它们是蒙古马与阿拉伯马杂交的结果。



一位汗王与其正夫人准备就餐，侍卫与廷臣按蒙古礼仪排列，男子在汗王右侧，女子在左侧。蒙古人从未丢掉对传统的煮肉与马乳酒的嗜好，消耗数量很大。但他们对在征掠之地所遇到的美味佳肴也产生了兴趣。例如，在侵占花拉子模期间，成吉思汗开始对设拉子产的波斯酒情有独钟。

兄弟忽必烈的率领下，蒙古人深入到了宋朝内地。蒙哥与另一个兄弟旭烈兀完成了对西亚的征服，几乎毁灭了刺杀团，一个用暴力恫吓中东160年的狂热的穆斯林教派。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摧毁了伊拉克富有的首都巴格达。据14世纪历史学家马其里斯记载，死去的两百万人中有哈里发，穆斯林世界的宗教领袖。

1259年蒙哥正在攻打中国时死于痢疾。他的死对于穆斯林中东如同窝阔台的死对于基督教欧洲一样，都是极大的福音。当时，旭烈兀已经冲过了叙利亚，正打算袭击由新夺权的马穆鲁克奴隶兵统治的富有、强大的埃及。一听到大汗死去的消息，他立即东去参加蒙古的传统的忽里台，留下一支主要由蒙古人领导的、减员严重的突厥人的部队继续作战。其结果是一场军事灾难。1260年9月3日，在巴勒斯坦境内约旦河附近的阿音札鲁德，万人之众的蒙古军被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忽秃思的部队缠住作战。蒙古军人少技弱被全歼。接下来，马穆鲁克人吞并了叙利亚，把蒙古人赶过了幼发拉底河。阿音札鲁德之役打破了蒙古军不可战胜的名声。另外，它还标志着蒙古军向地中海扩张的终止。不过，他们继续控制着中亚和西亚，该处兵源充足——尤其是游牧突厥人，很能适应蒙古人的凶残本性。19年后在东方，忽必烈对宋的最终胜利又把约9000

万人的整个中国民众置于蒙古统治之下。

蒙哥死后，蒙古帝国开始分解成几个独立的诸国，疯狂追逐各自利益。旭烈兀及其继任者伊儿汗们在波斯居统治地位。窝尔达与拔都的后代自其伏尔加河支流边的都城萨莱控制着钦察汗国——因拔都的绣金帐篷后被称为金帐汗国，强迫几乎全罗斯的王公纳礼进贡和提供军事支持。在撒马尔罕，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裔统治的察合台汗国统治着中亚草原。

同时，对蒙古腹地和中国的控制权引起了蒙哥的两个兄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争执。历经4年内战忽必烈才最终于1264年获胜。虽被称为大汗，他却从

在13世纪英国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所著《大事纪年》的一幅插图中，狞笑着的蒙古人吞噬受害者；右侧，一匹马在吃树叶。在蒙古侵占波兰和匈牙利期间，惊恐的欧洲人相信有关蒙古暴行的各种传闻，教士们称这是作为上帝对世间罪孽的惩罚而降诸人类的。吓坏了的修士伊沃（那旁的）自奥地利写道，“处女被强奸至力竭而死；然后其乳房被割下以作蒙古头领的佳肴。”

更真实的记录出自修士约翰（普拉诺·卡波尼的）和威廉（鲁布拉克的）之手，他们是最先前往蒙古的使者。不过即便是约翰修士也曾写过一处地方，他听说该处“每个男子都像狗一样”。

未有过像成吉思汗那样的对全体蒙古人无上的君权。察合台汗国与金帐汗国都公开与他作对。这次不只是部族世仇分裂了蒙古人。在传统主义者中产生了根本的宗教与思想分歧，他们偏爱干旷草原旧有的生活方式，对改变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环境的中国的忽必烈和波斯的伊儿汗等统治者日益小心。这种分歧水火难容。

蒙古人的新大汗是在与其前任们截然不同的模子里铸成的。其前任者是文墨不通的纠纠武夫，他则有文化有教养，政治上精明灵活。成吉思汗难舍难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视其心爱的亚洲草原为大汗们永久的根据地。而忽必烈则渴望在其先祖荒凉的家乡之外创建一个更高级的新的蒙古文明。

因为生在1215年，其祖父劫掠了金国都城中都四个月之后，忽必烈在受中国思想影响的环境中长大。其教育要大部分归功于一位儒家学者姚基。在经年的讨金伐宋中，他在趣味与习惯上越来越中国化，以至于觉得中国是自己必然的家。

1256年，忽必烈下令建造其在中国北部的避暑行宫，地点在开平，后更名上都。四年后，他被举为大汗，又在紧贴中都废墟的东北处选址建造其冬季都城。至1270年该城已蔚为壮观——宫殿、庭院、花园、假山、人工湖迤邐错落，湖里鱼儿嬉戏。

直到1279年，成吉思汗首次入侵后约70年，忽必烈才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最后的胜利有所延迟，一方面因为蒙古的骑兵式作战不适应炎热南方的稻田；也因为敌手比西亚的任何一处都人多、顽强、先进。不过，忽必烈没有等到全面胜利才维护权力。1271年，宋政权的最后残余退守东南之际，他宣布自己为蒙古元朝的第一位皇帝，此后便生活在与其游牧出身截然不同的富裕与讲究之中。其宫墙上贴着金银，饰以龙、兽、鸟图形，本人则有蒙古与中国谋士和廷臣前呼后拥；从12000名亲兵中选出的3000武士轮流守卫；无数



姬妾听命伴侍，她们又有太监伺候。他接见来自全亚洲及更远处的使者与商人，举行的宴会上宾客可达 6 000 人。

这位蒙古人的大汗以传统的中国的眼光看待自己。作为名正言顺的天子，从世界的正中心中国发号施令，世间各色人等都要纳礼进贡。忽必烈这样把自己与中国之事等同，煽起了蒙古内部反叛之火，他最终被迫派兵去收复旧都哈刺和林。他的军队获胜，可是影响不长。忽必烈汗不愿住在哈刺和林；亦不愿在草原长久驻军。中国对于他比蒙古帝国所有边远地区都更弥足珍贵，甚至比蒙古本身还要宝贵。



在一次出猎途中，穿着华贵貂皮大衣的忽必烈汗有一名穿中式服装的女子陪伴。忽必烈虽然采纳了中国宫廷的生活方式，却从未失去其蒙古人那种对狩猎的热情。大汗并不节制享乐，出行声势浩大，除了有数目庞大的猎犬和猎隼，还动用训练过的狮、豹和鹰。他人也要躬逢其乐：马可·波罗记载过，在 12 月和 2 月之间，忽必烈命令其驻辟处方圆 100 公里的所有人专事驯鹰、打猎。

西方屡次向蒙古主动提出过多项提议，其意在把他们转化为基督教徒。这些冒险行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名修道士的传教活动。前者在 1245 年的传教活动是记载中的欧洲首次亚洲探索。不过其目的却并未实现；大汗认定教皇只是在表示敬意罢了。威廉的境遇也不怎么样：他在 1254 年这样哀叹未能转变蒙哥：“若我有摩西创造奇迹之力，或许我也就说服他了”。然而在 1266 年，一种更进一步的机遇几乎偶然般地自己跳了出来，该年忽必烈在宫里接见了两个因战争而被迫逃离了预定路线的威尼斯商人。他们的名字是尼科洛·波罗和马蒂欧·波罗。

忽必烈汗对这两个欧洲人印象至深，竟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建议。他说让教皇派 100 个精通宗教和艺术的人到他的官里来。如果这些学者能证明基督教比其它宗教具有优越性，那么他与他的臣民都将接受洗礼。大汗向波罗兄弟保证，那样他的国土上的基督徒将比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的都要多。这两个威尼斯人掉头西行，可是没有把事办成；1275 年他们又回到忽必烈的皇廷时，只能交给他一些教皇信件和他索要的耶路撒冷的圣油。不过，他们自己还带着一名同伴：尼科洛 20 岁的儿子马可·波罗，忽必烈看来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聪明的威尼斯青年，任用他为特使达 17 年之久，派他遍行蒙古帝国办事。这些旅程，加上他对忽必烈皇廷的熟悉，为他提供了《马可·波罗行纪》的材料。该书以口述

这个 37 厘米高的陶伶的滑稽跳姿让人想起忽必烈汗皇宫里特点的许多戏剧节目。中国戏剧在蒙古君主们的庇护下繁荣起来，大多主要城市的街区戏院可多至十几个。歌唱加舞蹈那种单纯的娱乐节目演化成了有全面指导的戏剧，处理严肃题材，使用口语对白。宫廷故事尤为热门。有些文士不再能保得住大汗的文职职位，转而写作中国古典戏剧的基础——喜剧和悲剧，从而提高了这一行业的声望。



给专业传奇作家的形式记进了马可·波罗的旅行，展示了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及其皇帝的非常宝贵的第一手图景。

忽必烈汗，依马可·波罗所述，是中等个头，身材匀称，“肤色粉白，好似玫瑰，黑眼有神，鼻子英俊”。他约有 100 多个儿女，但只有儿子才算数：为数众多的年轻姬妾生了 25 个儿子，4 个法定夫人生了 22 个儿子，每个夫人都自有家庭，服侍的美女不下 300 名。寝宫之外，忽必烈的消遣是打猎和宴饮。去狩猎时，他坐在四头大象一起驮着的木料考究的象轿里，训练有素的猎豹、猎犬和约万名驯鹰手的猎鹰环侍周围。他庆祝许多节日，尤其是新年，到时其 5 000 头大象游行受阅；到他生日时，他身着金箔衣，与衣着同样漂亮的 1 200 名贵族欢宴。

年轻的马可·波罗为忽必烈富裕的生活方式所倾倒。他惊叹大都和杭州的华美，这是他见过的最美妙的城市。以前从未见过的日常用品也让他大为惊异——瓷器，石棉，一种“燃烧时间长的黑石头”（煤），及寻常使用的纸币，“由桑树皮制成”。不过事实上，他的印象只不过强调了文明比欧洲先进。他所看到的奇观很少可以归功于忽必烈汗和蒙古人。

那少数几个功劳之一是一种高效的交通系统。从大都辐射至蒙古帝国最边远角落的新路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使得前往中国较以前更容易。国内交通通过拓延大运河而大为提高——大运河造于公元前 5 世纪，连接扬子江和黄河——现在它从杭州到北方的都城延伸约 1 600 公里。另有十分便捷的驿路，通过约 10 000 个宏伟的驿馆运作，彼此相距约 40 公里，均养有数百匹马。

马可·波罗大肆吹捧忽必烈的这些成就。他还强调了这位皇帝的慷慨，免费发放谷物给“因疾病或其它不幸无力劳动而贫困的人”。但其观点是片面的。在中国人自己看来，他们已受惯了自己文明的种种益处，忽必烈的统治在很多方面都是场灾难。尽管这位大汗是全面认知农业与贸易重要性的第一个蒙古君主，其 23 年的统治却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变本加厉的贫穷。他想扩大土地生产力的努力不幸失败，鼓励商业又偏重非中国人利益，以至于外贸利润从本国流失了。

蒙古人本身没什么管理才能。成吉思汗与窝阔台的谋臣耶律楚材曾警告过：“可马背上得天下，不可马背上治天下。”大汗们听了进去，却无法建立自己的有效的管理形式。在中国，他们保留了当地由官僚阶级精英治理的方式。这不失为明智的权宜之计。可是现在该系统异乎寻常地低效，主要因为中国官员数量有限，重要职位又给了蒙古人和受宠的外国人。

此外，忽必烈从未放弃其蒙古先祖的那种萨满信仰。马可·波罗写道，在大都，忽必烈常设着约 5 000 名专职星相家和占卜者，他们造就了他对当地人

这枚印章由忽必烈颁给一个部队将领，可能亦伴有牌子，不识字士兵很容易辨认的一种象征权威的金属板。该印章的印文显示出法帕字体，一种较早的欲在文字上统一蒙古各地的尝试。蒙古人没有字母，所使用的干草原维吾尔文字并不真正代表蒙古发音，忽必烈于是委派一个西藏喇嘛设计一种不仅代表蒙古语，而且代表汉语和帝国其他主要语言的文字。该喇嘛设计成功了，可是其新字母系统一直未被广泛接受，维吾尔文继续被使用着。



的很深的不信任。结果，中国得到了一种种族上和文化上都分裂的等级结构，以这些军方骨干为首：几十万蒙古人对经济无所作为却又免交税赋。第二等级享有特权的公民包括其他非中国人，如波斯人和突厥人，他们做着高官、经营企业或从事买卖。像蒙古人一样，这些外国人享有免税及多项特权，包括优先使用官营商道和邮驿服务。

全部人口中的压倒多数是三或四等公民，前金国的臣民差强于被当作低中之低的宋朝人。他们认为其外来的统治者粗俗野蛮，却又被惯例和法律当作劣等人，比如，不得学蒙古语或嫁娶蒙古人。他们天黑后不许上街，亦不许携带兵器。

忽必烈进行的耗资巨大而所得平平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蒙古管理经济的无能。他的目标是把他的中国建为世界真正的中心。为达目的，他派兵对日本和今天泰国、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爪哇及菲律宾一带的王国，进行了非决定性且通常损失惨重的征战。

蒙古人的作战本领倚重于骑兵，在东南亚丛林中无甚用场。大汗的手下在对日本的两次大规模渡海远征中也未再成功。1281年的最后一次远征以数万蒙古人被俘或被杀而告终。忽必烈未再报得此次羞耻败绩之仇。1294年

他死去，时年 79 岁。他虽未能效法其祖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民众，却也

功不可没。他对中国的征服带来了一个分裂达 350 年的国家的重新统一，但是其元朝尽管又存活了 74 年，却无力再寻新的征

服对象。由于忽必烈的子孙间的对立、蒙古贵族的日渐骄横暴虐、中国地主贵族的贪婪腐败、通货膨胀造成的纸币贬值，元朝的下坡路走快了。削弱税收、洪水不断再加上其他自然灾害，使得内战在所难免。

若干反叛团体起而反抗其异族统治者。其中最强大的一支为农民出身、当过不长时间和尚的朱元璋所领导，他逐渐控制了南方的农村。1368 年，一支农民大军席卷了北方，在象征性的抵抗中拿下了都城大都。事实证明反对

忽必烈的保守者是正确的，在过了几十年穿丝着绸的宫廷生活之后，新一代蒙古军人出现了：士兵不但军纪松弛，而且缺乏传统的打仗欲望。随后，朱元璋宣告自己为新的明朝的第一位皇帝。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甚至未逾百年。

蒙古腐朽不只限于中国。从 13 世纪晚期起整个蒙古帝国快速衰落。内讧不休与领导不力打碎了成吉思汗的蒙古统一之梦；当一度自豪的蒙古军队用

意在占领而不在征服时，他们纪律废弛，军心涣散了；尤其是在中国和波斯，由于折服于高级得多的文明的微妙影响，蒙古势力给侵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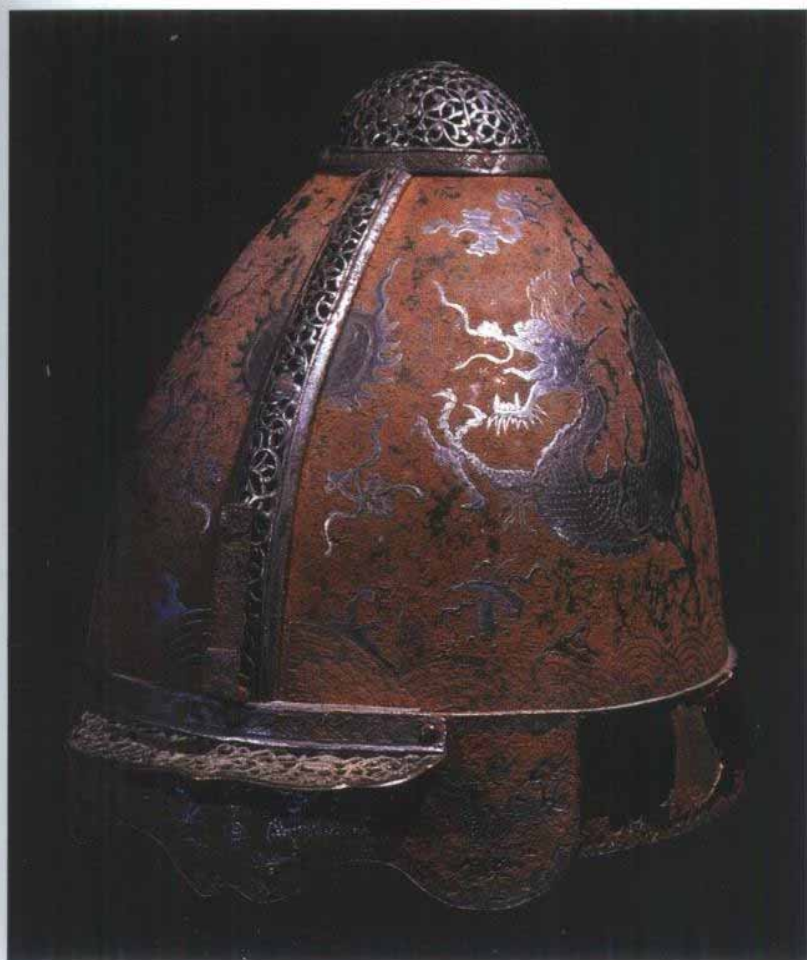
在波斯的伊儿汗国，蒙古人把这里弄得一片凋敝，最终被迫起用波斯官吏来恢复一塌糊涂的经济。在这里，征服者们比在中国更快地淹没于被征服者的文化中。面对埃及和叙利亚强大的马穆鲁克统治者的威胁，伊儿汗们采纳伊斯兰教也就是政治上不得已的事了。1282至1285年在位的汗第一个这样做，取了穆斯林名字艾哈麦德，并用了苏丹称号。不过轮到他的继任者当政时，佛教与基督教势力占了上风，造成了经济混乱：官僚腐败堕落，农民惨遭剥削，滥用纸币通胀肆虐。1295年秩序得以恢复，靠的却是伊斯兰的面子。这一年伊儿汗合罕宣布他皈依伊斯兰教，预示着一段持续不断的穆斯林伊儿汗的统治，直到1335年，旭烈兀的男系无嗣而终。这样算来，波斯汗国仅延续了80年。

蒙古在罗斯和中亚的统治要持久得多，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中央集权的传统不那么深，使得蒙古人管理经验不足的缺陷暴露得不是那么明显。与波斯和中国相比，这些地方原始蒙昧，征服者在这里不需要精密的政府机器。刀剑之力足以收获贡礼税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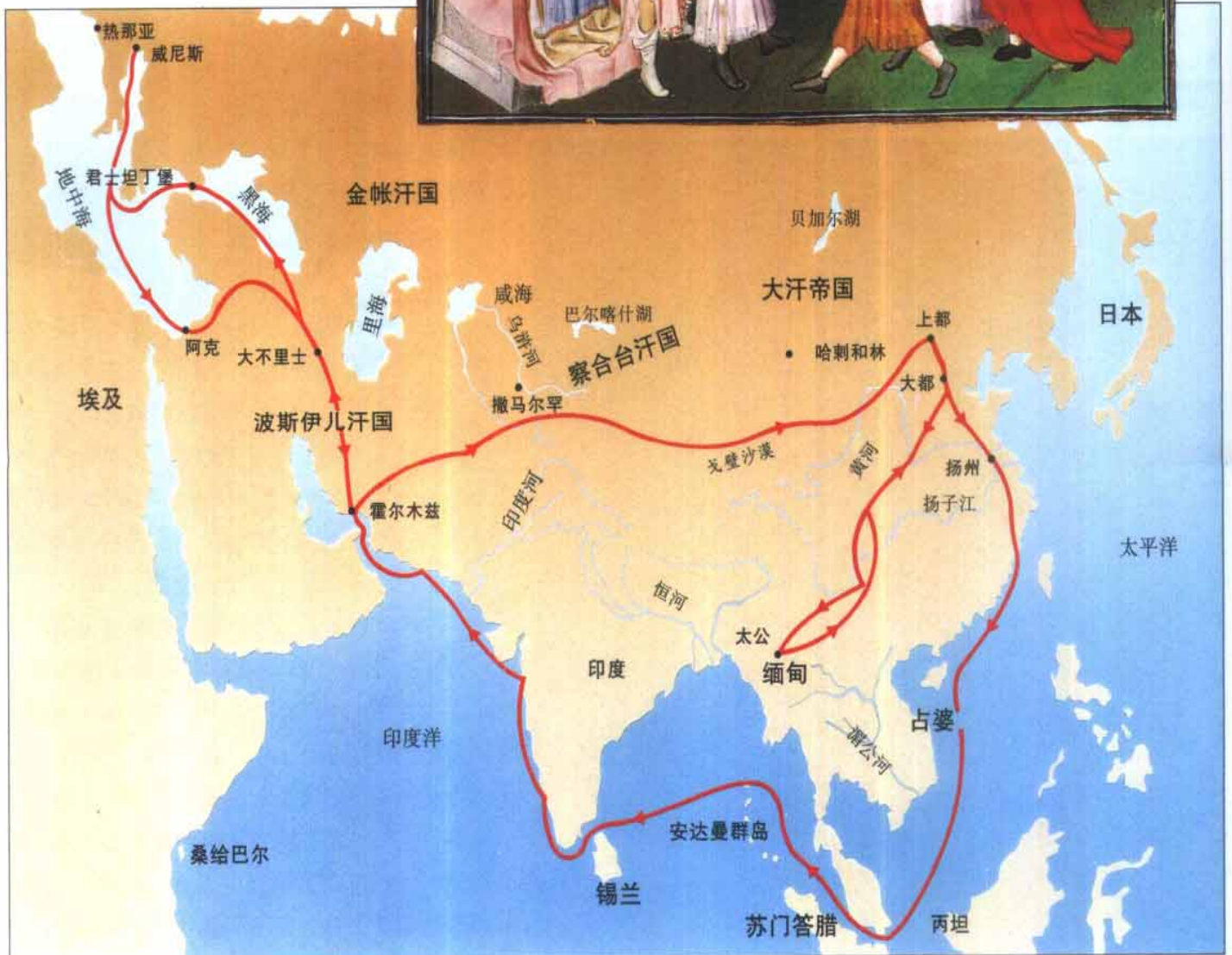
金帐汗国以罗斯本国分裂的公国为代价求得了繁荣。当地各公国的君主获准保其王位，只要他们前往萨莱纳贡效忠。这一系统运行了130多年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后虽渐失作用仍延续了约两个半世纪。确实如此，直到18世纪，克里米亚的最后一个独立的蒙古政权才被俄罗斯人推翻。

与此同时，东方的蒙古传统主义者与西方那些信奉伊斯兰教并大用波斯语的蒙古人发生了多年的内部纷争，察合台汗国因而被致命地削弱了。终于在1369年，一个新的领袖出现了：这是个在撒马尔罕夺了权的士兵，后来权力扩展到了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的近全部蒙古领土上。他一般被称为“跛子帖木儿”，注定要成为整个欧洲臭名昭著的

这顶中国造镀金头盔系为高官所制，式样与所有蒙古骑兵戴的铁帽或皮帽相同。正如所有大汗士兵的帽子和头盔一样，这顶头盔最初应有两条从头顶垂下脑后的红色饰带。



一个旅行家的传奇故事



泰摩兰,全部中西亚的祸水。帖木儿的兴起标志着蒙古帝国的完结。至15世纪初,来自草原地带的征服者已与征服者融为一体,几乎不再作为独立的人种存在了。在罗斯,他们与突厥人、斯拉夫人和芬兰人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一个新的操突厥语的民族,被泛称为鞑靼人。在中亚他们与当地民众——主要是突厥或波斯人——难分彼此了。成吉思汗于1207年所释放的这股破坏力横扫了欧亚大陆,但最终也耗尽了自己的元气。

蒙古帝国鼎盛期疆域东起太平洋,西至俄罗斯的第聂伯河,北自北冰洋,南到马六甲海峡。征服波斯与中国期间,蒙古人得以控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个文明。然而在开创这一庞大帝国的进程中,他们对有组织的管理和艺术科学的进步贡献甚微。事实上,除了更加嗜战,他们没什么东西可给予被征服的民族。

然而,作为军事征服者,蒙古人是许多变化的催化剂,包括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的力量与分布变动。在蒙古人统治下,佛教在东亚根基要强得多,尤其是在忽必烈及其子孙对佛教深有好感的中国。随着巴格达被洗劫,伊斯兰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只是随着马穆鲁克人把开罗定为新都才又兴盛起来。同时,在繁盛的波斯文化庇护下,穆斯林宗教为大多数蒙古人所接纳,远播蒙古人的西部领上。虽然这表示基督教丧失了一个机会,基督教世界的西边一半却逃过了蒙古征服。在自然发展未受干扰的情形下,西方最终得以繁荣,而蒙古统治下的东方则因暴政相传而止步不前了。

此外,蒙古帝国的疆域之广让货物、知识和思想首次得到了国际交流。13世纪中叶的某一时期,亚洲和欧洲的主动脉被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打开,这一由恐怖强迫来的和平相当有效,在大汗名义保护下的商人和使者可相对安全地往返于东西方。各国和宗教的使者在哈刺和林大汗的宫廷中受到了接待。在忽必烈汗的大都,旅行者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形:罗马的教皇使节与印度的佛教和尚混为一处,来自法国、意大利和中国的工匠撞在一起,波斯、爪哇和锡兰的商人逢在一块。

商队路线在亚洲纵横交错,中国陆路、海路均向世界开放。马可·波罗记载道,每年20000只货船沿扬子江而上,载着印度的钻石与珍珠;锡兰的生姜、棉花与细布;爪哇的黑胡椒、白胡桃与丁香。更重要的是,东方的人造物、知识与技能的西流使得在艺术科学上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颇为受益。

最后,对中国的野蛮统治导致了畏惧外来报复。在民族主义狂热的明朝,中国较以往更为孤立自己。那时候,了不起的贯通亚洲的商路因蒙古帝国末期的政治动乱而封闭。但是不要紧。远东的奇迹和财富已不再是秘密,西方可不甘永远干瞪眼空搓手。

马可·波罗与其父行经波斯和戈壁沙漠,于1275年到达了忽必烈汗的宫廷。接下来的17年他作了忽必烈的使节,为作实情调查旅行,他远至缅甸和华南,甚至可能作过扬州城的州官。

马可·波罗1295年终于返回了威尼斯,海上经占婆(越南)、苏门答腊、锡兰和印度。他随身不仅带着一笔宝石财富,还有一系列笔记,其中对他所见有详细观察,对所行国家的报道远及日本和桑给巴尔。后来,在被热那亚人短期投入监狱期间,他把旅行见闻口述给一位狱友写了下来。马可·波罗获释后出版了它,定名为*Dirisament dou Monde*,“世界记述”。前言称马可·波罗比创世以来的任何人都经多行广。确实,他展现了一个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几乎全然不知的世界,他走过的有些路线又过了600年才有欧洲人走过。

他描述的奇事引起了人们的普遍神往,该书亦重印多次。本图(上,左)取自14世纪的一个版本,画的是大汗的子民在用纸币——西方不知为何物的商品——换银子。在许多西方人看来,纸和银子一样值钱的想法荒谬绝伦,就像写石头被当作燃料(煤)烧的记述一样。事实上,据说马可·波罗1324年在临死前,曾被要求收回其无稽之谈。他的回答是,他连所见的一半还没讲完呢。



日本幕府的兴起

2

1185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编年史家们这样写道，日本本州与九州岛之间狭窄的关门海峡内血染波涛。咚咚的战鼓在岸边崖壁上回响；指挥官的喊话与伤兵的尖叫，险些淹没了对于两族战船相遇时箭射铠甲的无情叮叮声。双方为之而战的，除了对手的毁灭，是对亚洲东翼巉岩不断又火山连连的群岛的控制，这些群岛形成了与世相隔的日本王国。

交战之军由日本武士阶层的最强者平氏与源氏率领。在数量上，源氏所部占优势，其战船数是平氏方的二至三倍。但是平氏士兵在海战方面要高明得多，也可能是平氏的将领这样认为：源氏或许骑马作战还行，海上打仗可是鲜有经验。此外，平氏人占着他们所认为的道义上的优势。其战舰之后的船上载着日本贵族的精华，他们或身为平氏，或与之有姻亲。正中是天皇本人，7岁的安德与母亲和祖母在一起，她们都出自平氏家族，手里拿着王权的标志——神印、神镜和神剑——它们老早就成了皇权的三大象征。但尽管有如此耀人的靠山，平氏也未必能取胜。双方的预言占卜者都看到了征兆——一面神秘的白旗在空中浮荡，一群海豚突然出现——意味着上天有可能眷顾源氏。

征兆没有撒谎。源氏只守不攻等待时机，直到潮水变得对他们有利。然后他们以飓风般的箭矢对敌人狂攻猛射；源氏士兵登上了一艘又一艘平氏船只，杀死水手，夺得船舵。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汹涌的海水与两岸的峭壁使得登陆艰难，意欲亡命者只好乞命于源氏的挠钩了。

甚至是在皇室看来，现在失败也在所难免了。但是安德的平氏祖母不肯让自己、孩皇帝或是皇室标志落入敌手。她穿上深灰色丧服，教安德双手合十诵念祷文。然后，她怀抱安德、手握神剑跳入海中。有了这个例子，孩皇帝的母亲拿石头增加了袖子的重量纵身跳出舷外，一起跳的还有一群宁死不受辱的男女侍臣。

孩皇帝沉到浪下很快就被淹死了，其长者们却未能尽追随他而去。源氏的船工用挠钩钩住了女人们的黑色长发，把狼狈而又痛苦的她们拖到了安全处。神印与神镜也失而复得：怀抱神镜的那名平氏妇女长袍被源氏人的一支箭

这个正怒目而视要作恶之人的金刚力士，或“霹雳好汉”，最初是在庙门口镇守庙宇的。作为官定国教，1185年军人掌权时佛教已在日本广为传播了。下一世纪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教派为王孙以至农夫提供简单的觉悟之路，其信徒的地位惊人地提高了。

钉在了甲板上,因而跳海未遂。神剑却似泥牛入海,虽有举国最高神社声声祈祷,技勇双全的潜水员次次探寻,终未能重见天日。

神剑的失踪给其主人乃至全日本的命运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改变。源氏在关门的胜利强烈地改变了国家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治国的方略,掌权者的身份与本质,统治者采纳的价值体系,财富的分布,甚至宗教崇拜的方式等,无不深受其影响。皇权不受挑战的日子结束了:崇尚军人纪律胜于崇尚宫廷礼节、珍视勇敢作战甚于贵族血统的外省武士,现在掌握了这个岛国的命运。

日本群岛被凶险的日本海海流与亚洲大陆隔开,距其最近的邻居有 200 公里,最东部距亚洲大陆约 800 公里。该国虽岛屿不可胜数,大多数人口却住在最南端的本州、九州、四国等大岛上。日本地形极其美丽,高山海拔可达 3 776 米,深谷以外,又有湍急的河流注入无数多岩石的海湾中。然而,风景虽美,却不适宜居住:脚下地层不稳,位于断层带上,常有地震、火山喷发和海

在从镰仓施政的一个军事政权或曰幕府的霸权统治下,日本进入 13 世纪时已是一个强国了。幕府将军们名义上从天皇那里获得权力,天皇住在镰仓以西 480 公里处的古城京都的宫中,事实上只礼节性地行使职权。日本民族集中在本州、九州和四国这三大岛上,在幕府时期国力昌盛,商人与亚洲大陆贸易获利,国内局面安定。不过,对付本世纪后期自朝鲜而来的两次蒙古入侵代价甚巨:1333 年镰仓幕府垮台,日本国再度陷入内战中。



啸。大多数土地不适农业；虽然人们齐心协力开发荒地，汗流浹背修造梯田，也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土地可被耕作。

对这些困难的补偿是以适合种稻的理想气候的形式出现的。季风几乎像钟表走时一样有规律地到来，在夏季带来充沛的降雨，冬季带来较干、较凉的天气。这些条件，加上充足的光照及大部分生长期的副热带温度，对稻子至为理想。其它谷物在如此有限的地方皆未有如此高的产量——这在农田稀少之处是个重要优势。日本人虽也种植黍、大麦、小麦、大豆及各种蔬菜，但基本上——王孙也好，农夫也罢——以稻米为生。

稻谷是整个经济的基础。海岸养活了小的打渔群体，他们拿所捕鱼虾换得一点来自内陆的可贵的谷物，但是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靠所种的粮食过活。耕地被分成大的采邑，通常为贵族、皇室或大寺庙所有。这些地主远在异地，主要是在都城京都，与土地的唯一联系就是按其产量的提成坐等收稻或收钱。地产实际由当地有势力的地主经营——他们是像平氏和源氏一样的武士氏族的成员。作为管家与监工，他们经营采邑，为领主收割庄稼。不过他们不只是受雇的管理者：遇麻烦时他们会拿起武器领兵保卫其地盘；和平时期则统治着乡村，履行正义，实施法律。他们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其影响与权力远远超过了那些偏居京都的地主。

安德的先祖统治这一国家约持续了 1000 年的时间。在最后 400 年的平安时代，权力的源泉是京都——皇室和居统治地位的世袭贵族网络的大本营。但是到了 12 世纪，贵族们开始依赖两大氏族即平氏和源氏了。在都城，这些武士保卫着天皇，捍卫着和平；在乡村，他们平息叛乱，安抚边远地区，并保护乡村采邑，正是这些采邑以其收入维持着城里贵族富足、悠闲的宫廷生活。这些发放薪饷的贵族虽然瞧不起武士，但是他们却需要托赖武士的保护。不过本世纪尚未结束，对日本的控制权却要从贵族的香髻素手滑到军人的孔武掌心了。

到 12 世纪中期，京都的皇宫已不再是日本政界的唯一中心了。天皇本人有其名无其实，基本上成了摆设，其繁文缛节耗时颇多，因此任何寻求有效政治参与的天上要退位也就是正常之举了。接着，前天皇会建立起人员齐备的独立宫廷，在幕后发号施令。同时，其继任者（可能相当年幼）会成为法定君主。两者的并存并非总是相安无事；不同官派之间的对立常常会演进为新老天皇间的权力之争。

这种双桅政治之间形成了一个臃肿的官僚阶层。高级职位牢牢地掌握在通常很无能的世袭官员手中，升迁所托之恩赐有甚于功劳。这种唯地位是念

的等级制度，要求所有成员的生活都要严守礼法，从坐车的尺寸形制到服装的选料花色都有规定。

相比之下，日本的宗教精神反映出了一种平和的宽容：宣扬任何人都能通过消除惧、恨、幻而获得觉悟的佛教自印度经中国传来，并在 8 世纪被定为国教，但是其信徒却从未把它说成是唯一真理。在日本它与其它传统和睦相处，如神道教，该教以最简单的仪式于简朴的神社中敬奉任选的一些古老的本地神祇，他们代表山脉、山谷、处所和自然之力。人们不觉得以下活动相互



在 12 世纪后半叶日本内战的一次有生动记载的事件中，源氏骑兵在本州南岸水较浅的富士门海峡中攻击敌人平氏的船队。这两派之争在 1185 年的关门之战中达到顶峰，源氏大获全胜。在下一世纪里，有关故事成了日本的传奇作品。口头传说的一部分后来被用尚可辨认的现代日文书写下来，这些记述形成了 700 米长卷《平家物语》的基础，本详图即取自该画。

矛盾：敬奉本地神、朝拜佛教庙堂、遵行儒家道义（这是指一些道德和行为准则的形式，它把和谐与敬长融为一体）。

但是居宗教机构统治地位的是大的寺庙，其住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僧尼常是选择出家生活的贵族甚至包括天皇，他们所拥有大量的土地使他们富得惊人。为保护其利益，这些宗教处所拥有私人军队，由武僧组成，其精神服务部分地基于其剑术水平。这些军队反复无常：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寺庙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或是收入受到了危害，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开进都城，也不怕与俗世军队打仗，也不怕与其他武僧开战。佛教对流血的苛责似乎并未进入他

们的神学。

这些一意孤行的武僧只不过是这个逐渐脱离宫廷控制的国家的标志之一。路上不安全，有以抢劫偷盗为生的贫困士兵作祟。在海滨则海盗猖獗。农村为强大的当地军阀及其装备精良的骑兵支配。最初由宫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对这些头子及其部下管束甚微：他们对蓄敛本地财富与特权比履行其公职更感兴趣。

这些地方武士家族的首领系出皇门。依据古老的习俗，皇室子孙除登基的长子或直接继承人外在六代后就要失去其贵族身分。对这些前贵族来说，从军提供了在世上发迹的一种手段：带这种血统的有许多平氏和源氏人。数代的军旅生活消磨了他们的宫廷优雅举止，却又给了他们一种不同的自豪：他们是武士（字面意思“侍者”）、斗士，遵守一套要自律、自我牺牲和勇敢的规矩。追随者虽未必是他们的亲戚，但是忠诚所系之力绝不输于血缘亲情之深。

平氏与源氏曾一度互相提防着共处过，均寻求宫廷的青睐，拓展各自在乡村的物质和政治利益。但是一连串短暂而野蛮的内部冲突使得这两个氏族反目成仇。在12世纪50年代宫廷分裂成了开战的两派，他们分别支持平氏和源氏，各为其主而互斗。平氏获胜，大肆打击源氏，以至于人们几乎不相信他们能东山再起。

获胜者很快在京都把自己确立为实际专政者，在重要部门塞进自家亲戚，派亲信去统治各地方。他们摒弃了斯巴达式的军事生活，把自己渐渐融入了宫廷社会的核心圈：当他们首领的女儿成为天皇的配偶并适时成为继位天皇的母亲时，再没有对他们的新特权的怀疑了。他们的傲慢已成了代名词；据说平氏的一个人讲过，谁不是平氏人谁就根本是个无名小卒。

但是当平氏的首领们沉迷于都城舒适的生活中时，源氏势力在令人生畏的源赖朝的带领下开始在日本东部重新组建。赖朝的一幅同时代肖像画展示的是一个举止深沉、下巴刚毅、意志坚定、眼睛威严的男子。他生于1147年，有充分的理由痛恨平氏。12岁时，他就曾随同身为一个源氏首领的父亲与平氏作战。源氏战败，他父亲被自己队伍里的一名叛徒杀死，还是小孩子的他被俘，旋被流放到东部的伊豆。在那里他遇到了最终成为他岳父的恩人北条时政。他是当地的一个军阀，虽与平氏有姻亲，却对源氏很友好。在时政的支持下赖朝得以聚拢了一支约300人的军队，并在1180年再度向平氏进军，以帮助一个起而反抗平氏压制的王子。但是在石桥山之战中，起义军被一支占压倒性优势的平氏军队打败，赖朝向东而逃，渡海到了边远的安房半岛。安房既偏远

又难到，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从这里赖朝开始重组队伍，与源氏旧部再次建立联系，在反对平氏的其它武士家庭中获得支持。

随着力量的壮大，赖朝需要一个更易接近的作战基地，在新的助手们的建议下，他选中了海滨小城镰仓。这一地点具有战略上的意义：它离京都约 480 公里，远非平氏及皇宫势力所能及，易于防守，周围又有忠于源氏者的地盘环绕。历史上这里也与源氏有渊源：赖朝的祖先 100 年前就在那里造了一个神社。

赖朝带着数百名手下骑马从安房出发。在他向西朝镰仓而行的途中，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成群地加入进来。甚至对平氏心怀不满的平氏支持者也跟在后面：编年史家们讲道，有个军阀带来的兵有赖朝自己的兵的 60 倍之多。1180 年秋赖朝进入镰仓时，已有 27 000 人听命于他了。那些把宝押在赖朝身上的军阀地主不见得是崇信他的事业的伟大价值才这么干的。他们更可能是被单纯的私利所驱动，意识到赖朝的星运上升才归附的。

尚未到 1180 年底，源氏军队已打败了一支平氏部队，消灭了一个虽与源氏是亲戚却与之作对的、曾很有势力的外省家庭。但是赖朝却不急着投入全面战争中去。他的当务之急是给自己的事业带来力量和团结。为此，他饶恕了旧敌，欢迎包括平氏在内的老对手投诚。他利用自己的影响调解好了那些以前互相作对的人，这些人现在发现自己肩并肩地站在了源氏阵营中。那些与他家族没有血缘联系的支持者被变成了名誉上的源氏；只要有可能，这种关系又通过婚姻或把他们收养为本族人得到了巩固。

这些侍臣十分清楚他们对主人的义务。战时他们提供军事服务；平时则要在赖朝的指挥部警卫，在他出行或参加宗教仪式时作他的侍从，陪他打猎，参加从射箭比赛到马术比试的各种武艺竞赛。在镰仓，武艺不得生锈。

赖朝的追随者们对源氏事业也有更多的物质贡献。他们要在盛大场合向主人及其家庭献上丰厚的礼物，在他们乡下的家中热情招待，为赖朝的建设项目献木材，提供骑兵的坐马，为各种活计提供资金，比如修缮首领喜爱的神社的屋顶。

赖朝对他的武士论功行赏。其礼物中最好的奖赏是地权——源氏控制下持续增加的农村地产中某处的稻谷提成，或是对某一采邑的管家权，这样可自动取得该采邑全部利润中相当高比例的一部分。

赖朝说，他所有的努力都是着眼保卫皇家的利益。服务他者就是服务天皇。但同时他又要求追随者不可动摇的个人效忠。因为其父亲被叛徒谋害，他可不会对背信不忠姑息养奸：开小差的士兵被抓后当场砍头，任何看上去半心半意效忠的人成为他诅咒和责难的目标。“他贼眉鼠眼，”赖朝喃喃评价一个似乎三心二意

礼仪袍服与精梳发式使这幅目光严厉的日本首位武士领袖源赖朝像更显威严，该图由12世纪一位宫廷画师作于丝轴上。具有领袖魅力的赖朝在有才干的弟弟义经的帮助下打败了对头平氏家族，谋求权力亦绝不手软：1185年他宣布弟弟为叛将，最终将其害死。关门大捷后，赖朝从镰仓的总部统治全国，1192年被授予最高头衔征夷大将军，即“征服野蛮人的大将军”。7年后他52岁而死。



的人，“怕是再难找到一个比他更卑鄙可耻的校尉了。”为加强这种忠诚并在其追随者不断增加的军队中维持等级秩序，赖朝建立了一个军事管理机构，称为“侍所”，或武士办公处。它掌管分配官衔和职责，维持军队纪律，监督源氏侍臣的活动。

1181年至1183年间，赖朝逐渐在镰仓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并在东部地区巩固了源氏的统治。平氏在该处缺乏影响，因而无力阻止他。同时，他也赢得了京都那些指望他来除掉平氏霸权统治的贵族的日益支持。对这些了然于

胸的赖朝，提议把日本的管辖权一分而二，称平氏为西部摄政者，在那里，他们的势力最强；他自己的家族在东部摄政。皇宫似乎想听从这个主意，但是平氏却唾而弃之。

然而，到1183年底，平氏开始逃命了。他们清楚，对源氏的支持在壮大，宫里的敌人也在积聚力量，便全体离开京都向其西方据点寻求较大的安全，同时带着他们最重要的亲戚——孩子天皇安德，还有象征着皇权的日本三宝。对平氏深怀不满的前天皇后白河宣布他们为逃犯，派赖朝去镇压他们。一个沮丧的平氏人叹道，“东部的每一个武士必定都响应了赖朝的战斗号令”。

对平氏的追击是在赖朝的弟弟义经的领导下进行的，他的辉煌战绩使他成为后来若干世纪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正是他率军在关门摧毁了平氏。同时，赖朝继续在镰仓扩大政权。1184年，侍所与一个管理氏族领地民事的机构和一个处理全部源氏采邑土地纠纷，并监督公正执法的法律部门结合在了一起。

到源氏在关门赢得其决定性胜利时，赖朝已成为公认的皇室的保卫者，清除国内平氏腐败的人。他被授予军队的最高控制权，把赢得与维持和平之需要作为拓展自我势力的正当理由。这个国家很快由源氏侍臣组成的军人精英来控制，赖朝任命他们为前平氏采邑的管家和维持地方安宁的治安官。

皇廷与赖朝和睦相处。赖朝虽生长于本族严厉的军事传统中，早年却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与他那些经常是不通文墨的武士同伴不同的是，他重视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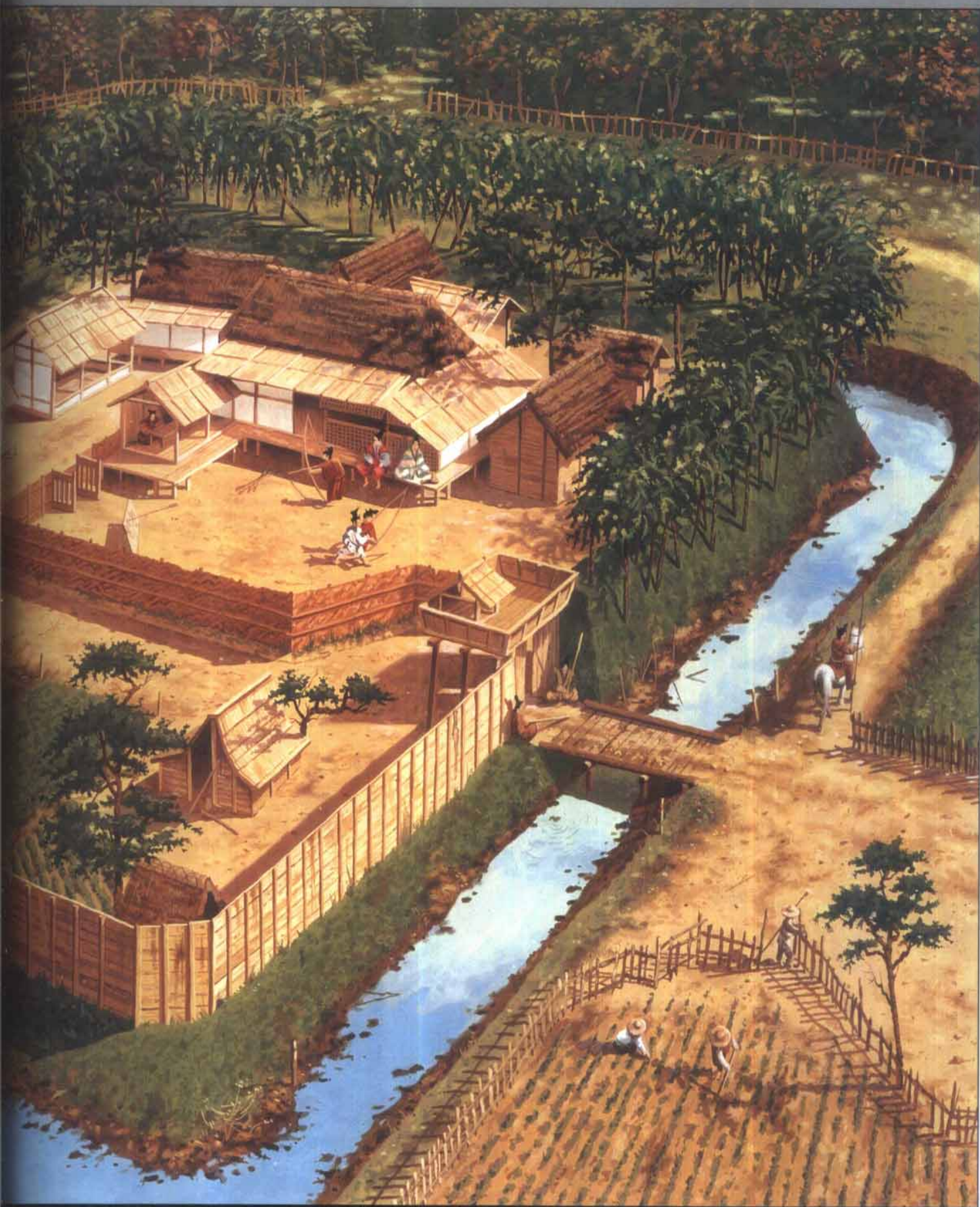
武士的庄园

作为掌管着日本大片地产的封建主的军事侍从，武士发誓要保卫其主人的领土。作为对这种服务的回报，他们常会得到赏赐的地产，住在宽敞的房子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高级武士住在战时与平时均装备良好的安全的围栏里面。如此处显示的典型例子，马厩、仓房和仆人与低级武士的住所环绕高级武士的私宅成群而立，私宅以芦苇苫顶，游廊探出房外。房屋墙壁采用昂贵的白雪松木，糊着透明的纸屏。院子里的一块地可种植枫树和蔬菜。人们在户外或敞棚的小房子里做饭就餐。水要从附近的泉眼取，泉眼旁可能建有一个小神龛。

平时，武士成员在房屋前面的围栏里面练习射箭和剑术等武艺，农工在周围的地里劳作。不过，这种宁静的院子还是个防守堡垒，一直有人守卫，并有壕沟、结实的栅栏和种着树的陡直的土坝防守。遭攻击时屋顶上要涂泥巴以防火箭，弓箭手急速赶往唯一的大门上的瞭望台上。





武士娴于弓刀，它是对主人忠心耿耿的打仗机器。他们穿着一套精心设计的有效的铠甲来保护自己。在宽腿马裤、宽大袖子的轻丝袍之外，他们穿着金属薄片做的一件套战袍，用绳子串起来，通过皮带子吊在身上。为活动方便，右臂没有保护，腰下的铠甲分成四片宽松的战裙。武士头上醒目地戴着向外张开的头盔，意在威吓敌人，也可避开刀砍。这种铠甲结构紧凑，易于修补，仅重约 11 公斤，在轻便方面无与伦比。

为自己在镰仓的机构招募了许多最出色的宫廷官员。他欣赏宫廷礼节的优雅细微之处，明了其传统，谨慎地坚持其规矩。他也有公正的美名：其法律机构的流畅运作被人所注目。有这样恰当有效的管理与法制机制，赖朝要在其侍臣以外的全国推行之，也就完全合情合理了。

在这场势力分割中，京都与镰仓都在坐等渔利。皇室摆脱了羞耻的平氏束缚，不再必须只任命和提升该氏的傀儡。乡村和靖，贵族因地产里稻米产量增加而富了起来。大神社与大寺庙的僧侣也称许源氏对他们权利的尊重；平氏没收其稻田又焚毁其殿堂，他们也是平氏的牺牲品。地方上的各武士家族也同样热心。他们觉得在和自己一样的人支配的政府之下有安全感，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只需他们付出一丁点代价：秩序恢复后，他们便无需提供那么多的军事服务，而可以从事更诱人的开垦新地和增加收入之事了。

赖朝的威望与权力俱增。同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慈元住持这样描述一次赖朝自镰仓礼节性进京谒见时的盛大入城场面：“每个人都期待着他的到来。但是因为他在他预定入城的那天下着雨，他在城外一处作了短暂停留。然后，当他在该月第七天进入首都时，其时雨已停，正如他所愿——他的士兵成三排骑马进城。他身前骑兵逾 700 名，身后过 300 名。他骑着一匹黑马，穿着夏天鹿皮做的罩衫，里面是深蓝、浅蓝与红色的光滑的三色袍，其状令人难忘。进入京都后，他晋见了退位天皇后白河，拜访了皇宫。在后白河看来，无人堪比赖朝……”。其他目击者称赖朝吸引的人群更多，引起的兴奋更大，甚于任何一位退位或在职天皇的公开露面。当 1192 年他被授予将军或全称征夷大将军的荣誉称号时，人们觉得这丝毫不过分。

他的辉煌时光相对较短：他被授予以上称号后仅 7 年就死了。但是赖朝在镰仓设立用以管理陪臣的体系幕府（字面意思“帐篷司令部”），以及他为武士阶层赢得的合法地位和权力，却在身后存在甚久，决定了若干世纪后的日本的政治与文化。

赖朝一死，镰仓实权落入了其寡夫人政子的手里。如同当时许多出身高贵的妇女一样，她在新寡后曾许愿出家。但是表面上的脱离俗世及其虚幻并未阻止她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在讲求无私、实效上绝不输于其前人。她的儿子赖家，将军头衔的名义继承人，是个不可靠的无能之辈；她在幕后把持实权，建立了由 13 名大臣组成的内阁——包括她父亲北条时政，赖朝的旧日恩人——来帮她施政。她与父亲很快便密谋要把赖家赶下将军之位。

然而，当时政未告知同伙便刺杀了赖家时，她们的联盟瓦解了。当时政又露出要谋害政子的次子实朝之端倪时，政子与自己的哥哥北条义时合力赶走



了父亲，并把原本会成为牺牲品的实朝扶为新的将军，新将军不大受欢迎。历史学家慈元和尚把他说成是“傻乎乎地没有心眼，只顾学习，给所担当的职位丢脸”。

但是公众的欢迎无关紧要。实权掌握在政子的手里。1219年实朝死后，她把本家另一名未成年的孩子立为傀儡将军，并把她的哥哥立为正式的摄政者，为这个孩子代行管理镰仓政府。她哥哥死后，摄政变成世袭的职位，这一职位传给了他的亲生子嗣，此后落在北条家族中历百余年。这些人虽身在源氏幕府，但是在血统上，他们却是平氏血统，一些编年史家每想及这点，便觉得这颇具有嘲弄之意。

镰仓日本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而今形成了。国家的挂名首脑是天皇，其宫廷职能大多是礼节性的。天皇背后是退位天皇，他不受礼节性责任的约束，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扩大皇室的利益。同时，许多行政管理职责依法掌握在将军的手中，他统辖镰仓的军事机构。然而他实际上也是个傀儡：摄政是国家真正的主宰。

并非各方对这种格局都满意。京都与镰仓间的关系变糟了。1211年，退位天皇后鸟羽开始培养训练自己的军队，意在恢复皇室的支配地位。地方上拥有大量武僧的寺庙同情此举。有了这股力量的支持，他把北条摄政斥为反叛，号召全国起而支持自己。

幕府反应敏捷。一支大军向西长驱而驱至京都，数周内镇压了后鸟羽的反抗。摄政接着把天皇、退位天皇与皇家的各色成员放逐到了偏远的岛屿上，在那里，他们赋诗度日，也算坚持了真正贵族派头的传统。前天皇后鸟羽曾写道：

未睹斯人自悲伤，
不见余者益凄惶。
魂灵深处终感悟，
世上无人济众苍。

在镰仓，摄政王可无暇听这种伤今怀昔之作。他忙于扑灭这些唱反调者的残部，放逐或处死那些参与动乱的贵族，夺走他们的采邑。

这些土地落入摄政的手中真是适得其时。军事政府有责任维持一个人数在增加的武士团群，他们中很多人只有一点或没有土地；为保持他们的忠诚，摄政现在可以把没收来的采邑的原管家的待遇赏给他们。这些侍臣没有马上

得到财产,但却享有利润中可观的一份:对他们管辖下的每4.5公顷地,他们可被奖给半公顷归本人所有,无需把收入拿出来分。对其他4公顷——其土地的出产在种地的农夫、监工、在镰仓或京都的封建主中分配——管家可征税。

摄政一丝不苟地遵行赖朝定下的规矩,即要得到被流放的天皇对这些安排的许可。或许用得着在外交上施些许压力,不过皇廷的抵抗已被彻底粉碎了。为避免将来可能产生的误会,有强大军队支持的一个幕府分部设在了都城原平氏的总部。

从文化上说,这两种体制生活在迥然不同的世界中,镰仓集团是建立在传统武人观念的基础上的,这些观念包括要自律、效忠、重视荣誉、生活简朴。武士通过勇敢和献身行为给其氏族增光。去打仗时,武士们相信其先祖之灵会立于其双肩之上,这位斗士会自豪地把自己的姓名和出身刻于箭杆之上,边步入战场,边高声背诵其血统。“发话者”武士们会边向敌人发出挑战,边这样声明,“乃桓武天皇的一代孙,法务大臣忠盛之孙,知事秋清盛次子,年值17,名为元盛者是也。”

在13世纪中期,摄政自家的一名成员,也是北条人,写了有关告诫人们要养成良好品行的手册《家训》,用来指导即将代表军事政府在京都任职的儿子。该书告诫他要避开不良同伴,敬奉众神,无条件服从主人与父母,对穷人慷慨大方,对生人小心行事,避免显示怯意,定时修习马术及其他武艺。该父亲写道,“武士须时刻谨记其道义之责。武士之良心与信仰恰如马车之双轮。”

偏爱奢侈生活与过分注重衣着也是要避免的。镰仓的每个人都对他们的首位将军对待一个衣着华贵的侍臣的反应记忆犹新:赖朝借了该人自己的剑,割掉了他袍子上的七彩裙,痛斥他在华衫丽服上一掷千金却不为其下属着想。

京都的贵族则没有此种顾虑。他们一味沉迷于审美情趣之中。他们拿采邑的财富大肆购买精雅的服装;在以漂亮书法写就的引喻诗中表达情感、安排约会。去观赏满月、欣赏秋叶或看春花初绽占用了他们大量的余暇。宫廷生活主要包括一系列礼仪、宗教仪式、官方宴会与诗会。许多幕后活动被用来搞宫廷特权、职务升迁及获得与职衔相称的外在的象征。13世纪的一个侍臣二条夫人这样骄傲地引用天皇宣布其身分之辞:“二条获准可于任何时间穿薄丝袍与白色打褶裤。她亦获准在宫门口登车。”

这些贵族私下称镰仓武士为“东方蛮夷”。但即使最目空一切的廷臣也不

武士之魂

对 13 世纪的日本武士来说,佩刀是他的身份的最主要的标志。武士刀是可怕的兵器,需严格操练,使用时要执礼甚恭,同时也是武士荣誉、勇敢和敬上的准则的可敬象征。

刀身的产生也充满了各种宗教仪式般的规矩。刀匠造刀时几个月不食荤腥、不行房事、不饮酒品,然后,在形成完美刀身那剃刀般锋利的刃的锻造阶段要穿上礼服。

所有的争端和问题都由刀来解决,武士自生至死都按剑道行事。这要涉及繁复的礼节:擅摸或跨过他人的刀将被视为冒犯,把自己的刀放置地上而把刀鞘踢向任何人则等于发出与对方死斗的挑战。



这只镀银护手盘取传统“米糕”式,装饰着下图所示的正规用刀。上面盘绕的飞鸟图案可能表明了精神向往,突出了该刀作为宗教祭品的用途。

这只装饰华贵的刀通过两个编结而成的链子悬在腰间,是某镰仓军阀专门用来献给伊豆半岛的三岛神社的。这种刀有许多从未在战斗中使用过,而是置于寺庙中用来敬神或是用作赢得某重要战役后对神的答谢,或是如愿以偿后的还愿之物。





这幅屏风画的局部描绘了12世纪晚期内战期间的六原之战，图中一个士兵拽着敌人的头正要用短刀割断其喉管。这种短刀刃朝上，佩于士兵的饰带或腰带上，机动作战或近距相搏时必不可少。这种武器在13世纪晚期大量生产，其时蒙古的入侵已证明了传统的长刀不便挥舞。



能否让镰仓施行了有效的治理。实用乃是当时的既定要求。数个世纪无先例和定规可循，幕府的统治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决定由摄政主持的国务内阁集体作出。他们的讨论暗中进行，其考虑成熟的结果将作为统一的法令发出。

镰仓这里制定的方针由幕府机构付诸实施。幕府的监察员行遍全国，监督治理各地方的治安官和掌管采邑的土地管家。这些地方官的品行要受到审查，其帐目要经仔细核对，任何腐败行为都要受到严惩。中央政府负责收税，税率依稻米收成好坏而定。若地方上无法解决水土纠纷，则由镰仓介入来裁决。

军事政府虽绝不算是宽和，却也尽量做得公正。1232年，国务内阁发行了名为《贞永式目》的文件——这是一些通例、劝诫与法律学问的集子，主要是基于赖朝与其家族对其家臣施行公正赏罚时所遵行的一些原则。几代的经验证明了其价值，幕府而今要把这些长处推行到全国、京都贵族的封建领地以及地方上地主的地盘。甚至是在稻田里涉水劳作的农夫也有望获得公正的待遇。他现在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他不再被困于某一特定地块；而可以卖了地产搬到新开出来用于耕种的地方去。

随着京都与镰仓间的不断交流，双方一定程度上利益均沾。重视前途的学者与行政官员在京都派不上用场，便到镰仓的幕府去更好地发挥其才能。在那里，他们明白了行伍之人并非都是凡夫俗子。例如，北条实时便是幕府时代13世纪中期的一个杰出人物。作为军事领袖的他也是个书迷。他大量的日文和进口中文图书中包括许多珍本，其中有数千册是他拿自己的钱复制的。他把自己的藏书放在武藏，编制了一个系统，使读者可查阅甚至借阅书本为其所用，由此创立了镰仓最著名的图书馆。

由来已久的士兵与有教养的廷臣之间的相互蔑视开始被执礼甚恭所取代。镰仓军人把自己确立为统治阶级之后，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发展起来，歌颂将士们祖先的事迹，赞扬武士们忠诚、勇敢、爱名誉、服从命令的精神。这些战争史诗源于说书人在音乐伴奏下高声讲诵的平氏—源氏之争的古老故事。类似的散文传奇最终由有学问的编书者记载下来并加以润色，为军人当政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神话、一种文化全书。

确实，武士学习起读写来都很快。中国一直是宗教与世俗学问的源头：几个世纪以来，识文断字就是有闲名流的独占领域，他们有掌握拥有数千汉字的复杂的中国文字所需的时间和老师。但是，平安时代早期形成的相当简化的音节文字的大量使用，使得读、写日文较为容易了。不过，历史学家慈元在

其历史记事中仍感有必要就使用其母语日语而非汉语向读者道歉：“因本书系以日语写就，读来会觉一般。但文意或深埋于日语文字之中……”

武士阶层的年轻几代开始失去了对京都奢侈的显贵们的蔑视，产生了对奢华的爱好：精美织物、陶器和漆具市场需求日渐扩大，匠人随之前所未有地兴盛起来。雕刻有钱主顾喜欢赠给寺庙的木雕像的雕刻师，显示出了新的勃勃生气：他们所刻的鬼神不再是抽象的作品，而有了真正的个性，脸可表达人的所有情绪，自然主义的身体显示着超人的力量。画师们创作了充满活力的有关英雄与圣贤生活、神社历史或新流行的军事传奇片断的逼真的画卷。皇宫与幕府中的高官显要均委托画师为他们自己、坐车和爱马画了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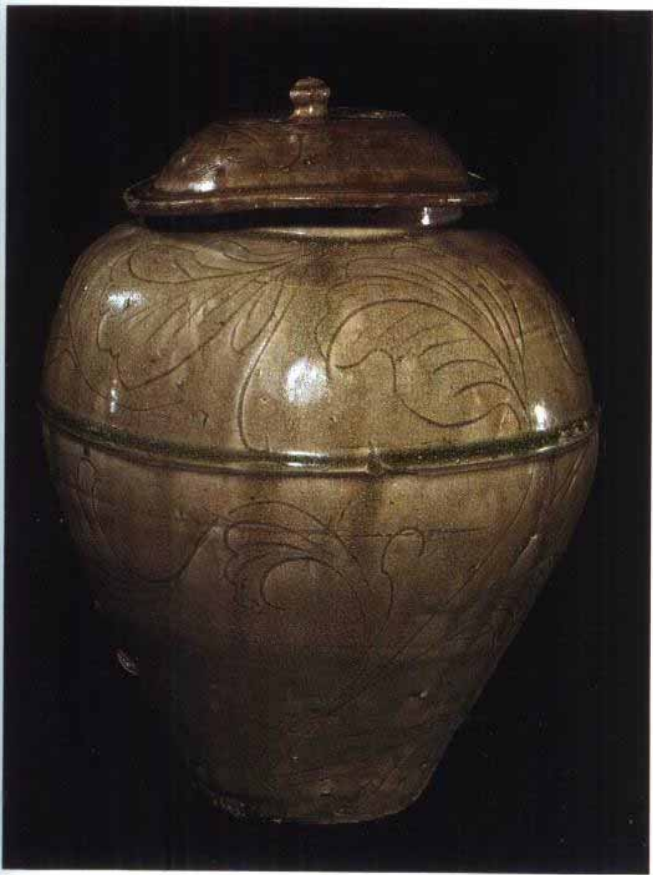
新兴的商人阶级投合着这些增长了的要求。在农村，铁匠和其他手艺人不再仅为满足某私人采邑而干活；他们在每月三次的村落集市上与行商一起出售自己的东西，这些村落很快成了有常住手艺人 and 店铺的小商业中心。在各省会和镰仓也有商人聚集；1251年，北条摄政建起了一个专门商业区，把独家掌管市场的权力交给了住在那里的商人。

城乡的商人和手艺人开始结成被称为“座”的商会或行会。仅以镰仓为例，这里也有丝绸、稻米、木炭、燃料、鱼类、盐巴和马匹商人的“座”，也有木刻工匠和木匠的“座”。这些组织在有势力的保护者的庇护下兴旺起来——保护者有镰仓政府成员，当地地主，京都贵族，或大寺庙住持——他们帮助被保护者获得垄断权、免税权与其他商业优惠。

外贸也很发达。日本佛教和尚与亚洲大陆宗教中心建立的联系，有助于与在宋朝统治下的华南形成更轻松的关系。中国人自己则很快地利用造船与航海技术先进的优势渡过了中国海，载着大量的锦缎、香料和药品用以交换日本北部新开金矿出产的黄金。宋朝来的铜钱变得很寻常，到该世纪中叶，市场已开始实行现金而非易货经济了。

军事首领对在其侍臣中增长的实利主义有了警觉，通过了若干节约法案。武士阶层没有被罚款与其他处罚吓住，胃口与那些老的都市贵族反倒更接近了。但是随着这一新的潜在消费者群体人数的膨胀，日本尚不稳定的农业经济承受的压力也在增加：愈来愈多的人想要愈来愈奢豪的东西，但是，最终支付这些货品的稻田只能产生有限数

这只陶罐造于1306年，用来盛放一名禅宗和尚的骨灰，它与许多这样的器具产于日本东部的濑户。该城的手艺人运用中国工艺，把本地区的细白泥制成上光粗陶器，这种陶器因耐用和它与众不同的“秋叶”绿釉而出名。在新富起来的武士阶层的需求刺激之下，濑户成了该国首要的陶器产区。确实，该处产的陶器在全日本广为买卖，以至于 Setomono 一词，即“濑户的东西”，成了公认的陶器代名词。



量的收入。人手充足时虽可开垦新地，

对稻米与基本商品的需求，却远远超过了这些岛屿所能提供的有限的数量。

经济压力并非北条摄政者们所面对的仅有困难。一次大规模的地震在1257年毁坏了镰仓地区，接着两年后又又有大规模的瘟疫和饥荒。据说京都的街道被死尸填满了，乡村的农夫靠吃植物的根和成把的草活命。为缓解农村灾情，幕府命令其土地管家交回所收的税赋，暂时不要再征收。死者如此之多，缺少身强力壮的男人种田或干其他必需的活计。罪犯从监禁中被放出来，甚至杀人犯也得到了大赦，以便补充人力。京都几近混乱。皇宫的墙上出现了谶文：

在新年，凶兆……

在地上，灾难……

在都城，士兵……

在宫中，偏袒……

在地方，饥荒……

在神社，火灾……

在河床，骷髅……

全国的寺庙庵观都被征募，以进行漫长的祈祷活动，恳求上天回以眷顾。但是这些机构也给幕府增加了负担。拥有土地的大寺庙频繁地争吵——互相吵，与贵族吵，甚至就领土权和特权，以及逾期未付给他们所提供的宗教服务的报酬，与皇室吵。为增强其争吵的威力，他们派出大批凶猛的武僧：13世纪，某个寺院的武僧军有20多次挺进到了京都。只要可能，幕府都会靠后站，任这些冲突发展，直到和尚们的不满得到了答复，或是其面子得到了满足。然而，在饥荒期间，当皇廷看来要陷入来自一队盛怒和尚的严重威胁时，镰仓不得不干预了。幕府派了几百名士兵，把这些献身宗教的僧兵赶回其寺庙去。

这些和尚虽桀骜不驯，但也只是发生在日本宗教生活中的剧变的一个征兆。多年的民族战争与破坏使得老百姓渴望得到希望与抚慰。腐化骄横的僧侣们对搞富自己的寺庙和扩展在宫廷的个人利益更感兴趣，对水稻收成被士兵夺去的农民或是被歹徒强奸的妇女仅仅略表安慰。随着政治权力从贵族向武士阶层的转移，新的受欢迎的佛教形式开始出现。佛的教义不再给神学上的争议和晦涩的学问弄得含糊难解了。随着简化了的日本文字的传播，佛教的

基本原则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生命痛苦而短暂，世界是不停变化的虚幻组成的万花筒。通过自我修行和怜惜众生，追求者会最终达到觉悟，永脱欺骗和难了心愿的可厌轮回。新的宗派兴起了，老的宗派复兴了，谁愿意信奉它们，公子王孙也好，农夫走卒也罢——就指给谁涅槃之路。

这些教派之一净土宗（创建于1175年，因其信徒想去的福地而得名）的皈依者说，灵魂的拯救无需终生严格禁欲苦行、不断默念或退出尘世。任何人在做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时，只要虔诚地反复诵念无限光明神阿弥陀佛的名字，都是可以达到的。甚至连以前不能投胎转世作男人就无望拯救的妇女，也可以在现世达到觉悟，只要她们勤念祷文：“南无阿弥陀佛。”社会各阶层都信奉这一做法：据报前天皇后白河曾诵此数百万次，直到口诵祷文而死。

正统佛教僧侣对此大为愤慨。这样简单的信仰会把寺庙、僧侣、仪式统统变得毫无用处，因此他们着手对此新兴宗派大肆迫害。1201年，他们说服了天皇站在他们那边。净土宗的首领遭到流放，一些最突出的门徒被砍了头。禁止再说念佛祷文。但是净土宗给人的希望是如此强大，结果这些措施最终都未得逞。净土宗历经种种分立和改变，但还是存活了下来——其根基安然无恙——成了日本宗教生活永恒的一部分。

要求较严格而同样有影响的是禅宗。与净土宗一样，它拒绝把宗教仪式与学问作为通向救世之路。觉悟——凡人成佛的实际转变——可通过默念和努力干活这种简朴的寺院生活而取得。它可以在一片突放的炫目的光彩中随时到来；脑力思考、精神思维、哲理思辨与它毫无关系。禅宗师父要花很大的精力对其门徒踢、打、吼，以便清除其自欺，把其提入更清醒的状态。

有着自律传统的武士阶层发现这一门径特别合意。他们能够欣赏那种强调个人努力会有所偿、尤其是不把识文断字作为取得精神圆满之前提的宗教。来自更传统的宗教机构的一些和尚把几座禅宗寺院付之一炬，但是尽管有官方的敌意，此年轻教派还是在武上的保护之下兴盛起来了。

禅宗与净土宗各自的拥护者虽均认为自己独有宗教真理，双方佛教徒却都不想除掉佛教的其它分支，日莲法师创立的第三支力量莲花宗则不尽然。日莲生性好斗，抨击、指斥酣畅淋漓，开始出家时还是位传统学者，浸淫于经典佛教文学和神学之中，像净土宗的支持者一样，他也宣扬人人可以得到灵魂的拯救，通往觉悟的钥匙在一本特别的宗教经文即《莲花经》中，是一本古老的印度佛教经书。不过，只要诚信者走正路，并且最重要的是，反复吟某一祈祷文：南无妙法莲花经（“向莲花经致敬”），他们就不必诵读或理解此经文。

日莲相信，一种新的、改革过的、真正全国性的佛教才是日本民族的唯一

雕刻中的新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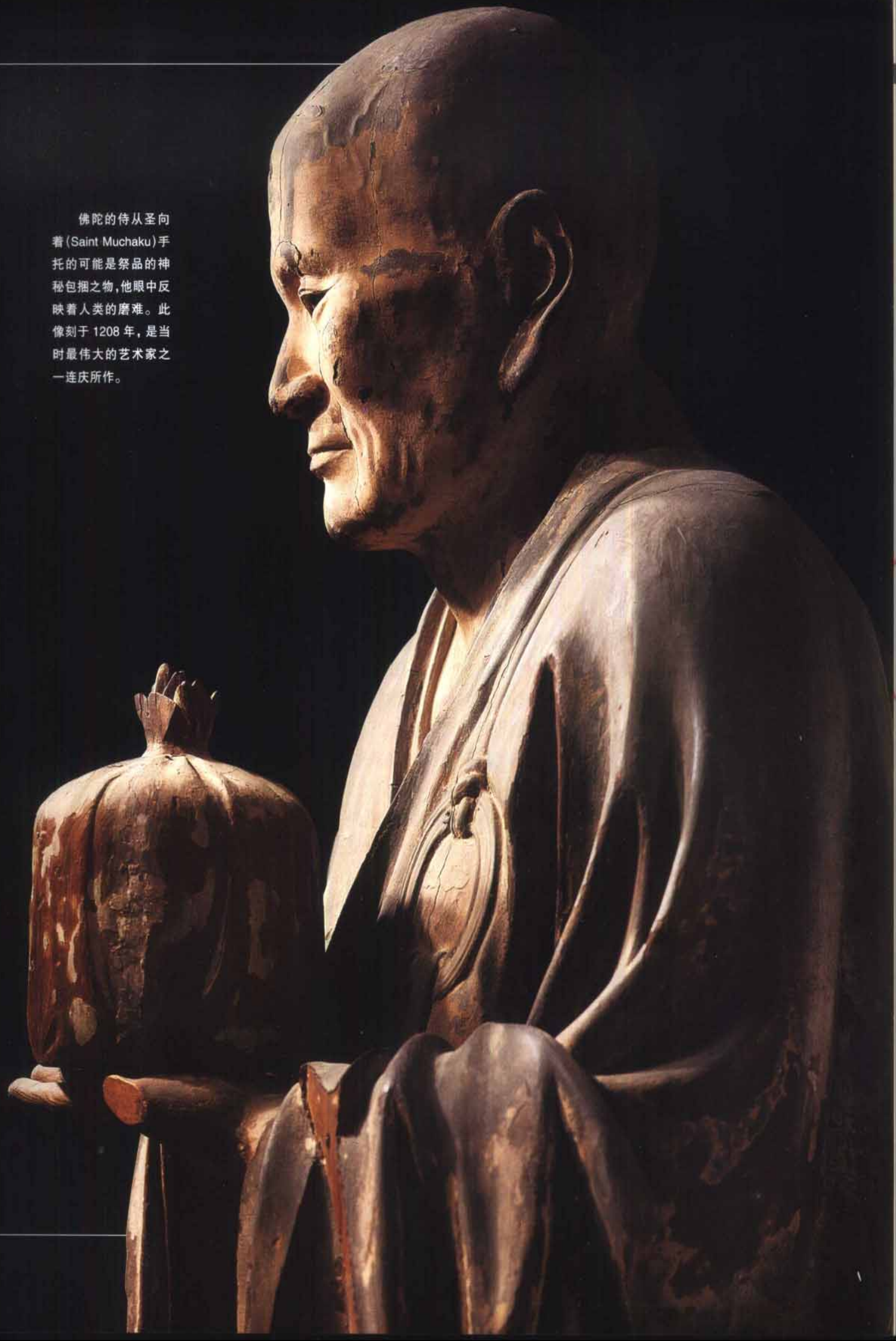


这个木雕像眉毛拱起，是佛教地狱十王之一的侍从，正准备记下一个罪人的命运。根据净土宗的教义，地狱是人可获重生的六界之一。

13世纪期间，统治日本的军事将军幕府对国内施以和平，使得该国文化得以繁荣。这在宗教上最为明显。6世纪传到日本的佛教信仰酝酿出了各教派，对寻求较容易的觉悟之路的军事统治阶级，及更广泛的大众都产生了吸引力。其一是禅宗，其严格的出家教义此时从中国传到了日本；其他宗派有断言死后可投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宗，及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莲花宗。

此种精神骚动可察于艺术，首先是雕刻之中，其手艺与表现力已登峰造极。在新信仰影响下工作的镰仓雕刻师们，努力创造出了反映温和现实主义的杰作；为了给雕像增加真实感，甚至在眼睛中使用了深色水晶。早期日本雕刻作品的理想化形式为自然主义式的真实所代替，因此强调的是个性。

佛陀的侍从圣向着 (Saint Muchaku) 手托的可能是祭品的神秘包袱之物, 他眼中反映着人类的磨难。此像刻于 1208 年, 是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连庆所作。



前进之路，便严厉指责佛教信仰的其他形式都是有毒害的势力，耗尽了其同胞的生命根基，任国家在腐败中打滚挣扎，他痛骂所有的宗教对于是“日本最大的撒谎骗子”，谴责禅宗是“魔鬼学说”、净土宗念佛祈祷式是“恶魔之行”。只有其同胞放弃所有的这些异端邪说，国家才能振兴。他本人要为民族复兴打先锋：“我将成为日本的支柱。我将成为日本的眼睛。我将成为承载日本之巨舟。”

1257年的大地震过去了三年后，正值瘟疫期间，眼看着混乱与饥荒要来，日莲在镰仓的街头讲道，拥有了一批愿意接受的人。他宣称，国内的困境是对多年宗教堕落的惩罚。如果日本不接受那唯一正确的信仰，更糟的恐怖事情会随之而来。他的警告是明确的：一支外国军队将要入侵日本了。

北条摄政机构对这样一个制造事端的和尚的存在不满，把他逐出了镰仓城。这没有吓倒他，他带着信仰走遍了东部省份，在武士中赢得了许多追随者。日莲甚至在幕府中也有支持者，1263年获准回到镰仓，在那里他未停止对政府的批评。他因重入叛逆罪遭到审判，逃过了死刑——可能通过有势力的友人的说情——再一次被放逐，但是只过了几年，北条摄政者们就要面对日莲预言的可怖的现实了：一个可怕的敌人正在西方集结。

闭关自守、与世孤立的日本已有300多年未与其强大的邻邦中国有正式往来。但是即使没有政府使节，仍有一些不那么正式的交往。中国商人往返于大海上，运给日本出口货品，载回来仍视中国大陆为宗教与俗家学识源头的僧侣和学生。紧邻中国，有更狭窄水道与日本隔开的朝鲜也同样被日本统治者们忽视了，尽管镰仓辖下的最西部的封臣会偶尔劫掠朝鲜脆弱的海防。

但是在13世纪中期，日本的与世隔绝突然被终止了。1264年，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成了蒙古人的大汗，把都城建在了北京。朝鲜对此优势力量卑躬屈膝，很快变成了大汗的臣国。忽必烈然后把眼光投注到了东方。

1268年他派了一名使者去，拿着一封“给日本国王”的信。得信的日本官员即刻把它送给了镰仓的将军而不是给了天皇。忽必烈汗在信中建议，日本拿贡物买他的友好——并暗示要么就开战。接下来的几年中，大汗用同样含蓄的恫吓刺激着镰仓，幕府并未屈尊回信。

忽必烈等待到了1274年11月。在该月，朝鲜船只载着一支蒙古军队，渡过了分开朝鲜南端与日本西南部九州岛的海峡。编年史家们估计，约15000蒙古部队在相同数量朝鲜人的支援下，乘450艘战船，在博多湾登陆。

地方氏族长与幕府自己的土地管家和法制官员一起向镰仓送了急信，并结成一团阻住侵略者以待援兵的到来。在双方力量悬殊之下他们成功地坚持了两天。蒙古兵要多得多，日本兵且害怕蒙古人奇怪的新武器——带着震耳的轰响声而爆炸燃烧的投掷物。战争的规则要被永远地改变了，以前中国做烟花爆竹者专

用的火药已经引起了军方的兴趣。

守御者损失甚多，但还是英勇战斗到了第二天日落。一心想着天亮再战的蒙古兵回到船上等待黑夜过去。但是夜间起了台风，只几小时之内便摧毁了入侵军队。狂风和海浪将未打碎的朝鲜船只被吹到了海上，蒙古兵损失了约 13 000 人。

为防再遭入侵，镰仓的首领们急忙招募了大批部队，建造了新的壁垒，巩固了防御工事。为响应这一动员令，地方地主与氏族首领们，尤其是在西部脆弱的九州岛上的那些，要求其所有的家臣交上人员、武器与其它物资的清单。比如，一名叫采红的老兵交上了田产目录，这样述列其家庭成员：

采红，85 岁，已走不动。

长秀，其子，65 岁。有弓、箭、武器。

连秀，38 岁。有弓、箭、武器、盔甲、马匹。

松次郎，19 岁。有弓、箭、兵器、两名随从。

高秀，40 岁。有弓、箭、武器、盔甲、马匹、一名随从。

这些悉听主人之命，并将忠心效力。

皇宫最初虽有所犹豫，到 13 世纪 80 年代末也开始明白了蒙古威胁的用意。天皇把皇家地产的全部收入都归幕府处置，命令在全国的神社举行祈祷集会，奉献祭品和进行其他安抚仪式。宗教仪式日夜举行，贵族与僧众一起守夜，群众聚集在远古的日本战神社祠前。天皇与前天皇在其先祖的墓前投书，乞求他们冥冥之中相助日本。据说北条摄政时宗曾以自己的血抄写了一些佛经，论热烈程度无有出其右者。

忙着征服尚在抵抗的南部中国的忽必烈汗过了几年又萌敌意。他两次派人送信到镰仓，要求日本归为属国。幕府的答复两次都一样：信被撕毁，蒙古使者被砍头。

最后，在 1281 年 6 月，漫长的等待结束了。150 000 蒙古兵、中国兵和朝鲜兵组成的军队在九州登陆。这次日本人已做了准备。他们新成立的子船组成的海军足够灵活轻便，能攻击和骚扰笨拙的中国军船。并且日本人是在保卫危急中的家园，其强烈斗志非主要由华南兵和朝鲜兵组成的蒙古军心态可比，不过，防守者意志有余而经验不足：除了那些西部兵，自从近 60 年前发生的前天皇后鸟羽造反以来，日本兵就很少经历战阵了。

战斗持续了 50 天。然后，狂风又一次呼啸着从天而降。两天中，猛烈的风暴

猛击着犬牙交错的九州海岸线。在陆地上，树被连根拔起；在海上，巨浪吞没了蒙古船只。没有被淹死的蒙古军被赶在一处，当狂乱的蒙古兵爬向已被撕裂成碎片的船只时，日本弓箭手从容点射。蒙古兵绝望地撤退，只有些残部活了下来并把败讯带回了中国。据日本编年史家记载，五分之四的侵略者被消灭了。

日本欢欣鼓舞。其人民向救命的台风致谢，称它为神风，并称它是日本人受众神佑护的明证。虽有庆祝活动，幕府却未放松警惕：镰仓令其士兵全面戒备达 20 年。只是在忽必烈汗去世六年后的 1300 年，镰仓才宣布危险已经过去。

胜利的后果却是一团糟。镰仓财库空了：没什么钱来支付那些战时保卫了国家，随后的和平年间又备战了的封臣们。这一次，胜利没有征服来伴随：没有叛乱者富饶的土产可被没收，也没有战利品可用于奖赏。无需再昼夜不停为和平祈祷的僧侣们发怒了：他们声称自己远比战士们更值得赏赐，因为不是他们的念经才带来天风的吗？

本图取自一幅描绘 1274 年中国的蒙古皇帝忽必烈汗的军队试图入侵日本的画卷。画中日本将领竹崎来永的坐骑血流如注，他倒在一阵箭雨中。日本兵既要面对人多势众的敌人，又要与先进的武器斗争：炮弹在来永头上爆炸，这是已知的关于火药被用于大炮的最早描绘。这些优势在面对顽强抵抗和毁灭性台风——日语发音 kamikaze 即神风——时，却帮不了侵略者什么忙。来永活了下来，请人作了这一画卷，主要以他的英勇事迹为内容；据信这位骄傲的将军在画作完后，自己加上了刺穿其头盔的红箭。



幕府基本上没什么招数来满足这些要求。全国变穷了。维持军队的开销是灾难性的。九州在被入侵期间伤亡惨重，当地军阀是用自己的物力建造的海防工事。全国的农业生产几近停顿：现有的稻米被拿去作军粮，许多能干活的男人被招去参军。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记载道“在最近几年，由于蒙古的进攻，东部与西部均未忽视战争武艺，但是农业实际上已被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遗弃了。”

不满在蔓延。幕府可以补偿封臣的支出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这群有功人员的钱给另一群。没得到足够补偿的被迫抵押地产以还旧债。一时之间幕府试图禁止买卖或抵押其封臣的地产，但是借得出钱的——和需用钱的——想法绕开了法律，这一规定也就很快被撤销了。京都有些与镰仓政权合不来的贵族与不满的军事封臣们联合起来，逐渐开始颠覆幕府的势力。

北条摄政者们正在失去控制。镰仓早期的斯巴达式的简朴特征已然消失殆尽。一度因公正有效而为人称道的法庭，变得像镰仓以前的皇家官僚一样地臃肿腐化。这一政权虽未戛然而止，但就连幕府最忠实的成员也知道：他们掌管着一个走下坡路的政府。

14 世纪最初的 30 年，军事政府仍然在镰仓实行着统治，但是到 1333 年，其敌人已形成了一个联盟：对政府不满的外省军阀与贵族成员及充满内讧的皇族和前皇族组成了一支军队。这支力量挺进到了镰仓，攻陷了该城，并付之一炬。末位北条摄政与其忠实追随者中的 200 人，按照被其先祖抬到新的尊严和权力高度的武士阶层传统，举行仪式自杀了。

但是末位北条摄政之死并不意味着幕府政治的结束。日本在贵族与外省武士的权力之争中飘摇了 50 年，直到 14 世纪 90 年代足利氏赢得了控制权。这个国家再度为幕府所统治，这次是在京都，皇廷也再度被抛到了阴影之中，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埃及的“奴隶”苏丹

3

1260年9月3日早晨,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位于吉尔堡山脉和加利里群山之间五公里宽的巴勒斯坦山谷里便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战鼓声。一支埃及军队正沿着厄斯垂伊伦平原向“歌利亚之泉”——阿因扎鲁特挺进,他们要在那里迎战来犯的蒙古军队。此前,蒙古人一路高奏凯歌,攻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征服埃及,进而独霸整个中东伊斯兰地区。

当两军相遇时,蒙军首先发起了势不可挡的猛攻,将埃及的先遣部队打得七零八落,并占领了埃军的左侧阵地。但不久埃军便重振旗鼓杀了回来。这一次,埃军由苏丹古图兹亲自率领杀向敌阵。古图兹一马当先高呼着“真主伟大!”率先杀入敌营。在这种精神鼓舞下,埃军士气大振,首先是蒙军首领吉布可哈被斩落马下,接着,埃军乘胜追击将敌军杀得丢盔卸甲,四散逃命。战斗结束后,古图兹跳下马来朝阿拉哈方面跪拜了两下,然后割下吉布可哈的头颅,派人送回开罗以示胜利。

阿因扎鲁特之战终止了蒙古人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尽管随后的50年中,草原斗士们五次重返叙利亚,却再也没有危及到埃及。这次战斗的胜利同时也是历史的转折点,战后的马穆鲁克人,即当时的突厥奴隶雇佣军,成为中东地区新崛起的力量。在随后的250年里,马穆鲁克人为争权和保权进行了血腥残杀,逐步统治了叙利亚和埃及。他们遏制了蒙古人的扩张,收复了12世纪以来十字军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属领地,并将开罗发展成了当时穆斯林地区空前重要的城市。

马穆鲁克执政前的帝国为库尔德士·阿尤布所统治。1171年,库尔德士·阿尤布迫使法蒂玛王朝统治者下台,随即建立了由萨拉丁领导的阿尤布王朝。到13世纪中叶,阿尤布王朝的疆界已经由原来的埃及扩展到周边的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当时的阿尤布王国非常繁荣,尼罗河两岸和由常年流沙淤积而成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土地肥沃,盛产小麦、棉花和水稻,上埃及大片草地是贝都因牲畜的天然牧区,叙利亚的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因盛产水果和橄榄很快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阿尤布王国缺的商品,比如铁或铜之类,都能从位于尼罗河口的繁华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买到,那里是西方商人汇集的地方。

尽管阿尤布王朝很繁荣,却并不稳定。在伊拉克,阿尤布王朝的统治受到来自敌视她的伊斯兰阿拔斯王国的威胁;在叙利亚,相互争斗的阿尤布派别为了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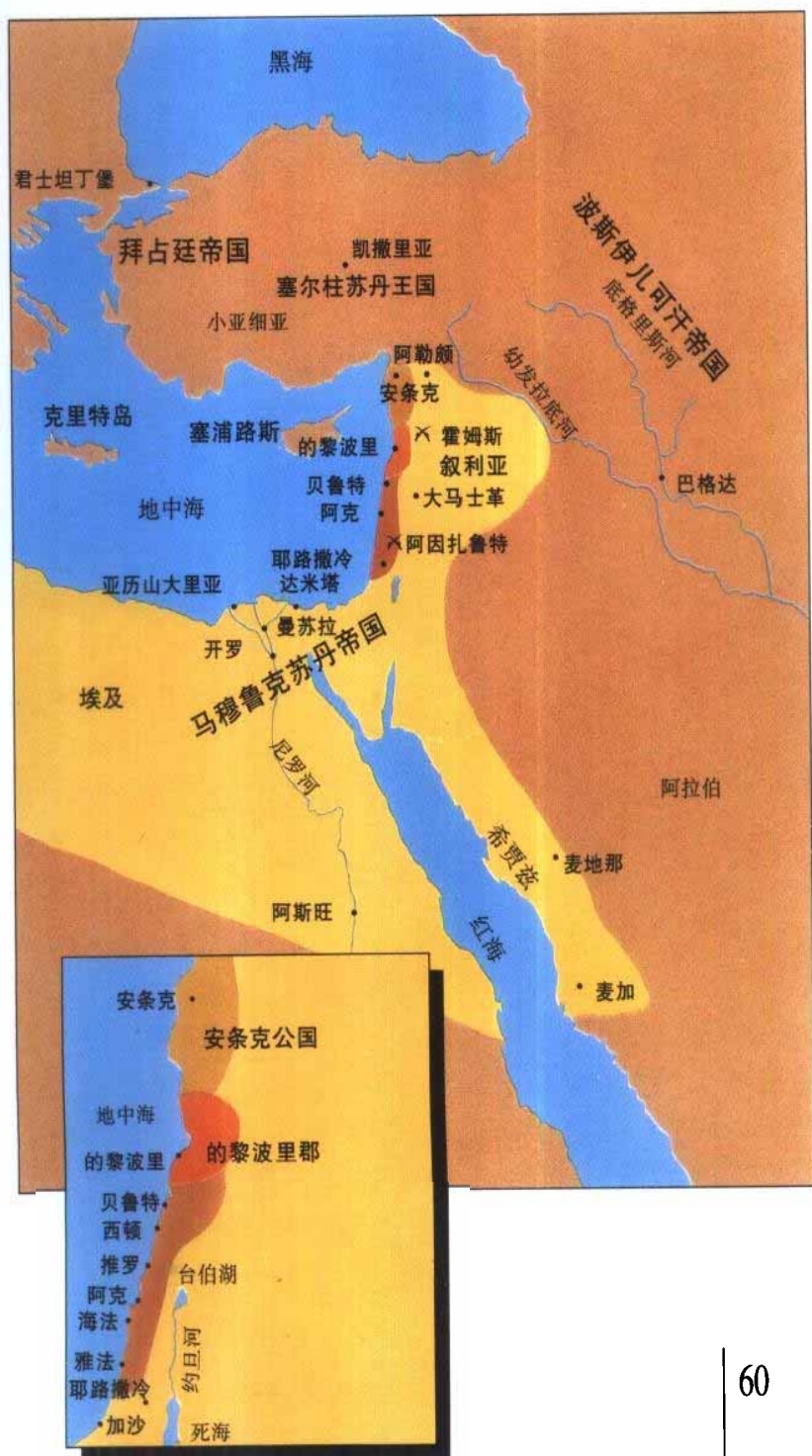
12世纪的阿拉伯作家阿·哈里里在他的传奇故事集《马卡卡特》中向我们描绘了埃及当时的突厥马穆鲁克统治者欢庆胜利的场面。1260年,马穆鲁克人上台后,在埃及和叙利亚实行了严明的军政统治。尽管伊斯兰为禁酒区,当时的许多城镇仍有酒出售以满足少数瘾君子的需要。当地的穆斯林们经常会在基督教徒所开的客栈里发现待售的白酒和啤酒。而突厥苏丹和士兵们则偏爱饮用由马乳发酵后酿造的烈性马乳酒。

1200年蒙古人向西横扫诸国的步伐终于停止了。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蒙古人被埃及军队击退。中东的边界也因这次战役得以重新划分。也正是从这次战役结束后起，埃及和叙利亚便处于从中亚平原征召来的突厥马穆鲁克的统治之下。12世纪末，马穆鲁克军队攻克了东征十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国、安条克国和的黎波里国，拓宽了中东地区的疆域。马穆鲁克人坐镇首都开罗和大马士革，统治着当时为世界贸易中心的这一富饶的帝国。

得萨拉丁王位的继承权进行着无休止的明争暗斗。巴勒斯坦沿岸建立的基督教属国家也一直是阿尤布王朝的心头大患。从1098年十字军首次进犯地中海开始，穆斯林和基督教势力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双方都认定巴勒斯坦是自己的宗教圣地。尽管早在1187年萨拉丁便进占了黎波里、安条克和圣城——耶路撒冷，但13世纪初仍有不少被穆斯林称作“法兰克人”的基督教徒生活在这里。在沿海这几个商业繁荣的地区，人们享受着贸易带给他们的富足生活。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民，无论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过着相对安定的日子。但在这种难得的宗教共存中仍然潜伏着动荡不安的因素：十字军随时会再次东侵，穆斯林统治者也在瞅时机灭掉基督教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流血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然而潜在的宗教派别威胁不光来自基督教势力。阿尤布人属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心目中的宗教领袖是巴格达的哈里发。但在埃及和叙利亚有少数地区的穆斯林属什叶派，坚持法蒂玛王朝时的宗教信仰。他们不承认哈里发的地位，认定有朝一日救世主会重登圣坛，取代哈里发的位置。城镇里居住的什叶派信徒容易管理，对社会构不成大的危害，而边远地区的什叶派信徒则大为不同，他们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因而也常遭到军队的镇压。其中最令人提心吊胆的是什叶派极端分子组成的刺杀团，他们从12世纪早期开始就一直在扰乱叙利亚人、基督教和穆斯林的生活。对阿尤布统治者来说，对付异教徒组成的刺杀团要远比对付法兰克十字军重要得多。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阿尤布王朝统治者和9世纪以来其它的统治者一样征募了大批的奴隶。这些奴隶的来源为别国的进贡品、战争中的俘虏或是市场上买来的奴隶。萨拉丁上台后，撤掉了法蒂玛王朝的非洲步兵卫队，他的皇家卫队由500名强壮的突厥士兵组成，这些卫队士兵身着统一的黄色戎装执行保卫皇宫安全的任务。萨拉丁的继承者们继续保持着这种传统。到最后任阿尤布苏丹——艾尔·萨利赫执政时，马穆鲁克斗士已成了埃及军队的中流砥



柱。大多数马穆鲁克士兵被编入苏丹的私人卫队，史称巴赫里军团，因他们驻扎在与开罗城一岸之隔的尼罗河的巴赫艾尔尼尔岛上而得名。

几乎所有的马穆鲁克士兵都是从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南部大平原的突厥吉卜恰克部落征召过来的。虽然伊斯兰法律明文规定不准使用非阿拉伯的异教徒奴隶，但在征兵充军时，突厥人却成了伊斯兰国家的首选兵源。突厥人几乎天生就是完美的战士，刚会走路就开始习骑射。9世纪一位阿拉伯人在一封使书《谈突厥人的素养》中这样描述道：“他们只习拼杀、狩猎、骑射和格斗，以俘获对手、侵入别国为乐。他们天生就是行军打仗的料，毕生追求的也就是戎马生涯。他们谙熟各种作战技术。他们不讲手工艺，也不谈商业，如何作战是他们百谈不厌的话题。因此就如同希腊人在哲学方面有造诣一样，突厥人则以其骁勇善战而著称。”

征召的马穆鲁克得学会各种作战技术，尤其要熟谙箭术，掌握致敌人于死地的战术，如战略假败（将敌人引入包围圈最后将其全部歼灭）。当然，接受逊尼伊斯兰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要会讲阿拉伯语，如有必要还得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因远离家乡和亲人，马穆鲁克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相依为命并把自己的主人视为生身父亲。尽管“马穆鲁克”这个词的意思是“被人占有的东西”，但主人并不把马穆鲁克当作奴仆，而是将他们视为自己家庭的一部分。主人在世一天，马穆鲁克就有义务悉心照顾他一天。他们有可能被主人选为贴身侍卫、私人厨师或掌管日常事务的总管。有抱负和上进心的马穆鲁克甚至会谋得更高的职位。一旦接受了伊斯兰的洗礼，马穆鲁克便不会因其出身而受到歧视，只要他们肯努力，他们的仕途会平步青云的。如果碰巧主人膝下无子，由马穆鲁克继承他的遗产也是极可能的事。巴赫里军团中的马穆鲁克甚至有望被任命为统率三军的将领，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

13世纪中期，一位名叫拜巴尔·艾尔·班度克达里的矮壮巴赫里军团战士是马穆鲁克人中取得最高地位的人。他不仅担任过统率三军的首领，而且后来还成了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拜巴尔于1220年出生在吉卜恰克部落，幼年时期随部落从蒙古逃亡到克里米亚，不久便沦为俘虏，14岁时被奴隶贩子卖到阿勒颇的奴隶市场上。虽然大多数突厥人长相英俊，但拜巴尔却奇丑无比。正因如此，当时一位埃及将领以极低的价格（800第纳里，约合40两白银）购得拜巴尔。不久，拜巴尔的这位主人便失宠了，他所有的马穆鲁克也归苏丹艾尔·萨利赫所有。萨利赫慧眼识英才，将这位智勇双全的战士编入皇家卫队——巴赫里军团中。不几年，拜巴尔成了巴赫里军团总指挥阿克泰的副手。

在和十字军作战，及镇压叙利亚反叛分子的战斗中，由马穆鲁克组成的巴赫里军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苏丹萨利赫一再告诫其子图兰萨赫应保留巴赫里军团。1249年11月，在他死前不久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萨利赫表达了他对自己常规军的作战能力的担忧，并再三敦促其子要善待巴赫里军团。他写道：“我衷心

军事作战手册

经过读写训练后的马穆鲁克可以从军事作战手册中学习军事理论和作战技巧。左图是军事作战手册《骑术技巧探求》中的一页插图。虽然书名看似只讲骑术，但书中的技战术讲解不仅包括骑术，还有箭术、剑术、枪法、战略、战术、埋伏、排兵部阵、使用毒气和化学武器、防火衣的运用、伤口治疗法、战利品分发法等方面的知识。书中甚至还讲到对未来军事危险之预测法术的运用。

这些技战术都强调一个“精”字，这样才能确保马穆鲁克战士在战场上有出色的表现。这一要求在运用战略诈败和战略反攻上尤为必要。开罗和大马士革都设有竞技场定期举行军事演练，勇士们可在那里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本领。苏丹拜巴尔每天中午都会出现在开罗的竞技场上检阅部队的演练。马穆鲁克勇士还借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这样的狩猎活动一般在叙利亚的郊野进行，猎捕的对象有狮子、山豹、野猪、鬣狗、野狼、山鹿和瞪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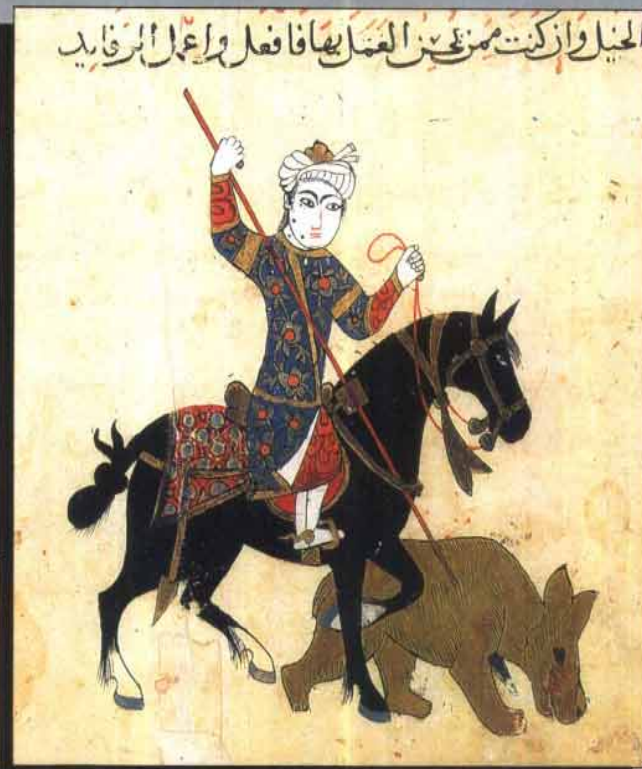


四个手持长矛的年青勇士正疾驰在竞技场
内作实战演练。

一位勇士在展示其坚不可摧的盾牌。这种盾牌是拜占廷时期的发明，广泛运用于中世纪的战场上。其制作工艺现已失传。



长矛刺熊：马穆鲁克们借狩猎机会提高他们的应战能力；同时借狩猎活动来侦察边境十字军的敌情。



剑术练习：持剑的马穆鲁克士兵每天需用重达两公斤的剑对着铅条或砖块进行上千次的劈砍训练。

向你推荐他们，他们战功卓著，我们应永远不忘他们的功劳。”事实上图兰萨赫上台后，许多重大的内征外战仍离不开巴赫里军团。正是这支骁勇的军团在1250年2月于曼苏拉击溃了一支十字军，并俘虏了当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但图兰萨赫的御卫队只召他原先的随从，其中有突厥人，但更多的是苏丹黑奴。萨利赫死后，图兰萨赫大肆提拔自己的部下，根本不考虑巴赫里军团的愤慨。将苏丹黑奴提拔为御林军和皇家卫队的大小头目一事极大地激怒了巴赫里军团。但图兰萨赫对他们的反应置若罔闻。当时的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记录下这一幕：当有人提醒图兰萨赫巴赫里军团有可能造反时，图兰萨赫猛然抽出军刀砍掉了一排燃着蜡烛的火焰，大声喊到：“那就让他们来吧！”

他们真的来了。1250年5月2日，拜巴尔带领一队人马闯入图兰萨赫的中军帐要将他活活砍死。图兰萨赫仓皇出逃，另一路巴赫里士兵一直将他追到尼罗河边的一座木塔里，然后用一把火将木塔点燃。图兰萨赫不得不冲出火海向河边跑去，未到河边便被乱刀砍死。巴赫里军团首领阿克泰走上前将其开膛破肚，用军刀将其血淋淋的心脏挑了出来，拿到被俘的法国国王路易面前说道：“我已将你的仇敌杀死，你也应该为我做些什么，要不是我，你迟早会死在他的手上。”据说，一直在为释放自己讨价还价的路易国王当时吓得一声未吭（5天后他被释放）。

图兰萨赫死后的十年是埃及政权更迭的十年，阿尤布王朝也行将崩溃。在埃及，马穆鲁克和阿尤布派系势力明争暗斗，都想控制傀儡的苏丹政权。在叙利亚，各阿尤布派系王储联合起来，自称一国。上埃及的贝都因部落也处于反叛动荡之中。开罗的大街上充斥着巴赫里团恐怖分子。在阿克泰和拜巴尔的授意下，巴赫里团士兵为所欲为，他们扰乱社会秩序、抢劫民宅，甚至闯入女浴场进行骚扰。市民们宁愿活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而不愿看到开罗遭此大劫。

1254年开罗市民的生活又恢复了安静。4年前，图兰萨赫亲手提拔的将领爱巴克杀死了不可一世的阿克泰，包括拜巴尔在内的大多数巴赫里士兵被迫逃往叙利亚。其余的巴赫里团士兵全部被捕，财产全部没收。肃清残余的巴赫里军团后，爱巴克觉得自己上台的时机到了。1254年9月他登上了埃及苏丹的王位。

然而爱巴克的王位并没有坐多久。4年前，他娶了萨利赫的遗孀萨贾尔。由于萨贾尔是女仆出身，她担心爱巴克将会废除她的皇后位置另立她人，于是在1257年指使手下的佣人将爱巴特勒死在浴室里。

萨贾尔也并未捞到多少好处，不久便有爱巴克的追随者找她报复。据史载，她被迫在开罗城堡的红塔里避了几天，将随身带的珠宝砸得粉碎，以免别的女人捡到便宜。终因饥饿难耐，在出来找东西填肚子时，她被爱巴克的一群姨太太挥舞木履活活打死，暴尸野外，任由野狗分食。1259年11月，爱巴克的马穆鲁克将领占图兹取得了王位，成了埃及新的苏丹。

古图兹上台后刚刚平息完内乱，埃及便面临蒙古人入侵的威胁。到13世纪中期，蒙古帝国已分为四部分，其中西南部分定都波斯，号称伊儿汗国。1258年，伊儿汗国大汗旭烈兀（成吉思汗的孙子）向西进犯，血洗巴格达城，不幸的哈里发也死于蒙古人的铁蹄之下。两年后蒙古人侵入叙利亚，阿勒颇于1260年1月失陷，接着3月份大马士革也被攻占。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10万大军的蒙古人继续向埃及进犯。面临亡国的危险，马穆鲁克人暂时放下内讧，同仇敌忾迎战来犯之敌。历史挽救了埃及。在攻下大马士革后，旭烈兀忽闻远在中国的蒙哥大汗驾崩。为了争得空缺的蒙古王位，旭烈兀率领精锐兵力东进，留下的一两万部队由皈依基督教的吉卜可哈统率。吉卜可哈盲目自信，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是年夏天，他派使臣前往开罗劝降。得知旭烈兀已班师回朝，古图兹不仅没有投降，还对蒙古使臣处以腰斩，死者的头颅高高悬在开罗的苏外拉城门上。

1260年7月25日，古图兹骑马出城检阅临时组成的10万大军。这支军队主要由叙利亚逃来的难民组成，其中有不计前嫌的各阿尤布王储，更令古图兹欣慰的是，连拜巴尔也回来为他效力。古图兹重新让拜巴尔执掌巴赫里军团的军权以抗击蒙古人。虽然埃及军队的兵力十倍于蒙古军队，但他们对取胜仍没有太大的信心。这支军队中英勇善战的马穆鲁克只占极少数，大多数士兵装备简陋，更糟的是部队中还有很多纪律涣散的贝都因人。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在开路先锋拜巴尔的带领下，于加沙很轻松地就击败了蒙古人与他们旗鼓相当的先遣部队。拜巴尔率军在此等候埃及的主力兵团，然后一道沿巴勒斯坦海岸向前挺进。

马穆鲁克的行军路线要穿过十字军所属要地。尽管蒙古人曾承诺不会触动十字军的利益，但法兰克人仍对他们心存戒备。因此他们选择了给古图兹开辟通道并给他的部队提供了大量给养。当马穆鲁克军队由法兰克人作陪，在阿克城外稍作调整的时候，古图兹收到吉卜可哈已率军到达加利里的情报。古图兹任命拜巴尔为先锋，率军向东南方面前进，在阿因扎鲁特进行了决定中东命运之战。

阿因扎鲁特之战不仅确立了马穆鲁克在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中东，他们都被认为是伊斯兰的坚强捍卫者。大败蒙古人后，古图兹完全有理由欢庆胜利，但他身边的拜巴尔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情绪。由于战功卓著，拜巴尔要求把阿勒颇和巴勒斯坦划分给他管理，但却遭到了断然的拒绝。10月23日，气恼至极的拜巴尔伙同其它马穆鲁克将领在加沙暗杀了古图兹。据官史记载，杀死古图兹的不是别人，正是拜巴尔自己。古图兹死后，各将领为王位的继承争论不休，最后一位资深埃米尔说道：“谁杀的古图兹，谁就应该称王。”

很少有像拜巴尔那样无情的君王，他从不讲信誉也少知廉耻。早在阿克整军待战时，他就发现法兰克人城池防范甚松，建议古图兹先将该城拿下然后再对付蒙古人。但古图兹对法兰克人的帮助心存感激，没有采纳拜巴尔的建议。虽然残

精巧的五金工艺

13世纪50年代，蒙古军队大举入侵波斯，大量的波斯穆斯林难民涌入埃及和叙利亚。在这批难民中有许多波斯金箔匠和铁匠，正是在这些匠人们的影响下，整个马穆鲁克帝国的五金工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应那些富有的土耳其将领要求，匠人们每天不停地为他们打造生活奢侈品，这些物品大多为嵌有贵重金属的黄铜制器，体积越来越大，造形越做越精美。匠人们将从欧洲进口来的矿石冶炼后铸成所需的装饰品，然后用锤子在其上的凹槽或留孔处把金、银、镍、铅、紫铜等镶嵌进去。配有抽象花纹和文字的饰器看上去精美绝伦。虽然一些马穆鲁克不愿让工匠们在饰物上雕刻代表活物的东西，许多成品上仍然以人物、动物及怪物形象作为装饰。

这只镶有金、银、镍的贵重黄铜笔盒可能是一位高级马穆鲁克行政官员订做的。笔盒通常别在腰带下，里面装有抄写人员必备的芦苇笔、清洁芦苇笔的丝线、墨水以及涂改墨迹的细沙。

酷无情，但拜巴尔对拥护他的马穆鲁克都予以加封进爵。他的传记中写道：“当真主赐与你王位，你就应招回远方流离的难民，恢复他们的地位，归还他们的财产。贤者应得到重用，能者应予以提拔。”

但得到提拔重用的并不都是巴赫里军团的马穆鲁克。由于种种原因，拜巴尔还不得不留下古图兹原先的将领。为了先发制人，拜巴尔组织了一个秘密间谍组，由一位马穆鲁克军官负责。除了间谍活动，该军官还负责检验来往信件，处理外事活动。拜巴尔仍感到不放心，他经常突击拜访部下或是微服上街，体察部下及市民对他的评论。市民们大都不喜欢马穆鲁克，因为他们恃强凌弱、自大傲慢。他们永远也忘不掉50年代初拜巴尔当政时制造的全城混乱。为了取信于民，拜巴尔降低了赋税，但收效甚微。尽管战场上的拜巴尔勇猛异常，但敢于公开在开罗抛头露面却下了几个月的决心。

在马穆鲁克看来，拜巴尔之所以能取得王位，得益于他的个人能力和军政要人的拥护。拜巴尔没忘记自己的奴隶出身，因而他尽量想使自己的登基显得名正



言顺。他的做法之一是恢复象征逊尼穆斯林统一的哈里发地位。理论上讲,所有各国苏丹都应效忠哈里发,并从他那儿接受掌管一国的大权,但事实上哈里发不过是一具傀儡。由于前任阿拔斯哈里发死于蒙古人铁蹄之下,拜巴尔不得不找一个新的宗教领袖。一位自称是前任哈里发叔父的人被带到开罗,拜巴尔向公众宣布他是新的哈里发,并在随后发行的货币上印上了新哈里发的头像。但新的哈里发并不像拜巴尔想像的那样可以任他摆布。所以拜巴尔有意找来一群散兵游勇让哈里发带领远征阿拔斯,从蒙古人手里夺回巴格达。结果,哈里发和他的部下几乎全军覆没。苏丹便另立了一位哈里发,该哈里发也声称是阿拔斯血统。

拜巴尔一面将哈里发软禁,另一面却雇佣自己的宗教顾问——萨伊克·克哈迪耳·艾尔米赫兰尼。这位自称寻求真理的宗教顾问却是寻欢作乐之徒。当他和当地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之间的暧昧关系被主人得知后,他仓皇逃离了伊拉克。在阿勒颇他又因男女关系引起事端,不得不逃到大马士革。在那里,他结识了时为将领的拜巴尔,拜巴尔对这位布道者的话深信不疑。作了苏丹后,拜巴尔仍对克哈迪耳信赖有加。这样一来,克哈迪耳便利用自己职位之便,把大量供奉苏丹的钱物挪入自己的私囊。1263年,埃及政界的重要人物指控他犯有贪污、通奸、行为不检点等数项罪名。克哈迪耳声称如果他被处死,苏丹的死期也会马上来临。凭这句弥天大谎,他被改判为终身囚禁。

克哈迪耳还曾一度唆使拜巴尔对犹太人和基督教势力进行驱逐和肃清。名

图为一个雕有双头鹰图案的镶银的黄铜香盒,用来盛放香料。同样的小号球形饰物还可以用作暖手炉,炉中固定有盛木炭的火箱。



义上是保卫伊斯兰的圣战,实质上是对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财富的掠夺。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时期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尽管生活在穆斯林统治的国度里,但他们的生活却相对安定。许多人甚至成了上层管理人员和富翁。但处于马穆鲁克统治期,他们的处境就大为不同了。基督徒历来被认为是蒙古人的帮凶,蒙古人经常雇佣基督徒组成的外援军团为他们作战,在城池被攻破后,基督徒总能幸免于难而穆斯林们却总在遭殃。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社会地位总会引起广大穆斯林的不满和妒嫉。这种不满经常表现为暴民冲击犹太人和基督徒居住区。发生这种事情后,马穆鲁克总是站在广大穆斯林的一边,基督徒们被迫缠上蓝色的头巾,系上蓝色腰带,而犹太人也是同样的黄色打扮。他们不准在城内骑马、骑骡穿行;基督教堂和犹太教会也被打劫一空被迫关闭;许多基督徒因不愿皈依伊斯兰教而被罢免公职。然而,尽管遭受了种种迫害,犹太教区和基督教区仍然存活了下来,因为马穆鲁克离不了他们的高超管理和巨额财富。

除了对犹太人和基督徒进行迫害外,拜巴尔在穆斯林内部也发起反狎妓、反吸毒、反酗酒、反穿戴奇装异服的运动,以排除异己、纯洁伊斯兰教。他所针对的是蒙古人、十字军军阀和仍在叙利亚肆意横行的刺杀团。除了这些逊尼派伊斯兰的仇敌外,拜巴尔还决心摧毁叙利亚的阿尤布诸王储的势力。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拜巴尔在执政的17年中做了不懈的努力。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他征服了阿尤布王储势力,平息了刺杀团的活动。虽然他没有完全铲

图中展示的一个脸盆,代表了当时伊斯兰的艺术水平。盆上描绘的是马穆鲁克将领及仆人狩猎的场面。因为当时政权更迭频繁,艺人们有意在雕刻时漏掉了短命的苏丹。



除这些势力,但也达到了使他们服从统治的目的。此外,他还向十字军发动了一系列的血腥战争,将十字军势力范围压缩到了沿海的几个据点。1268年攻克安条克是拜巴尔取得的最为辉煌、同时也最为残酷的胜利。当部队冲进这座被诺曼人霍特维勒氏统治达150多年之久的城堡后,拜巴尔下令将城门封死,不准从城里逃走一个人。之后是血腥的屠杀,大多数市民横尸街头,剩余的人也全部当奴隶卖到奴隶市场,因为数量太大,买卖的价格也大幅下跌。4年后,英格兰王子爱德华率军抵达阿克准备和蒙古人联手进攻巴勒斯坦。得知这一消息后,拜巴尔马上派了一名扮作基督徒的刺客行刺爱德华。被带毒的匕首刺伤后,爱德华大病几个月。伤稍好,爱德华慌忙带人撤离巴勒斯坦,再也没敢回来。

尽管残暴无情,拜巴尔确实有他的政治外交才干。1261年,他和蒙古金帐汗国的伯克汗建立了同盟。因为在继承大汗汗位的问题上,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有过分歧,彼此结怨极深,和拜巴尔结盟可以抑制伊儿汗国的势力。而拜巴尔与之结盟却是想从金帐汗国管辖地吉卜拉克平原征召马穆鲁克士兵。为保证征得的奴隶能胜利通过博斯普鲁斯,拜巴尔还和拜占廷统治者迈克尔八世签订了和约。当时主要的奴隶贩运商热那亚人和战斗物资提供商威尼斯人与拜巴尔交往甚密,双方互利互惠,各有所得。

就在扩大自己在国外影响的同时,拜巴尔也不失时机地通过重组部队,加固城堡等方式巩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便捷的通讯是拜巴尔统治其王国的关键。两个国都,大马士革和开罗虽然相隔650公里,但往来信函由骑兵发送也只需4天。每个城镇每周向开罗汇报情况两次,遇有紧急情况,则由信鸽传递。携带好消息的信鸽往往身上洒有香水,它一落到开罗城堡的鸽舍内,便有人飞速报告给拜巴尔。此时不论他在饭桌上或是在马球场上,他都能马上知道消息的内容。好的信鸽可卖到700个金第纳里(约合60两黄金)。

随着国内交通的发达,拜巴尔对再次发动战争野心勃勃。这是他最有野心也是最后一次发动战争。拜巴尔刚上台时,被蒙古人驱逐出去的罗姆苏丹就请他帮忙杀退蒙古军,恢复1243年遭蒙古人侵略的罗姆国。1277年春,拜巴尔接受请求,出兵小亚细亚,在埃尔比斯坦边界击败了一支蒙古军队。接着,拜巴尔率军向西横扫,占领了凯撒里亚并封自己为那里的苏丹。但他的王位没坐几天,伊儿可汗就派来另一支蒙古军争夺失地。由于在当地招不到足够的士兵与蒙古人抗衡,他不得不把刚坐暖的位子让给愤怒的蒙古人,自己溜回大马士革。是年6月,因喝了一杯带毒的马乳酒(据说是他为别人准备的,而自己不慎误喝),拜巴尔彻底病倒,13天后于6月20日死去。

马穆鲁克体制打破了世袭传统。马穆鲁克的社会地位不能传给其子孙。解除自由的马穆鲁克后代已是讲阿拉伯语起阿拉伯名字的穆斯林了。尽管军事统治

者仍对他们另眼相看,他们已经同化得和本土埃及人没什么两样了。他们不一定非要从军不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有选择部队的权利,比如他们喜欢兵源不分人种的、统帅多为马穆鲁克将领的部队。马穆鲁克的后代也不会再像父辈那样,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很大优势进而谋得王位,苏丹也很少会同意让他们接管父辈掌管的军队,也不会让他们继承其父辈得到的皇家恩赐——伊克塔(享有土地的使用和经营权,但无所有权)。许多马穆鲁克统治者都希望将统治权传给其子孙,但是其子孙必须能征善战顺应民意。不然,即使继承王位也不会坐得很久。总的来说,马穆鲁克苏丹只是在第一代外国雇佣军出现时才产生的新事物。

马穆鲁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武力等于一切。在政治上,马穆鲁克也奉行这一原则。如果某位马穆鲁克想登上最高王位,那么他所需要做的只是打败现任的苏丹。因而派系之争就像沸腾的开水冒出的气泡一样层出不穷,经常会有流血政变发生。皇宫成了堆放被杀苏丹的停尸场,每任苏丹的平均执政期只有5年。

尽管政权更迭频繁,管理体制却相对稳定。马穆鲁克王位之争很少引起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每个企图称王的人只考虑如何篡夺王位,并不考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是本土埃及人,虽然他们看不惯动辄就挥舞刀剑的马穆鲁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此时国势的强大。有些人甚至认为是上苍派马穆鲁克来拯救埃及和叙利亚的。当时多数国家仍然实行王位世袭制,这种制度下虽有不少贤能的君王,但也不乏无能的昏君。但马穆鲁克统治的国家却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她的君王永远是最有才干的铁腕统治者。

拜巴尔死后将王位传给其子,但不到两年便被巴赫里派系推翻。1279年11月,在经历了三个月的争斗后,一位高级将领夸拉温登上了王位。这位与拜巴尔同年出生的吉卜恰克突厥人做苏丹时已年近60。他直到快30岁时才被卖到埃及,因而没有学好阿拉伯语。人们戏称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突厥人为艾尔·艾尔菲,即“一千”,意指当时购买他的人花了1000金第纳里的天价。他是萨利赫阿尤布最后几年统治时期的战将,在首领被杀后,他和拜巴尔一块儿逃往叙利亚。虽然他比拜巴尔谨慎从事,但他和拜巴尔一样残酷,一样不受埃及人喜欢。当他终于敢在公众场合露面时,却遭到市民的唾弃和围攻。

夸拉温上台后,撤掉了拜巴尔的随从,然后出兵大马上革,攻打拜巴尔死后一直想独立称王的逊克耳。逊克耳的部队根本无法与夸拉温部队抗衡。1280年6月21日,逊克耳惨败后逃往叙利亚南部。在那里他向波斯的伊儿汗蒙古国请求援助。蒙古人巴不得利用穆斯林内乱乘机向其发动侵略。于是在1281年伊儿汗的弟弟统兵5万,外加3万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突厥雇佣军浩浩汤

标志身份的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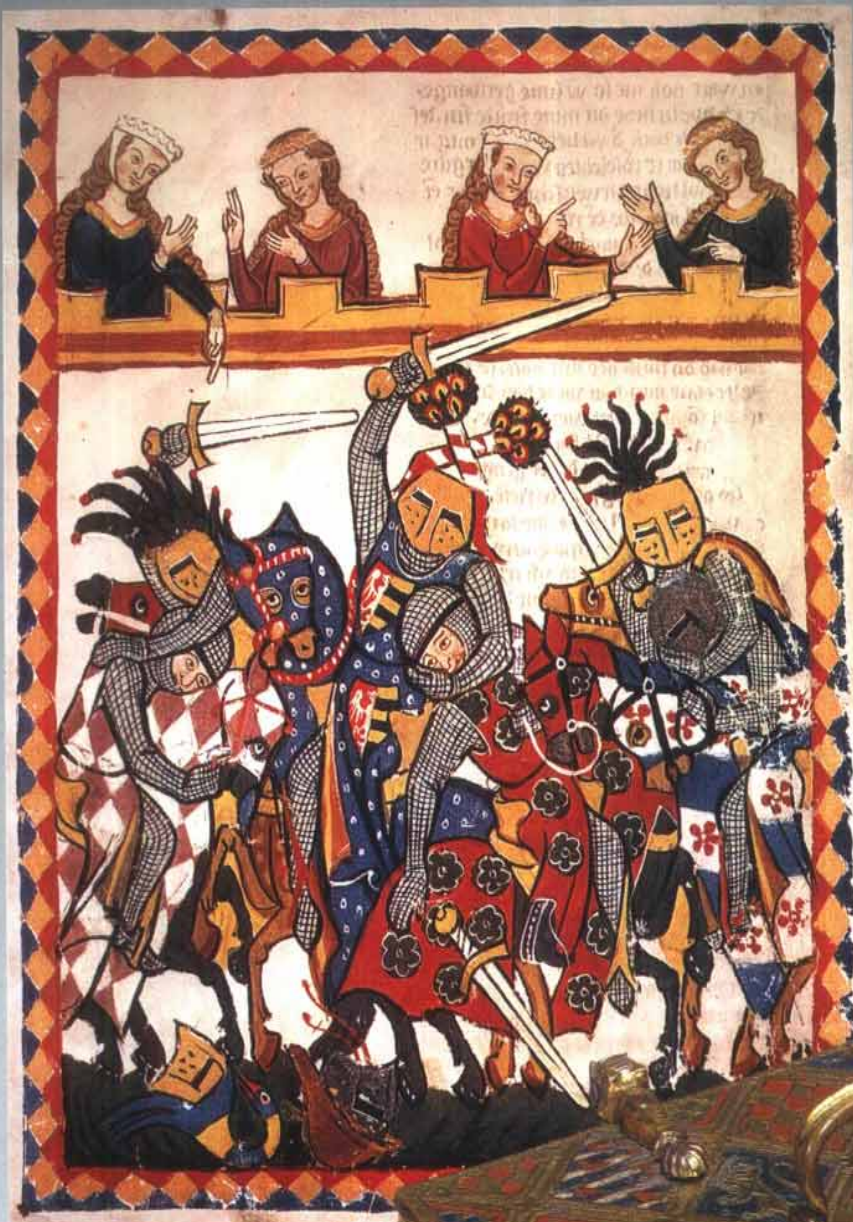
马穆鲁克和西方十字军之间的频繁斗争也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种相互影响的产物之一便是标识身份和地位的徽章的流行。徽章首先由十字军发明，用来区别不同集团的骑士身份，后来这些徽章发展成了西方的纹章学。徽章常用于盾牌、战袍和战旗上。

在欧洲对徽章的研究慢慢成了一门复杂的学问，比如颜色的搭配、盾牌的划分都有一定的讲究。随着徽章的流行，宗谱纹章院相继成立，专门研究徽章知识及运用。

在中东的穆斯林军队很快就引进了西方的徽章制度。比如，象征法国皇室和圣母玛丽娅的盾形徽章在中东非常流行，那些代表权力和领地的狮、鹰徽章在中东的穆斯林和十字军地区也随处可见。

下图为 1147 年到 1148 年十字军第二次东征时，手持长矛的十字军和穆斯林军队交战的场面。盾形徽章在双方军队中都可以见到。





图中为 13 世纪的四个骑士，他们的战袍和战马的马具上都有标明自己番号的纹徽——玫瑰花结，这种纹徽在穆斯林和十字军中都比较盛行。

在比武大会上或战场上，将领的级别可以通过观察其佩戴的徽章而断定。除了用于战场上外，徽章还可以用来表示职务和财富：贵族身上的盾形纹徽是权势的象征，墓碑上的纹章代表了死者生前的地位，一个人的祖上也可以由其佩戴的纹徽猜测出来。



在这枚公章图案中，骑士手持的盾牌表明了他 是罗伯特·菲茨瓦特东征军中的一员。

这只于 13 世纪末制作的珍珠箱，从其油漆的图案来看，应该是英格兰彭布鲁克伯爵的财产。



和欧洲人一样，马穆鲁克将领也用徽章来区别不同的军衔和职务。这种标记有时是将领自己设计的，有时是苏丹赐给的。拜巴尔就曾赐给在 1268 年攻打安条克时一位战功卓著的将领一种特殊意义的标识——安条克城原先的堡主像。马穆鲁克的纹徽还表明佩戴者在皇宫中的职位。因为马穆鲁克王位不是世袭制，再加上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大量入侵，到 16 世纪，这种风行一时的纹徽就很少再能看到了。

这只赠给清真寺用的玻璃灯台上的弯形徽章表明了捐赠者为阿拉·艾尔丁·爱达克因，这种标识是由萨拉赫阿尤布苏丹所赐。



这只为大马士革医院制作的瓷瓶上的百合花图案是夸拉温家族几个成员的专有标识。



荡向叙利亚进发，满以为和逊克耳的反叛部队里应外合后当能痛击夸拉温，然而大马士革的人民却不愿遭受蒙古人的统治，逊克耳的残部归顺了夸拉温。夸拉温率领大部人马驻扎在叙利亚的霍姆斯城外等候来犯的侵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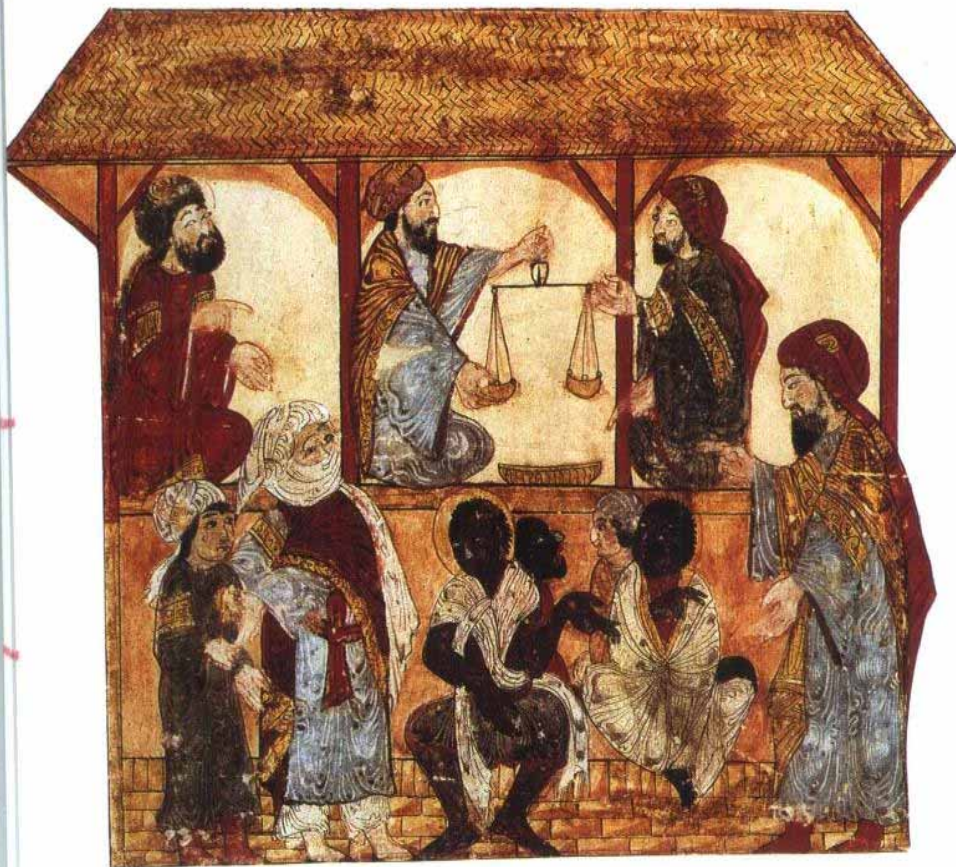
1281年10月29日，两军在霍姆斯城外相遇。就数量和作战能力来讲，双方应该是旗鼓相当，不分高下的。两军的作战阵形也极为相似：中间为精锐部队，两翼为雇佣军。战斗中，马穆鲁克右翼痛击了蒙古人左翼部队，但左翼同样遭到了

蒙古人的重创。双方都认为自己已输掉了这场战斗。就在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一位马穆鲁克高级将领高呼投降，纵马跃入蒙古人阵中。在被带到蒙军首领面前时，他突然拔刀刺向该首领，结果被蒙军乱刀砍死。在这一壮举的激励下，马穆鲁克士兵向蒙军发起了全力猛攻。蒙古人在这种气势逼迫下，精神彻底崩溃，慌忙撤回幼发拉底河对岸。太阳落山时，夸拉温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一本史书中讲夸拉温部下战后只有500人生还有点夸张，但阵亡名单上确实写满了战死的将士和平民自愿军的名字。

打完蒙古人后，夸拉温想乘势将十字军赶出中东，为此他得重建军队。由于他不断地扩军，到他当政的第10个年头时，马穆鲁克军团已达到12000人之多，占当时埃及和叙利亚所有外援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其他任何一位马穆鲁克

苏丹都未做到的事情。也许是急需扩大自己部队的力量，在保证奴隶士兵大多数为突厥人的前提下，夸拉温的兵源地区不限于吉卜拉克平原，而开始扩展到了其它地区，其中主要是黑海沿岸东侧的切尔卡西亚地区。这些马穆鲁克大多被编入精锐部队，一般一支精锐部队设有300个将领和3000个其它各级职位。这些精锐部队大都被安置在各个战略要塞，因此被称作“伯吉斯”或马穆鲁克“铁塔”。

尽管来自不同的地区，新征来的马穆鲁克士兵很快就和突厥人融为一体，事实上很多新征的士兵不久就在等级分明的马穆鲁克军队中担任各种要职。部队的最高层是苏丹的御林军，由两位摄政王统率，一位负责埃及的部队调度，另一



上图为哈里里作品《马卡马特》中一页插图，图中的阿拉伯商人正在就黑人奴隶的价格讨价还价。这些黑奴大多为北非的奴隶贩子贩运过来，或是在同努比亚作战时被俘的俘虏。马穆鲁克苏丹或将领们常会到奴隶市场购买黑奴作仆人或士兵，甚至让他们充任后宫卫兵。这些黑奴和年轻的马穆鲁克之间经常会有冲突，成为中世纪开罗的主要内乱之一。

位负责叙利亚事务。御林军中下设的其它高级官员有负责接见来访者的皇宫总管，有负责掌管武器和看管马匹的将领。除这些高级官员外，马穆鲁克军队还有一套分得很细的军衔制度，从统领五个士兵的小头目到拥兵上百的战将一应俱全。

依官衔的大小，马穆鲁克可从上级那里领到数额不等的津贴。苏丹经常会赐给统率兵团的高级将领某些特权，比如地区税收可以自得。战争发动前，苏丹会赠给他大量的钱物和马匹。刚登基的苏丹为了得到他的支持也会赠送他大量的礼物。这些将领会拿出部分钱物发放给下级作为其津贴和粮饷。

苏丹赐给下属的官服更能显示他们不同的级别。在欢庆仪式或正式场合，拥兵上百的将领往往身穿镶有皮毛、饰有金线、红黄相间的缎质长袍，头缠饰有丝条的穆斯林头布，腰系镶有宝石的金腰带，护身宝剑插在镀金剑鞘内挂在腰间。深得苏丹赏识的将领还有望分得配有豪华马具的御马一匹。级别较低的将领身着的是镶有金边的五彩长袍。马穆鲁克五颜六色的制服和平民百姓普通的白色或黑色装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带兵 40 名以上的将领，还可以有自己的乐队，当然乐队中主要是鼓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战场上为己方擂鼓助威，这样的鼓声不知吓破了多少十字军的胆，以至于他们的编年史中经常提到这种吓人刺耳的声音。然而这一乐队除了战时外，平时也有用场。如果将领心情不错，他会在太阳落山后把乐队叫到他的门前表演一番。

虽然军队中的各个要职都由夸拉温的亲信担任，但他还是怕会有意外发生。于是他要自己的手下全面训练，然后慢慢给他们加官进爵。尤其在对叙利亚摄政王这一职位的任命上，他煞费苦心，不停调动人事以防日后叙利亚的摄政王宣告独立。夸拉温到叙利亚走访期间，埃及的统治权就暂由其子和埃及的摄政王共同代理，一切行事均由严格的条文规定。整个开罗城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巡逻，在城堡周围安排有重兵把守。地方官负责通知百姓只准白天出行。前往叙利亚保护苏丹的部队，因有特殊的通行证，也会大大缩短花在路上的时间。尼罗河三角洲的贝都因地区负责提供邮政快马。但平日和大马士革的信函往来均由信鸽完成。除此之外，亚历山大里亚港口的西方商人不得在晚上外出，礼拜五中午，当所有穆斯林在参加宗教仪式时，他们也只能被锁在客栈里以防意外发生。

当然这样严加防范的管理机制无疑需要大量的开销。但苏丹自有他的经济来源：其一是税收，其二是别国的供奉，其三是贸易。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使用税。阿尤布统治时期，六分之一可耕地的税收已能满足皇室的开销。这笔钱的十二分之五发放给马穆鲁克军团，剩下的钱用于本土士兵组成的部队。到 14 世纪早期，分到马穆鲁克手里的份额已翻了一倍多，这样一来，国家的收入几乎

全部集中到了马穆鲁克的手里。

和弱小邻国作战得来的战利品以及其每年送来的进贡品不断扩大着苏丹金库的储量。霍姆斯战役结束后,就有蒙古人的盟国亚美尼亚向夸拉温求和。其国王列奥二世在和夸拉温签署的和约中承诺,每年向埃及供奉50万第尔汗银币并在年头付清。此外还答应每年送上25匹战马,25头骡子和1万只带钉子的马掌,这最后一项对矿产资源匮乏的埃及来说可以称得上是雪中送炭。其它的条款中还规定列奥必须释放所有穆斯林商人和囚犯,同时开放输送奴隶的通道。

1288年,夸拉温发布了一则公告,同意热那亚商人在给埃及运来大量奴隶的同时,可以和威尼斯商人一样在埃及做香料生意。埃及市场的香料先由商人从锡兰和印度运进,然后大批卖往欧洲,同时卖往欧洲的商品还有丝绸、亚麻、香木等;埃及商人再从欧洲购得铜器以高价钱转卖给印度人。苏丹对进口的香料征收高额关税,再以高额的价格卖到欧洲,这是他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做香料生意富起来的穆斯林商人在苏丹国库紧张时,也能拿出巨额的款项支援苏丹。

苏丹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扩充军备。单是修建马厩和牲口棚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一位14世纪的苏丹曾有过养7800匹马,30000只羊和大群骆驼的经历。每匹马都得有自己的马厩,马穆鲁克士兵好自己的坐骑对号入座。羊群是部队的伙食来源,而骆驼则是用来驮运作战行李的。有了这笔开销,苏丹便不会纵情享受其它诸如饮水时非要放一块从黎巴嫩雪山上采来再由骆驼飞速运抵开罗的冰,也不会花费巨额钱财去玩马球、打猎和养鹰。

马穆鲁克统治时期,埃及的艺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该时期是伊斯兰文化繁荣的时期。铁器打造和玻璃制作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马穆鲁克还大规模地建起了许多清真寺、学院、苏非派隐居所(神秘主义派别,得到不少大众的支持)。从夸拉温上台后,这些建筑已不再用砖块砌建,而是用刻有花纹的当地人青石块搭建起来的。石块建筑要比以前的砖块建筑经得住风雨的侵蚀。这些建筑的修建者大多是为了逃离蒙古人的铁蹄而从伊拉克和小亚细亚移入埃及的移民。由于大批的移民涌入,开罗城的人口到13世纪末已达到50万,成了中国以外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是其它任何一座欧洲城市的5倍或5倍以上。

和拜巴尔一样,夸拉温也一直有将十字军赶出圣地的夙愿。1289年他向自己的理想实现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利用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之间闹矛盾的时机,轻取黎波里这座港口城市。大量的战利品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他在台上的最后几年中,将目光盯在了阿克这座仅剩的法兰克人控制区国都上。在攻打黎波里城时,为了避免自己军队遭到阿克的袭击,他和阿克签订了一个10年10个月零10天的和约。1290年8月,撕毁这个和约的借口来了。当年8月,一队意大利十字军抵达阿克城,见穆斯林就杀。苏丹派使臣前往阿克要求法兰克人将杀

人凶手以及所有的基督囚犯交给他们带回开罗处置。公众不同意,使臣只好空手而归。

夸拉温找到了出兵理由后,他马上召集人马向阿克进发。1290年11月5日,部队刚在开罗城外驻扎下来时,70岁的苏丹便染上了风寒,5天后撒手归天。

看来阿克居民的命运会有转机,因为马穆鲁克统治阶层有可能为夺取王位而分散其攻打阿克的精力。夸拉温死前不久其长子莫名地死去,王位的继承权自然应该是老苏丹的小儿子克哈里耳的。但老苏丹不大喜欢克哈里耳(谣传说他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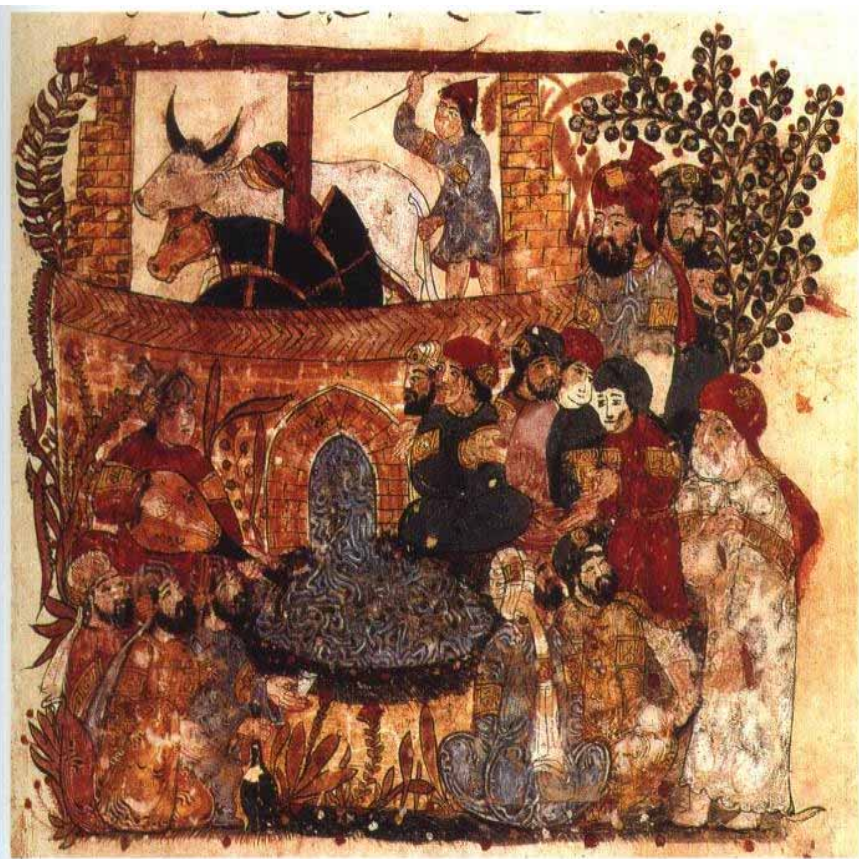
死了其兄长),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我是不会将统治穆斯林的王位交给他的。”

然而,老苏丹死后仅两天,克哈里耳便登上了王位。阿克人的希望破灭了,同样失望的还有进入天堂的苏丹。其实很早以前克哈里耳就开始准备夺位,而且因其能征善战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即使严格地按马穆鲁克的标准来看,他都是一个好骑手、好射手、好战将。1290年整个冬天,克哈里耳都在巩固自己的王位。身边的反对者一个个被铲除,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克哈里耳再将这些财物发给那些潜在的对手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巩固自己的同时,克哈里耳没忘记备战阿克。到第二年3月份时,他的部队已拥有近百架攻城机械。

1291年4月6日,一切攻城准备就绪后,马穆鲁克兵团以6万骑兵、16万步兵(史载可能有所夸张)的兵力向阿克逼进。而阿

克城内只有不到1000人的骑兵和14000部兵外加三四万平民。尽管兵力如此悬殊,攻克阿克也决非易事。阿克坐落在半岛上,三面临海,通往陆路的城门也没有三道护墙,牢不可破。除了天然屏障外,守城者知道守好城就等于保护自己的生命,所以城内各种势力暂时放下了彼此的恩怨,齐心守城。而马穆鲁克军团中的叙利亚摄政王却不愿攻城,克哈里耳和他也是面和心不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穆鲁克的战斗力。

马穆鲁克军团攻城的射石机昼夜不停地向城墙发射石块(该机械由希腊火药助燃发射石块,其配制成份已失传)。大约有1000名的工兵专门破坏城墙的地基。守城者用自己的石弩予以坚决的还击。一位年轻的叙利亚王子,伊斯美尔·



一群不知农耕之苦的闲散之人聚在一起讨论语法规则。丰富的阿拉伯语言给文人提供了不少闲谈的资本,比如说,文字游戏、猜谜语、作诗等。还有不少专职说书的艺人在市场内或公共场所搭台,讲些雅俗兼有的故事吸引了不少路人。

开罗的医疗中心

在苏丹夸拉温的全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曼苏里马里斯坦，是开罗当时最高级的医疗中心。夸拉温曾因发高烧住进大马士革的努里医院接受治疗，那时他就发誓要在开罗建一个更好的医疗机构。病好后，夸拉温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开罗的医疗中心于1284年开始动工修建。由于夸拉温强行抓来很多壮丁参与施工，他的梦想在短短的11个月中便成了现实。

花费巨额资金修建起来的医疗中心除了有先进的医疗配套设施外，还有一座清真寺和一座孤儿院。除普通的疗养病房外，中心还设有各专科门诊室，比如高烧科、眼科、外科、痢疾科、神经科等等。中心还配有实验室、配药房、浴室、厨房、贮藏室和供院长召集人员开会的演讲厅。医生们认为新鲜的空气对病人的康复非常重要，所以医疗中心的地板上洒满了香草，前厅还引来天然泉水营造舒适的氛围。所有的治疗一律免费，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中心还雇有专业的乐师为他们演奏，50人组成的唱诗班日夜为病人诵读《可兰经》。





阿布·艾尔菲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克人用船将石炮运至海上向我们进攻，极大地分散了我方攻城的兵力。一天晚上，海面上突起风浪，阿克炮艇在海面上颠簸了一阵后船沉炮毁。”只要有可能，阿克人便会冲出城门和敌人拼杀。实在被逼无奈，他们会紧闭城门，在晚上取小道偷袭马穆鲁克兵营。伊斯美尔的描述中有这样一段：“法兰克人经常会给我军制造些麻烦，他们驱散我们的哨兵，杀入我方军营，结果陷入我方设的绳套。一位骑士一头栽入我方将领的便坑，还没来得及上来便被杀死。惊慌过去后，我方士兵开始大举围攻偷袭者，将其一路杀回阿克城。”

一道一道的护墙被攻破、倒塌。5月16日，马穆鲁克士兵突破所有外层护墙将守城者压缩到了内城。1291年5月18日，苏丹发出了全面攻城的命令。伊斯美尔描述道：“在穆斯林冲入城中后，城内一些居民乘船逃离。剩下的法兰克人都钻进城内的几座碉堡进行最后的抵抗。被穆斯林军队杀死和俘虏的法兰克人不计其数。最后苏丹向躲在碉堡里的人下了通牒，要求他们全部投降，但没有一个人屈服。最后，被俘的法兰克人一个个被推往城外斩首。随着苏丹的一声令下，阿克城眨眼间便夷为平地。”

克哈里耳夷平阿克后，担心会引来其它十字军的报复，因为100多年前萨拉丁就有过这样的教训。所以他下令将所有的法兰克人据点一一捣毁。这其中包括推罗、西顿、贝鲁特、海法、阿斯里特和多特萨。十字军在中东延续了近200年的统治也随之不复存在。

随着阿克城的毁灭和十字军据点的一一湮灭，新一轮的马穆鲁克内讧开始了。接下来的20年内，一共换了六任苏丹。马穆鲁克的政治斗争可以用苏丹萨勒尔的一句话来概括：“今天他当政，明天我称王。”

萨勒尔最终的结局是当时各苏丹下场的典型代表：在吃完自己拉下的粪便后，萨勒尔被活活饿死。

直到1310年，夸拉温的另一个儿子艾尔纳苏耳·穆哈默得上台后，埃及才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政局。但1340年苏丹死后，政局又出现了动荡。这次是突厥势力和切尔卡西亚势力的公开冲突。随着马穆鲁克内部矛盾的深化，士兵的作战能力与日俱减，传统的技战术也不再演练，又不引进当时已发明的火枪、火药。

祸不单行，一连串的瘟疫席卷了整个马穆鲁克统治的帝国。随之而来的是人口急剧减少，田地荒芜，经济衰退。15世纪末的地税收入只有马穆鲁克刚当政时的四分之一。政府插手商业、本土埃及人的反抗以及15世纪以来葡萄牙在香料贸易上的崛起，使马穆鲁克帝国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虽然当时的帝国已有衰落的迹象，但马穆鲁克的统治依然维持到16世纪20年代，随后的几年里小亚细亚的奥托曼帝国逐渐取得了埃及的统治权。

书稿制作

13 世纪的欧洲人普遍希望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大批的大学相继开办了起来,从英国的牛津、剑桥,到法国的巴黎和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习风气日益浓厚起来。大批的学生(许多只有 14 岁)涌入这些学府学习,希望将来能找到一份稳定的文职工作。求知人数的增加使增印书稿也成了一种必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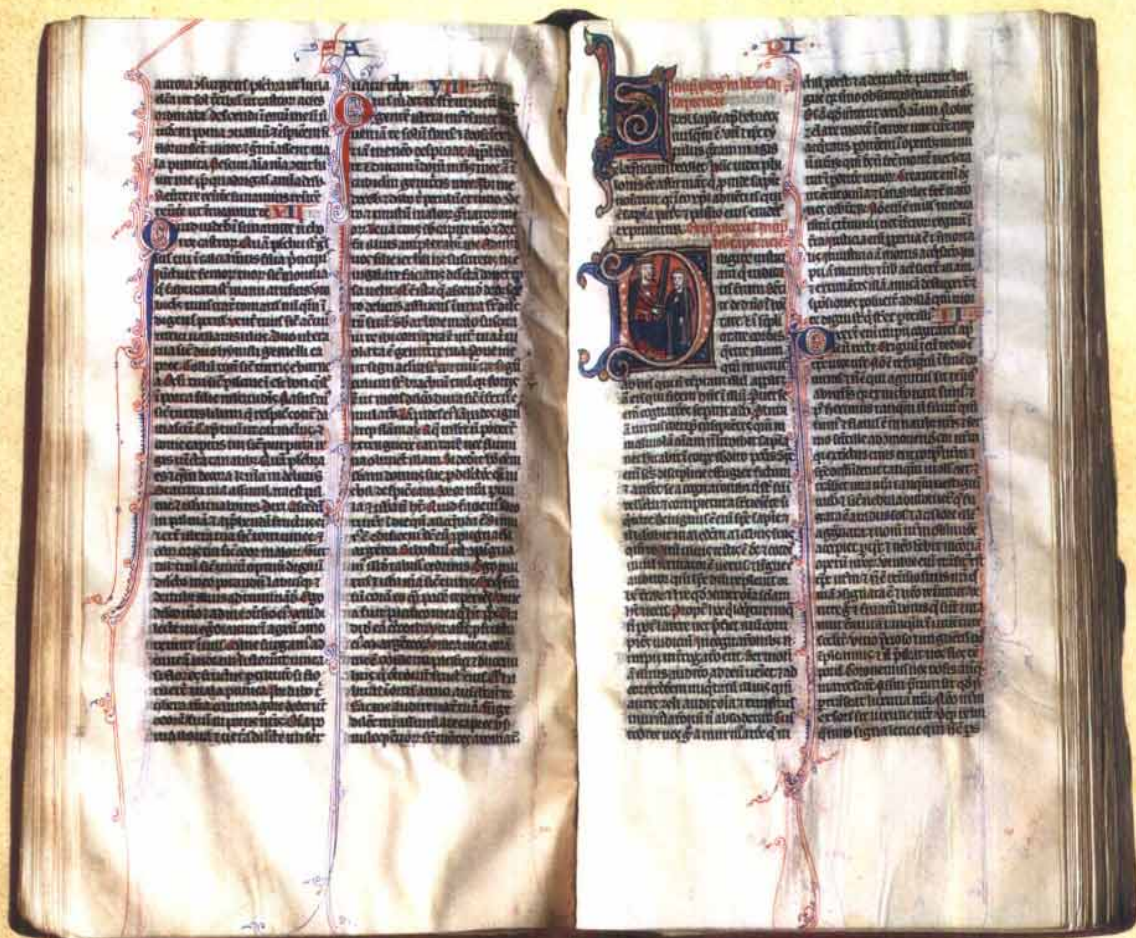
所谓书稿,实际上就是 15 世纪以前欧洲的僧侣们为了自己学习或祈祷,而用手抄写的宗教教义或经典文章。由于求知人数的猛增,书面资料的内容也得相应拓

宽。巴黎、牛津、博洛尼亚等城市相继开起了印刷房,印制新近的有关逻辑、天文、法律、数学、音乐等方面的教科书。有钱的人可以向这些印刷房订书,比如《圣经诗集》和当时流行的个人专集《岁月之书》等等。

先进的制作工艺保障了人们的需求。出书人用削瘦的歌德体代替了圆胖的罗马字体,并用优质的牛皮纸抄写,使书的大小及厚度大为减小。下图为单本发行的《圣经》,长宽仅有 138 和 83 毫米。这样一来,那些圣多明尼克和圣芳济会的僧侣或修女们在化缘时便可随身携带《圣经》。巴黎众

多的书商使人们得以能对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先睹为快,多产的圣多明尼克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也借此很快流行起来。

尽管这一新兴的产业最关心的两个要素是速度和数量,但中世纪的书稿业并不仅仅是功利主义的产物。高超的制纸、抄写、绘画和装订等技术都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掌握。看似操作自如的职业匠人们都经历过一个长时间实践的过程。当时的书稿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本身和它所传递的知识同样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制作书

装好一本书稿需要经过一系列专业处理过程。首先是书写纸的制作过程：先将动物皮（最好是牛皮或羊皮）浸入水中数日后捞出，放入石灰水中浸泡更长时间，将皮上的毛刮掉后，再依上述步骤重新浸泡一遍，捞出的皮用木框固定在太阳下晒干，最后制纸匠再用轻石粉和水对动物皮进行刨光清洗。

在往上写字前，先把制成的纸张叠好修剪成形，然后放入一个标准的书盒里（通常装8页、12页或16页），再送由装订人员缝

制成册。下面从13世纪中叶的德国版本《圣经》中节选的图片及说明，向我们展示了装书成册前的各道制作工序。

抄写员首先从公共文书院借来标准书稿的样本，然后抄写样本上的内容。穷学生一般借活页的样本，一次只借一页抄写，最后装订出自己的书稿。有钱人则直接从书商那里订购抄写好的并配有图片的整本书稿。文书院的样本书的内容要经常交由大学领导人审阅，以防止抄写时可能出现遗漏或误抄得不到修正。

叠好的纸张放入固定尺寸的盒子内，再用尺子和刀子将纸张剪齐。到了13世纪末，学生们已经可以买到已经切好并放在盒子里出售的抄写纸。



一位造纸商向一位僧人展示自己的样品，僧人正检查纸张有无小窟窿和斑点。在制作过程中，牛羊皮被拉伸钉在木框上（如图示）。框边的弯刀用来刮掉牛羊皮上的毛发。





手拿羽笔和刀子，这位抄写员正蘸着墨斗里的墨水在他已打好框线的纸上书写。刀子是削笔尖用的，也可以划掉抄错的字母，还可以帮助撑平纸张以便书写。文章的章节、标题及首写单词的大写处都留有空隙，稍后再用艺术字体装饰。



这位艺术家用笔在调色板里蘸好颜料，左手把着右手在画一幅头像。所有的颜料涂好后，用胶状物或鸡蛋清再重描一遍，能使画像保持永久的光泽和亮度。

小插图

红色标题

配图的首写字母

注解

修饰性大写字母

书稿中成功运用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各种技术的一个例子是，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九世的教会及主教法规的一本册子。

原文（关于婚姻）是黑体字，旁边的注释则是用淡一些笔迹写的对原文的评论、解释和理解。原文注解则挤在有空隙的地方。原文很有可能是在波洛尼亚这一法律公文盛行的城市写的，为了在法国市场上畅销，这些艺术插图是后来加上去的。



版面的安排和修饰不光是为从视觉上吸引读者，更重要的是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原文的每一行字母都是在精心准备好的方格线的帮助下写就的。复杂多变的首写字母标明了书

本或章节的开始，标题用特殊字体外加红墨水加以突出。

这些图片及艺术字体所用的各色颜料非常昂贵且不易买到。天蓝色颜料是从波斯和阿富汗进口的，橘红颜料是由于

死的雌胭脂虫研磨制成的。各种颜料的搭配在设计版面时非常重要。教会的当权派则力劝那些艺人们在设计版面时不要太花哨，以免误导读者的注意力。



这页书稿的最后一行在抄写时和前面的段落不小心分开了。这一失误给了版面设计人员发挥其想像的借口，一位身着蓝色斗篷，头戴红色帽子（和首写的红色字母相应）的人身后拖着一根长绳，长绳的另一端连着漏掉的句子，而那个人手指的地方则是漏掉的句子应该插入的地方，每一行结句后留有空余的地方，设计人员用一个色彩斑斓的狐狸将其添满。



这幅色彩绚丽的图片是13世纪《圣经诗集》中的一页，该画以人间为模型描绘了一幅富丽堂皇的天堂生活场面。两个图片分别代表的是麦琪受宠及麦琪之梦。图片中人物的头部略大，着装有明显的棱角，这表明该英国画家受了法国风格的影响。

这些首次在中世纪书稿中出现的插图主要是用来宣传宗教信仰的。“配图”指书稿的彩饰过程，大多数的彩饰选用金色以和圣·约翰在其书稿中对上帝的描述相对应：“像黑暗中的金色光亮，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灵，哺育了万事万物。”

这些书稿中的图片同时还显示了当时配图者的精湛技艺。右面的图例为现在配图者完成这样一幅作品时的不同步骤。完成这样一幅插图大约要花4天时间。

1 先用铅笔或淡墨汁把整个画面勾勒出来，再用羽毛蘸上用糖、石灰粉、铅粉和胶制成的混合物涂于要上金箔粉的地方作为底漆。等这层底漆干透时，用刀子将其表面刮平。



3 将底色添入画中。这时的整个画面轮廓较为模糊。用作底色的颜料有桔黄、深蓝、孔雀绿、橘红、赭红、褐黄等。



5 用醒目的黑线再将涂有金色的地方标好，并勾勒出其特征，整幅画呼之欲出。



2 画家可以用呵气的方式润湿底漆再将金粉粘于其上，然后用玛瑙块或磨成一定形状的动物牙齿将金粉打磨光亮。



4 涂上的底色将粘有金箔粉上色的地方突出来，便于画家确定再下笔的范围。



6 画家最后的点睛之笔：用细线条描出人物的面部表情及头发，用细长的白色线、点及圆弧勾勒出图案的边线及服饰上的皱褶。最后用较尖细的工具将金粉剥亮，使整个画面生色。





西方的战乱

4

13 世纪 30 年代，围绕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位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奇谈怪事层出不穷。据说他对灵魂的本质很好奇，于是将一死囚封在酒桶里，慢慢淹死，他与博学的朝臣们在一旁仔细观察，看是否有任何灵魂“流溢”的迹象，结果一无所获，于是灵魂被宣布为并不存在。还有一次，皇帝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有关人类语言起源的争论：他将一组孤婴交由一批又聋又哑的人在荒岛上抚养，几年以后，他造访该岛，想看看结果如何。可惜天不助人，一场致命的瘟疫已将这项帝国实验毁于一旦。有人坚信皇帝连一介信徒都算不上，因为他曾说过，人类一直被三个江湖骗子蒙骗：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另外，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过分注重个人卫生被认为是一种放纵行为，而有流言说，皇帝每星期都要洗一次澡。

这位使同时代人又震惊又着迷的人就是腓特烈·巴巴罗萨太帝的孙子，日耳曼南部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第三任皇帝腓特烈二世。他统治着中欧的大部，其冠冕一直可以追溯至公元 800 年在罗马加冕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重建昔日罗马帝国辉煌的尝试一直并仍将进行下去，尽管它的废墟遍及各地。拉丁语仍是受过教育的人的首选语言。到腓特烈时代，皇帝矗立在其疆域内封建制度金字塔的顶端，没有他，这一制度的其余结构几乎无其意义。不过，帝国的神圣性同样重要，因为它被视作一个基督教政体，其权力直接由上帝赋予。从法理上说，皇帝是上帝的摄政，或曰副理，他不轻易服从任何更低级的权威。

然而，在基督教世界，有一个对手与他争夺领导权，其授权方式甚至带有更直接的神圣色彩，他就是教皇。教皇是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无论如何不会向任何低于他的权威屈服。教会直接站立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并赋予任何其它事物以意义。按照传统，每一任皇帝都由教皇加冕；有些狂热的神职人员甚至据此声称，正是教皇赋予世俗君主以合法性。尽管围绕这一观点的争议纠缠不休，但绝大部分人认为，从整体角度而言，教皇和皇帝之间最低限度的合作，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而在实践中，合作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自从 11 世纪以来，教皇和皇帝之间更多的时间用于争斗，而非合作。到 13 世纪，两者的不睦升级到仇视的程度，并导致了两败俱伤的战争。这种争斗将给腓特烈二世的统治投上阴影。在他死后，教皇一方取得显而易见的绝对胜利，事实上使古老的霍亨斯陶芬家族陷于灭绝的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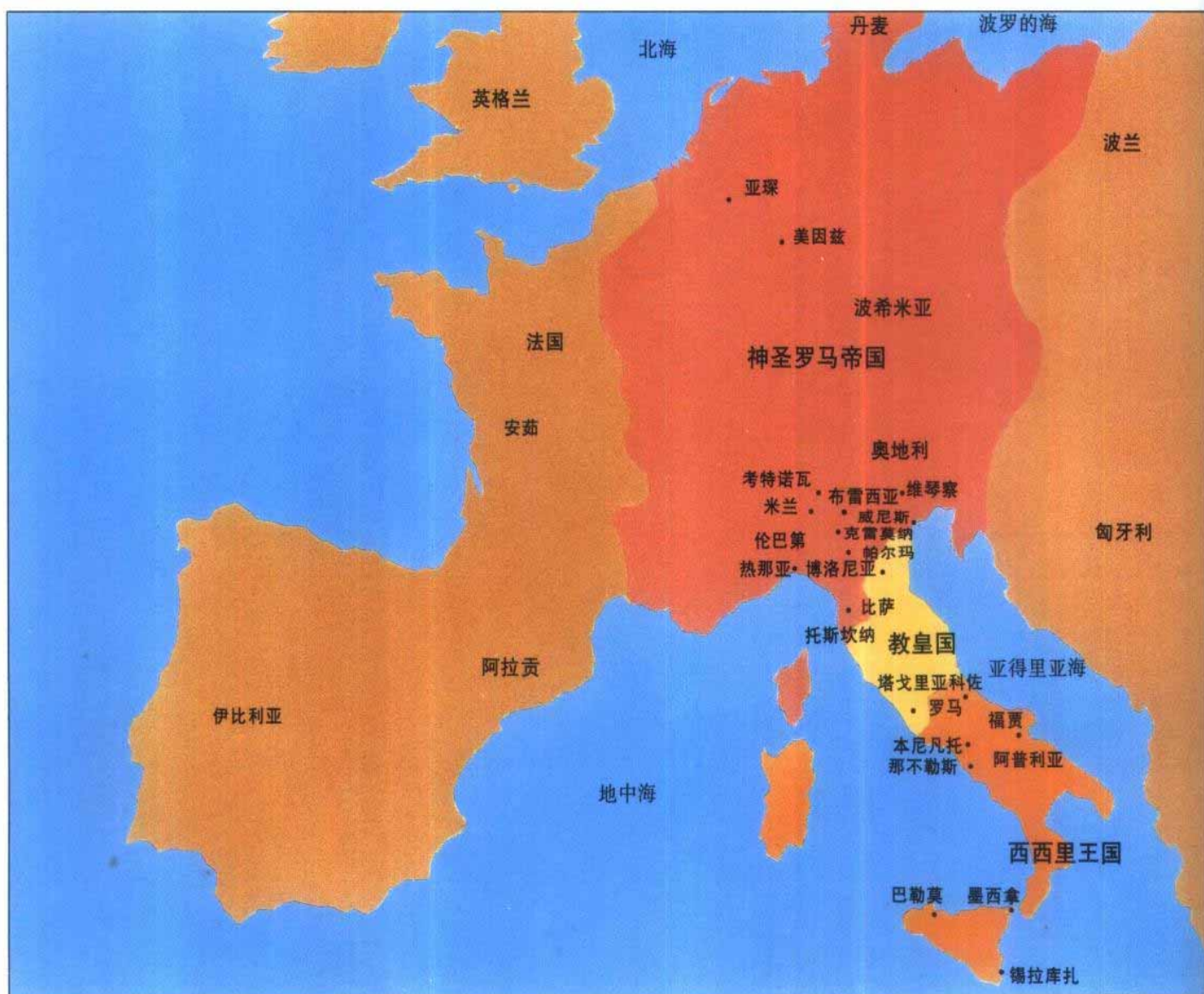
身穿锁子甲和无袖紧身上衣，带着头盔准备作战。这位 13 世纪的日耳曼骑士的形象和动作，似乎只能在中世纪宴会用的铜水罐或带柄大口水壶上才能见到。而腓特烈二世正是以这些用长矛和菱形盾牌装备起来的骑士，作为执行帝国使命的核心力量，控制着神圣罗马帝国，并向教皇制的权威性发出挑战。

当腓特烈二世 20 岁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他控制着当时欧洲最大的封建联邦，其疆域北迄波罗的海，南抵地中海，囊括了德意志全部和意大利半岛的绝大部分。只有围绕罗马城的教皇国不承认他的权威。腓特烈并没选择帝国的发祥地日耳曼而选择了西西里王国作为他的基地。他在那儿出生、长大，经他之手，西西里王国变成那一时期最富有和最具世界性的国家。

运。然而这一胜利反过来也大大削弱了教会。从长远的观点看，在权力和威望方面，教会同样是一个失败者。

这一碰撞是始料未及的。在 12 世纪后几十年中，教皇对皇帝在政治上占据优势的恐惧正日趋减弱。尽管皇帝统治着辽阔的疆域。包括德意志和它的诸侯国波希米亚、勃艮第、普罗旺斯和北意大利，但侯国间的互相隔绝状态和皇帝松散的统治给他带来的权力并没有如地图所暗示的那么大。相形之下，教皇直接统治的只有“彼得的遗产”，也就是罗马城周遭的拉丁姆地区。即使在这一辖区内，他的权威也常常遭到不服统治的市民阶层的挑战。

然而，在拉丁姆地区以南，由诺曼人建立的独立的西西里王国给帝国的权力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制衡因素。西西里岛原来是个穆斯林酋长国，后于 11 世纪时，被一个胆大而无耻的冒险家“诺曼底的罗杰·德·奥蒂维尔”征服。他以伯爵的名义统治，在其死后，他的儿子罗杰二世开始称王，并把意大利南部疆域纳入其版图。罗杰的西西里王国称为“雷尼奥”，从当时欧洲最奢华的宫廷所在地巴勒莫起，事实上向北一直延伸至那不勒斯和阿布鲁齐。尽管处于诺曼风格的封建统治



下,但这一王国拥有一个开放和具有世界色彩的社会风尚,兼收并蓄了穆斯林和基督教文化,同时兼具阿拉伯、伦巴第和希腊文化的色彩。

从罗马的角度来看,相比于其前任穆斯林来说,诺曼人显然处于有利地位。而且诺曼人并不向皇帝效忠。与此同时,在几次严重的误解后,德·奥蒂维尔家族对与教皇保持绝佳的关系感到心满意足。后者成为其名义上的宗主,反过来又保证了他们家族的征服成果。然而,一场朝代更迭给这一现状带来了剧变。1186年,腓特烈·巴巴罗萨之子亨利娶了罗杰二世之女康斯坦斯;4年以后,西西里国王,康斯坦斯的侄子死后无嗣,她成为西西里王位的首席候选人。但是,罗杰的一个私生子反对由康斯坦斯承袭王位,并进而夺取了政权。同时巴巴罗萨已死于十字军东征途中,26岁的亨利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亨利六世。1194年,他率领德意志骑士席卷西西里,以冷酷无情的手段将妻子扶到王位上,赢得“残暴的亨利”之名。1194年圣诞节,亨利以康斯坦斯丈夫的资格,在巴勒莫加冕为国王。至此,除了小小的教皇国,皇帝的权力已遍及整个意大利半岛,教皇的政治处境顿时变得岌岌可危。

康斯坦斯对丈夫可谓克尽妻道。她不但送给他一个王国,而且为他生了一个继承人。这件事让人感到如此出乎意料,因为康斯坦斯已年届40,而且在婚后的头8年里并没有生育。于是,恶毒的流言四处传播,说是魔鬼使康斯坦斯怀的孕,但亨利安之若素,给孩子取了其祖父的名字腓特烈,决心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日耳曼人。1196年,他宣布儿子腓特烈为“法兰克福的日耳曼”国王。翌年,他准备带着儿子北上,为他正式加冕。

1197年,在赴西西里埃特纳山斜坡的狩猎远行中,他患了热病,不久去世。于是有关年幼的腓特烈加冕典礼的计划立即被取消,因为德意志的帝国政治不会给一个婴儿国王留下一席之地。关于帝位继承的问题争论不休,形势迅速恶化成一场内战:亨利的弟弟,斯瓦比亚的菲力普,与来自魏尔孚家族的不伦瑞克的奥托展开了争夺帝位的角逐,霍亨斯陶芬家族与魏尔孚家族的冲突渊源流长。在日耳曼,他们各自的战场呼喝用语很久以来就被用于对峙的双方。“魏尔孚”表明是奥托家族的支持者,“魏布林根”(霍亨斯陶芬家族在斯瓦比亚的一座城堡名)的呼喝声则表明呼喊者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忠诚追随者。到下一世纪,这些战场呼喝声将向南移动,经意大利化以后,变成了“归尔甫”和“吉伯林”,它们将成为教皇和皇帝之间长年争斗的标签的一部分。

然而,此时对教皇制来说,似乎是上帝之手把它从帝国的优势统治下解救出来。而康斯坦斯对于在内战中丧失的其丈夫的北方属地并不感到心疼,她立即下令驱逐绝大部分跟随亨利来到意大利的日耳曼贵族和行政管理人员,当地民众欢呼雀跃,跟一场深入人心的暴动相差无几。现在起,腓特烈的未来被母亲牢牢

掌握着,他将以诺曼西西里王子的身份而非日耳曼国王的身份成长起来。

腓特烈丧失了一次加冕的机会,现在康斯坦斯要予以补偿。1198年,他加冕为西西里国王。但他继承的王国此时已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原因是亨利死后不久,因为欠缺政治上的安全感,康斯坦斯与教皇结盟。为得到保护和支持,她向罗马宣誓效忠,并给予教会以巨大的权力。自腓特烈加冕后6个月她就去世了。她儿子毋庸置疑地成为新当选的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被监护人。同时,“雷尼奥”在腓特烈未成年时由英诺森指派的人进行管理。

若亨利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惊恐异常,因为英诺森是一个狂热的教皇权威无上论的支持者。更不寻常的是,英诺森生性勤勉、聪慧、政治嗅觉灵敏,这些素质加上他强劲有力的个性,使他把野心变成了现实。在他任期内,他将把教皇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提高到巅峰。他把“彼得的遗产”扩充为一个蔚然可观的疆域,囊括了意大利中部的绝大部分领土,他介入到德意志内战中,将教皇权力付诸于皇帝的废立。他成为整个基督教王国申诉法庭的大仲裁者。他甚至强迫英格兰的约翰王交出王国,然后以教会采邑的形式交还给他,作为教皇的恩赐。

对于“雷尼奥”和它年幼的国王来说,英诺森简直是一场灾难。腓特烈在各种各样的权贵手下度过了不愉快的童年,他绝大部分时间居住于意大利半岛最顶端的阿普利亚地区。英诺森自己也承认,在他的监护下,“那种迫切需要宣泄悲伤的心情使他(指腓特烈)在其他绝大部分孩子都呀呀学语时就已获得了雄辩的才华”。然而腓特烈依旧处于教皇的控制之下。他于1208年14岁时行成年礼,次年,英诺森为他娶了西班牙公主。

腓特烈几乎迅即显示出危险的独立迹象。置英诺森的反对于不顾,他解除了教皇派来的最后一个权臣的职务,自行统治业已满口疮痍的“雷尼奥”。在教皇采取比规劝更激烈的行动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发生的事件迫使英诺森给他那位桀骜不驯的人质的地位来了一个戏剧性的提升。

在德意志进行的战争最终以腓特烈的叔叔,即斯瓦比亚的非力普于1208年被刺死而告终。次年,英诺森在罗马为非力普的对手奥托加冕为新皇帝。作为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对头,奥托表面上是教皇的人;但首先也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皇帝,而且他决定做一个皇帝。由于对亨利六世在南方的辉煌业绩记忆犹新,奥托把目光投向了西西里,加冕后仅数月,他便率领一支部队入侵“雷尼奥”。

英诺森怒不可遏,当即开除了奥托的教籍。在信仰至上的时代,这是一项强有力的制裁,它不仅威胁到奥托的灵魂不朽,也将激使其追随者放弃对奥托的效忠。但甚至这样做也不足以让奥托放弃计划。英诺森需要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予以反击。最有效的武器莫过于另立一位他可以赋予权威的皇帝与奥托对抗,但几乎没有候选人能具有足够的威望来对奥托构成严重挑战。

事实上,这样的候选人只有一个,即腓特烈。由于无力抵御奥托的入侵,他让人准备好了一艘船,预备航行到北非,那儿有教皇授意的日耳曼诸侯迎接他,然后他再北上宣布承袭王位。但妻子与大臣们都反对接受,一则冒险性太大,二则教皇让腓特烈放弃“雷尼奥”的王位,将之交给自己新生的儿子亨利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但腓特烈自有主张,1212年,带着屈指可数的几个随从,他跋涉北上接受王位,手中的武器最多也就是教皇的保佑和他贵族世家的名头。

但这两者的结合已经足够了。旅途本身困难重重,危机四伏;有好几次腓特烈差点被奥托及其盟军俘获。但一回到日耳曼,他受到热烈的拥戴。1212年,他第二次当选为德意志国王,几天以后,美因兹大主教为他加冕。然而,这位被朋友和敌人谑称为“阿普利亚来的男孩”的人地位还不稳固。在英诺森精明的外交手腕的操纵下,腓特烈和一支法国盟军用两年时间击败了奥托。1215年,奥托被正式废黜,返回仍旧支持他的萨克森地区。依照传统规定,腓特烈在亚琛再度加冕。这一仪式被一致认为是重登帝位的前奏。

腓特烈为此要大大感谢英诺森,但为教皇的支持他必须支付高额代价。他的先辈,特别是腓特烈·巴巴罗萨享受的一些权利和特权,转交到了教会的手中。不过这位新皇帝于1215年加冕时,似乎完全陶醉于他所获得的崇高荣誉中。在一阵宗教热情的激发下,他发誓要带上十字架,率领一支十字军团解放在巴勒斯坦的圣地。政治不妨缓一些再处理。

对英诺森来说,腓特烈的加冕典礼是一个政治上的辉煌胜利。1215年,他召开了教会史上规模最大的主教集会,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会议名字取自罗马的一座宫殿,这一系列的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教皇在处理基督教会事务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确认了腓特烈的当选和奥托的废黜。教皇制与帝国的较量似乎结束了。哪方获胜不言自明。

英诺森死于数月之后的1216年7月,但他留给教会的令人自豪的遗产看起来非常安全。尽管帝国在一些关键性的承诺上反悔的征象已很明显,但在此以后几年,腓特烈与英诺森的后任霍诺留三世保持着极其良好的关系,腓特烈违背了对英诺森的承诺,仍然保有西西里王位。年幼的亨利并没有在巴勒莫取代父亲的王位,而是被带到北方封为斯瓦比亚公爵,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封号;然后,在8岁时,他在父亲所在之地被加冕为德意志国王。在他未成年时,权力被授予接连三的摄政者。而霍诺留是个虔信宗教的人,不是一个政客,因而对这些都不闻不问。他更关心的是腓特烈的另一个承诺:率领十字军东征。

腓特烈没有履行诺言,在德意志一直呆到1220年,忙着通过连年战争,对一个日益危险地强大起来不臣服的国家施以某种形式的帝国统治。绝大部分时候,他通过向大主教们这些宗教贵族及崛起的城镇力量作出一些权威上的让步来购



这张面无表情的马赛克画像掩饰了教皇格利高里四世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毫不妥协的争斗。格利高里认为，教会的精神权威将被帝国的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所埋葬。他曾一度开除了腓特烈二世的教籍，甚至把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引为盟军，而这些城市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在通常情况下是他所竭力反对的。

买和平。由于军事实力有限，事实上他几乎别无选择。至少暂时，他只能通过淡化他的权威的方式来巩固它。

1220 年秋，腓特烈回到意大利时，已经是教会的忠实的儿子了。他为拖延十字军东征的行期向霍诺留致歉。他在信中写道：“哦，神圣的父亲，您不会因为抚养并爱着像我这样一位儿子而后悔，我们时刻准备匍匐在您神圣的脚下听候差遣；不久，在您亲手植下的树上，您会得到渴望已久的果实。”教皇为这一承诺感到安慰，于是在 1220 年 4 月，他最终同意加冕腓特烈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由于罗马自身的不安定局势，双方的协商被简化了。罗马的政局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仅在 6 个月之前，由于害怕罗马几个名门望族之间的争论所引发的暴乱，霍诺留本人被迫离开这座城市，藉着腓特烈的护卫部队，他才能安全返回圣彼得大教堂完成加冕典礼。除了重新履行他的东征诺言，腓特烈发誓要对各种各样的异教徒采取铁腕行动。其时，德意志和意大利正被韦尔多派问题所困扰，该派倡导一种严苛的基督教义，与教会生活中浮华炫耀的一面针锋相对；另外还有“清洁派”教徒，他们坚信物质世界本身所固有的罪恶。除此之外，腓特烈再次向教皇重申他的德意志和西西里领地在宪法上是分离的。为此，教会承认了腓特烈同时拥有皇帝头衔和西西里王冠的权利。这一微妙决定以后会招致麻烦，不过，当腓特烈平定罗马回他废弃已久的“雷尼奥”时，他和霍诺留分别时非常友好。

自从亨利六世 1197 年去世后，西西里王国事实上没有真正的统治者。腓特烈发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盗匪横行的国度，他花了两年时间使大陆上的封建领主屈服于他。1222 年，当地穆斯林全体暴动。又经过两年的殊死战争，暴动被彻底粉碎，腓特烈才成为名至实归的国王。

他对待降服的穆斯林出乎意料地宽大仁慈，他们被整个儿迁移至阿普利亚北部。在那儿，他们可以开垦土地，进行传统的地毯编织和武器制造工业。更不寻常的是，他们被允许保留其伊斯兰教信仰，并不受到迫害。腓特烈的政策使这些以前的反叛者转变成霍亨斯陶芬家族狂热的效忠分子。从那时起一直到王朝终结之日，阿普利亚的穆斯林为每一支帝国部队提供核心力量，甚至皇帝的贴身卫队也由穆斯林组成。除了作战时的英勇无畏，这支军队在将要到来的冲突中具有一项对其主人而言特别有价值的优势：即作为穆斯林，他们对于一个基督教教皇开除教籍的恫吓简直无动于衷。

在平定“雷尼奥”的过程中，腓特烈就已开始着手创建一套严整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系统，使“雷尼奥”成为欧洲最稳固、统治最有成效的国家。这一政体没有任何开明色彩，除了那些很不情愿地割让给教皇的权力，其它几乎所有权力都被国王牢牢掌握。这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由法律的形式不容置疑地规定下来的。

这样一个国家只有靠一支训练有素的文职官员队伍才能平稳运作，为了实现目标，腓特烈决定着手创建这样一支队伍。1224 年，在古城那不勒斯，他主持了

一所大学的奠基仪式。这是欧洲第一所彻底摆脱教权和君权控制的大学。对学问的热爱无疑是创建这所大学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帝国敕令建造该大学的诏书中，腓特烈的实用需求也很明显：“朕意以为，王国将（从大学）获益良多……朕将诚招饱学有才之士，将公正管理之理念，言传身教于学法之人。”

这些并非空话：敕令颁布后一年，皇帝将一位曾在巴勒莫宫廷中供职的学者，皮埃特罗·德拉维尼亚招入麾下服务。按照编年史家记载，当时他“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仅仅几年之内，德拉维尼亚就成为皇帝最信任的智囊。大学甚至还为贫困的学子提供贷款，并由政府保证提供食宿。但皇帝的新式教育政策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精神自由。不过，不管它有什么缺陷，这所大学的建立是一个文化上的里程碑，并且及时为腓特烈提供了他所需的各类官员。

随着秩序的重新建立，意大利南部繁荣昌盛起来。这一地区一向具有富甲地中海地区的潜力；西西里岛是一个繁荣的谷物、棉花、丝绸及其它大量货物的出口地，而整个“雷尼奥”就是一个久负盛名的东西方贸易的货物集散地。腓特烈制定政策，保证日益增长的财富越来越多流入国家囊中，从中拨出款项增强商业和军事舰队的力量，从而与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商人争夺制海权。

腓特烈所拥有的宫廷展现了浓厚的东方情调，使欧洲的其它国家的人既震惊又着迷。腓特烈的生活方式像一个东方君主，身边簇拥着由太监护卫的后宫妻妾（他的原配妻子死于1222年）；但宫廷同样以拥有成群的学者、哲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而著称，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以满足皇帝自我享乐的需要。据说腓特烈会说9种语言，为人熟知的是，他肯定用过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以及德语和意大利语。尽管他用拉丁语写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一本有关猎鹰的训练艺术的教科书，但他用意大利语写下了一些用这种新兴方言写成的最初几首诗歌，可以这样认为，他的宫廷是意大利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发祥地。（他对自然史的兴趣促使他在皇家动物园里蓄养了他所能网罗到的一切珍禽异兽。大象、骆驼、长颈鹿和猎豹经常随他一起出巡，使皇家仪仗队看上去有点像个马戏团，使旁观者惊羡不已）。腓特烈生具一副怀疑一切，喜欢追根究底的头脑：他花了大量精力研究星相学和骨相学，并且经常跟这些领域内公认的大师们进行通信商讨。所

这一12世纪的纯金玉球仪是腓特烈的众多王室宝器之一。它以珍珠镶嵌而成，伴以指环、宝剑、王冠和坟墓，象征着帝国的权力。这一荣耀并非仅是继承而来，它更多地建立于新得到的西西里的财富之上。凭借这种财富，腓特烈能够使他的个人兴趣超前于教皇和北部意大利诸城邦。



有事实都证明,腓特烈是个具有非凡能力的君主。

然而,那些虔诚的基督徒对于皇帝运用其语言才能很有礼貌地同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阿拉伯人交谈感到愤慨,在他宫廷洋溢的开明氛围也使他在“雷尼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于是乎,有关他的故事在欧洲广为传播。但是,说句实话,腓特烈并非像他的敌手所悬揣的那样是个自由思想家。他是上帝授权的皇帝,并且在他自己眼中,还是尘世间神圣权威的维护者。终其统治,他对异教徒的迫害不遗余力,尤其是在德意志;同时,比起其他的意大利统治者来,他对待“雷尼奥”境内的犹太人的态度尽管肯定不会更差,但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在政治上,腓特烈就不再有开明思想了,凡是他认为属于帝国权利的,他都要坚定不移地加以施行。到1225年,“雷尼奥”已在他牢固控制之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其余上帝许托给他的领上。德意志仍然是个大问题,太多的权力被诸侯们掌握着。如果皇帝强大,问题就好处理一些。但这块地方本身并不是什么力量的源泉。与意大利相比,那里的经济方式太原始了,如果没有一些重要的城镇(科隆除外),腓特烈在南方创建的那套行之有效的征税系统在那儿也无法征到多少税收。眼下,剩余下来的帝国权威不妨先让他年轻的儿子的监护人掌管着。

意大利北方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地理上看,北部意大利平原(伦巴第和波河谷地)将德意志和意大利半岛的其余部分衔接在一起。名义上,这一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隶属帝国疆域。富有的商业城市密布其间,它们采用一种叫做企业家资本主义的令人激动的新方法发家致富,这一制度伴以一种信贷系统刺激下的现金经济,该系统已向欧洲不少头戴王冠的人提供了有息贷款。这些城市中的绝大部分由某种形式的自治公社进行管理,他们利用帝国衰弱之际,都已变得太过独立。对腓特烈来说,下一步显然就是要把这些城市重新置于帝国的有力控制之下。1226年复活节,他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召开了一次大规模集会,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所有的帝国诸侯都被要求与会,包括所有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地区“自由”公社的代表。大会议题是:意大利境内之帝国权利。当然,为了不致激怒教皇,也包括了诸如镇压异端和腓特烈自己一再拖延的十字军东征问题。不过谁都清楚皇帝将议题的优先权给予意大利境内的帝国权利的含义。

温和一点说,克雷莫纳会议并不成功。腓特烈从阿普利亚出发,其随行人员浩浩荡荡。但北方的代表一个也没见到,甚至包括腓特烈的儿子日耳曼的亨利。帝国的命令使北方城市在前一世纪的军事同盟——以米兰为首的伦巴第同盟复活了。一支同盟的军队已控制了阿尔卑斯山的所有关口,阻止日耳曼人进入意大利。

腓特烈以罕有的外交手腕,努力使形势转向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他向教皇解释说,伦巴第人的行为是想阻止他进行许诺的东征,因为东征要让他们出钱。事实上同盟成员的确不愿为一支数量庞大的十字军提供经费,它们害怕腓特烈

猎鹰手册



在腓特烈看来，猎鹰训练术并不仅是国家大事之余的一项愉快的消遣，而是一门高贵、复杂的艺术，其中融入了作为一名刨根究底的自然主义者的他所具有的极高天赋。从年轻时代起，他就蓄养着数量可观的猎鹰，其中有产自他故乡意大利的游隼（见上图），产自北极圈内的大隼和出产于中东的猎隼。后来，他记下这方面的知识，经过30余年的累积，汇成一篇汪洋恣肆的论文，*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即“用鸟打猎的艺术”。他死后不久，手稿另制成一个副本，里面有大约900幅插图，包括这幅腓特烈肖像。肖像出现在该书扉页上，身边有一只猎鹰相伴。

腓特烈把他的论文分成六部，第一部讨论鸟的解剖学构造和习性，除了自己对鸟类飞行与迁徙的观察所得以外，他还从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历史的著作中汲取材料，以充实他的观点。其余五部就如何获取、驯养、训练和管理猎鹰以及针对不同猎物时放飞它们的方法提供指导说明。作为一个对伊斯兰文化如饥似渴的学生，他宣称已把阿拉伯人在训练带冠猎鹰时使它们保持平静的实践引入到了欧洲。



助手们用绳索把同伴吊到悬崖绝壁上，掏取一对猎鹰幼雏。腓特烈深知，如果在猎鹰幼雏太小时把它弄到手，就会影响它的成长，并会养成在饥饿时尖叫的习惯，令人头疼。



用这支军队来对付它们自己，而不是去征服耶路撒冷，但霍诺留非常在意这理论。他忍受了腓特烈收税的侮辱，又是威胁，又是停止其教权，终于迫使同盟妥协。不惜任何代价，十字军东征事宜必须首先解决。

从政治上说，此刻离开意大利并非最为明智的选择，但他几乎已找不到理由再次拖延其东征。不管怎样，对于这次出征，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1225年他娶了十字军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女继承人伊莎贝拉，自从40年前耶路撒冷被撒拉丁攻陷后，这是十字军所建王国中仅存的一个。1227年9月，他终于布林底西港扬帆出发，开始他的东征。

老霍诺留没能活到十字军出发的那天。如果他活到那一天，也肯定要被活活气死，因为还不到3天，腓特烈就返航了。他病倒了，军中疫病流行。他立即向



一个猎鹰训练师正手持打猎用鹰离开鹰棚。腓特烈指出，一个鹰棚须配备若干栖枝让猎鹰憩息，要有好的通风条件，还要有一盆水供鸟洗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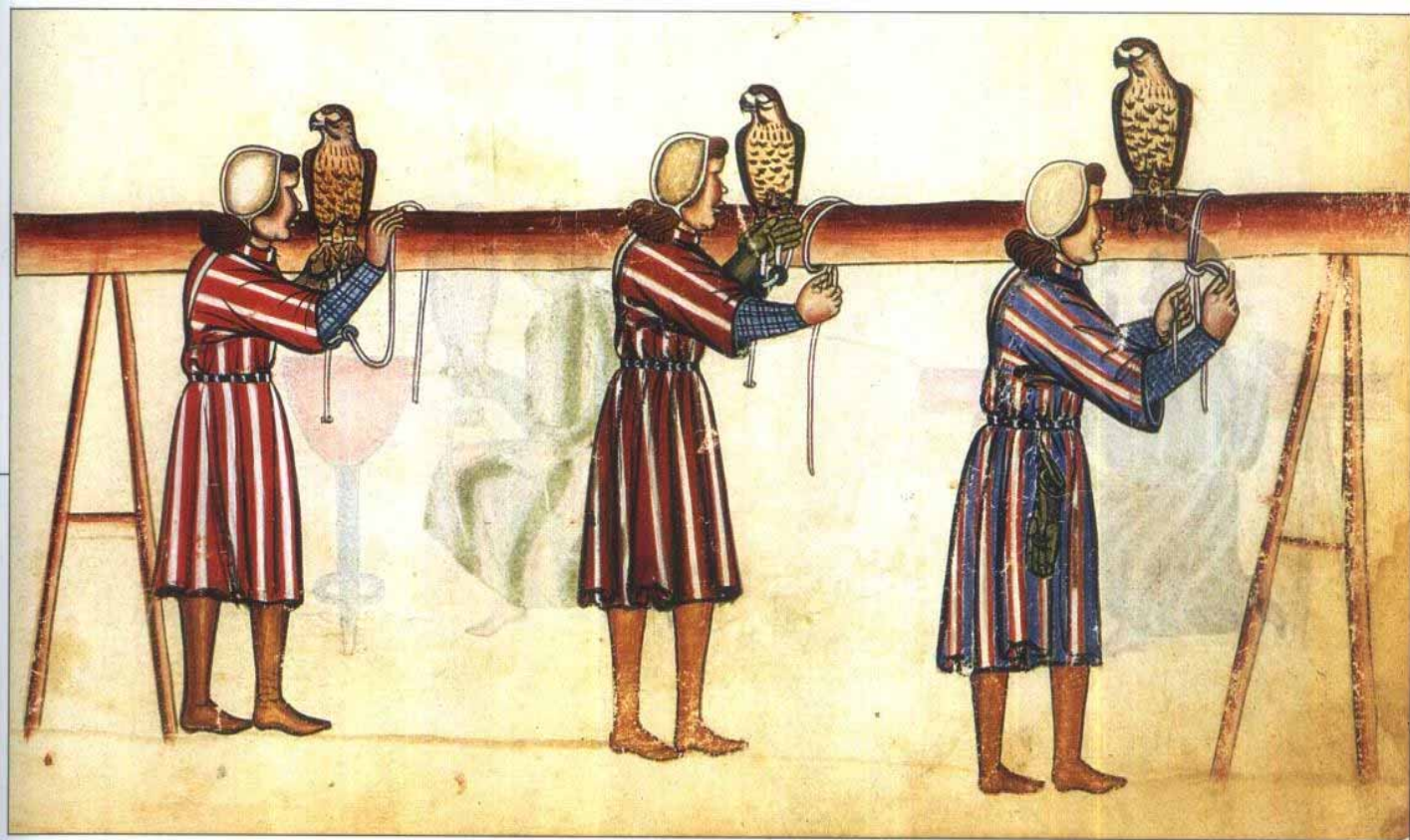
猎鹰训练者演示把猎鹰系到栖木上的正确方法。用绳子系成活结，然后连接到系在猎鹰腿上的短带上。这种短带有旋转接头，便于猎鹰自由活动。

任教皇呈上致歉说明。但新教皇格利高里四世可不像霍诺留那样容易应付。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有点神秘色彩，但最重要的，他是一个教皇权威至高无上论的绝对的、深入骨髓的信奉者。他不准备听腓特烈的任何借口。他火冒万丈，立即下令开除这位“所谓的皇帝”的教籍。

不管怎样，次年春天腓特烈又出发了。没有教籍，只有一支穆斯林贴身卫队和一支基督徒组成的军队，由他率领去完成圣战的使命。这一自相矛盾的开端使这次东征行为非常古怪。在十字军统治的效忠于帝国的塞浦路斯岛停留一下以补充实力后，腓特烈于1228年9月登陆巴勒斯坦。他的军队规模很小，可能不会超过1000名骑士，要取得军事胜利希望甚微。

他甚至不想尝试去获取一场胜利。相反，他与控制着基督教圣地的埃及苏丹马立克·阿尔—卡米尔举行了谈判。阿尔—卡米尔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对阿拉伯诗歌和哲学很感兴趣，这正与腓特烈气味相契。由于自身也被其它政治问题缠身，况且眼前这位对手和自己如此志趣相投，阿尔—卡米尔根本无心开战。和约很快达成。苏丹割让耶路撒冷给腓特烈，同时奉送伯利恒和地中海沿岸一条走廊；作为回报，腓特烈承诺不干涉他新获得疆域之内的清真寺的礼拜活动。顺理成章地，腓特烈在圣墓所在的教堂加冕自己为耶路撒冷国王。

可以预料，这一结果使腓特烈的敌人暴跳如雷。一次十字军东征既没有流血，又没有战利品就草草结束，这成何体统；更不用提一个据称是基督徒的皇帝竟与一个毁坏基督教圣地的异教徒在一起啖饮果子露，互致阿拉伯式的礼节。阿



尔一卡米尔也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相类似的反应。这一协定注定要失败：这位苏丹的继任者可无法容忍基督徒的存在，当耶路撒冷于 1244 年陷落后，基督教世界永远地失去了这座圣城。

当腓特烈于 1229 年返回意大利时，他的敌手只剩下格利高里四世。在他远征期间，教皇发动了一场诽谤运动，赠给腓特烈很多绰号：“奴颜卑膝之徒”“蛇怪”“弑父者”是较为常用的几个。他还与伦巴第同盟正式结盟，并寻求在德意志另立一个魏尔孚家族的“敌对国王”。最后，格利高里散布谣言说腓特烈已死于巴勒斯坦，并下令军队开进“雷尼奥”。

但这些教皇的战士们并没有什么胃口来英勇作战。腓特烈把一切能找到的忠于他的军队集结起来，迅速把入侵者赶出“雷尼奥”。抵达教皇国边境时，他下令停止前进，希望能与格利高里达成妥协；但只是在条顿骑士团的大首领和绝大多数日耳曼诸侯的外交斡旋下以及军事上被击败之后，格利高里才被迫同意妥协。1230 年，在塞普拉诺收回了开除教籍的诏书。这个“奴颜卑膝之徒”至少在公开的声明中，转变成了格利高里“最亲爱的儿子”。

腓特烈同意暂时把对伦巴第那些城市的野心搁置一旁，回到“雷尼奥”，思考皇帝的性质、帝国及其法律。结果诞生了“墨尔夫法典”，法典得名于其颁布之地阿普利亚的一个小镇。这部法典是继 700 年之前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之后欧洲第一部综合性的法典。起草工作大部分由皇帝信任的谋士皮埃特罗·德拉维

演示正确护理猎鹰的系列图画。驯鹰者蹲得很低，以避免鹰受到惊吓，然后把它托起，猎鹰站在水罐上，驯鹰员为它洗澡。



尼亚完成,但法典内容完全体现了腓特烈的思想。

在那个时代,其它任何地方的公正和正义都由当地贵族施予和执行,而在“雷尼奥”,所有司法权力都由法典作为保障掌握在国家手中;伯爵和男爵们并不比其他臣民拥有更多的权利。贸易和职业需经严格审定;比如,医生和药剂师需要国家发放的执照才能营业。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循严格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的本源当然是君主腓特烈本人。他权威的来源已不再是适用于其他君主的措辞模糊的“神性权利”,而是“必然性原则”:法典的导言宣称,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以来,人类一直迫切需要一位统治者来规范他们的言行,限制他们的罪恶。

这部法典撷取了多种来源。上一世纪的诺曼法律制度对它的形成贡献良多,另有一些观点出自博洛尼亚的法律学校,德拉维尼亚本人曾是那儿的一名学子。但在必然律的教条下,它引入了新鲜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点。这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经由阿拉伯世界的学者之手重新回到欧洲。只有在腓特烈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宫廷里,这些著作才恰当结出了第一批果实。

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健全,“雷尼奥”的财政机制也日趋完善,在科列克塔——一种所有职业,包括办事员在内都要缴付的固定税收——中,腓特烈创造了一种效率之高罕有其匹的税收征集系统,他的国家因为有一套自从古罗马以后从未有过的行政系统而得以巩固。但在他的统治中也有黑暗的一面。在法典中,各种形式的异教徒都被单列出来,以接受特别残酷的惩罚。

图中两只猎鹰的姿势表明,如果在骑马时托持不当,可能会给猎鹰带来不安。其中一只(左)竖起了羽毛,它的同伴则因躁动而张开翅膀,准备飞翔。



事实上皇帝对于自己和他臣民的所作所为经常采用双重标准来衡量,不管他的朝廷多么开明,在他统治的土地上也缺乏个体的自由。格里高里在写给他的信中指摘:“在您的王国里,没有您的命令,没有人敢动一动手或动一动手脚。”像锡拉库扎和墨西拿等城市,愤怒于失去他们占已有之的自由,进行了公开的反抗,但被残酷镇压下去。很多反叛领导人像异教徒一样被活活烧死。整个制度依靠一支间谍大军和秘密警察来维系,并且很快就充斥着腐败现象。

法典使意大利北部城市惊恐万状。到目前为止,它们事实上是独立的共和国,憎恨成为腓特烈统一国家的一部分。腓特烈对待异教徒的态度也不能让他们欣赏:他们已习惯于拥有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和经济活动自由,他们注定要做西西里的反叛者。尽管宗教信仰自由,但北部意大利诸城还是得到教皇的支持,因为教皇对于一个统一帝国的恐惧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形成了这场正在酝酿中的冲突的最具有讽刺意味之处:一方是宣扬思想独立,宗教上并不正统的伦巴第同盟诸城,他们与宗教上正统得无以复加的教皇结成联盟;另一方却同样是思想独立,宗教上并不正统的皇帝。但双方消除了矛盾,准备最后,一决雌雄。

然而德意志发生的事变给了意大利几年和平。那儿的帝国权力至此已掌握在腓特烈的儿子亨利手中。他于1228年达到法定年龄,从那时起就努力要从过分强大的德意志诸侯手中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从本质上说,他想摹仿其父在南部实行的中央集权政策,但他采取的是另一种与之相反的途径:即联合日益崛起的德意志城镇势力来与诸侯们抗衡。但亨利既无其父的明智,也无其父的决断。诸侯只是略施武力就迫使亨利退却,其结果是帝国一方败北,更多的权力由诸侯托管。由于被意大利的事务缠身,腓特烈不想与德意志再来一次战争。1232年在锡维代尔,他批准了儿子的让步条款。

加上腓特烈在1220年已作出的妥协,锡维代尔和约使德意志的统一推迟了好几个世纪。亨利开始把他父亲看成是德意志厄运的始作俑者。1234年,他联合了伦巴第的公社,公开反叛。腓特烈仅带了极少量的军队,却携带大批西西里黄金,疾速北进。他废黜了他的儿子(后者在阿普利亚各式各样的城堡中备受冷落和折磨,直到1242年死去),以其弟弟康拉德代之,并将叛乱迅速平定。

腓特烈在德意志呆了两年以巩固其地位。在1235年举行的美因兹大会上,他终于取得了帝国至高无上的确认和德意志诸侯给予军事支持的承诺。但在意大利,那些城市既不愿解散伦巴第同盟也不承认腓特烈的权利,于是,1237年,受挫的皇帝将蓄积已久的怒火倾泻到了北部意大利平原上。

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帝国的军队,那些雇佣军和联盟的公民战士根本不是腓特烈的德意志骑士和撒拉森弓箭手对手。他赢得了对不断撤退的伦巴第人的一系列小胜仗。然后,1237年11月,在意大利北部湖泊群附近的考特诺瓦,他



这一拜占庭风格的王冠封藏于腓特烈二世的第一任妻子，即卒于1222年的阿拉贡的康斯坦斯的高中。王冠显示了这位皇帝性格中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因为通常陪葬的王冠都是廉价而俗丽的黄色，仅仅是地位的象征而已，而这一样品的奢华珍贵暗示了腓特烈对妻子的极大尊重。1209年，匈牙利国王的寡妻，比腓特烈年长十岁的康斯坦斯嫁给这位14岁的国王后，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带来了成熟和良好修养。这种氛围使腓特烈养成了以后众所周知的温文尔雅、洞悉人情世故的性格。

追上整个联盟的军队并将其彻底击溃。紧随着失败的是，原先敌对的城市对胜利的皇帝敞开了大门；整个地区为军队提供食宿。甚至连主教们也争先恐后地宣誓效忠，而米兰自己，作为同盟的领头羊，派出了求和的使者。战争早该结束了。

但腓特烈对用谈判来解决问题不感兴趣。他要求无条件投降。对同盟成员来说，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一旦他们重新鼓起勇气，结果将是腓特烈的力量无处施展。因为尽管他的军队在开阔的战场上要大大优于同盟的军队，却既无力量也无设备去抓获一支在高墙围起的城市中活动的民兵武装。

皇帝要求他统治下的所有领地给予支持，但由于攻城能力有限，事态没有多大改观。当腓特烈徒劳无益地猛攻布雷西亚和米兰城时，格利高里正忙着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签署一项秘密条约，后者答应用9年时间与皇帝作战，而作为交换条件，教皇意味深长地保证给予他们“未来西西里的王位”。

在腓特烈这一面，他召集了红衣主教们，要他们反对其主人的“危险计划”，以免使教会做出有伤宗教尊严的丑行。这一抗议行动使他第二次被开除教籍。他迅速作出反应，驱逐了“雷尼奥”境内的所有宗教组织。他与格利高里之间的责骂日益出格。腓特烈把自己看成是皇家权力的保卫者。他声称：“当第一击落到帝国权威上时，国王们和诸侯们会更容易蒙受羞辱，因为前者是后者的保护伞。”而格利高里则以下面的话来还击：“一头妖怪已浮出海面，他长着熊的爪子和狮子的下颚……他张开大嘴，只是为了诅咒上帝和圣徒。”

在北部意大利，伦巴第同盟已逐渐强大到使腓特烈无力将之击败，尽管毁灭性的战争仍在延续。于是，腓特烈把注意力投向南方，控制了托斯坎纳，作为一个解放者领军穿过教皇国。许多城市渴望摆脱教皇的控制，对腓特烈建立一个统一帝国的构想也抱有同情心理，于是纷纷打开城门迎接他的到来。腓特烈宣称即使活到1000岁，也要为每一块被征服的领地与教皇战斗，他决不会轻易把它们归还给教皇。不仅教皇国，就连“永恒之城”也将纳入“雷尼奥”的版图。

但在1240年2月，当腓特烈的大军在罗马城外扎营时，时年96岁的格利高里使出了他任期内最精彩绝伦的一招。在带领一队庄严肃穆的行列走向圣彼得大教堂时，他被一群哄笑的人群围攻嘲弄，其中许多人戴着象征帝国的鹰徽以示他们对腓特烈的支持。只见这位年迈的教皇高举起据说装有使徒彼得和保罗头颅的圣盒，大声呼喊：“哦，圣徒们啊！你们必须保卫罗马，因为罗马人已不愿再保卫她。”人群羞惭不已，扯下衣服上的鹰徽；罗马的城防工事迅速完成。而腓特烈呢，像往常一样无技攻城，只得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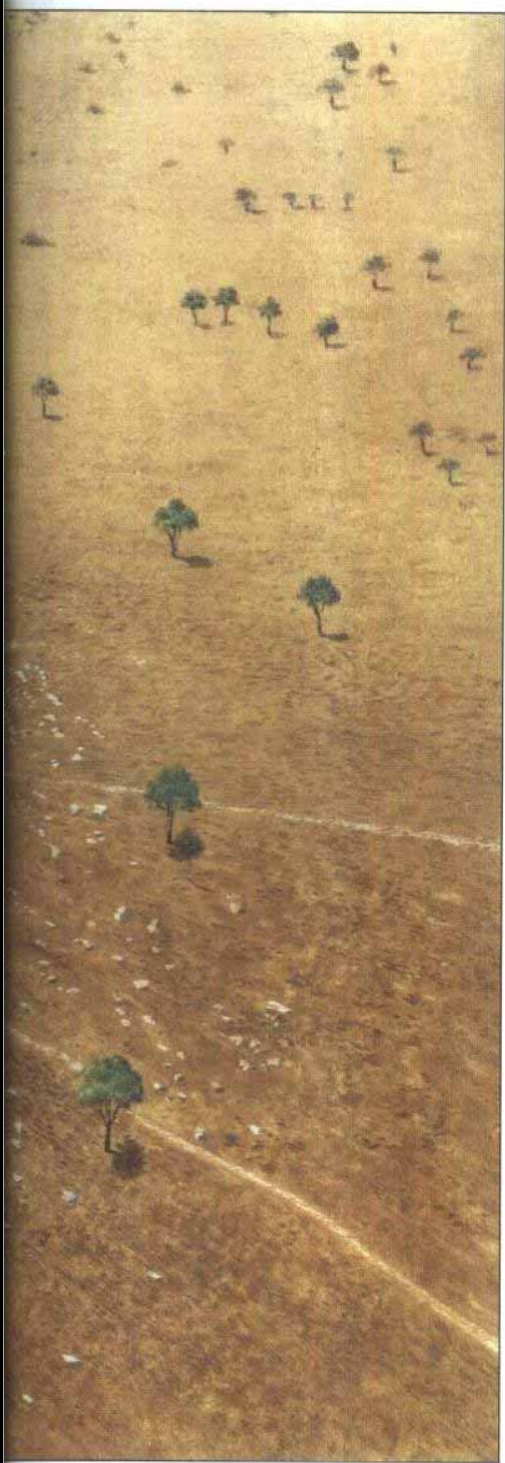
战争继续进行。1241年，格利高里召集了一次教会大会；腓特烈正确地猜测到教皇想以此为契机正式将其废黜，所以对各条要道进行封锁，使会议不可能举行。到目前为止，教皇和皇帝之间的争斗震惊了整个欧洲，并使其陷于极端危险

戴尔蒙特城堡是腓特烈二世最喜爱的城堡和打猎行宫，矗立在东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亚高地之上。这座城堡据信由腓特烈本人设计，配备有瞭望塔楼的独一无二的八角形造型体现了帝国皇冠的八边形状。腓特烈对自己抚养之地阿普利亚怀有特殊的感情，但他注定很少使用亲手造在那儿的这座城堡。他死于1250年，距离戴尔蒙特城堡完工才几年时光。

的境地。因为在1240年，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已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侵略，吞并了匈牙利和波兰，彻底摧残了西里西亚的德意志骑士的精华。而基督教世界的两大首脑却还专注于互相毁灭的争斗。危急关头，因为在亚洲故土发生的一场政治危机，蒙古人没有被击败而自动撤退。而腓特烈和格里高里谁也没有动一动指头来阻止他们的袭击。

法王路易四世和条顿骑士团的大头领康拉德设法促成和谈。但格里高里不为所动，直至战争日益朝着向皇帝有利的一面倾斜。只是在隶属帝国的帕多瓦击败了米兰人，腓特烈的比萨盟军摧毁了运送代表们到罗马的热那亚舰队后（两名红衣主教被送到阿普利亚关押起来），教皇才同意展开谈判。但一切还没开始，格





利高里就死了。因为帝国的封锁,直到 1243 年才选出了新任教皇英诺森四世。

腓特烈很高兴。作为红衣主教时,英诺森就是一个呼吁和平解决争端的积极分子。然而,作为教皇,他承袭了格利高里对皇帝无法平息的憎恨。不管怎样,在一种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和谈。腓特烈将交还教皇国;教皇则将收回开除教籍的诏书。但以什么次序进行呢?为此为这两位主角安排了一次会面。但英诺森怀疑(可能是正确的)腓特烈预谋囚禁他。1244 年 6 月,他通过热那亚逃到勃根第地区的里昂,该地名义上是腓特烈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鞭长莫及。1245 年,他在那儿召集了格利高里曾经计划召开的会议。会议结果是腓特烈早就害怕的这位皇帝(一位反基督的人)被正式废黜,他的臣民们可以从服从他的宣誓中解脱出来。斗争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教皇的使节们在整个帝国内为叛乱煽风点火。许愿将腓特烈的头衔提供给任何有胆量攫取它们的人。在意大利,战争降格为一系列背叛和镇压背叛的行动,腓特烈对此反应激烈:叛乱者被残肢、挖眼、处以绞刑、活活烧死或装入麻袋扔进大海。到处都是真正的或想象出来的叛徒。腓特烈甚至怀疑皮埃特罗·德拉维尼亚不忠,命人将他逮捕施以酷刑。这位谋士骗过行刑人自尽身亡;他的前主人鄙夷地说:“他来时一无所有,回去时依然一无所有。”

但战争本身依旧悬而未决。腓特烈遭受了惨败:在攻打帕尔玛时,他的军队受重创,另外,亲英诺森的博洛尼亚人抓获他最疼爱的儿子恩佐,尽管用的是非法手段。不过也并不都是坏消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康拉德国王击败了英诺森的捍卫者,荷兰的威廉;在伦巴第进行的又一轮战斗中,城市接连沦陷于帝国军队之手。赌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帝国的胜利将给意大利带来统一,尽管为此要付出牺牲个体自由的高昂代价。皇帝则可以腾出手来把精力用于德意志事务上。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教皇制将会被消灭,也许永远永远被消灭。

但就像英诺森将要看到的一样,上帝之手又开始工作了。就像皇帝的父亲凯旋时死于热病一样,腓特烈在从福贾宫廷至附近卢塞拉的旅途中病倒了。他停下来在阿普利亚地区的城堡中休养了几天。1250 年 12 月 30 日,他去世了。

他最后的遗言表达了深切的宗教信仰,甚至对教皇的忠诚。但英诺森没有心绪去接受垂死之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忏悔。他用刻毒的语言阐明了他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未来政策:“将那个毒蛇的家族赶尽杀绝,直到最后一个后代,使他们永远无法重登王位,”这一政策实现了,尽管死于 1254 的英诺森没有活着见到他那可怕的复仇诅咒完全实现。

霍亨斯陶芬世系已变成一株脆弱的植物,在腓特烈的 3 个合法儿子中,长子即失势的前德意志国王已死去,幼子于 1253 年死于自然原因。次年,幸存的一个即康拉德国王,从德意志出兵想重新夺回父亲死后落入教皇手中的那不勒斯和



阿普利亚，也死于行军的路上。腓特烈的私生子曼弗雷德设法重新夺回了“雷尼奥”的大部分领土，并一直保持到1266年。那时，教皇派得到了野心勃勃的好战的法兰西诸侯安茹的查理的帮助；曼弗雷德在那不勒斯附近本尼凡托与之进行的一场战斗中被杀死。两年以后，康拉德15岁的儿子康拉丁踵其父足迹向南寻求危险重重的继位。在意大利中部的塔戈里亚科佐被法国军队抓获，几个月之后，安茹的查理在那不勒斯的闹市区将这条年轻的“毒蛇”当众砍头。

康拉丁还不能算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人。恩佐，这个博洛尼亚的囚犯还活着。在监禁期间他转向了诗歌创作。1272年，他在囚徒生涯中死去，这样，霍亨斯陶芬家族复兴的最后一丝微弱希望就此破灭。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毁灭几乎没给教会带来什么好处。长期争吵带来的尖锐痛苦几乎已将教皇制在本世纪起始阶段拥有的道德资本剥夺殆尽，英诺森四世的继任者将会发现，花掉这一资本比重新积聚起它来要容易得多。与法国的结盟带来了在南方的军事胜利也带来了安茹的理查，后者证明并不比那位皇帝更容易对付。争吵很快就爆发了，这为14世纪的教会大分裂铺平了道路，那时，敌对的教皇们互相指责，诅咒对方，而母教则漫无目的地盲目冲向宗教改革的巨大阵痛之中。

查理和他的法国扈从们也没从他们的意大利探险中捞到多少东西。到1282年，他们在西西里如此不得人心，以致民众发动起义，制造了名为“西西里晚祷”的大屠杀。到该世纪末，西西里岛和腓特烈“雷尼奥”的绝大部分领土落到了阿拉贡人手里，他们正在地中海地区建立自己的西班牙帝国。

至于神圣罗马帝国，此后从没真正重建过。腓特烈死后，德意志有一个长达23年的空位期，当皇冠落入声名并不显赫的哈布斯堡家族时，他所保留的仅仅是早期权威的一点阴影——绝大部分权力，都被掌握在公爵、伯爵、大主教和主教们手里，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事实上的独立。

意大利也经受了经久不息的内战。争斗双方是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这两大党的名字和当地政治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几乎没人能再记得它们一度代表的是什么。不过，尽管随着腓特烈的大败，国家统一依然是一个无望的梦想，但是，意大利人杂烩式的城邦国家之间的对抗和争吵却有其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一面，在腓特烈死后一个多世纪，这一面将催生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之花。

腓特烈本人所寻求的是回到昔日的罗马帝国，他的生涯说明这一雄心是不可能实现的。前面还有其它的路可走。甚至当腓特烈还躺在停尸床上时，新兴的君主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证明了在较小规模和同种族的社会里，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是能够和生机勃勃的商业生活取得协调的。用英国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的并非完全褒扬的话来说，腓特烈曾经“震惊了世界”。也有其他途径来改变世界，英国和法国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座发型优雅，缀满珠宝的女朝臣的大理石雕像反映了腓特烈的西西里宫廷的富有和文雅，而它的古典风格则使人回想起腓特烈意欲模仿的古罗马时代的威严和高贵。尽管皇帝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妻子藏起来不让别人看，但妇女们被鼓励在宫廷上表现她们的音乐和舞蹈技艺，并在宫廷享有优越地位。两种性别的朝臣们都不惜在衣饰上花费巨资以跟上最新时尚，而贵妇们则带上珠宝镶嵌的王冠来模仿她们的皇后。



波罗的海十字军

5

1197年，一位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贝特霍尔德被委任为波罗的海以东利沃尼亚（今拉脱维亚）的主教，由于海岸常年被人雾笼罩和冰封，利沃尼亚远没有文明世界那么舒适。他的前任费尽了一生中最后的17年也没有使那些异教徒利沃尼亚人改变信仰。贝特霍尔德显然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新职位，一开始，他力图用礼物和宴会来赢得人心，但是利沃尼亚人没有什么反应：有一次他们差点儿淹死了他。在这一努力失败后，他们又放火焚烧他正在其中布道的一个教堂。

从火焰中逃生之后，贝特霍尔德回到了德国，他招募了一支十字军去征服利沃尼亚人。在1198年7月24日的一次战役中，倒霉的贝特霍尔德被利沃尼亚人的一支长矛击中，他那些固执的教徒们把他撕成了碎片。东征的十字军被他们领袖的死所激怒，发动了一场可怕的针对利沃尼亚人的战役，在两天内迫使150人接受了洗礼。然而，一当十字军踏上返回德国的路途，利沃尼亚人就放弃了他们的新信仰，跳进德维纳河洗掉他们受洗的印记，并且把所有留下来牧师赶出了他们的国家，似乎利沃尼亚仍然要保持对真正宗教的无动于衷。

不仅利沃尼亚，事实上整个波罗的海以东，从北方的芬兰到南方的普鲁士，在不到一个世纪就归入到基督教的统治之下。在这片不受欢迎的领土上作战，没有那种为圣地而战的光环，这些北方的十字军仅仅被一种残酷的效率所支配，这种效率使得十字军国家在巴勒斯坦失败很长时间以后得以在波罗的海生存。

13世纪开始的时候，波罗的海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是从波兰的但泽穿过哥德兰岛，往北延伸到瑞典海岸。对于这条线以外的疆域，西方国家还几乎不了解，而对于他们所了解的，也并不是特别关心。一位曾经穿过奥得河东部林地的12世纪的旅游者写道：“行走非常艰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蛇和巨大的野兽，和那些在树上做窝的鹤，他们鸣叫和拍打翅膀的声音令人头疼，还有大块大块的沼泽地阻挡了我们的马车。”

往北部和东部，在维斯图拉河与德维纳河之间，行走甚至更加艰难。这里有一道非常难对付的屏障：原始森林、湖泊、沼泽等，包括从波罗的海海岸延伸到俄罗斯边境一带的大部分地区。在这大约3000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陆地旅行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路线是河流，这些河流在夏季为小船、冬季

丹麦王瓦尔德马二世在王后和王室其他成员的拥戴下高高举起了日德兰半岛上莱布大教堂的这枚石雕十字架。这位丹麦王是13世纪东征波罗的海南岸异教徒的十字军领袖之一。在13世纪20年代，丹麦军队帮助一支利沃尼亚的宗教兄弟会——剑兄弟会征服了爱沙尼亚的北部，使该地区整个13世纪都处在丹麦人的控制之下。

为雪橇提供了一条通道。在其他季节,河流经常由于雨水或融雪而泛滥。

在这片荒原上住着不同民族的人,他们后来被集体称作波罗的人,包括普鲁士人、立陶宛人、列托人。他们以部落形式定居,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界定的领土。他们散布在波罗的海沿岸和维斯图拉河、涅曼河、德维纳河河谷,耕种土地、饲养家畜,定期从周围森林里收获毛皮、蜂蜜和蜡。

再往北,在德维纳河和芬兰湾之间这一更加开阔、更多山岭的地区,橡树、榆树和杨树林逐渐地被松树林所替代。这一地区居住着三个民族:集中在波罗的海沿岸一直到奥河的利沃尼亚人、居住在芬兰湾南岸及其附近岛屿的爱沙尼亚人、夹在利沃尼亚人和东部的罗斯人之间的又一支列托人。

无论他们的领土怎样划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都把这些居民看成一个民族,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民族都是异教。这些人都是泛灵论者,崇拜太阳、月亮、星星这些大自然的力量,他们的节日通常都包含有活人祭。他们不知道用石头和灰泥来建造房屋,而用动物的头骨装饰土木屋来防止邪恶的侵害。13世纪30年代的一位德国编年史作者这样警告道:陷入这些“邪恶的异教徒”手中的基督教徒很快就会“被剥夺生命和财产”。

如果说东波罗的海很危险,但它同时也很让人着迷,因为那里有极其丰富的宝藏——毛皮、鱼、木材、蜂蜜、蜂蜡、琥珀,这些都是西方商人们渴望获得的东西。尽管当地的部落愿意做生意,用他们自己的货物交换外来的奢侈品,比如羊

穿过13世纪的历史长河,基督徒军队将几乎整个波罗的海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在芬兰,来自瑞典和罗斯诺夫哥罗德公国的互相对立的军队争抢着要第一个改变当地异教徒的信仰。剑兄弟会从他们的里加基地出发,征服了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同时在西部,条顿骑士团和普鲁士当地人进行了战争。到1300年,剑兄弟会的土地已经被并入了条顿骑士团的领土,产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军事国家(地图上的黄色部分),从波美拉尼亚往东一直延伸到诺夫哥罗德的边界,只有萨摩吉提亚的本地部落仍然在抵抗着基督教的统治。他们的抵抗受到邻国立陶宛的支持,而立陶宛人一直坚持他们的异教信仰到14世纪末。



毛、银和铁武器,双方的关系却一点都不融洽。一方面,当地的民族要求更好的货物交换和更少对他们事务的干涉,另一方面,商人们嚷着要获得更多当地的资源以及更好地保护他们不受抢劫。

西方商人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来自罗斯人的竞争,主要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竞争,天主教会也对此感到惊恐:尽管他们也是基督徒,但罗斯人信仰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东正教,因此他们在罗马的眼里和异教徒一样需要拯救。而且罗斯的传教士们在波罗的海各民族中施行弥撒洗礼,损害了天主教的事业。

东正教与拉丁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冲突在芬兰南部的湖泊和森林中发展成全面的战争。在西南边,天主教国家瑞典把从事农业的索麦人居住的地区变成了它的殖民地,而在东边,罗斯人建立了对以渔业和毛皮业为生的卡累利阿人的实际统治,只有居住在中部南岸的以狩猎为生的塔瓦斯提亚人大部分还没有被征服过——这是瑞典人和罗斯人都下决心想要改变的一个状况。

罗斯人先下手了。1227年,诺夫哥罗德的雅罗斯拉夫亲王在小心地迫使卡累利人受洗之后,领导了一次对塔瓦斯提亚人的远征。第二年,塔瓦斯提亚人进行了反击,然而他们被罗斯人的卡累利盟友击溃,被赶进周围的森林中。卡累利人是塔瓦斯提亚人的宿敌,几乎不给他们逃到湖的北岸的机会。14世纪的一本《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写道:“据传,他们来了两千人;上帝知道,他们没有几个人逃回到自己的国家。所有其他的人都被消灭了。”

教皇被雅罗斯拉夫的成功所激怒,把芬兰置于使徒的保护之下,并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诺夫哥罗德进行贸易封锁。始于1229年的封锁正好赶上诺夫哥罗德庄稼遭秋季霜冻,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年代史编者描述“一些普通的人”怎样“杀死活人吃掉他们,另一些人割下死人身上的肉,还有一些人吃马肉、狗、猫……一些人吃苔藓、蜗牛、松树皮、欧椴树皮、欧椴树和榆树叶,以及所有每个人所能想到的东西。”

对于诺夫哥罗德人来说,幸运的是沿波罗的海西部的富裕贸易区,并不想仅仅为了取悦于教皇而牺牲自己在东方的贸易利益。没有它们的支持,贸易封锁很快就失去了作用。对于诺夫哥罗德的另一个威胁却更加严重。1240年7月,瑞典的一支十字军和索麦、塔瓦斯提亚两族的土著部队逆涅瓦河向上航行,如年代史编者所叙述的一样,企图“夺取诺夫哥罗德和整个诺夫哥罗德省。但是,最仁慈善良的上帝又一次保护了我们不受外族人的侵犯……”

十字军也是在没有一个像诺夫哥罗德人的将军雅罗斯拉夫的继承者,即21岁的亚历山大那样的领袖的指挥下“蠢动”的。亚历山大把自己那支为数甚少的军队集中在涅瓦河河岸上,给了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为自己赢得了这样一个称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意为涅瓦河的亚历山大。9年后,瑞典人发动了第

波兰格涅兹诺大教堂的青铜门上雕刻的一个细部，描绘了一位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圣阿德尔伯特的殉教，他的遗骨也因此被波兰人从异教徒普鲁士人那里购来。在条顿骑士团到来之前，已经有好几次努力试图用和平的方式去改变普鲁士人的信仰：这些著名的努力是1215年由教皇任命为普鲁士的克里斯蒂安主教的一位西多会僧侣所做的。然而，他的传教最终失败了，1223年，克里斯蒂安本人呼吁对普鲁士人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二次、也是更成功的十字军东征，占领了塔瓦斯提亚，对罗斯人在卡累利阿的地位构成了威胁，然而直到1292年，在经过40多年零星的激烈边界争斗之后，一支由贵族特吉尔·克努特松指挥的瑞典人才试图要征服卡累利阿本身。

特吉尔没有达到他的主要目标，但是成功地在卡累利阿南端的维堡建立了一个要塞，从那里，瑞典军队可以时常侵袭涅瓦河下游和拉多加湖周围的乡村地带。又持续了30年，双方都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终于在1323年签订了和约，每一方都获得争端领土的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条约并非标志着敌对的结束，而仅仅是敌对的暂时搁置，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双方仍将纠缠在冲突中。然而，到目前为止，瑞典人满足于卷起他们的大旗来等待打击这些异教徒的更好时机。尽管有来自教皇和瑞典君主滔滔不绝的祝福，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这场战争已经不再像十字军东征，而更像一些草率的冲突，除了更多的令人不安，它并没有带来什么利益和荣耀。几乎没有几个骑士愿意在阴郁的芬兰战场上效力，那些留下来定居在这块新的土地上的人，被当地人称作“饕餮瑞典人”，他们那副惊人的好胃口比他们的战功徽章更引当地人注目。

利沃尼亚的情况不同，在那里东征的十字军勇士们建立了大不一样的名声。在1198年的大混乱之后，一位年轻的德国牧师柏格兹特胡德的阿尔贝特，被委任为新的主教，和他的那位殉教的前任贝特霍尔德不一样，阿尔贝特既有钱，有野心，也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他是由他那有钱有势的汉堡一不来梅大主

教叔叔私人委派的),他那无情的傲慢对于他的敌人,不管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来说都是一种前途不吉的预示。此外,他还有过人的精力和组织才能——这两项品质将在以后的30年里得到充分的展示。

1199年10月,在他受委任的几个内,他就得到了教皇的保证:在利沃尼亚战斗的十字军或是如同他们被称作“朝圣者”们将会像那些在圣地战斗的人一样自动地获得罪孽的赦免。有这个保证做后盾,阿尔贝特主教在德国北部整个地区招兵买马。1200年早春,在牧师、商人、手艺人 and 一支500人的强大十字军的陪同下,他沿着德维纳河逆流而上,开始了对他那难以驾驭的教区的征服。

打仗对于利沃尼亚人而言并不是新鲜事,事实上战争在当地是常见的,不仅是在利沃尼亚人与他们传统的敌对邻国如列托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之间,也在利沃尼亚人内部进行。被攻击的危险是那么大,以至于每个定居点都有自己的城堡。正常情况下这个堡垒用来作为当地首领的居住区,但是一有危险情况,它就变成了四周居民的避难所。城堡坐落在易于防御的地点,比如山顶或特殊建成的土垒,并且有着厚厚的木板墙、瞭望塔,以及由木块、树皮和泥做成的屋顶,通常坚固到足以阻挡由敌对部落射来的矛和箭。

然而,它们却不能够阻挡十字军的屠杀。西方的士兵们带来了远比利沃尼亚人先进得多的战争机器:盔甲、十字弓、掷石器、围攻用的塔架和铁蒺藜等。尽管当地士兵比他们人数多,这些东西仍使得十字军们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即使这样,在利沃尼亚作战也是艰苦和危险的,包括要在一大片适合埋伏和迅速撤退的林地做长途跋涉,何况即使是穿过海盗出没的波罗的海到那儿去,就是一桩很冒险的事业。

更糟糕的是适合交战的季节很短,只从六月延续到九月份。随着令人无奈的冬天的来临,士兵们将撤回利加,那是阿尔贝特主教在德维纳河口建立的新的要塞,在那里他们等待着春天的来临以及新兵的到达。

这些穿过波罗的海来到这里的是一批由职业士兵和业余冒险家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准备在利沃尼亚忍受一年,为了等待一次适当的掠夺,以及获得教皇所保证的赦免。毫无疑问,很多新兵受到阿尔贝特要把他那原始教区献给圣母马利亚的决心的影响,圣母马利亚这个形象在他们中无疑激起了和救世主本人一样多的崇敬。事实上,教皇英诺森三世将在1215年宣布:他就像关心“圣子之地”巴勒斯坦一样关心“圣母之地”利沃尼亚。

一个十字军在利沃尼亚一年的开支包括回去的路费平均为10马克,这相当于在圣地的十字军开支的一半。即使这样,许多新兵还是很贫穷,他们不得不依靠里加商人的资助。很少商人反对这一安排,因为十字军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保护,而且还卖给他们袭击异教徒时所获得的战利品。

为了长期维持对本地人的控制,阿尔贝特主教需要一支既能在夏日在战役中冲锋陷阵,又能在冬天守卫新领地的军队。因此在1202年他获得教皇的批准以利沃尼亚为基地建立军事骑士团,这个骑士团的官方称呼是基督军事兄弟会,

大商人的港口

许多被条顿骑士团统治的城镇都是商业行会的成员，商业行会是那些贸易发达城市的一个团体，以德国为中心，扩散到邻近的土地，在13世纪变得更为重要。维斯比港（右图）坐落在波罗的海哥德兰岛上，它有着高耸的石灰石货舱，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商业行会的商人们利用小船组成船队护航，在已知世界各地从事有利可图的货物贸易。这些坚实的小船有着倾斜的船尾舵，吃水很深。他们利润的主要部分来自波罗的海的鲱鱼，为了欧洲基督徒们不能吃肉的斋戒日，这些鲱鱼被大量地腌制。

到14世纪，商业行会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铸造自己的货币，用来直接与外国的统治者（把皇室徽章作为贷款的抵押）进行交易。行会传播它自己的法律，甚至能够打败交战的国家。





并很快以剑兄弟会的名字而著名。

受修道院关于安贫、守贞、顺从的誓言所约束，这些新的骑士团成员穿着带红色徽章的白色披风，徽章上是一个十字架和一把剑。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捍卫“圣母之地”不受异教徒的侵犯。剑兄弟会划分为三个阶层：骑士兄弟会，他们形成军官阶层，从他们中产生首领和其他高级头目；牧师兄弟会，他们为骑士团成员的灵魂工作，聆听忏悔，施行赦罪；服务兄弟会，包括步兵，带武器的骑兵或通常像骑士一样装备的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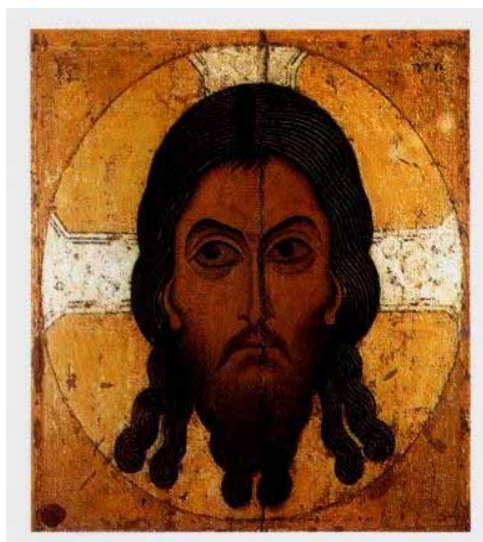
以前的十字军骑士团只接受贵族出身的骑士，剑兄弟会就不那么挑剔了。他们的新兵“是一些因犯罪而从萨克森放逐出来的富商”。当然，剑兄弟会的行为引起了从里加到罗马的基督徒们的不满。当一些兄弟在阿尔贝特主教劝说下为他的异教徒牧民们表演一场教育性的圣母马利亚诞生节戏剧时，骑士们插进了一些可怕的战斗场面，以至于大部分观众都逃跑了。早在1208年，兄弟会的第一位首领洛拜克的威诺就被他的一个属下用斧头砍死。

尽管他们在道德上是可疑的，这些剑兄弟会的成员仍然是出色的勇士。兄弟会人数可能从来都没超过150名，但还是打败了利沃尼亚人和列托人的反抗。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沿着德维纳河修建的一系列砖石堡垒来控制周围的乡村地带。整整一年里，这些城堡抵挡了敌人的进攻。此外，这个骑士团还利用了古老的敌对部落：通过帮助利沃尼亚人和列托人来攻击他们传统的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敌人，阿尔贝特主教和他的骑士们赢得了他们所急需的当地人的支持。

到1206年，列托人就已经紧紧的和基督徒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仅仅就军事方面的优势而言。然而很多利沃尼亚人仍然憎恨外来的侵略者，就在那一年，这种憎恨演变成了流血的反抗：几十名基督徒，包括德国人和当地人被残酷地杀害了。其中两名皈依基督教的利沃尼亚人后来被教会宣布为殉道者。

在从德国新来的军队和那些忠诚的利沃尼亚人帮助下，阿尔贝特的军队再度控制了局势。在确保他们的家乡安全之后，剑兄弟会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爱沙尼亚。他们征服了利沃尼亚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保留三分之一的土地——三分之二由阿尔贝特主教控制，他们把向芬兰湾扩张看作是获得更多土地的途径。为了这个目的，1208年剑兄弟会和德国十字军以及征自被洗礼过的利沃尼亚人和列托人一起，开始了战役，使得爱沙尼亚的南半部成为一片饥荒和疾病的荒原。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萨卡利亚边境省，通过这个省，他们打开了一个流血的突破口。1211年，他们包围了这个省的要塞费林，把俘虏带到阵前示众，以他们的生命胁迫守卫者投降并接受真正的上帝。爱沙尼亚人拒绝了，并且挥舞着他们缴获的德国盔甲讥笑嘲讽这些进攻者。十字军立刻杀掉了俘虏，并且把他们的尸体抛进了护城河。围攻持续了6天，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最后，在每一个守卫城堡的幸



一幅大胆描绘基督的肖像，是诺夫哥罗德宗教艺术的代表。诺夫哥罗德是13世纪波罗的海舞台上主要演员之一，被它的居民们骄傲地称作诺夫哥罗德大老爷。这座城市统治着连接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河流流域的北端，控制着广阔的毛皮交易地区，往东延伸到乌拉尔山脉，往北到北极圈。尽管它对罗斯南部的蒙古统治者表示敬意，但仍然维持着它的独立，在能干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统治下，疆域扩展到了芬兰南部，并且阻止条顿骑士团向东扩张。

存者都负了伤，水源也几乎枯竭的时候，爱沙尼亚人投降了。根据阿尔伯特主教的一位传教士利沃尼亚的亨利的描述，投降者请求说：“饶恕我们，仁慈地用基督教的枷锁套住我们，就像你们套住利沃尼亚人和列托人一样。”然后，这些幸存者被挥洒圣水和对他们进行教义问答来作为洗礼的开端。

这样的战役不断地定期进行着，以至于整整一个夏天中有9支不同的部队攻击了整个爱沙尼亚南部，进行烧杀抢掠，使这一地区受到极大破坏，以至于“那里既看不到任何人，也找不到任何食物”。如亨利所解释的，这些袭击的目的“是为了战斗得足够长的时间，直到要么那些活着的人来寻求和平和洗礼，要么他们被从这个地球上完全消灭掉”。

到1219年为止，阿尔伯特主教已经做到了对爱沙尼亚南半部强有力的控制，不仅打败了难以驯服的爱沙尼亚人，还打败了来自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的罗斯军队。1220年，在丹麦王瓦尔德马二世领导下的一支丹麦军队的帮助下，十字军成功地征服了这个国家的北半部。“现在是主教的第二十二年，”他那忠实的编写年代史的牧师写道，“利沃尼亚人的土地稍稍安静了一会儿。”

接下来在1223年，当爱沙尼亚人在狂怒中奋起反抗丹麦人和德国人的时候，这种局面被中断了。在费林、欧登帕和都帕，他们攻击剑兄弟会，消灭了他们三分之一的成员；在耶瓦，他们掏出了每一个守卫在那里的丹麦士兵的内脏，吃掉了总督的心脏。到这时为止，爱沙尼亚人已经能够娴熟地使用战争机器，他们用缴获的德国武器攻破敌人的堡垒，他们得到一支罗斯军队的帮助，这支军队从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来到这里围攻丹麦人在勒佛尔最主要的要塞。

十字军费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控制了局势。1224年，他们突袭都帕，杀死了所有的人，只留下一个罗斯守卫者，给了他一匹马跑回诺夫哥罗德汇报天主教的胜利。这次胜利清楚地展示了十字军的英勇，罗斯人和爱沙尼亚人都来求和，胜利者按照两年前所订的协议瓜分了这个国家，丹麦人接管了爱沙尼亚北部，兄弟会保留他们在南部的统治。但是双方很快争执起来，渴望得到土地的骑士团征服了丹麦人的领域。1225年，为了结束这场战争，教皇派一位使者接管了这个国家。

很快，这个安排也引起了冲突。1229年，一位新的使者，阿尔纳的鲍德温来到里加。阿尔伯特主教在那一年早些时候已经死去，鲍德温带来的敕书说明要调查因继承人的选举而引起的争执，不幸的是，鲍德温野心勃勃，没有节制，并且好管闲事，他与剑兄弟会的关系很快恶化。当1233年骑士团拒绝放弃他们从丹麦人手里夺来的勒佛尔城堡时，事情到了严重关头，鲍德温想要用武力拿下这城堡，在战斗中教皇的军队被打败，鲍德温本人也做了俘虏。

尽管很快就被释放，气急败坏的教士仍然不肯原谅他的敌人，相反，他进行一项宗教诉讼，控告兄弟会不服从、反叛和异端，具体的过失包括杀害皈依者、攻

行乞僧侣

13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一个新现象是行乞修士——致力于布道、贫困和学术的四处游荡的僧侣，他们把乞讨作为维生的唯一手段，创建的第一个修道会是多明我会，由卡斯蒂利亚的一个教士在1216年为了向法兰西南部的卡特里派教徒宣讲福音而建立的。大约在同一个时间，一位意大利富裕布商的儿子，年轻的圣方济各转变到投入自甘贫穷的事业中，聚集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圣方济各会的基础。在基督教财富增长的年代，这些乞食僧侣的苦行不仅在教士中也在非宗教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

乞食僧侣的生活方式虽然对于基督教世界是新鲜事，但在其他宗教里都有类似的情况。伊斯兰教国家有属于苏非派的神秘主义者，他们在路上游荡，寻求与神合一的迷狂；在印度，耆那教的信徒们发誓抛弃一切世俗的东西，也不伤害任何生物，保持贞节，以达到解脱所有精神和生理羁绊的自由状态；在整个亚洲以及远东地区，流浪的佛教和尚们通过一种思考和自我克制的生活来寻求大彻大悟。

一系列描绘祈祷中的圣多明我会的创建者圣多明我的绘画局部。一幅微型图展示了旅行中仍在继续祈祷的圣人的两个形象。

击修士、阻止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人接受洗礼。裁决对剑兄弟会很不利，教皇格利高里九世指责了他们，命令他们把1224年夺到的丹麦在利沃尼亚的省份归还给瓦尔德马国王，赔偿他们过失的受害者。结果，骑士团没有继续存在足够长的时间来履行任何一项指令。

1236年夏天，骑士团首领佛克温在他的十字军援军劝说下发动了对立陶宛的入侵，基督教的军队往南一直打到沙勒河。一位当时的年代史编者说：“在许多地带抢、烧，令人惊骇，无所顾忌地劫掠了整个地区。”然而，当立陶宛的勇士们起来反抗他们的时候，佛克温的十字军联盟变得慌张起来，整个军队“像女人一样被砍倒”。2000多名十字军士兵被消灭，包括首领本人和他的50名伙伴。这是一场剑兄弟会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的灾难。由于受到教皇的谴责、丹麦人的对抗，现在又被立陶宛人打败，幸存的兄弟们开始协商，希望加入另一个十字军骑士团——条顿骑士团。

因为他们白色披风上的黑色十字架，条顿骑士团也被称作手擎十字架者，是由去圣地的德国十字军在1198年创建的，总部设在阿克。骑士团在财富、权力和声望上得到迅速发展，很大部分归功于老十字军骑士沙尔沙的赫尔曼，他于1210年被选为首领。1170年左右出生于图林根的赫尔曼兄弟被一位同时代的崇拜者描述为“雄辩、和蔼、英明、富有远见并且在他的所有行为中都显示着荣耀”。当然，他知道怎样给有势力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赢得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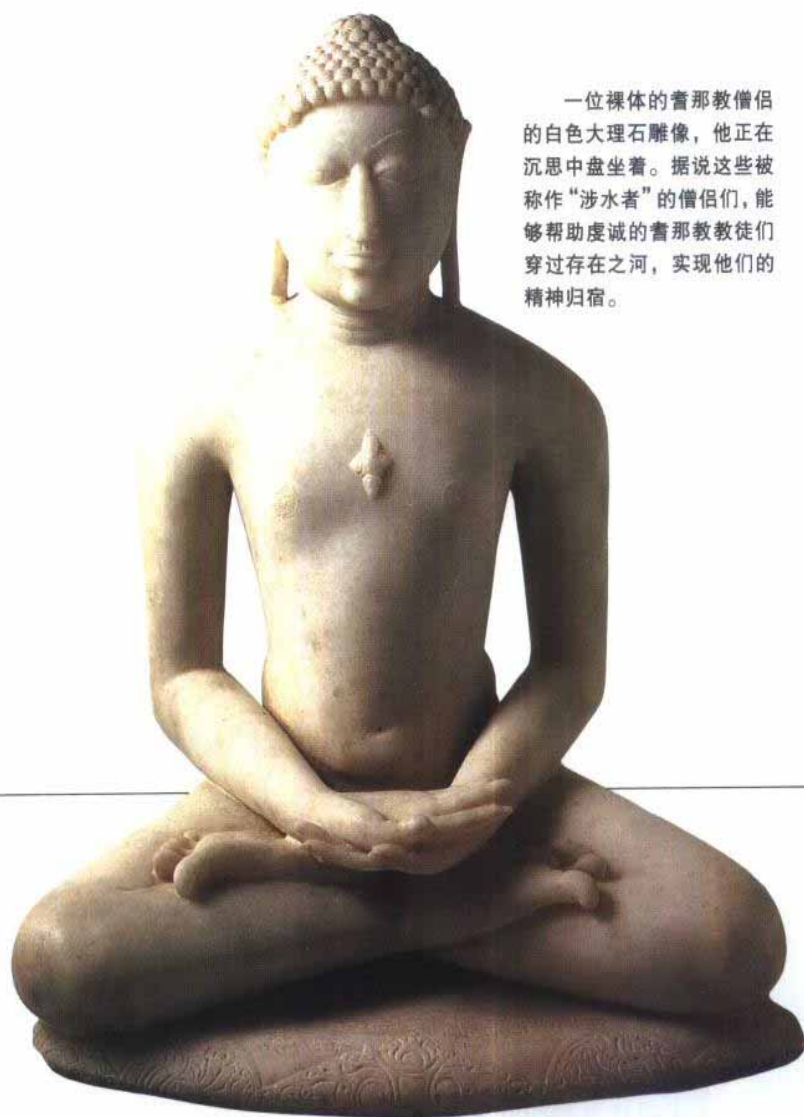


一位日本圣人嘴里吐出一排木雕小佛像，揭示了他对于净土宗的信仰。净土宗宣扬通往大彻大悟的道路就在于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南无阿弥陀佛。”

心，条顿骑士团从前者获得特权，从后者获得土地。

骑士团与东欧的联系始于 1211 年，当时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邀请骑士团守卫他的一部分边疆，抵抗东亚好战的库曼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来自库曼人的威胁并不比条顿骑士团更大。条顿骑士团在打败游牧民族后就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独立的国家，甚至还把德国农民殖民到这片土地上。1224 年，安德烈国王决心为自己除掉这一威胁，他把骑士们描述为“衬衫底下的火，口袋里的老鼠，胸口上的毒蛇”，要求他们离开。当他们拒绝的时候，他的军队用武力赶走了他们。

几乎与此同时，他们收到了另一份来自波兰公爵马佐维亚的康拉德的邀请，他想要他们驯服他那些好战的异教邻居普鲁士人。在这以前所有的努力都只获得有限的成功，各种想要通过劝说而不是武力赢得皈依者的传道效果甚微，大部



一位裸体的耆那教僧侣的白色大理石雕像，他正在沉思中盘坐着。据说这些被称作“涉水者”的僧侣们，能够帮助虔诚的耆那教教徒们穿过存在之河，实现他们的精神归宿。

西班牙十字军的掠夺物

在西班牙,就像在波罗的海一样,基督教的骑士们整个 13 世纪都在连续地加入十字军讨伐,那里的敌人是伊斯兰教的军队,他们自从 8 世纪以来就控制着这个国家很大的部分。1212 年,在格拉纳达以北 100 公里的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取得的胜利——如图所示的这面哈里发的旗帜被当作战利品赢得的时候——是两个宗教之间长期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自从开始侵略以来,基督教军队第一次控制了大部分伊比利亚半岛。

然而,仍然还有幸存的穆斯林堡垒进行着严酷的抵抗。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二世以及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又花费了 35 年的时间才收复了马略卡岛、科多巴、巴伦西亚、摩尔西亚以及塞维利亚等城镇,直到 1344 年才取得了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同时,穆斯林对格拉纳达的控制权一直延续到 1492 年。



分的普鲁士人仍然怀着很深的敌意。1220 年,受到剑兄弟会榜样的启发,波兰人也建立了一个军事骑士团:多布尔金骑士团,保护自己不受异教徒的攻击。但是这个新的骑士团——只有大约 10 来个骑士,几乎不能够守卫自己的城堡。1223 年,一场十字军东征开始了,但是普鲁士人报复性的袭击是如此凶猛,以至于马佐维亚的边界和毗邻的波兰公爵领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现在,为了争取条顿骑士团的援助,康拉德答应把库尔姆兰省包括库尔姆要塞以及他们可能征服的其他任何土地送给骑士团。然而,骑士团首领沙尔沙并不想重演在匈牙利的那场突发的灾难,直到腓特烈二世皇帝本人保证骑士团保留对所有被征服领土的权力时——这一保证后来又得到教皇格利高里九世的认定,骑士团才得到了向北进军的信号。

主要的小分队由 20 个骑士和两百个军士组成,在骑士团最伟大的英雄之一赫尔曼·巴尔克的指挥下,他们于 1230 年到达库尔姆。和利沃尼亚的剑兄弟会一样,他们利用河流作为入侵的路线,一路上建立了一连串堡垒,从那里攻入四周的森林。每征服一个地区后,就让德国的骑士和居民殖民过去。这些人有助于使土地殖民化,而且还能为骑士团提供便捷的收入来源和军事服务。

条顿骑士团胜过剑兄弟会的一点是独立。剑兄弟会是作为阿尔贝特主教的工具而产生的,而条顿骑士团是一个自治的骑士团,不受任何主教的约束,并且还有足够的十字军联盟。当剑兄弟会不得不依赖于阿尔贝特主教一年一度在德国讲道争取来的援军时,条顿骑士团却有一个由修道院、城堡、辖区组成的庞大网络来作为征兵中心。此外,在航行通过利沃尼亚危险的水域时,许多胆怯的德国十字军战士转而准备作陆地旅行到普鲁士去,他们也有可能加入。条顿骑士团也和许多有权势的贵族有着亲密关系。所有这一切带来了稳定的人员和装备。

尽管有这样的优势,和普鲁士人的战役也不是那么轻松的。虽说他们的柳条盾和木头城堡没法跟十字军的十字弓和攻城器相比,这些当地人仍然在绝望中凶猛地回击着。和十字军一起来的有多明我会的牧师,他们提出用改变信仰作为和平的条件,但是很少被接受。普鲁士人不要任何宽恕,也不愿给任何宽恕。

条顿骑士团最主要的目的是渴望通过战斗来赎罪,“谁和我们作战,”骑士团宣称,“那就是和耶稣基督作战。”但是对于那些僧侣骑士来说,敌人不仅仅是不忏悔的异教徒,也是他们身体里面的撒旦,为了消除这个看不见但是致命的仇敌,骑士兄弟忍受着严酷的祈祷、自律、自制的生活方式,他不拥有任何财产,但是除了一条马裤、两件衬衫、两双靴子、一件外套、一个睡袋、一条毯子、一本每日祈祷书和一把小刀外,还配有一套剑和盔甲。他可以要求有两匹或四匹马,但这些都和他的衣服、装备一样,是属于骑士团的。他被禁止和非神职人员呆在一起,并且在用餐时、在寝室里、在行军中和在厕所里必须保持沉默,他不能参加比武

和骑马赛。他可以独自去捕猎那些袭击居民的庄稼和牲畜的动物——比如狼、山猫、熊，除非是带猎狗一起去。他还有一项合法的娱乐：木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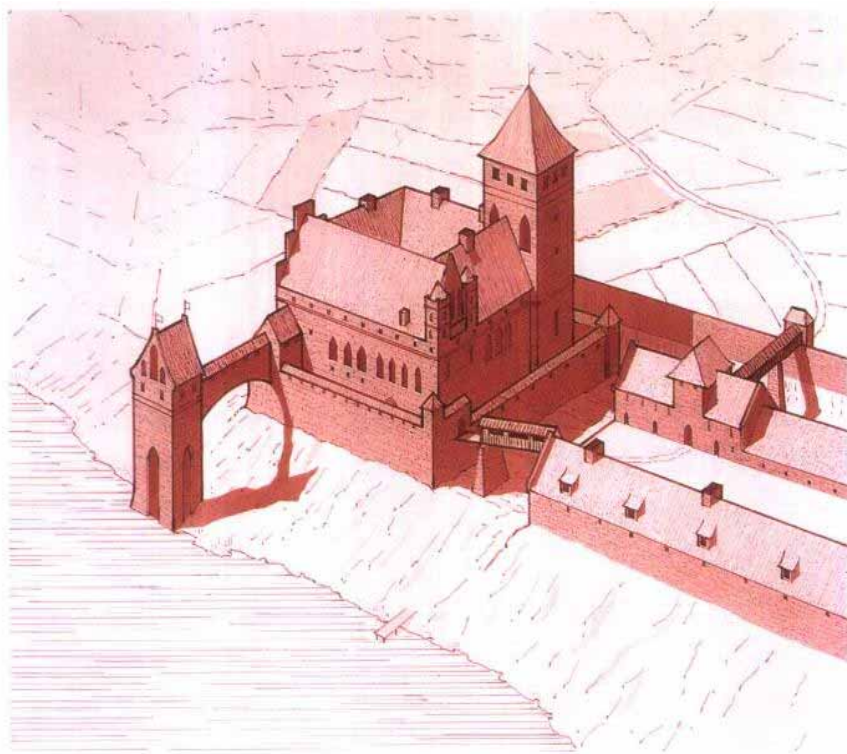
任何形式的虚荣，比如展示个人的盾形纹章，都是被禁止的。尽管可以留胡子，头发却必须短。睡觉的时候，骑士兄弟必须穿着他的衬衫、马裤、靴子，手里拿着剑。按照要求，他一个晚上应该起来四次，目的是为了背诵祷告词。每个星期五，他都要遵循教规鞭打自己的身体，直到流出血来。他在精神上或在军事方面的过错，由高级军官在营地用权杖、在战场上用棍棒来处理。

除了通常的封斋期禁欲以外，11月和12月的大部分时间，或者20天指定的斋戒日中，或者任何一个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或星期六，骑士兄弟都不可以吃肉。他的饮食范围主要限于鸡蛋、牛奶、粥和水。此外，还希望他抵制一切肉体的诱惑——一个申请神职的人曾用这样的方法来训练自己：挑选一位他所能找到的最漂亮的姑娘并在她身边睡一年而不碰她。其他人通过折磨自己来压抑自己的欲望，在衬衫里面穿上锁子甲，直到擦破的皮肤使金属生锈。

尽管如此贫困，骑士们仍然有着令人生畏的战斗能力。1235年，他们的骑士团收编了多布尔金骑士团的余部。1236年，在六年的战争之后，他们一直渗透到维斯图拉河三角洲，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沿着波罗的海海岸向东往涅曼河行进。然而，随着1237年5月剑兄弟会在沙勒的被打败以及与他们合并，为条顿骑士团带来了一片波罗的海土地，这些土地超出了普鲁士的边界。几星期之后，普鲁士的首领赫尔曼·巴尔克来到里加，负责指挥利沃尼亚的十字军。

他最初的考虑是要安抚仍在要求归还他的爱沙尼亚领土的丹麦统治者瓦尔德马国王。1238年，双方同意回到16年前最原始的分割计划，丹麦人得到北部的省份，骑士团保留剑兄弟会在南部征服的地区。然而，爱沙尼亚仍然处于教皇的保护之下，要取得教皇的同意，丹麦人和条顿骑士团必须答应加入一场庞大的十字军东征去攻击诺夫哥罗德的罗斯人。因此，在1240年，一支混合了德国人和丹麦人的军队从利沃尼亚出发，在占领了依兹伯斯科和普斯科夫之后，准备入侵诺夫哥罗德本土。这对于诺夫哥罗德公国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时期，它不仅面临着来自十字军的危险，还面临着拔都汗率领的蒙古人的威胁，他们在此前三年里踏平了罗斯南部和东部。

但是，拔都汗没有进攻诺夫哥罗德，而是向西进入波兰和匈牙利。攻击罗斯人的十字军暂时得先去攻击蒙古人。1241年4月9日，一支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军队，包括普鲁士首领奥斯特纳的珀坡率领的一支条顿骑士团的生力军，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茨与蒙古人遭遇，骑士团不屑于等待援军，勇敢地向密集的敌人发起冲锋，结果很多人在箭下伤亡。珀坡设法逃了出去，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蒙古人杀死了基督徒的指挥官西里西亚的亨利公爵，把他的头高高地挑在一支长矛



靠近哥尼斯堡海港的洛赫施泰特城堡，这是条顿骑士团为了征服普鲁士而沿着波罗的海海岸以及河谷建造的战略城堡之一。城堡是用砖石建造的，包括一个小教堂、一个餐厅、一个军械库、一间供开会用的牧师会礼堂、一间厨房、一间骑士们的寝室。此外还有一个用作厕所的塔楼，这个塔楼直接排水到海里，它与城堡的主体分开，通过一条走廊连接起来。相邻的一座综合楼包含有一个给管理员用的地产办公室，管理周围的农地、谷仓、作坊、马厩、一个接待来访者的旅店和其他阶层人的住处。这座城堡可以容纳大约60人的一支防卫力量，包括牧师、军士和大约10到20名骑士。

上。他那些死去同伴们的耳朵被割了下来，塞在9个袋子里呈献给了拔都汗。

对天主教欧洲来说，幸运的是窝阔台大汗于1241年末去世了，这个事件使得拔都汗为了争夺继位权匆匆忙忙地赶回了蒙古。与此同时，诺夫哥罗德人由于解除了来自蒙古人的威胁，趁机想要与十字军清算。1242年初，诺夫哥罗德年轻的亲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涅瓦河战胜瑞典人之后仅仅过了两年，就已经收复了丹麦人和德国人占领的罗斯领土。在有关普斯科夫陷落于罗斯人之手的叙述中，一位德国史书作者悲伤地写道：只剩下两名骑士兄弟在守卫这座城，“如果普斯科夫能够守住，那么它将给基督教带来巨大的利益，拿下一块地方而没有适当地占领是一个错误。本来可以很容易避免的错误所产生的痛苦，让人伤心得最厉害。”

苦，让人伤心得最厉害。”

接下来是更深的痛苦。几乎是利格尼茨灾难整整一年之后，1242年4月5日，两支基督教军队在佩普西湖边交战，一开始，有重装备的十字军骑兵占了上风，突破了罗斯人的阵地。但是，他们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涅夫斯基的士兵。据一本编年史记载，他们被赶到一个冰封的湖上，大部分人要么被杀，要么被俘。

十字军还没有从这次失败中完全恢复过来，就遇到了一场甚至更严重的危机——普鲁士人的反叛。暴动的部落毁掉了骑士团绝大部分城堡和居住点，只有3个幸存下来。镇压这次起义花了整整七年时间。

罗马教廷急于避免将来的麻烦，劝说条顿骑士团要宽宏大量地对待被征服的部落。根据1249年签订的克里斯堡条约，放弃了异教并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普鲁士人被保证享有和德国人、波兰人一样的权利。他们可以做买卖、打官司和做礼拜，有权成为牧师和骑士，在这些方面和移民们完全平等。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间，立陶宛的首领明道加斯，他那强大、管理得有条有理的国家正受着波兰人、罗斯人、蒙古人和十字军的攻击，他决定通过接受罗马的拥抱来至少使它的一个敌人保持中立。教皇英诺森四世非常高兴，给了他的新皈依者一顶王冠。至于明道加斯，他邀请德国商人和居民进入立陶宛，甚至还安排条顿骑士团在他死后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接管他的土地——考虑到立陶宛贵族

对谋杀的偏爱,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把萨摩吉提亚的土地移交给骑士兄弟,这样就把普鲁士和利沃尼亚的领土连接起来。

然而,萨摩吉提亚人拒绝接受基督教的统治,1260年7月,他们在库洛尼亚西部的德本打败了一支十字军军队。这是条顿骑士团来到波罗的海地区后所遭到的一次最惨重的失败,150名骑士兄弟被杀死,包括利沃尼亚的首领和普鲁士指挥官。这次失败引发了普鲁士人更大规模的反抗,反抗蔓延到其他部落,甚至明道加斯看到有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也决定继续反对基督徒的战争。虽然他在1263年被他的姐夫谋杀,这对当时的军事形势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许多立陶宛人仍然继续支持反抗者。事实上,条顿骑士团已经陷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以至于教皇乌尔班四世原来打算派一支十字军去攻打蒙古人的,现在却不得不把所有十字军派去援助条顿骑士团,并且答应不管他们的服役时间多么短,都将完全赦免他们的罪过。

到这个时候,异教徒的勇士们已经从基督徒那里学到了现代战争的艺术,他们有很好的装备,受到很好的领导和组织,既有能力去攻打敌人的堡垒,也能在旷野上和他们对阵。然而,尽管十字军遭受到一些惨重失败,他们还是使对方付出了更大的伤亡。1290年,经过30年的战争以后,尽管萨摩吉提亚人和立陶宛人仍然那么好战,他们还是终于平息了反抗。

由于条顿骑士团牢牢地控制了局势,移民们潮水般涌进了这块土地。利沃尼亚由于其位置的偏远被移民们忽略,但在普鲁士,情况完全不同,受到大片廉价土地和低房租的诱惑,来自德国北部的农民殖民者大量进入,在50年内他们就建立了大约1500个城镇和村庄,人口也发展到15万左右(当地人经过多年屠杀和饥饿大批死去,现在已经失去了数量上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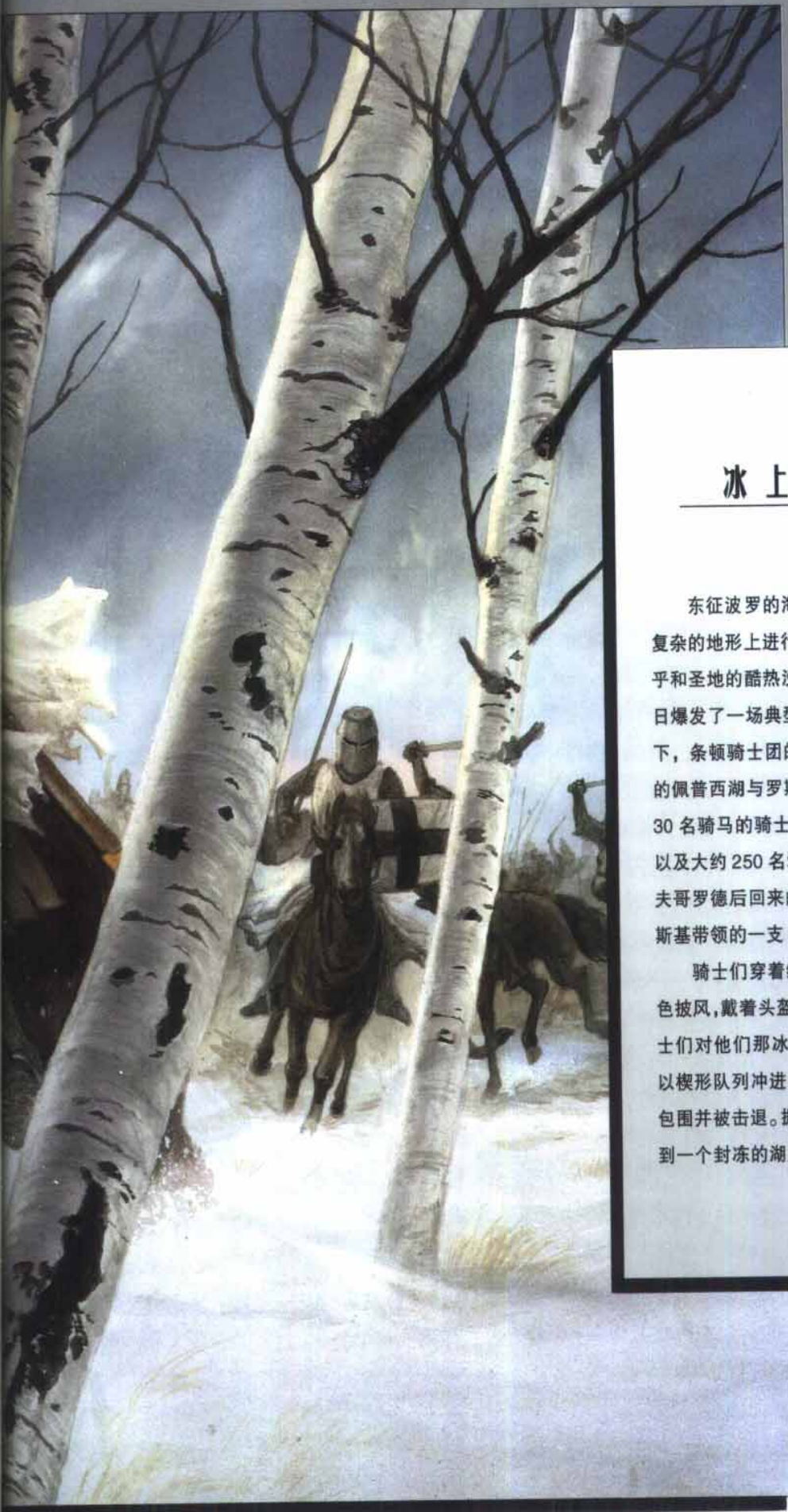
骑士们为了确保普鲁士荒原的有效开垦,雇用了一批土地勘测官,或殖民代理人,他们的职责是招募农民、分配土地、组建村庄。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同时,他们也能得到自己的土地,通常是整个土地的十分之一;并担任村庄的法官和头领,常常还拥有一个作坊或一家旅店。一个村庄有大约20来户人家,每一家拥有40到60公顷土地。在德国,农民们对庄园主负有义务,但在普鲁士他们可以自由来去,他们仅有的义务是按时缴纳每年的租金以及按要求服役。

主要以里加为基地的当地商人们,也可以自由地进行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因此在德国北部富裕的港口和匈牙利、立陶宛以及罗斯的内陆城市之间建立了繁荣的贸易纽带(尽管他们之间有战争和宗教的分歧,立陶宛人和罗斯人之间的贸易仍在继续

由波兰马佐维茨省的统治者康拉德公爵赠送给普洛克大教堂的金制的圣餐盘,是在作弥撒时用来盛放面包的。盘子的右上角是捐献者赠送的一只圣餐杯的画像,由于边境受到普鲁士人的骚扰,康拉德于1225年邀请条顿骑士团来征服他的异教邻居。条顿骑士团于1230年到达,在接下来的50年里把普鲁士变成他们直接控制之下的一个独立国家。他们的成功最终威胁到波兰本身的地位,从而在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这个问题直到15世纪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坦伦堡战役中打败条顿骑士团才告结束。







冰上的战役

东征波罗的海的十字军的战斗是在比较复杂的地形上进行的,天气条件非常恶劣,几乎和圣地的酷热没什么两样。1242年4月5日爆发了一场典型的战斗,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条顿骑士团的一队人马在爱沙尼亚东部的佩普西湖与罗斯人打了一场遭遇战。大约30名骑马的骑士和相同数量的骑马的军士,以及大约250名爱沙尼亚步兵,在袭击了诺夫哥罗德后回来的路上,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带领的一支300人的罗斯军队相遇。

骑士们穿着绣有黑色十字架的醒目的白色披风,戴着头盔,穿着铠甲,拿着剑和矛。骑士们对他们那冰凉的盔甲和武器充满信心,以楔形队列冲进了罗斯军阵地,结果被对方包围并被击退。据一部编年史记载,他们被追到一个封冻的湖上,大部分人被杀死。

着)。尽管被要求付关税,商人们却可以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免费运输他们的货物,使用维护良好的道路或河流,这些地方都有巡逻的骑士兄弟维护治安。

条顿骑士团自己也经营着大宗很赚钱的贸易,保持着一支舰队把他们的货物带过波罗的海,他们的主要出口品是谷物和普鲁士琥珀——后者为骑士团所垄断,用它们做成的念珠是相当珍贵的。骑士团还铸造自己的硬币,建立内部邮政服务,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政策问题由普鲁士首领和他的高级官员共同决定,但是国家每天的事务:税收、执法、防御、组织等则交给当地的司令官,每一个都受到由至少 12 名兄弟组成的修道会的支持。修道会的许多兄弟都是娴熟的簿记员,他们确保修道会的经济事务有条不紊,他们每周把账本送交本地的司令官,而他则每个月把账本呈给一名高级行政官员。司令官也为每一名兄弟建立了档案,把它们送到马连堡的档案馆。

然而,无论条顿骑士团的成员是簿记员还是职员,他们都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主要职守:保卫这块土地不受异教徒和不信教的人的侵犯。基督徒统治的好处只是对基督徒的臣民而言,因此,任何犹太人或巫师都被禁止在骑士团的领域内居住。此外,当地的普鲁士人继续受到强烈的怀疑,只有在重大反抗中保持忠诚的少数人受到和德国殖民者相同的待遇,得到和他们的头衔相称的土地和特权。那些又转回异教和被怀疑对天主不是那么忠诚的大部分普鲁士人,一般被雇用为德国人土地上的农奴,甚至连开一家商店或旅馆的权利都没有。事实上,对于本地人的不信任是非常深的,以至于无论普鲁士人和德国人在什么时候一起喝酒,普鲁士人都被要求先喝,以减少下毒的危险。

到了 13 世纪的最后十年,条顿骑士团得到了最好的安全保障,并且拥有比大部分世俗君主更多的财富、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声望。但是,表面的东西常常是欺骗性的。1291 年,穆斯林攻打阿克,冲击骑士团古老的总部,迫使骑士团在威尼斯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这一哀伤的事件之后,在波罗的海又出现了更大的麻烦,不是来自普鲁士仇恨的异教徒,而是来自里加的基督徒自由民。

里加人和条顿骑士团之间的冲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前者要求更多的独立,后者拒绝放弃对这一城市的统治。1297 年,当骑士兄弟毁掉里加人在德维纳河上建造的一座桥时,事情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在接下来的暴力冲突中,愤怒的里加人猛烈攻打骑士团在当地的修道会,捣毁了它并把 6 名被俘的兄弟关了起来。骑士兄弟做出的报复是毁坏周围的农田,焚烧庄园和谷仓,砍倒果树,赶跑牲畜,杀死反抗他们的人。在圣诞节前夜,他们击败了来自城市的一支军队,然后叫喊着嘲笑吓坏了的居民:“你们的大牧师在哪里?”绝望之中,里加人转向骑士兄弟最大的仇敌立陶宛人求救,立陶宛人立即攻入利沃尼亚,打败并杀死了利沃尼亚首领以及他的 60 名骑士。尽管立陶宛人很快就返回了他们的家园,里加人和骑士

兄弟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着。

对波罗的海事变感到极度震惊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要求得到一个解释，1299年7月，双方的代表都在他面前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根据里加人的说法，条顿骑士团的人只是一些无赖，他们对赚钱的兴趣比对跟异教徒作战的兴趣还要大。里加的大主教约翰第三的田产被骑士兄弟夺去，本人也被他们劫持了30天，他对他们的指控尤其激烈。他声称，骑士团被授予在利沃尼亚改变当地人的信仰、协助保护这个国家不受侵犯的任务，然而，他们却阻碍传教工作，拒绝与异教徒作战。他坚持说，正是条顿骑士团把明道加斯国王赶进荒原，并且由于他们的野蛮、残酷和霸道，阻止了当地人接受基督教信仰。

骑士团愤怒地否认了这些控诉，他们争辩道，骑士兄弟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使利沃尼亚人改变了信仰。他们宣称，他们的成功如此之大，以至于当一位当地人被问到“你信仰上帝吗？”时，他就会回答道：“我像那些真正的好基督徒一样信仰上帝和神圣罗马教会，相信教义问答手册。”教皇卜尼法斯力图让双方达成妥协，劝说骑士团答应还回他们夺走的东西，大家停止互相控告。

然而，1306年，约翰大主教的继位者又重开了这场争吵，他在原来控告的基础上又加上巫术、鸡奸、种族屠杀的罪名。以前，条顿骑士团还可以依靠与法庭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与教士们的不和，但是1305年新当选的教皇克雷芒五世是法兰西的腓力四世的亲密盟友，而腓力宣布他的目标是废除现存的军士骑士团，建立一支由他自己领导的新骑士团。1307年10月，他逮捕了驻扎在他的领土上的圣殿骑士团的所有成员，以异端罪名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一年之后，克雷芒在腓力的影响下，授权整个欧洲对圣殿骑士团进行逮捕和审判。许多曾经参与过对异教徒战斗的骑士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

条顿骑士团吸取了这一教训，1309年，他们匆忙地把总部从威尼斯转移到普鲁士的马连堡——教皇和君主都鞭长莫及的地方。这次转移很及时，就在第二年，克雷芒委任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所有对于条顿骑士团的悬而未决的控告：他们“羞辱了所有的信徒、损坏了基督教信仰、变成了敌人的朋友，没有以基督的名义与基督徒的敌人作战，而是令人惊讶地发动反对基督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教皇几乎不能做什么，得不到具有签名的坦白书就没有足够的理由放逐骑士团，反对者们只好满足于一纸把骑士团赶出里加的教皇指令，而这个指令在几个月后就被废除了。

骑士兄弟在教廷的麻烦并没有阻止他们在波罗的海继续扩展的野心，1308年，他们占领了波兰的波美利里亚，包括沿海城市但泽，引发了一场与波兰的虽然时断时续却长期的冲突，他们还加紧了对已经被合并到强大的里乌塔拉斯王朝的立陶宛人的战争。由于失去了阿克而不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十字架去巴勒

斯坦,寻求冒险的贵族们因此从欧洲各地涌向波罗的海加入那里的十字军。

尽管条顿骑士团自己很节制,对这些客人的招待却很慷慨,为他们提供丰盛的宴会,以及音乐、杂耍、比武等消遣。当然,主要的节目——袭击立陶宛人,则要看季节而定。有200到2000名十字军勇士参加的冬天的袭击是一种抢劫,目标是尽可能快地清除和抢光一个地区,通常会有两次,一次是在12月,一次是在1月或2月,中间的间歇是因为有圣诞节。

在8月或9月进行的夏季的袭击规模要大一些,也更复杂一些,袭击的目标是要征服新的土地,毁坏旧的堡垒,建立新的要塞。一位参加过一次袭击的法国骑士把它看作是“一件很壮观的事情,非常荣耀,非常美丽。”骑士中既有来自法兰西王国,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是骑士、绅士和贵族的大聚会。”

尽管懦夫和体力不佳的人也许有非凡的诡计,他们还是不适合参加袭击。不管是什么季节,十字军都必须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把他们的盔甲和装备拖拽过浓密的森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虽然通常都有普鲁士人作向导,但十字军有时候还是会迷路,再也没有回来。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夏天里一场突然的洪水,冬天的融冰,野兽的袭击,立陶宛人的埋伏等。但是,这样的艰苦似乎并没有怎么影响十字军好战的热情,他们作战时一般都相当残暴。

被俘的十字军会成为立陶宛人勒索的对象,条顿骑士团也答应为任何落入敌人手中的基督教骑士付钱赎回。同样,被俘的立陶宛人经常要被十字军用来勒索赎金,但这样的待遇却只给富裕的和出身高贵的人,普通的士兵和不幸的农民们就没有这种指望了。由于十字军在这方面的名声,立陶宛的一个村庄的居民宁肯互相杀死也不愿意被围攻的基督徒俘虏,一位老妇人正是这样杀死了100多名士兵,当十字军终于闯进来的时候,她用斧头劈开了自己的脑袋。

14世纪初和中期是条顿骑士团最兴旺的时期,然而到1386年,就已经有衰落的迹象了。在那一年,立陶宛的领袖约盖拉大公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并且和波兰王后约德维加结婚,被加冕为波兰国王,成为弗拉季斯拉夫四世。现在,对于条顿骑士团而言,不仅为十字军继续反对一位基督教统治者辩护很困难,而且波兰和立陶宛的王朝的结合也对骑士团构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

清算的日子必然会来临。1410年7月15日,在普鲁士与波兰边界附近的坦伦堡(格兰沃德),经过10小时的血战,波兰和立陶宛的一支军队杀死了条顿骑士团的大批人马,包括首领本人,主要的官员和大约400名骑士兄弟。然而,战胜的盟军并没有能够拿下马连堡。在57天的围攻之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撤走了,骑士团依然存在,大部分领土也没有遭到破坏。事实上,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骑士团才在内外敌人的夹攻下被迫把它最后的一片土地割让给波兰。但是,坦伦堡之战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骑士团的衰落,是波罗的海十字军时代的终结。

哥特式建筑的鼎盛时期

由于人们要寻求一个崇拜上帝的理想场所，13世纪的欧洲在艺术和建筑上都创造了一种非常新颖的形式，这些在今天被称作哥特式——文艺复兴时代敌视中世纪的作家所取的一个名字，他们把它等同于中世纪的野蛮——风格的先驱者们，目的是要在世俗世界创造一个关于天堂的预示。

教堂里塞满了圣人、先知和殉道者的图像，艺术家们采用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手法，摒弃11、12世纪程式化的罗马风格，画家和雕塑家都显示出对基督人性的新的兴趣，给他的行为加上温和亲切的色彩，比如他为其母亲圣母马利亚加冕（右图）。

同时，建筑师们渴望创造这样的建筑物：它们高耸的形状将强调上帝的神秘和伟大。他们首先受到光的象征意义的启发，他们相信这个因素最接近上帝的力量，是上帝的创造给黑暗的世界带来了光明。

1137年以后的那些年里，在巴黎郊外的圣但尼修道院创造的这一模式，由法国国王们私人赞助在法兰西北部建造的一系列大教堂中达到了美的顶峰。这种风格在法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接着传到英国、德国和其他邻近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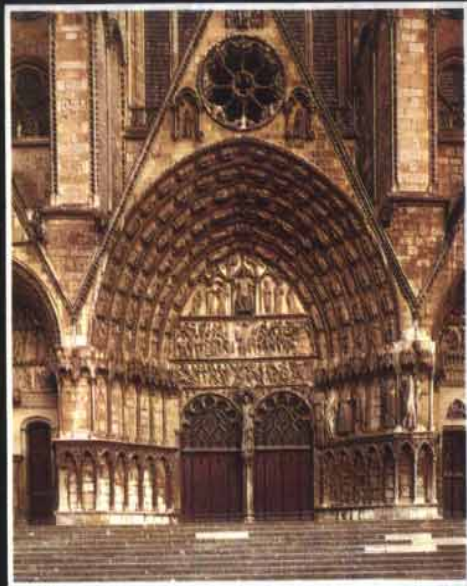
以前，教堂的建筑充满阴郁和阴影，为了支撑砖石建筑和屋顶的巨大重量，罗马式建筑师们不得不依赖于圆拱，这些圆拱是由



厚重的墙壁和非常厚的内柱支撑的，哥特式风格引进了一些这样的技术革新：一种被称作拱扶垛的用来支撑墙壁的外部石柱，和减少侧面延伸并支撑一个石头肋拱框架以承受屋顶重量的尖拱。

教堂的外墙由于免除了一部分承担重量的功能，可以转变成精致的框架，装上又宽又大的彩镶玻璃，窗户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让建筑物更加光亮，使教堂内部沐浴在五彩斑斓的光辉中。

向上的动力



一系列圣人和使徒的雕像，构成了布尔日大教堂廊台的框架。在两扇门上门楣的中心，是正在庄严地主持最后审判的基督的雕像。

哥特式教堂的塔以及塔尖在周围几公里外都可以被信徒们看到，因此成为信仰的灯塔。在它们下面刻满雕像的入口，则是象征着把上帝的领域和人的世界隔离开来的门槛。从每一个山墙涌出的大量卷页饰和叶尖饰——雕刻得很精致的石头叶片和花蕾，把观众的目光往上引到天空。

高度是通过把墙壁和屋顶的重量以拱扶垛的方式扩散到很宽阔的基石上实现的。用来支撑建筑物伸出的外部结构的扶垛，通过砖石建造的拱与教堂的墙壁相连接，发展成为一种精雕的石头支架。正是这些支撑使得兰斯的建筑师们把屋顶提高到 38 米，亚眠的建筑师们更把它提高到了 42 米。对高度的追求在博韦大教堂达到了顶峰，1284 年，48 米高的高坛大拱顶由于基石不牢而坍塌了。

细长的拱扶垛支撑着布尔日大教堂的东端，支撑着墙壁，使得它们可以开许多窗户。



兰斯大教堂的西面是哥特式建筑师们希望使教堂成为人世间天国的梦想的记录，它西面窗户上那一排旧约中的列王雕像，时时在提醒参观者们：兰斯大教堂是法兰西的加冕教堂。

兰斯大教堂的拱像箭一样指向天空，它的与中殿平行的侧殿毋庸置疑地把观众的目光引到东边闪光的彩窗玻璃上。

光与影的舞台



哥特式大教堂的内部沐浴在五彩的光辉中，是被打算用来举行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剧场。建造者们通过装上至少两排窗户来达到这种典型的效果，一排是用来照亮离地面近的中殿和侧殿，另一排就在屋顶下面。两排窗户被一个柱廊隔开，承受屋顶重量的圆柱被雕刻成精致的丛丛圆杆状。圆柱上面是石肋拱，这些石肋拱伸出来在拱的中间形成尖拱。拱的角度可以调整，以便支撑相同高度但不同宽度的屋顶。这是早期圆拱和桶形拱结构所不能实现的。

毛茛属植物装饰着南威尔大教堂的柱顶。



布尔日大教堂的中殿被放在细长的刻有杆状物的柱子上，有40米高，分为三个层次：地面那一层的连拱廊、柱廊或拱廊，以及上面一排称作高侧窗的窗户。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一个手持圣杯、拿着带有三角旗的十字架的雕像，象征着教会在执行圣礼中的作用。

石雕中新的人性



装饰着诺姆堡大教堂的一尊逼真的雕像。

安置在大教堂里面或者是成排地刻在外墙上的雕像，起着布道作用，提醒信徒们想到《圣经》中的人物或一位捐助者，或阐述神学要旨，比如把旧约里的先知和福音作者摆在一起，以强调传播上帝意旨的连续性。这样，石刻就不仅为大部分不识字的教徒提供了一个图画的材料，也通过其隐喻和寓言传达了宗教思想。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西面的一对雕像展示一
位愚蠢的处女，准备接受
一个英俊的引诱者奉送
的一个苹果。

与对面图中代表教
会的人像并列的这个具
有象征意义的犹太教雕
像的眼睛被蒙上了，用来
强调《新约》信仰优越于
《旧约》信仰。





英格兰坎特伯雷大教堂高坛北边一扇环形的小圆窗，描绘了这个城市 1011 年被丹麦人围攻时的一个场面。

哥特式建筑最大的荣耀是彩镶玻璃，它把教堂的窗户变成对更美好世界多彩的梦想。窗户被圈在铅质窗框里，再由嵌进周围砖石里的铁条固定。各种颜色被涂到玻璃上，产生丰富的色彩，最流行的是从波希米亚引进的钴氧化物制成的灿烂的蓝宝石色。一种棕色的树脂被用来详细地描画脸部和衣服等地方。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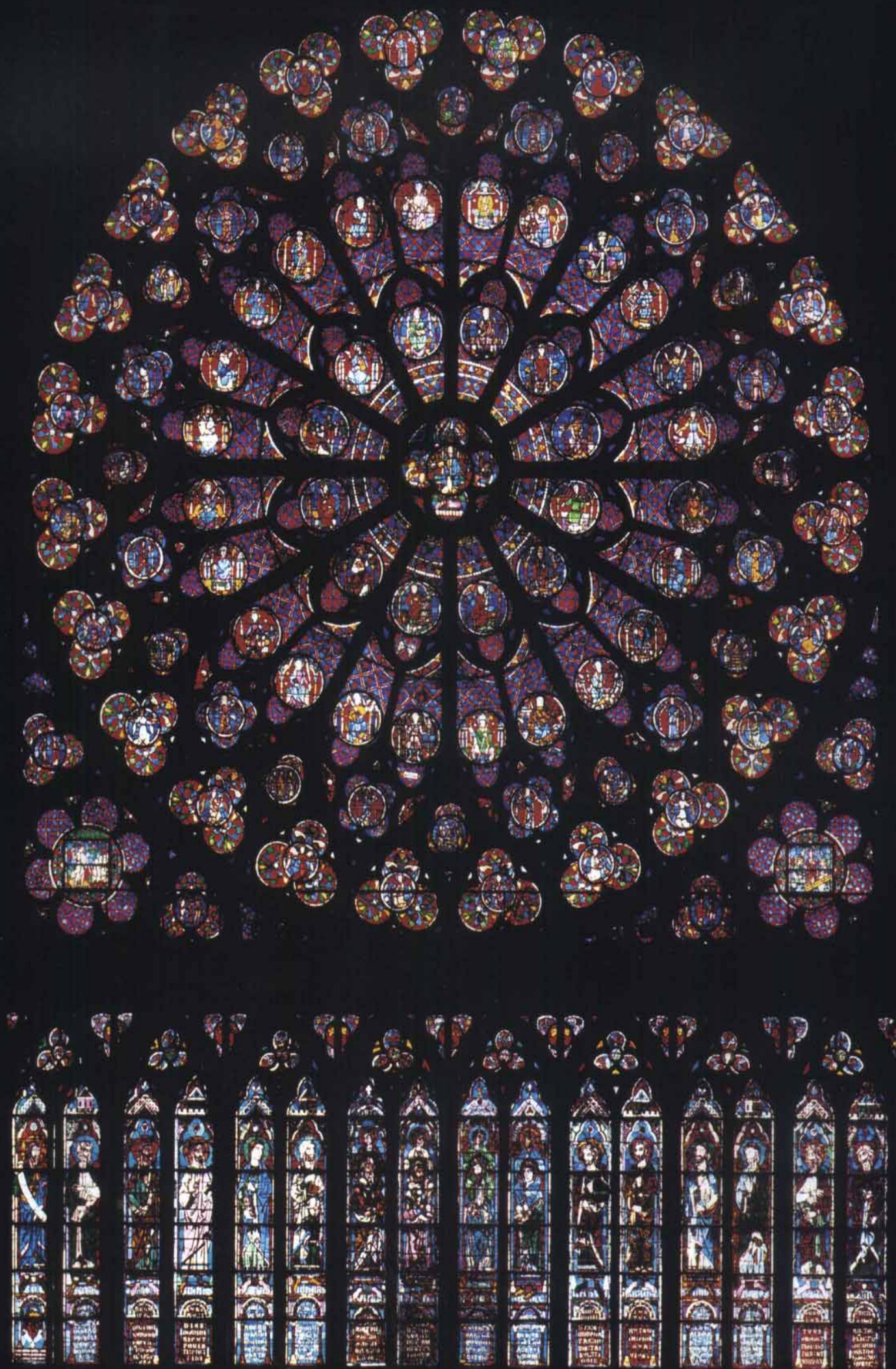
种独特的红宝石色，来自铜的氧化物，颜色非常深，以至于要分成好几层涂在好几片明净的玻璃上才能透明。最后的产品宝石般的光彩夺目，用当代英国学者罗伯特·格洛斯泰斯特的话来说，把光变成实体和无实体的存在之间的媒介，同时是精神的实体和实体的精神。

绘在 1230 年完工的巴黎

的大教堂圣母院南部
的圆花窗中央的基督，
被使徒、天使、圣人和
殉道者围绕着。



哥特式建筑物对于彩镶玻璃有着极大的热情，其典型之一是巴黎的圣夏佩尔小教堂。法王路易九世建造它用来收藏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遗物之一——基督的荆冠。国王在 1239 年花了 135 000 里弗赫（法国古币）收购了这顶荆冠，这相当于建造这座小教堂费用的 3 倍。





欧洲的新君主制

6

初看上去,法兰西的路易九世和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似乎很引人注目地相似,他们有很近的血缘关系,都是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和阿奎丹的埃莱诺的后代,两人都在大半个13世纪统治着法兰西的领土,因为这一点,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两人登上王位的时候都还是孩子,都在未成年时拥有杰出的摄政者:亨利的摄政者中主要有彭布鲁克伯爵威廉·马歇尔,他是基督教世界中最著名的骑士;路易的摄政是他母亲,专横的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奇。两位国王,以及他们的兄弟们,都娶了普罗旺斯的雷蒙德的女儿们为妻。两个人都很虔诚,赞助修建哥特式建筑精华的高耸的教堂,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巴黎的圣夏佩尔小教堂。两个人都不得不对付难以驾驭的封建贵族和有权势的牧师,两个人都真正开始了他们所统治的国家的独立。

但是这两位君主以及他们王国的命运就大相径庭了。金雀花王朝的亨利死时已经丧失了权力,并受到史书作家的谩骂;卡佩王朝的路易则是在他的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死去的,他是那样的受敬重,死后不久就被封为圣人。亨利使得他祖父留下的领土大为缩减,并且使君主统治受制于英格兰的贵族;议会制度已经产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兰西王国则从一个通常被有敌意的封建领主包围着的相对狭小的区域,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在君主统治下的统一国家,君主的绝对权威也随着13世纪末的来临不断加强。

或许可以在这两个国家的特点中找到关于这些差别的原因。法国很大,并且是扩散的,有利于产生一个强大的国王;英国则是压缩和单一的。多亏了它们的不同,法国人才没有形成集体反抗国王的传统;多亏了它们的相似点,英国人才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同样重要的是在那个多变的年代里行使统治权的国王的性格,亨利和路易的成功与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个性——也取决于他们的父亲、祖父的性格。

当12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法兰西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他们在13世纪的发展。1180年,路易的祖父腓力二世在他14岁即位的时候,法国的君主统治还很软弱,欧洲经过数世纪的混乱和恐怖之后,正处在安定下来的过程中。摧毁了古代世界秩序的移民和入侵风暴终于在公元1000年左右变得缓慢并停了下来,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大陆,在这个大陆上,当地的军阀和依附于他们的诸侯之间契约性

这幅法兰西国王路易八世委托制作的画表现了《圣经》的一个细节,一位国王手里拿着象征他的职权的圆球和权杖。路易在1226年死前只统治了3年,他是13世纪登上法兰西王位的五位君主之一,这一时期不仅法国的王权得到了巩固,而且在它的宿敌英格兰统治的范围内,王权也得到了巩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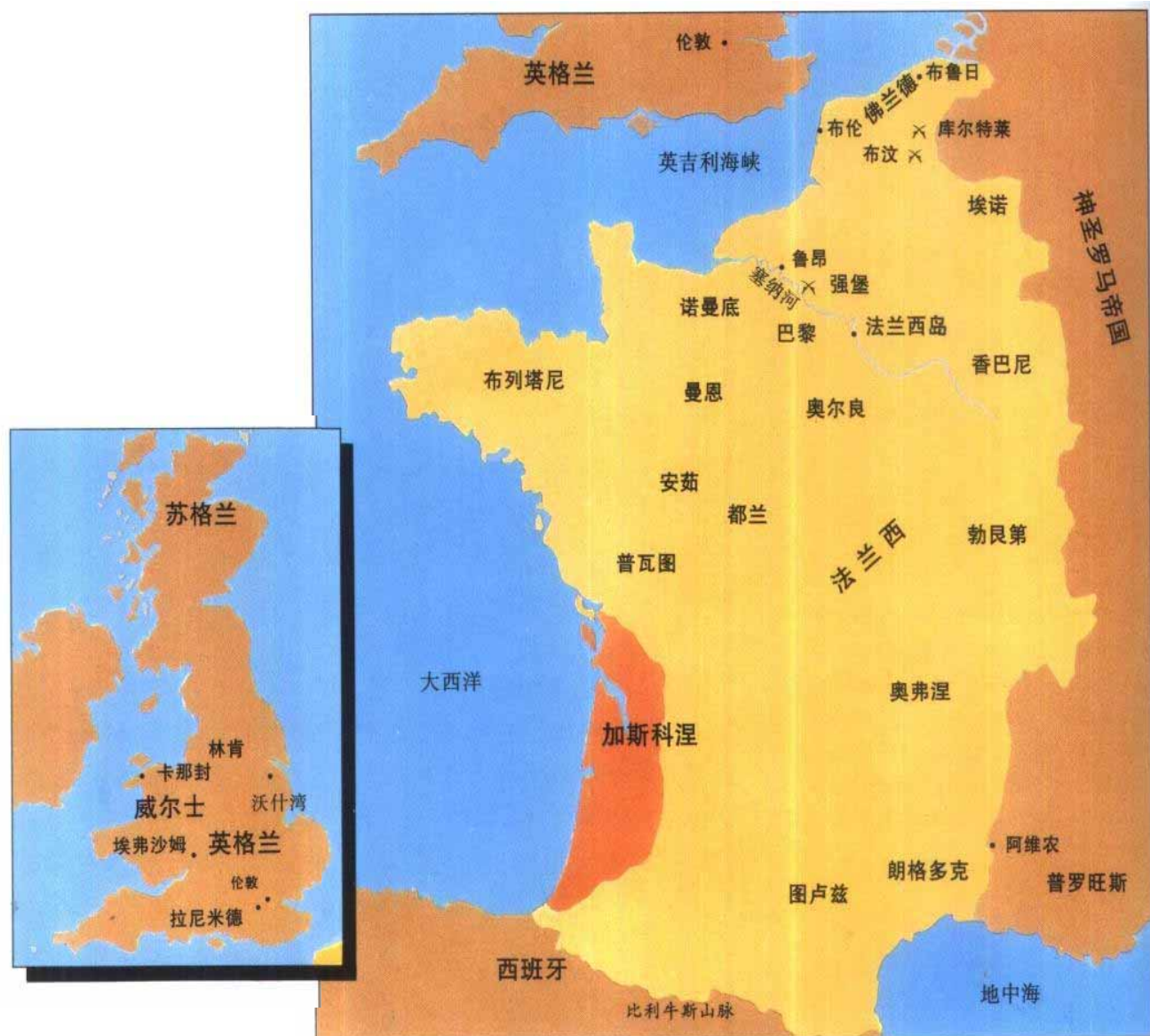
13 世纪初，法国是由那些在理论上承认国王制约的本地权贵统治着的公爵领地、伯爵领地等交织的网络。只有在王家领地的土地上——巴黎周围封闭的法兰西岛，君主才拥有绝对的权威。他最大的封臣是英格兰国王，后者控制着诺曼底、安茹和阿奎丹，在英吉利海峡两边拥有土地，形成了强大的金雀花王朝。然而，到这个世纪末，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数名强大国王的支持下，法国从金雀花王朝抢夺来了他们陆地上除加斯科涅（地图上为桔黄色）外的几乎所有领土，使得英国即使合并了威尔士，实力也大大下降了。

或封建的互相支持的关系是安全的最好保障。国王与领主之间的关系具有同样的性质：以顺从和服务来交换支持与保护。

但是，顺从的程度是有很大的弹性的，当腓力成为国王时，他在自己领域内不同的地区获得两种不同程度的权威。在所谓的王室领地——那些由君主直接支配的土地上，王权确实是真实的，但是所涉及的领土很小，以法兰西岛和巴黎为中心，向外最远只能延伸到 150 公里。

王室领地之外的地方，国王几乎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从理论上说，他是构成法兰西领土的各种各样的伯爵领地、公爵领地和其他领地的封建君主，但实际上，那些控制这些地区的领主们几乎就像独立的君主，任何时候都尽其所能地抵制王权的介入。他们在形式上承认对国王的服从，但是却极力维护自己的独立。

有这样一位领主尤其被巧妙地安排来挑战法国的国王，他就是英国国王。他在法国本土有一片相当大的领地，自从 1066 年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王位就一直和诺曼底公爵领地相联系。1154 年当王位传给法国一位著名权贵安茹伯爵的儿子亨利二世之后，与法国的联系更多了。随着他而来的是一片完全不同的领地，



除安茹之外,还包括曼恩、都兰、阿奎丹(包括加斯科涅和普瓦图),以及从12世纪60年代开始的布列塔尼:实际上是法兰西整个西部沿海地区,往内地一直延伸到中央高原,这些地方和英格兰、诺曼底以及爱尔兰的部分地区构成金雀花王国。

金雀花王朝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土是属于法国国王的领地,事实上比腓力自己的领地要大得多,尤其是亨利的继承人狮心理查在塞纳河边的安德列修建了一座炫耀式的城堡之后,这一事实更加明显了。这个城堡离巴黎只有一天的路程,而且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建筑技术,因此它对腓力的权威构成了直接挑战。理查夸口说:“就算这城堡是用黄油做的,我也能守住它。”

勇上理查在位期间,腓力没有能够对金雀花王朝造成任何影响。他的机会到1199年才来临,时当理查死去、他兄弟约翰继位的时候。新国王的个性比极有效率的理查的个性要复杂,并且易被人误解,导致他在外交上产生失误,让腓力乘机牟利。亨利因为抢了普瓦图领主已订婚的新娘来做自己的妻子,很快就和这位领主闹僵了。这位贵族向他的封建主求助,1202年,腓力传讯他的封臣约翰来解释对他的控诉,约翰拒绝了。这件事使腓力有借口占用他的土地,并且开始了把法国统一在法国国王之下的过程。

腓力首先入侵诺曼底。1204年,在7个月的围攻之后,强堡陷落了。约翰失去了他最强有力的防御据点,对他的封地再不能很好地控制。由于英国国王以前的封臣在关键地带作了让步,腓力的胜利很快就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到1205年,约翰在卢瓦尔河以北的土地全部陷落,金雀花王朝最富足、最发达的地区都落入了腓力手中。约翰把收复他在法国的土地列为头等大事,这个决心把他拖进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之中,他加入了腓力的其他敌人之中,出发去征服法国国王。

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1214年7月27日,在布汶一个佛兰芒人的小村庄附近,那里是法国、德国、佛兰德的边界交汇处。在一个有着可以追溯到9世纪历史的西索安修道院广阔的坡地上,已经到了收割季节,但是没有人是在麦田里工作,而是有两支经过几天休整的军队正在空地上迅速移动,专心致志地对阵打仗。

炎炎烈日下,法国封建主的军队——大约1300名骑士以及相同数量的骑兵和数千名步兵,由经验丰富的国王腓力亲自指挥。法国神圣的红色旗被从巴黎附近圣但尼修道院的安放处带了过来,在队伍前面正中央国王的身边飘扬着。

在他们对面是法国的敌人,他们中央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奥托,和一面象征着他的权威的大旗:一只鹰落在一条盘在柱顶的龙身上。在右翼是索尔兹伯里伯爵——约翰国王的私生子兄弟和其得力助手,他指挥着一支英格兰人的军队和用英国的银子收买的一群佛兰芒雇佣军:在索尔兹伯里伯爵旁边是生龙活虎的布伦伯爵,勒诺·德·达马丹。在左翼,是佛兰德的费朗伯爵,带领着许多熟练的佛兰芒骑士。

一个要塞的陷落

1204年2月，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的军队终于攻破了巴黎西北80公里处强堡的外墙。

强堡是在12世纪90年代由英王理查修建的。作为守卫当时由英国君主统治的诺曼底公爵领地的一系列城堡之一，它以圣地的十字军城堡为模式，采用了最新军事建筑技术，里面有两处空地，一个堡垒，一座主楼。所有这些都有厚达四米的墙，建在距塞纳河100米的石坡上，两边是陡峭的悬崖，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1199年，英国王位传给理查的弟弟约翰，

腓力终于等到了入侵诺曼底的机会。1203年8月，他对这个城堡进行围攻，把一支船队布置在塞纳河上阻挡敌人的援军。法国的十字弓手在一座很高的木塔上向守军射击，工兵则在下面挖开了一条地道，放火焚烧，软化了城墙的地基。1204年2月，最外围的塔陷落，腓力的军队涌入第一个空地（如图所示），通过一扇打开的厕所窗户冲向第二个空地，用石弩和坑道攻下了堡垒。3月6日，剩余的186名守兵投降。这块公爵领地的命运由此决定，仅仅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它就被法国国王所控制。





约翰本人不在，他在 500 公里以外的普瓦图西南部，他本打算要用两支军队之间的钳形运动来对付法国国王，然而，腓力的儿子路易牵制住了他，使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前进一步。

在战场上，指挥官们整装待发，每一个人周围都是一批经过特殊挑选的有技术、有头衔的骑士。但是，在战斗开始的号角吹响之前就开始作战了。腓力最活跃、最机智的顾问桑利斯主教派遣一支骑马军上去骚扰费朗的佛兰芒骑士，为法国骑兵的冲锋做准备。佛兰芒人愤怒地看到和他们对阵的不是骑士而是普通的士兵，拒绝出击，他们等着他们冲上来，再轻蔑地把他们赶回去。

冲锋的马卷起了人团的灰土，很快就遮住了战斗，任何一个观察者都看不清战斗的过程。尘土飞扬中，骑兵们向最适当的对手挑战，步兵们也冲进去攻击骑兵的马，或者压倒一个坠马者，直到有一个骑士来使他屈服。在几个回合的战斗中，骑士们不断地撤出去休息一下再重新加入。他们有盔甲的保护，并且有一个战争的传统，就是贵族在被击败后应该被活捉以换回赎金，他们还明确知道，除非发生意外，一般他们都会重上战场，因此能够以游戏的态度来对待打仗。非常典型的是，布汶之战中大部分伤亡人员都是步兵，甚至被派去牵制佛兰芒骑士的骑兵在被阻击时也只有两人死亡。

战斗像潮水一样起伏着，有一个时刻，奥托的德国骑士决定性地接近了法国国王，约翰的盟军几乎要取得胜利了。腓力的士兵击退了他们。但是，与此同时，德国步兵冲进去包围了腓力，杀死了他的马。旗手疯狂地挥舞着他的红旗呼救，攻击腓力的人被赶跑了。

国王骑上一匹新的马，激励他的手下去攻击德国皇帝。奥托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的马由于在战斗中受伤而脱缰狂奔，他的随从们也跟着冲出去，把帝国的旗帜扔在后面。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德国骑士们继续勇敢地作战到日落，但是皇帝的离开对于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盟军的左翼，28 岁的佛兰德伯爵也受伤了，因此被法国人捕获。在右翼，布伦伯爵继续战斗着，把他的骑士集中在从尼德兰招募来的凶悍且久经战斗、装备精良的雇佣步兵所形成的包围圈里，骑士们往外冲锋时圈子打开，受到压制时再把他们接回安全地带。但是，此时力量的对比已经对盟军不利，傍晚时候，他们的队列越来越稀疏。最后，勇敢的伯爵只剩下几个人和他一起继续战斗。一名法国步兵成功地掀开了伯爵坐骑的铠甲，把他的剑刺进马肚子。马倒了下来，也把主人带倒，几名法国骑士争闹着应该由谁来俘虏他，伯爵向桑利斯主教投降了，被带到被俘的费朗伯爵身边。索尔兹伯里伯爵也已被俘。到晚上，盟军被消灭了。

回到法国军营，俘虏们被带到国王面前，他们包括 5 位伯爵，以及 25 位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旗帜的领主。大举获胜的国王赐他们不死，派人把他们押解到法国

各地的城堡,等待被赎回。

国王约翰面临着所有计划的破产,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向胜利的敌人求和,回到英格兰,他的希望破灭了。虽然没有丧失更多的领地,英国君主在法国的领土已仅限于卢瓦尔河南边的土地——当地一位不守规矩的贵族使得君主对这块土地基本上无利可图。

与此相对照,腓力为自己赢得了建设国家的安全保证。在巴黎爆发了一场长达一星期的狂欢,接下来是行政的重新组织,巴黎成为卡佩王朝的首都,布汶这个名字成为王家宣传大厦的基石。这一伟大的日子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的是腓力的牧师,这场战争的目击者,一位布列塔尼人威廉所写的《腓力王朝》。正是这个威廉给了他主人“奥古斯都”这一称号:腓力大人。这位卓有成效的统治者以腓力·奥古斯都之名留在后人的记忆中。

腓力去世一年后,1224年,这部用拉丁文写的史书完成了。王位由他的儿子路易八世继承,路易那短暂的统治几乎和他自己的统治完全一致。很多年来,路易积极参与他父亲的政事,正是他于1214年在南部打败了英国国王约翰的军队。接着,他在英国的一支反叛贵族的邀请下,渡过英吉利海峡追击回到英国本土的约翰。但是他人侵英国的时间很短,在他统治的三年里,路易几乎完全专心于解决法国本土的问题。

1224年,也就是布汶之战的十年后,路易进军普瓦图,通过收买贵族、教会和城镇来使这一具有反卡佩王朝传统的地区开始归顺。下一步,他集中精力把卡佩王朝的统治延伸到法国南部,这一地区对于法国人来说,在气候、文化、心理上甚至比英国还要陌生。

吞并南部的借口是反对异端,卡特里派在朗格多克对天主教构成了威胁。这是一种二元论的宗教,其教义宣扬上帝只统治天堂里的精神世界,撒旦统治地上的物质世界,这与正统的信念水火不容。教皇在企图通过政治和外交压力限制卡特里派的发展失败之后,签署了一份公开的告谕,授意人们拿起武器攻打他们的信徒。1208年以来,法国北部的贵族就一直在朗格多克打仗,等到路易入侵英国受挫回来加入他们的队伍,战斗取得进展,统治南方的家庭被消灭,他们的土地被交给了北方的人侵者。但是,法国国王还没有真正统治南方。1226年,路易发动了对朗格多克的大规模远征,在受到将近20年野蛮战争的打击之后,南方崩溃了。路易在这一年死去,他的军队仍然在战场上,虽然它还那么难以驾驭,朗格多克省的独立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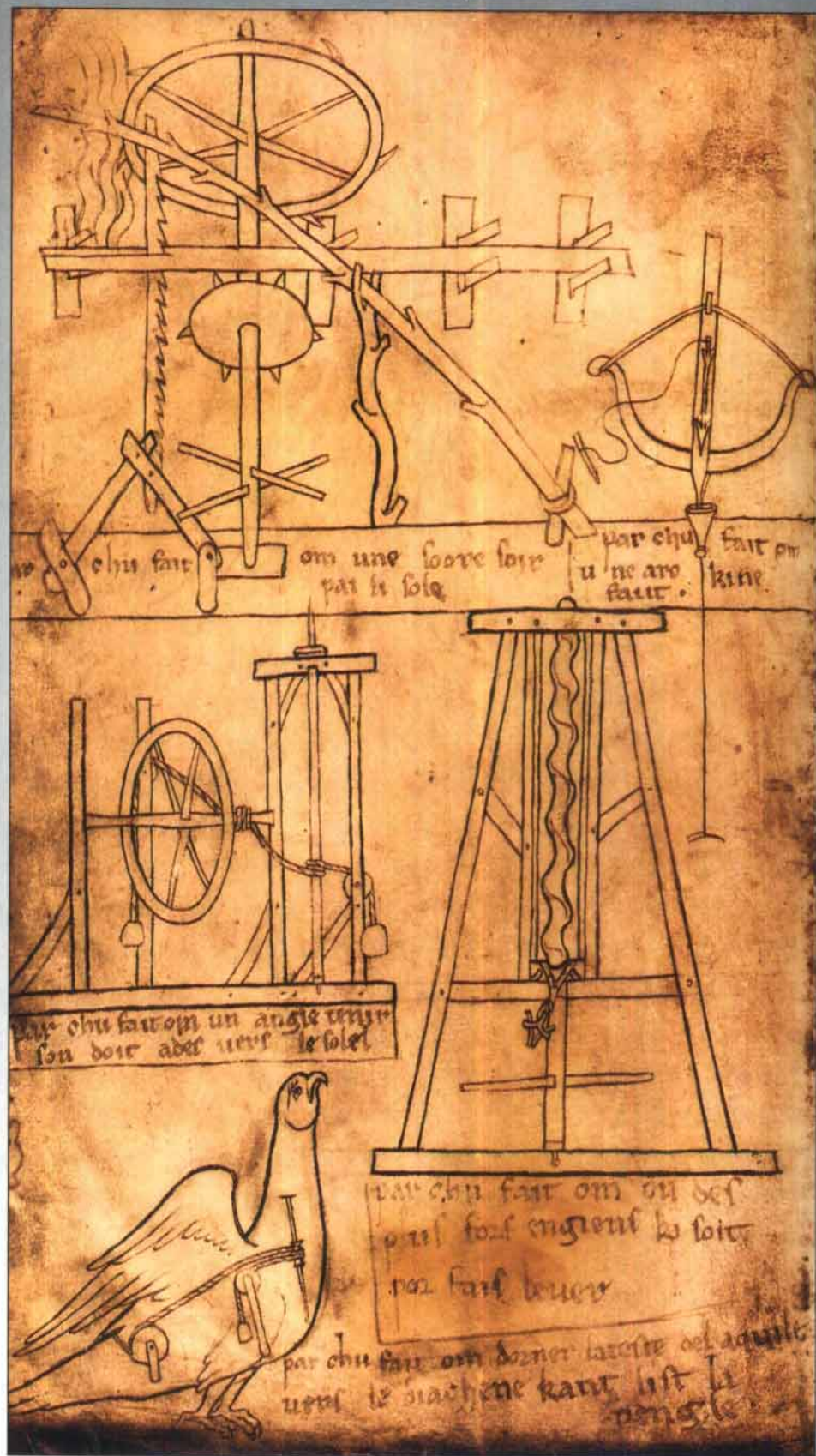
多亏了他的父亲和祖父,路易九世继承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他那荣耀的统治在那时候还无法预见,因为路易在他父亲死的时候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而那些地位受到日益强大的王权损害的贵族和亲

一位建筑师的制图本

奥诺古尔的机械制图范围包括设计水动锯子、非常精确的十字弓（图的上部），以及读经台上的鹰，这只鹰在副主祭宣读福音的时候会面对他（图的左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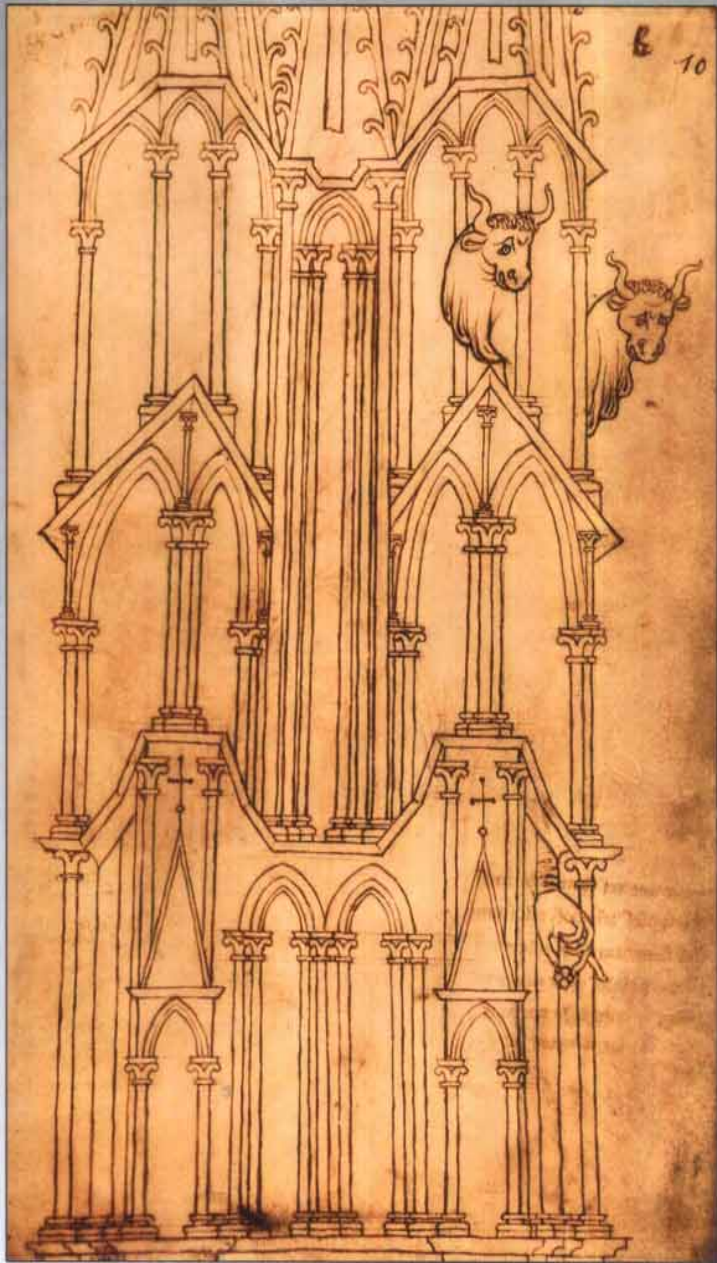
法国建筑师维拉尔·德·奥诺古尔在1220年到1235年间绘制的草图本，从中可以看到一位中世纪的艺术家引人入胜的心灵。奥诺古尔这个杰出的石匠，集设计师、雕塑家、工程师角色于一身，指挥并且经常亲自实施建筑物建造的每一个阶段，包括起草计划到奠基、制造脚手架和运送石头的机器，和最后的装潢。这样的手艺人属于“会社”——一个高级专业团体，保存有关于方法、方案的秘密档案——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像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奥诺古尔不断地搬迁着，有时候会到瑞士或匈牙利这样远的地方执行任务，搜寻新的材料，研究新的设计，与同行建筑师们探讨。在版权还不存在的年代里，设计会在遥远的土地上被频繁地模仿着。奥诺古尔的图本——被用来作为他的徒弟们的范例，也可能是给“会社”用的，包含着丰富的知识，关于比例、测量、楼层平面图、正视图等，除了他自己关于机械原理和解剖方面的思考，还包括从拜占庭、阿拉伯和欧洲各地收集来的建筑技术。





一个卧在地上的基督形象象征着筋疲力尽。奥诺古尔的图本里包含了许多这样的绘画，用来做雕塑装饰的摹本。



这幅拉翁大教堂塔楼的草图，绘制了两尊公牛的雕像，有可能是在建筑中用来使人联想到野兽，但是右边绘制的那只手却是奥诺古尔本人的奇想。



为了说明敲钟机的原理，图中4名石匠被表现成围绕中轴旋转，相互蹭着对方的脚。

土们,决不会放过收复他们失地的机会。国王约翰的儿子,英国年轻的亨利三世也是这样。他对法国贵族反叛的提议做出了反应,试图打回普瓦图,但没有成功。然而,路易的母亲,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奇,她本人是英王亨利二世的孙女,作为一个果敢能干的女政治家出现。贵族们很快就不能保持一致以取得长期利益,布兰奇娴熟的统治使君主统治安全地度过了路易的未成年期。布兰奇是那样的果敢,以至于一首民谣把她称作母狼。即使在路易成年并娶了普瓦兹的玛格丽特之后,布兰奇仍然是路易最好的顾问,直到她于1252年去世。

布兰奇本人的虔诚在路易的成长中产生了极大影响,路易给他同时代人留下的印象是幽默和机智,但最重要的是他在施舍时所表现的虔诚和慷慨。虽然他强烈地相信王室的至高特权和义务,并且生活在那样的奢华之中,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却是严肃、简朴的。

作为一个给人印象很深的有道德、有责任感的、虔诚的君主,路易很早就开始了一系列慷慨的捐赠和建筑工程,这些把君主统治的辉煌和上帝的荣耀一起提高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的圣夏佩尔小教堂,被设计用来安放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遗物之一,据说是基督戴过的荆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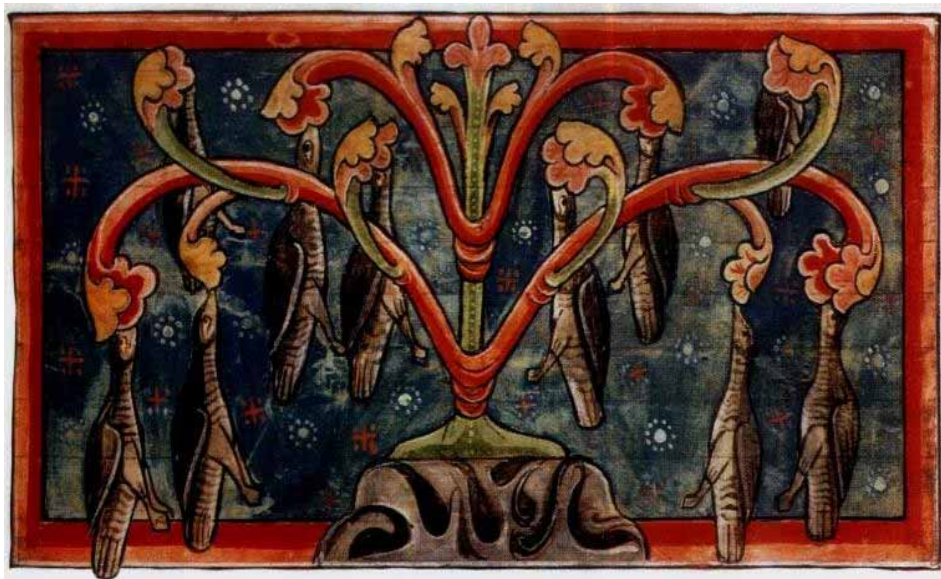
路易也开始了把法国统一在王权下的庞大计划。他大大地稳定了与英王亨利的关系,在他未成年时期惹过麻烦的不安分的领主也很快被降服。1247年,为了扶持公共司法,他委派官员——一般是行乞僧,他们被称作调查员,到他领土各地去处理对那些执行地方公务的官员们的抱怨。

路易对司法的关注是他同时代人很少有的,他的朋友,史书作者儒安维尔描述了他听取臣民意见的方式:“夏天,在听过弥撒之后国王经常要走到樊尚森林,在那儿背靠着一棵橡树坐下来;……那些有什么官司要陈诉的都可以不受阻挡地来跟他说。”路易所表现的最突出特点是个人正直。

和这一时期的许多其他国王不一样,他响应了教皇要解放圣地的号召。听说她儿子已经拿起了十字架,布兰奇哀伤得(用儒安维尔的话)“像是她已经看见他倒下去死了”。他确实是活着回来了,虽然她没有活到看见这一事实,但那只是在遭受了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记的灾难性挫败之后。

路易的十字军于1248年8月出发,那是远征中东准备最好、花费最大的一次。他的军队在埃及登陆,很快就占领了达米埃塔三角洲港口。但是,从那时起,他们的远征就陷入困境,军队中的许多人——包括痛苦的国王本人,由于染上了疟疾和坏血病而失去了战斗力,在试图从一次判断失误的进军内陆的行动中撤退时,他被穆斯林军队捕获。路易的王后玛格丽特因为已经到了妊娠后期而被留在达米埃塔,答应给把他们带到这里的意大利船的船长们一大笔钱才让他们没有离弃,使这次冒险不至于成为一次彻底的灾难。一大笔赎金换来了路易的自

中世纪动物寓言集，描述动物和他们行为的手抄本。它把文章与图画结合起来，创作出了“袖珍动物园”，书中经常把动物的行为和人类正确的道德行为并列。它虽以一本早期希腊作品《Physiologus》为基础，但更多的是基于流行的神话而不是精确的观察，所以它把对真实动物的描写与独角兽、凤凰这样传说中的动物混在一起。刺猬（下图）被描述为父母亲的典范，他们从葡萄树上摇下葡萄，把它们穿在自己的刺上来喂养饥饿的婴儿。黑雁（右图）的故事没有什么明显的道德意义，按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据说黑雁在水下成长，就像水果在藤萝的枝条上快速长大一样。



由，但是他却失去了很多部下。接下来，他又在中东的战争和外交上毫无建树地忙碌了四年，才在1254年打道回府。在那前一年，他已经收到他母亲去世的消息。

路易离开了整整六年，他不能原谅自己没有能够解放“圣地”，不能原谅自己在这次行动中所招致的基督徒的牺牲。在他以后的统治里，他专心于做好一个基督徒国王，实践并且宣扬正义和慈善的理想，还在个人生活上越来越禁欲。国王对于政府司法的关

注随处可见。1254年颁布的一条改革法令不仅让王家土地上的行政人员发誓要诚实，而且还更加实际地组织了一个上诉机构。同时，他那些徒步旅行的调查者们的任务也被安排到每年一次。1254年的法令在整个法国境内宣布，这是第一个这样宣布的法令。现在，路易想要作为整个民族的国王来统治，贵族们不大高兴，尤其是路易坚持要他们也遵循王家判决的时候。他不懈地努力，希望禁止司法决斗，因为这样的决斗使贵族们之间的纠纷要用流血来解决。相反，路易鼓励他们把官司打到国王面前。

现在，宫廷成了法国无可争议的权威。路易和他的官员们一起想方设法榨取日益发展的城镇的财富，这些城镇富裕的专业行会越来越游离于封建社会严



格的结构之外。传统的王家收入来自正在大幅度增加的王家领地以及以钱为形式的封建服务,现在又增加了为特定目的从城镇哄骗来的津贴、特殊的征税,以及来自法官审判过程的收入,包括罚款、没收财产带来的收入。此外,教会也承受很重的税务,路易的虔诚并不阻挡他行使他的权力。

然而,路易的对外事务却没那么成功。英国国王在1230年、1242年两次发动对普瓦图的远征,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不快。1259年,路易与约翰的继承人亨利三世签订了巴黎条约,法国君主统治的现状才得到了正式认可。但即使是那个时候,条约所包含的条件并没有使任何一方国王的支持者感到满意。两个君主政权之间的摩擦仍旧继续着。6年后,路易使法国卷入了意大利半岛的纠葛之中。当时,教廷的支持者和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室之间正在争夺西西里的王冠,路易让他那野心勃勃的弟弟安茹的查理去接受教皇提供的这顶皇冠。

那时候,路易正逐渐衰老。1270年,又病又衰老的路易再一次踏上了东征的路程,但是,只走到突尼斯就死了。他的尸骨被带回,安葬在圣但尼修道院,成为受人景仰的对象。他死后,法国君主在精神和政治上的统治不只是在法国,而且在欧洲都是无可匹敌的。在两位其统治一直延伸到下个世纪的国王治理下,领土的扩张、权力的集中,以一种新的冷酷继续下去。

在路易的儿子腓力三世15年的统治期间,王家领地通过一些重大事件得到拓展。最著名的是香巴尼伯爵领地,这块领地长期以来是各领地中最富裕、最独立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对于巩固王室领地又起着关键作用。通过让这块领地3岁的女继承人和国王的儿子订婚,它被合并进了王家领地。到1285年腓力死的时候,王家领地在大小以及财富上远远超过了剩下来的布列塔尼、勃艮第、加斯科涅公爵领地和佛兰德伯爵领地。

17岁的腓力四世继续着这一趋势,在—批效率极高受过大学教育的律师、政治家影响下,以罗马的民法而不是路易时代的牧师条例为原则,一种赤裸裸的要把王权延伸到法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的决心成为政府最主要的事务。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教皇在法国的权力。国王和教皇很快就在关于君主未经教皇同意就向教会征税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逐步上升到关于教皇权威这一基本问题的冲突上。1303年,腓力采取极端措施擒获了教皇,事情得以解决。1305年,一位法国人被选为教皇后,教廷被迁移到阿维农,仅仅在法国领土之外。

为了对付教皇对君主政权的威胁,腓力和他的顾问们设法取得法国三个社会阶层的同情:牧师、市民和贵族。三个阶层的代表多次被国王召见,这一权宜之计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双方交流的渠道:国王可以解释他的情况,接受臣民们对他政策的认可。然而,这些召见并没有法律上的权力来制约国王,腓力的君主统治在他的人民中是不受约束的。

兰斯大教堂正面雕刻的一个细节,描绘一名十字军勇士从牧师手里接过面包和葡萄酒的情景。1095年开始发动的十字军运动在整个13世纪仍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勇士。在欧洲许多拿起十字架的著名人物中,最热情的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他死后仅27年就被封为圣徒。他在罗讷河三角洲的艾格—莫特(意为剧痛或剧烈的死亡)建造了一个特殊的港口,使他的十字军能够从那出发。然而,他的两次十字军东征都失败了。1250年,他在对埃及一次毫无结果的进攻中被俘,1270年,在围攻北非的突尼斯港口时死去。13世纪末,基督教在巴勒斯坦最后的领土落入埃及马穆鲁克统治者之手,十字军运动到此基本结束了。

一个异教徒的幸存

13 世纪新的哥特式风格雕塑家们比较欢迎的一个主题是叶状的头颅或“绿色人”，他那被叶子装饰的脸出现在欧洲教堂的石、木制品上。

这个绿色人是异教时代的遗留物，很可能是从凯尔特人或罗马人的神话中流传下来的，起初被创造为一个魔鬼一样的面容，它把自然世界与欲望和罪孽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在那些早期去教堂的人心里引起恐惧感。然而，哥特式风格的雕塑家们把这个叶状的头颅改造成一个慈祥的形象，用来象征更新和复活。这个绿色人性格上的升华使得它能够被摆在教堂中心的位置，甚至被与基督教最神圣的人物基督和圣母马利亚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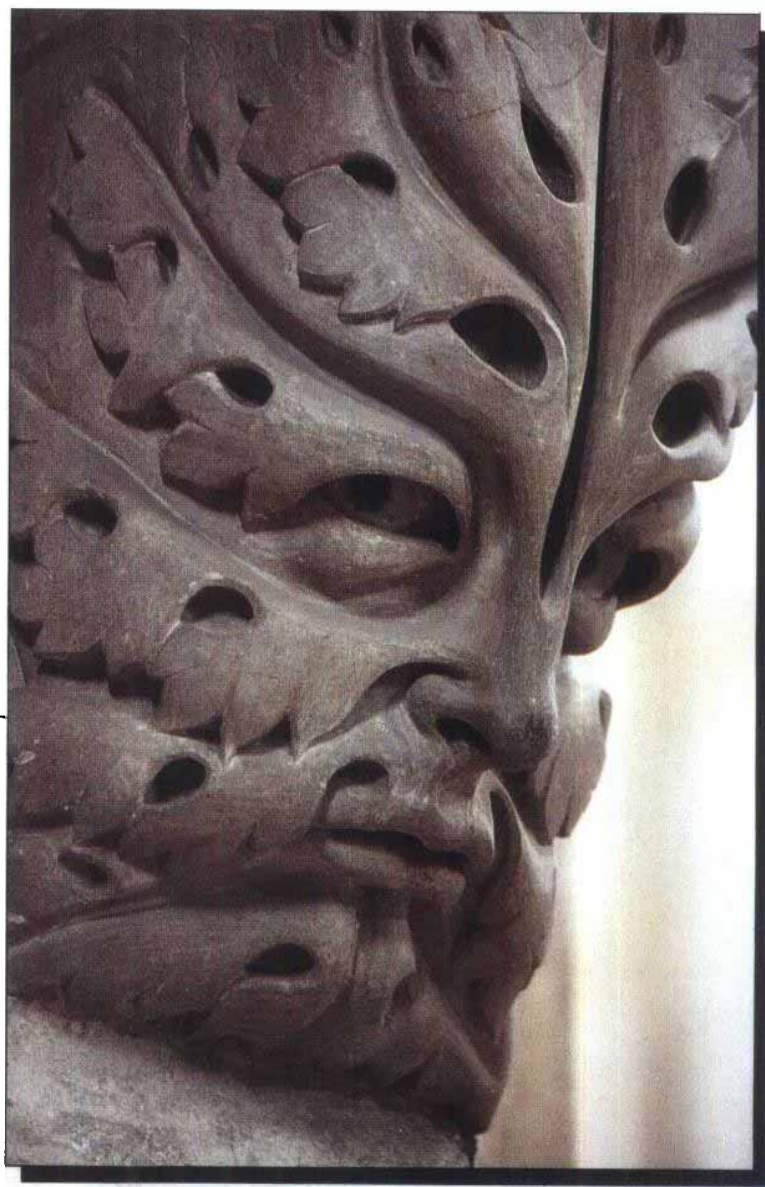
德国班堡大教堂里大量雕刻的叶板形成了一个叶状头颅。这个绿色人装饰着一座骑士雕像的支柱，这个雕像被称为“班堡骑士”。

腓力对于剩下来的那些封建领主的统治就不那么确定了，两位最强大的领主是加斯科涅的公爵（也是这一时期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亨利三世的儿子）和佛兰德的伯爵。1297 年，被腓力的干涉所刺激，出于对布汶之战的回忆，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一开始，爱德华和伯爵被腓力挫败，但是，佛兰芒人对于法国人控制他们的那种方式很憎恨，在 1302 年杀死了占据布鲁日的法国人以及他们的盟友。接着是公开的反叛，招致一群法国骑士的报复。

但是时代在变化，当两支军队于 1302 年在库尔特莱遭遇时，傲慢的法国骑士由于他们自我优越感而粗心大意，被佛兰芒步兵阵地密集的长矛挑下马来。腓力被迫与爱德华谈判，他重新做的努力并没有降服佛兰德。

战争开支使腓力感到吃紧了，他又增加了税收，使许多重要的团体感到惊恐，各地区对他的憎恨与中央集权一起发展，灾难在酝酿，即将在接下来的那个黑暗的世纪里爆发。

亨利三世祖父时代的英国似乎比法国有更光明的前途，王权也强大得多。首先，英国在 11 世纪被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威廉公爵用他自己的诺曼封臣取代



了拥有土地的盎格鲁-萨克逊贵族，这些领主由于从王室直接的恩赐中获得土地，对于君主非常感激，因此其封建体制比法国有着更清晰的轮廓。

12世纪中期，形势变得更为复杂。那时候，安茹的伯爵，也就是金雀花王朝年轻的亨利，把他在法国的领地置于英国王位之下。要管理一个从苏格兰边界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这么一大片土地的任务制约了王朝的性质和发展，像爱尔兰、布列塔尼或威尔士和苏格兰边界这样一些远离中心的地区，受几乎独立的领主控制。然而，在金雀花王朝的腹地如英格兰、诺曼底、安茹、曼恩和都兰，国王是通过地方官员来统治的——在英格兰是首席政法官，在大陆是执事，他们直接对他负责。书面指示被送给这些地方官员，到处巡视的委托人监视着机构的运行，国王本人也不断地到处视察。国王和他的巡回法庭一起从一个省来到另一个省，检查每一个环节，办理案件、应答控告，如果他在中途停下来，只是为了陪伴王后度过另一个分娩期，或者甚至在动身之前让全家团聚，过一个短暂的圣诞节。

组织英国的行政管理只是金雀花王朝诸多事务中的一个，虽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是这个王国一部分的英国的封臣们，极其憎恨金雀花王朝统治的扩张、索取钱财、干涉当地和私人事务，好在国王并不是总会出现来惹恼他们。亨利

一个绿色人展现出罕见的挑衅神情。



普瓦蒂耶唱诗班牧师座位的叶饰。



温切斯特一个叶饰头颅露出慈祥而镇定的表情。

的继承人狮心理查在他统治的 11 年里，只在英国呆了大约一年，他的弟弟和继承人约翰除了 1199 年为了加冕典礼所做的 3 个星期访问，统治的前四年里都不在英国。

在把法国的省份输给腓力二世并且在 1214 年的布汶之战中被打败之后，所有这些改变了，约翰由于被夺去了他最心爱的大陆的土地，或多或少的被迫要永远住在英国领上。同样的，国王的许多封臣原来在金雀花王朝拥有大片土地，现在也发现自己被限制在他们在英国所拥有的土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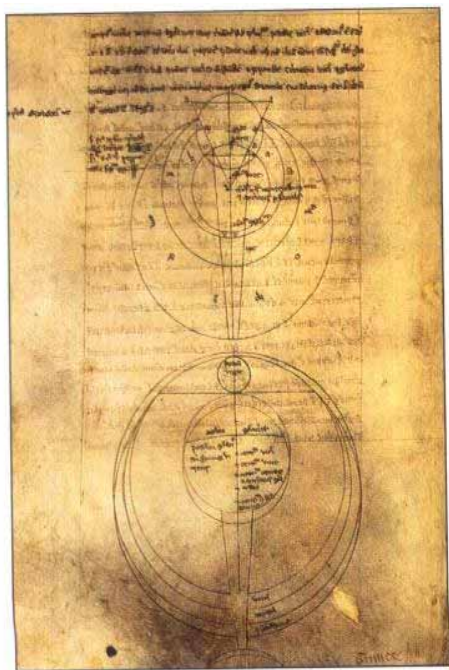
约翰从来没有赢得过封臣们的爱戴，尽管他的有些顾问表现得很忠诚，他的敌人把他描绘成一个残酷、淫秽、贪婪、胆怯的小人。也许是因为他与教会不断地冲突——他在 1208 年被革去教职，到 1213 年把他的王国变成教皇的封地才重新获得教皇的宠爱——疏远了修道院，有关他罪行的详细历史就是在这里编写的。比较客观的文献资料至多表明，他曾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谨小慎微的管理人员。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总带着书在身边，通常是史书，但他也因袭了金雀花王朝家族典型的放任。据传，一些小的焦虑就使他父亲亨利大发脾气，撕扯自己的衣服，啃地上的草。约翰也不大稳定，一会儿一副精力充沛、果敢的样子，一会儿又不可思议地了无生气。

然而，并不仅仅是约翰的个性在他 1214 年回到英国的时候给他带来麻烦。他没有卡佩王朝那么大的收入来源，为了支付他远征法国的费用，他花了大量银子，使国库亏空。此外，他召集来为他服务的许多领主和贵族们并没有亲自去作战，也没有送来应该送的骑士。约翰不在的时候，王国交给在行政人员手里——他们中有些人不是英国人——他们只对君主本人负责。

结果是国王和势力很大的领主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约翰求助于更极端的财政方法来偿付。在他统治期间，继承应付款——贵族在就职时应付的款项，从 100 马克涨到 10 000 马克之多。根据国王的法令，即使是对比较小的过失所罚的款也在惊人地增加。约翰也擅长用直截了当的恐吓来筹款。他的国库的一个记录曾揭示，1210 年一位北方的贵族不得不向国王提供 5 匹一流的供骑坐的马，“这样，他就会对亨利·皮内尔妻子的事情守口如瓶。”此外，他还付了一大笔钱重新获得国王的“善心”。约翰还准备好在他的交易中利用贵族们的妻子，另一个记录表明，“休·内维尔的妻子答应给领主国王两百只小鸡，以能够与丈夫过上一夜。”国王刻薄的勒索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不满，在布汶战败后更达到顶峰。

在约翰从法国回来的那一年冬天，他试图要那些拒绝过战斗的人用钱来偿付他们的义务，贵族们公开抵制，要求废除金雀花王朝体制的暴政，恢复盎格鲁-诺曼时代的习俗。约翰为争取时间而拖延，竟然发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这样

英国科学家阿·培根，一位实验的热诚倡导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画出这张图解释光在进入人的眼睛时是怎样折射的。在意识到人工透镜的可能时，他注意到凸透镜对阅读有帮助，这一认识预言了眼镜在欧洲的第一次使用。他甚至还提议说，巨大的折射镜可以用来侦察敌人。数学家、炼金术士以及玄学的实践者培根在1214年左右出生，生活在有强烈科学探索精神的时代里。在那个时代，被翻译为拉丁文的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作品，正在被西方思想家们研究。



就把他自己和他的财产置于教会的保护之下。同时，他派人到阿奎丹和佛兰德征集雇佣兵来镇压反叛者。在他们能够到达之前，贵族们已经放弃了效忠的誓言，拿起了武器。他们没能占领重要城镇北安普敦，但是贝德福德却为他们打开了大门。他们还占领了伦敦，这个要塞从来没有对金雀花王朝忠诚过。迫于宫廷里那些中庸的顾问们的压力，约翰要求休战。

1215年6月，双方在伦敦泰晤士河上游30公里处的兰尼米德的草地上进行了详细的协商，根据他们最终达成的协议条款，贵族们以后来被称作“大宪章”的文献的颁发为条件继续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宪章的63条款包括从国王那里争取来的解决贵族们控诉的一些具体诺言。

宪章最重要的条款是肯定法律规则高于国王的个人权力，因此在第39条国王宣布：“除非是根据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所作的合法判决或土地法，任何自由的人都不能被监禁、被剥夺权力和财产、被剥夺公民权或被放逐，或者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或者反对他”。宪章并未抽象地界定法律的含义，神裁法或司法决斗来判决这样古老的习俗还保留着，然而宪章建立起了客观调查以及获取证据的完善的程序。国王的手们迫使他承认，他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对自由人起诉。

另一重要条款是，不管是为了取代军事服务还是为了特殊的需要，如果没有“我们王国的共同协商团”（一个顾问团，理论上包括所有直接从国王那里获得土地的人）的同意，王室不能够征取任何额外的偿付。许多条款都是试图要使王家法庭实施果断干脆而有效的司法，其他的条款限制了金雀花王朝所发展的掏空臣民们口袋的那些手段。一些段落只是重述了被独裁的金雀花王朝忽略的古老而受人景仰的习俗，还有一些段落干脆列出了某些受憎恨的王室代理人，并且宣布从此结束他们的职业生涯。伦敦的商人们由于支持贵族团体，所得到的回报是保证他们运送货物的自由以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的尝试。在王室看来，最受限制的一条或许就是25名贵族被提名组成一个法庭，接受那些关于违反宪章的诉讼。这样的话，只要有必要，他们有权使用武力来约束国王。

回顾起来，这个大宪章可以被看作是离开独裁统治之路的一个里程碑，然而，短期内这个重要宪章却无法阻止英国陷入混乱。约翰的政府不可能应付得了被要求的工作，一些野心更大的贵族继续进行推翻约翰政府的行动，尽管有路易的军队暂时占领伦敦的干涉，贵族们还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时约翰已经有时间在这块土地上纠集了一支有效率的雇佣军，法国人的入侵陷入了困境。

但是这时候约翰患了疟疾，身体迅速地衰弱下来。灾难在1216年10月12日降临，在他的军队在林肯突破反叛者的围攻后回去的路上，约翰在剑桥郡的沼泽地里一个叫沃什的大海湾海岸附近，他和他的行李车走散了，而在试图走捷径穿过有定时潮汐的威尔河河口湾的时候，赶驮马的人和马一起遇难。据当时一位史

书作者说：“他们许多人都淹没在海水里，或被流沙所困，因为他们在退潮之前就粗心地匆忙出发了。”在这次事故中，约翰王不仅失去了他很多家产，也失去了很多搜刮来的财富。在那以后，他再没有活多久，就在同一个星期里，他在纽瓦克城堡死去了。

他9岁的儿子迅速被加冕为国王：即亨利三世。1217年5月，对侵略者及其联军的一次胜利和8月份一支援军舰队的毁灭，把路易赶回了法国。路易为了挽回面子休战了。大宪章重新颁发（尽管没有25个贵族组成的委员会），确认了内战的成果，叛党瓦解了。

在亨利未成年期间，英国在威廉·马歇尔摄政下恢复了一定的秩序。1219年摄政者去世后，年轻的国王开始不断地取得权力。然而英国理论上还是处于教皇的保护之下，就是在1223年以前，教皇允许年轻的国王“主要依赖他自己下属的意见”来治理国家。亨利不是从他自己的人民而是从教皇那里取得权威这一事实受到大领主们的怀疑，同样，他们还发现自己被一个王家内部的顾问圈排除在国王的信任之外。王家顾问是一群娴熟的、野心勃勃的人，他们通常不是英国人，尽管他们有可能被封赏英国的土地和头衔。1225年，以普遍的赠款为条件，大宪章的再一次颁发使贵族们放心了。然而，国王与权贵之间的鸿沟继续扩大。

亨利在20岁时得到教皇的成年恩准。在他长时期的统治中，几乎贯穿始终的是他要面对海峡那边基本上和他同时代的路易九世。他对法国国王所感到的敌意是他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他把自己跟路易对比对他没有好处，因为路易不仅在政治成就而且在虔诚及声望上都超过他。不过，亨利却是一个慷慨、有鉴赏力的艺术提携人，虽然他统治期间又发生过一次内战，他死去的时候，王国却比他就职之时更统一、更繁荣。

年轻的国王很快就因为他那高压政策而使贵族们疏远，他免去了他那有节制、可信赖的首席政法官休伯特·德·伯格的职务，剥夺了这个机构以前的权力。新委任的人对地方和中央的行政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政府的主要机构变成了国王的咨议会，这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团体，成员就职时都要正式宣誓。它包括封建领主和大臣，但是因为他们的职业专长以及他们与国王的亲密关系，专职行政人员有更大的影响。

亨利对于外国人明显的喜爱也激怒了他的人民。1236年，他娶了法国王后的妹妹普罗旺斯的埃莱诺为妻，她从萨瓦带来了一些亲戚。两年后，国王自己的妹妹，也叫埃莱诺，嫁了一个法国丈夫，西蒙·德·蒙特福特。当亨利把法国的新亲戚封为伯爵和委任为主教时，英国的贵族越来越发现他们被撇在一边。

在贵族们看来，1215年的成果似乎正在迅速受到侵蚀。不仅仅国王的行为变得日益专横，而且那些约翰统治时期曾经受到憎恨的外国行政人员似乎再一次

在被称为西翁法衣的豪华的长袍上装饰着一位使徒和一位圣人的形象，它是被称作“英国杰作”的刺绣风格的一个实例。这种装饰着金线和银线、点缀着宝石的华丽外套为皇帝和教皇所珍视，其价值足够在贷款时作为抵押。商人们在出口它们时要做特殊的安排，把它们藏在普通衣服的包裹里才敢在欧洲那些海盗出没的海洋上航行。



占了上风。此外，国王亨利受着教皇的支配，这也似乎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据传，他曾经说过：“我不希望也不敢在任何事情上反对教皇大人。”到 1238 年，亨利变得极不受欢迎，以至于他认为不仅要在他所有房间的窗户上装上铁条，甚至要在他在威斯敏斯特宫殿的盥洗室的出水口装上铁条来防备暗杀。

亨利在他的贵族中所引起的民族感情，甚至在他试图要收回金雀花王朝在法国的领土时也没有得到一点儿缓和。亨利的母亲嫁给了法国一位拥有普瓦图省的领主，1242 年，她怂恿亨利在普瓦图卷入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一场灾难，最终导致 1259 年巴黎条约的签订。通过这个条约，亨利用加斯科涅向他的姐夫表示敬意，并且正式放弃了所有金雀花王朝剩下的土地。

所有贵族都强烈反对亨利在法国的冒险，以及他所涉猎的其他奢华的外国事务——尤其是他接受教皇英诺森四世为他的儿子埃德蒙提供的西西里皇冠（在安茹的查理接受它之前），这件判断有所失误的事情使亨利陷入了一场昂贵而令人难堪的失败，结果使得贵族们更加憎恨教皇对国王施加的影响。亨利表示愿意让教皇在英国安置人员、从教会搜刮钱财而不考虑他们的愿望，也同样使主教们感到不安。当 1245 年教皇的一个使节来向神父征税时，英国的权贵告诉他，如果他不离开的话将被撕成碎片。

1258 年，一场危机发生了。权贵们由于憎恨宫廷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满于国家被统治的方式，愤怒于君主的疏远，拒绝给亨利为了支付他在国外的鲁莽行为所需要的钱，尤其反对亨利为了他那西西里的野心而增加的征税，以及亨利那些 1247 年从普瓦图来的（异父或异母）兄弟的冒险行为。贵族们以武力迫使国王答应在所有事务上听从他们的建议，把他置于 15 名贵族议员的制约之下。他们继续提出详细的、非常重要的改革建议，权贵们组成的委员会这时被称为议会，每年举行三次，选举贵族代表，讨论国家事务，王国的主要官员必须对这个委员会负责。在地方上，骑士们必须听取上诉，把它们呈交给贵族们委任的首席政法官。代表郡级地区的骑士——长期在地方行政中起作用的中小贵族们，被召集到一些议会上，组成了一个定期的讨论会来商谈国家事务。选举更能反映大的社会集团利益代表的做法正流行开来。

但是亨利对于强加到他身上的控制的憎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又一场冲突。在回避内战好几年之后，贵族们与国王在 1263 年达成协议，把他们的争论提交给独立的第三方裁决。他们选择了法王路易九世做他们

一个繁华时代的缩影

在英国和法国，13世纪是一个人口增长、疆域扩大的时代。为了开垦新的土地，森林被砍伐，沼泽地被排干。此外，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推广。12世纪被引进欧洲的风车，这时已变得很普遍了。富含矿物质的沉积物、泥灰等肥料也用得越来越多。

城镇由于受到农业剩余物资的供养，又得到集市和市场上的盈利而发展起来了。许多更大的城市购买自治的特许状，把它们从封建领主或教会的剥削中解放出来。

在拉特尔的赞美诗中反映了这样一个由哥特式建筑的荣耀所装饰、拥有众多的学校和大学的繁荣世界。英国生活中的花饰挤满了这本赞美诗书页的白边，该书是为英国14世纪初的一位贵族制作的。

的中间人，因为他道德正直的名声甚至使他的老对头都只好佩服他。路易自己对于王权的迷信使得他站在贵族的敌对面，他的判决把路易从贵族们施加给他的种种限制中解脱出来。贵族们——现在在西蒙·德·蒙特福特的领导下，他显得气度不凡，他的理想主义渐渐地使他远离了自私自利而又无能的国王——不能接受路易对他们整个成就的否定的判决，战争在所难免。

一开始，贵族一方取得胜利，他们在1264年刘易斯战役中俘获了国王。但是，西蒙以国王的名义组成的临时政府缺少普遍的支持，第二年进一步滋长的敌意导致国王的反对派在埃弗沙姆的最后失败，德·蒙特福特被杀并且被极其残酷地肢解。

埃弗沙姆之战的英雄当中包括亨利的儿子即继承人爱德华。和他父亲不同，爱德华是一位有勇气、能做大事的军事领袖，他热爱战争和竞技，珍惜骑士传统。这位高个、头发卷曲的年轻王子，仪表堂堂，不过有点儿口吃，左眼睑下垂。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金雀花王朝的人，他的脾气也就很变化无常——有一次他拿着剑追赶一位打猎的伙伴，因为他没有控制好猎鹰。但是，这一点被他的虔诚感和通过下棋磨练出来的机智所缓和。

埃弗沙姆之战胜利后，爱德华变成了在治理国家方面很有影响力的人物。1272年，他父亲死时他及时登上王位，称为爱德华一世。尽管改革者们失败了，爱德华还是在此后那些年里表现出对于变革的需要。在他整个统治期间，他继续并且扩大了召集议会的做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机关，议会成为爱德华制定一系列重大法令的地方，这些法令既是为那些具体的不幸事件提供补救办法，也是防止领地分封——土地通过继承被分裂成更小的封建领地——的措施，以及用来维护道路的畅通。

每一次议会的召集都有一定目的：听取请愿和上诉，同意征税，通过国王的法令。权贵和主教们以个人身份被召见，郡级骑士以及自由民有时候作为他们社

宫廷里的夫人们旅行时候所乘坐的一辆既能遮蔽风雨、又能避开路人视线的马车，大得足以装下许多仆人和叭儿狗。



区的代表被召见,后来,神父也有了说话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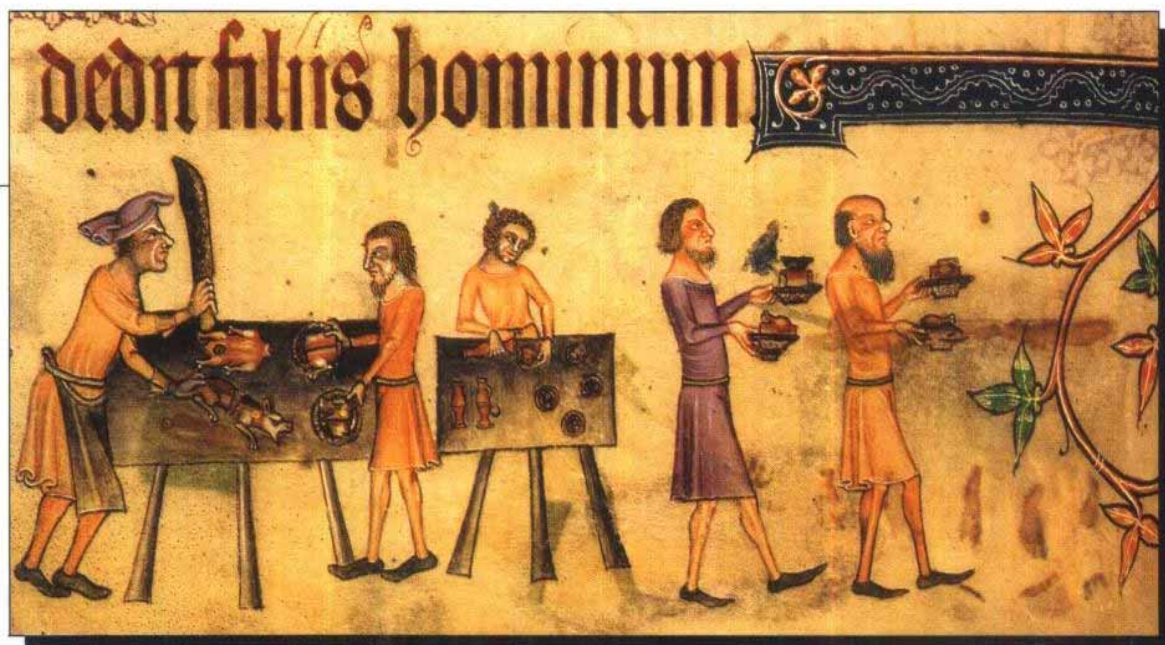
爱德华统治时期对国家的管理方式作了很多调查。第一次始于 1274 年,他派出王室委员让他们去证实谁在这个王国里行使什么权力,虽然是为了调查国王的权力是否被篡夺,结果却查出了许多滥用职权的例子,比如在林肯郡斯波丁发现一位修道院院长无理地把一个人拘留在可怕的环境里,以至于这位囚犯的双脚都烂掉了。这些丑闻接下来都由议会的法规来处理。然而更重要的是,始于 1278 年的责问某人根据什么行使职权这样的调查,目的是要建立所有司法权都由国王来控制的原则。就像在法国一样,地方权威正在稳定地变成王国的权威。

自治市和郡代表被赋予的主要任务是给国王打仗提供钱,因为战争再也不能够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封建兵役制度。后任的英国国王们试图要把他们的领土扩张到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威尔士和苏格兰都抵制英国对凯尔特人内地的实质性入侵,只在形式上承认英国国王的领主地位。威尔士的首长们尤其利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最后几年的混乱放弃效忠的誓言,起来反抗,他们的领袖是卢埃林·阿普·格拉法德,他在 1267 年与英国签订的一个条约里被称为“威尔士亲王”,这样一个称号还是第一次使用。当利沃林拒绝对爱德华表示敬意的时候,就预示了一场灾难将在威尔士爆发。

1277 年,爱德华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入侵,除了留给他一小块土地,几乎剥夺了利沃林所有的一切。首次失败后受到宽恕的亲王子 1282 年又一次发动反叛,因为他憎恨英国人势力在这个公国里蔓延。这一次,爱德华决定不留情面,展示了英国国家权力新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的一面。到 1284 年,他已经永远地剥夺了威尔士人的反抗能力,把这块土地——由一系列新建的城镇和城堡控制的——并入了英国。

爱德华的军队现在被大队的威尔士弓箭手加强了,他把目光移到了苏格兰。苏格兰传统上与法国有着联系,是一个有潜在危险的邻居。在 13 世纪的大部

仆人们为他们的主人准备宴会,主人们丰盛的食物由于增加了东方的香料而变得更美味可口。



分时间里，英国在那里的影响一直很小。苏格兰连续几任国王都与英国公主结婚，以示同盟。但是，1286年亚历山大三世的死亡，以及接下来他唯一的继承人，一个6岁小女孩的死亡，为爱德华的行动打开了口子。1296年至1306年间，他派了8支军队入侵苏格兰，然而，他委托负责军队的英国指挥官的苛刻，引起了坚强不屈的苏格兰人的猛烈反抗。1306年，由苏格兰有才干的贵族罗伯特·布鲁斯领导的最后一次起义成了爱德华的末日。已经67岁且病入膏肓的国王把自己拖向北方来应付这件事，不幸于1307年7月死在路上。他的儿子即继承人爱德华二世缺乏和布鲁斯富有机智的领导作战的性格，他那畏畏缩缩的努力于1314年在班诺克伯恩遭到致命的阻击，结果布鲁斯成为独立的苏格兰国王，统治着不列颠的北部。

使凯尔特人屈服于国王的领土野心的连年战争以及为了保护国王在加斯科涅的权力而对法国的远征，破坏了国王与他的臣民们普遍的和谐关系，这样的战争事实上对封臣们没有利益可言，不能拿来作为要求他们忠诚、支持的理由。而且，这些战争也不能够在封建习俗所规定的40天的服役期内结束，支付军事服役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支付给贵族和骑士让他们在规定的服役期满后仍然留在战场上，还是支付给外国雇佣军。由此而导致的增加收入的需要，引发了1297年的冲突。爱德华被迫又一次颁布大宪章来平息人民的愤怒，这一次又增加了一条，规定如果“没有整个王国全体的同意，不是为了全民族的共同利益”，就不可以在传统的封建征税之外再收税。国王后来违背了这个条约，争取了教皇特许他取消诺言。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建立了一个供后代仿效的先例。

英国和法国的君主统治由此进入后封建时代的这一个世纪，是经济力量继续发展和扩张的世纪。两个国家的人口都在增长，边远的土地也被开垦来供养不断增多的人口。日益丰富的农业剩余物资鼓励了城市中心的发展，新的城镇产生了，城镇扩大为城市。货币的流通量也在增长，对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群英国村民在轮流练习射箭。



在下一个世纪里，欧洲人口的增长将会带来食物缺乏、城市动荡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但是在目前，法国和英国都是在相对繁荣的背景下，民族精神得到了发展。

民族君主制包含很多不同的意思，每一个国家都想要在他自己的领土里取得高于教会的权力，偶尔引起与教皇的冲突。在英吉利海峡的两岸，政府活动的规模都急剧地扩大了，不仅有更多的官员在工作，而且还有新的努力——在法国是通过“调查员”，在英国是通过爱德华的行政调查——来对他们的活动进行某种控制。对于强调公民责任和国家好处的罗马法的研究，在两个国家都得到了普及，它的概念慢慢开始取代旧的、封建的有关个人义务的观点。

两个国家都设法成功地把他们所控制的领土巩固成更实用的地理整体。的确，亨利没有能够收复英国在法国的领土，最终产生了一个更便于管理、更一致的王国。此外，英国对威尔士的征服以及法国对朗格多克的合并，都帮助产生了这样的国家，与1200年古怪的封建格局相比，它们跟现在称作法国和英国的国家要相似得多。然而，加斯科涅仍然保留在英国国王手里，这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断造成麻烦。在下一个世纪里，它将把两个国家抛入可怕的百年战争之中。

但是，正在形成的这两个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区别，最主要的是其统治者本性的区别。在法国，一个独裁的君主通过庞大的王家行政人员团体来统治，他的行动很少因为需要与地方权力机构商谈而受阻；而在英国，国王受自己臣民的约束，从大宪章发展而来的反对的传统，在这个世纪期间定期出现，人们要求国王更广泛地听取意见。到1300年，两个国家未来的立宪政治的种子就已经种下，并开始发芽。

一艘战舰正破浪前进，战舰上有一塔楼，犹如海上堡垒一般。



一个征服者的城堡



在欧洲,13世纪是一个建造城堡的伟大时代,尤其是在被争夺的土地上,那里的城堡和住在里面的士兵可以把一个统治者的意志强加给方圆许多公里范围内顽强反抗的臣民们。这种征服的策略从来没有人像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在征服威尔士时用得那么彻底。

在诺曼征服者于11、12世纪把他们的统治强加给南威尔士很长时间之后,北部的格温内斯郡倔强地保持着独立,通过语言、文化和可怕的斯诺登山脉和英国隔离开来。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由于不能用武力征服他们,以宣誓效忠为条件,承认最强大的卢埃林·阿普·格拉法德为威尔士亲王。但是,利沃林拒不表示效忠英王,亨利的继位者爱德华决心征服他那难对付的封臣,把他的至高权威加到所有威尔士人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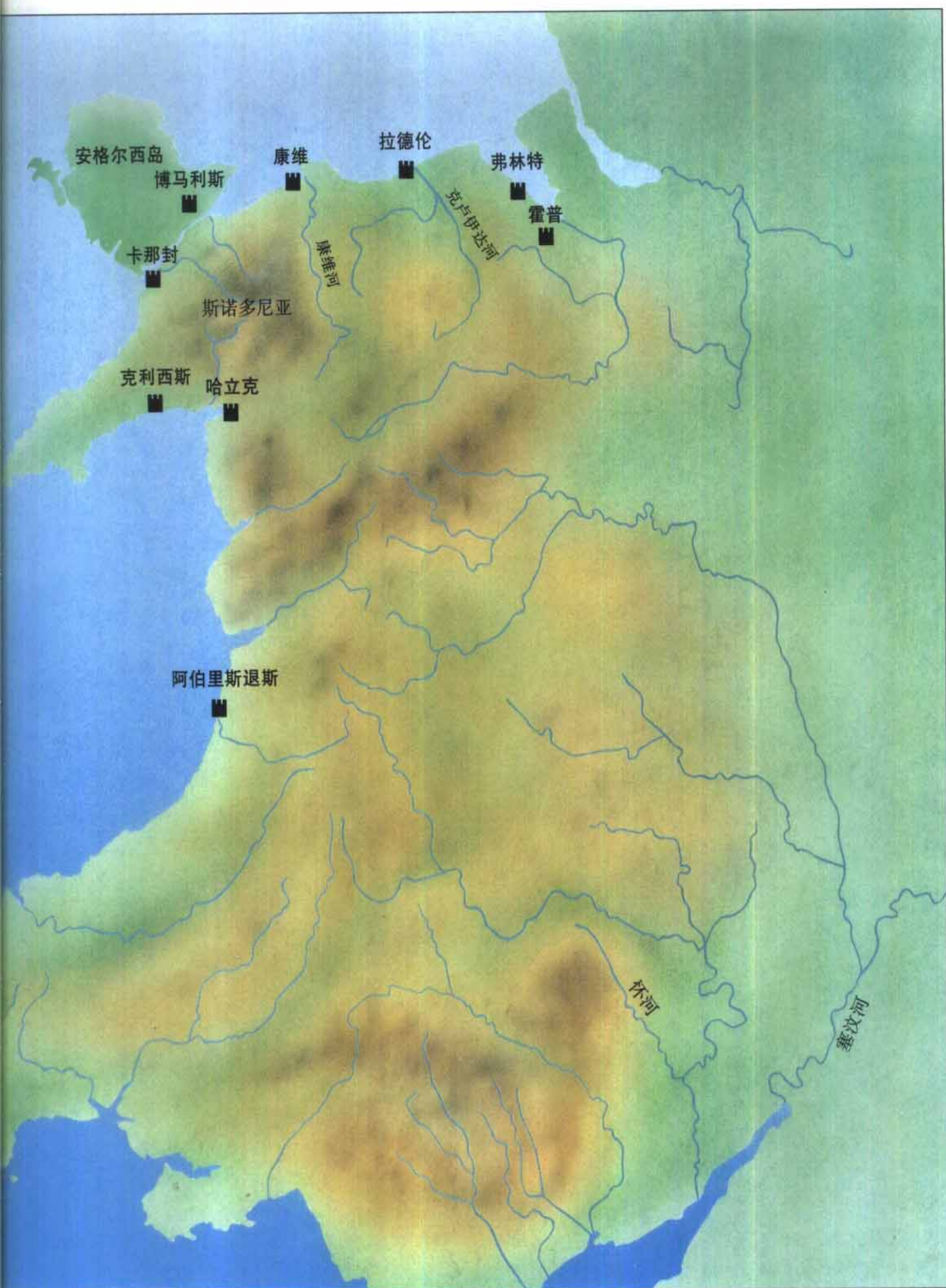
1277年,爱德华一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征服战,强行通过了利沃林的领土,攻下了西北部的安格尔西岛,这个岛上重要的

谷地使得叛军能够在以前的围攻中躲在他们的山区堡垒里挺过来。双方签订了休战协议,但是1282年又一次爆发了反叛,结果是利沃林彻底被打败,他本人被杀死,接着威尔士独立的最后希望也破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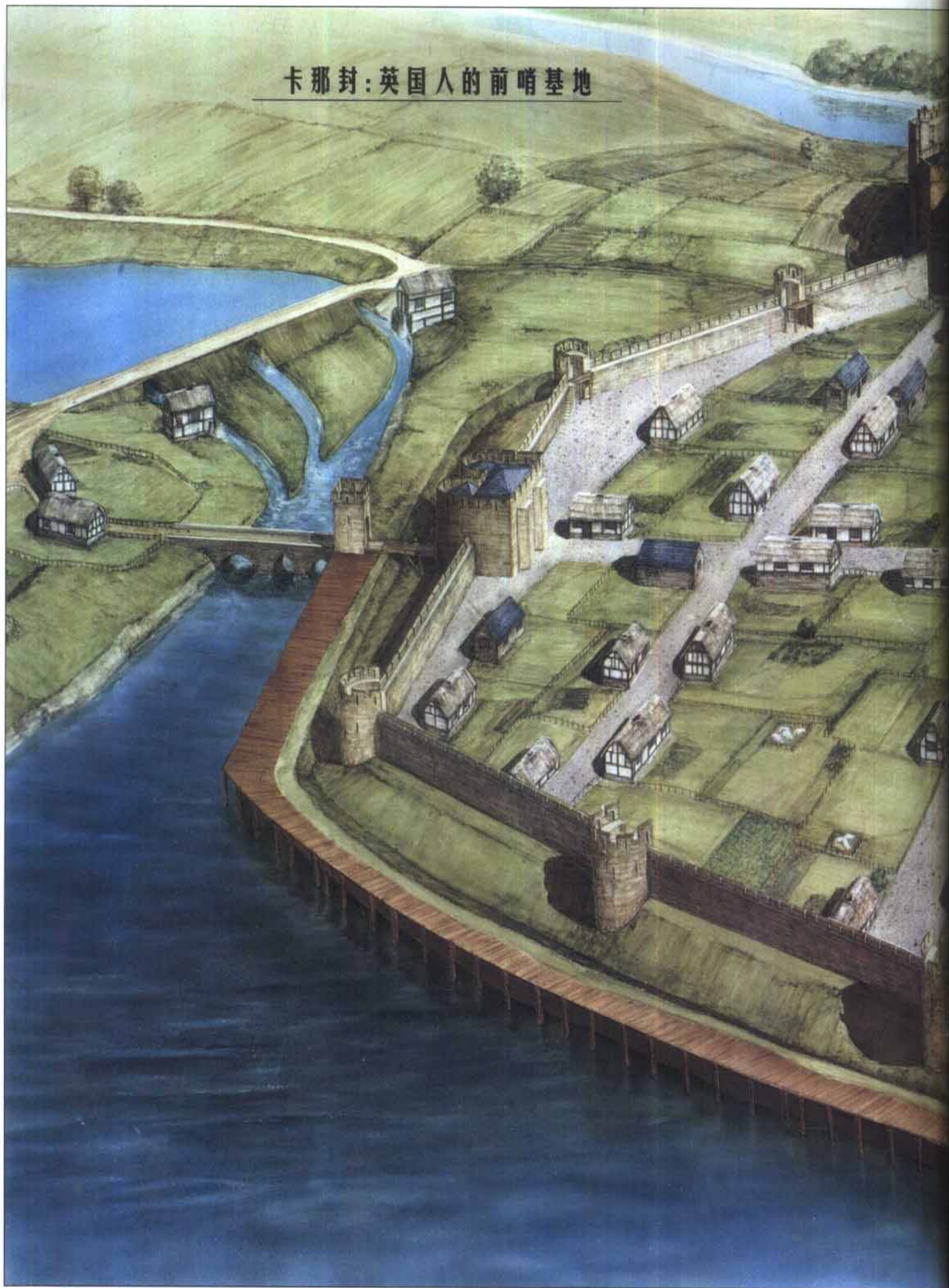
威尔士以前的独立地区都被变成了殖民地,由伦敦来控制。英国法被引进,由英国来征税,威尔士的军队被编入英国军队。

1294年的一次反叛也失败了。7年后,爱德华把他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封为威尔士亲王,巩固了他的征服成果。

到1300年,爱德华已经通过右边地图上所示的靠近海岸的一系列城堡征服了斯诺多尼亚广袤的地区,这些城堡是:霍普、弗林特、拉德伦、康维、博马利斯、卡那封、克利西斯、哈利克和在南边的阿伯里斯退斯。在每一个城堡的墙下,他建造了新的城镇,鼓励英国移民们通过受赠的土地和其他特权在那里定居。爱德华已有了在加斯科涅依附城堡建造城镇的经验,他在威尔士建造的城市和堡垒成了军事、经济和社会征服的重要标志。这些城镇通过坚固的墙与城堡相连,为居民们提供了安全的居住地,使他们能与当地人进行所喜欢的贸易往来。



卡那封：英国人的前哨基地





位于战略要地莫奈海峡的卡那封城防，是爱德华用来抵抗攻击的城堡链中最强有力的一个。它那砂岩镶边的墙壁和多角塔是仿照君士坦丁堡建造的，建于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到这时依然以拥有世界上最坚固的壁垒而著名。

以这个城堡为依托的小城也有坚实的城墙作保护，墙长734米，城墙里面，用圆石铺成的街道像格子一样把整个地方划分成18x24平方米的等块小区。这些“租用地”被赠给英国定居者，鼓励他们在这里修建房屋，耕种周围的乡村土地，在新建的市场和港湾四周租赁摊棚。小城有自己的市政和法庭，在其管辖下，移入该地的制革工人、皮匠和羊毛商人的贸易相当兴旺。

防御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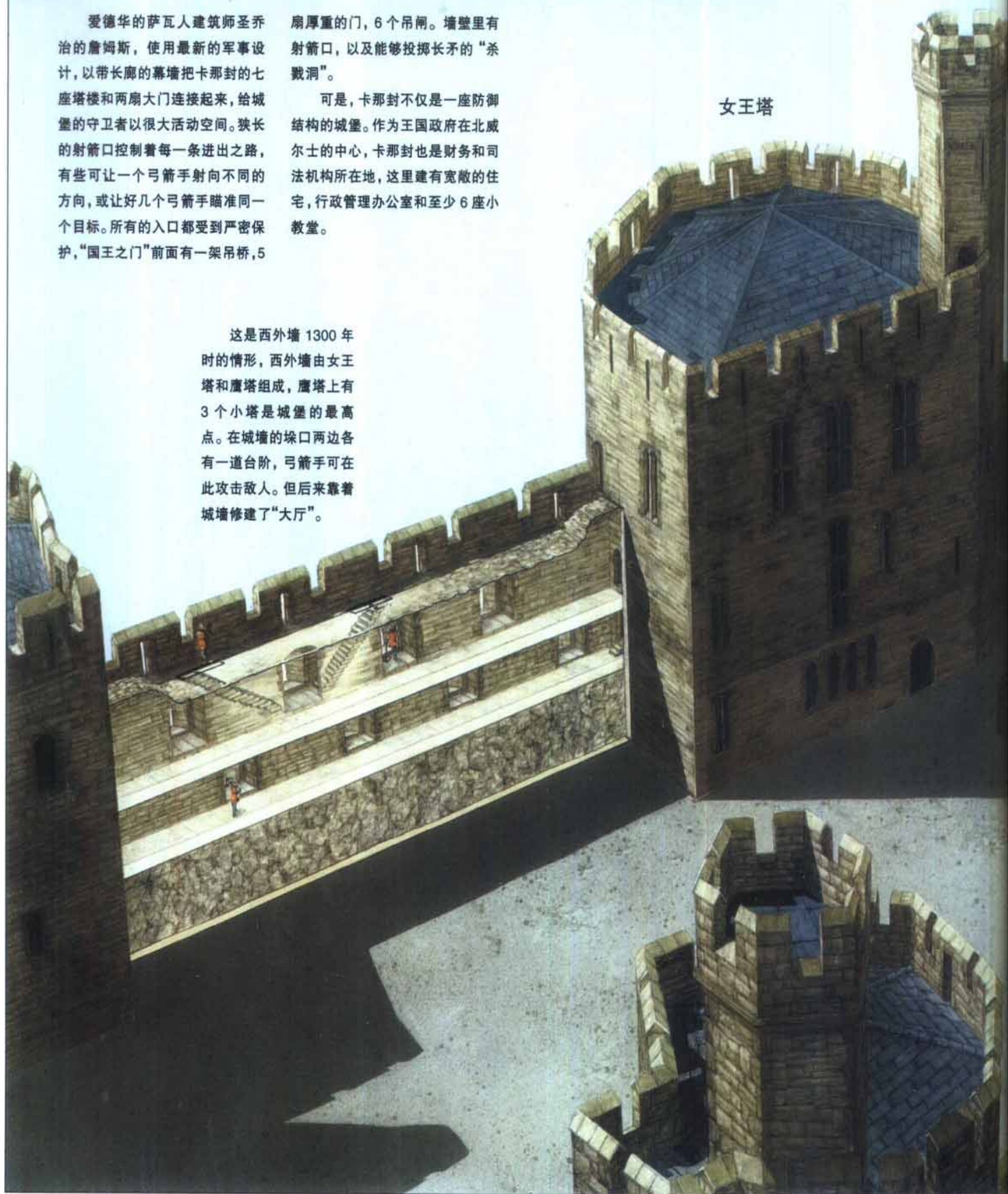
爱德华的萨瓦人建筑师圣乔治的詹姆斯，使用最新的军事设计，以带长廊的幕墙把卡那封的七座塔楼和两扇大门连接起来，给城堡的守卫者以很大活动空间。狭长的射箭口控制着每一条进出之路，有些可让一个弓箭手射向不同的方向，或让好几个弓箭手瞄准同一个目标。所有的入口都受到严密保护，“国王之门”前面有一架吊桥，5

扇厚重的门，6个吊闸。墙壁里有射箭口，以及能够投掷长矛的“杀戳洞”。

可是，卡那封不仅是一座防御结构的城堡。作为王国政府在北威尔士的中心，卡那封也是财务和司法机构所在地，这里建有宽敞的住宅，行政管理办公室和至少6座小教堂。

女王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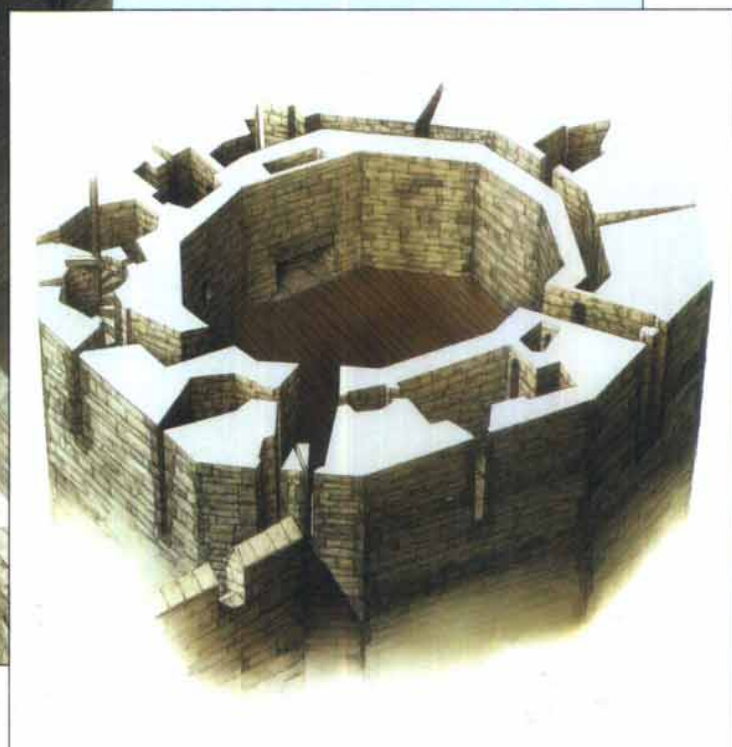
这是西外墙 1300 年时的情形，西外墙由女王塔和鹰塔组成，鹰塔上有 3 个小塔是城堡的最高点。在城墙的垛口两边各有一道台阶，弓箭手可在此攻击敌人。但后来靠着城墙修建了“大厅”。





鹰塔

这是鹰塔二楼的一个横截面图,可以看到城堡的主要房间和结构复杂的厚度达 4.5 米的墙。墙壁内部的许多小室和通道使墙呈蜂窝状。塔楼的楼梯设置在厚厚的墙壁里,墙壁里面甚至还嵌有一个私人小教堂。



公元 1200 年 - 1210 年	1210 年 - 1220 年	公元 1220 年 - 1230 年	公元 1230 年 - 1240 年	公元 1240 年 - 1250 年
英国国王约翰把强堡输给法国人 (1204); 法国人在一年内收回了英国占据的卢瓦河以北的所有法国本土的土地。 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阿尔比十字军攻打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的卡特里派教徒 (1208)。	法国腓力二世在布汶决定性地打败英国国王约翰纠集的盟军 (1214)。 英国贵族强迫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个权力宪章, 及“大宪章” (1215)。	腓特烈二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220)。 路易九世登上法国王位 (1226)。	腓特烈二世在科特诺瓦打败伦巴第联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联盟 (1237)。	教皇英诺森四世正式罢免腓特烈二世的神圣罗马帝国帝位 (1245)。

西欧

里加的阿尔贝特主教建立军事骑士团“剑兄弟会” (1202)。 阿尔贝特主教的军队征服利沃尼亚人和列托人, 向爱沙尼亚进军 (1208)。	基督徒军队摧毁了爱沙尼亚要塞费林 (1211)。	剑兄弟会在丹麦军队支援下征服爱沙尼亚 (1224)。 教皇把芬兰至于使徒的保护之下, 开始了对诺夫哥罗德的贸易禁运 (1229)。	条顿骑士团征服异教徒普鲁士人 (1230)。 剑兄弟会在沙勒几乎被立陶宛人歼灭 (1236)。 条顿骑士团兼并剑兄弟会的领地 (1237)。	诺夫哥罗德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涅瓦河北岸打败瑞典人 (1240)。 蒙古人在波兰利格尼茨打败基督徒军队, 接着进攻匈牙利人, 但因其大汗之死而撤军 (1241)。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佩普西湖打败条顿骑士团 (1242)。
--	---------------------------------	---	---	---

波罗地海

北条家族从镰仓取得控制权有效管理着日本 (1203)。 铁木真统一蒙古, 称成吉思汗 (1206)。 蒙古侵入中国北部 (1207)。	蒙古攻取金国都城中都 (1215)。 日本权力从将军或军事将领手里转入摄政王手中 (1219)。	在鸟羽战争中, 镰仓军事政权打败了反对其统治的京都皇家军队的反抗 (1221)。 成吉思汗征讨唐古特时死去 (1227), 其子窝阔台继位 (1229)。	日本军事统治者制订新法典《贞永式目》 (1232)。 蒙古灭中国北部的金国 (1234)。
--	--	---	---

中亚和远东

		蒙古人击溃伊朗花拉子模帝国 (1221)。 腓特烈二世在十字军第六次东征时通过外交手段取得耶路撒冷的统治权 (1229)。	蒙古人击败罗姆塞尔柱人 (1242)。 在第七次东征时, 法王路易九世攻占了达米埃塔, 后被俘 (1249)。
--	--	---	---

非洲和中东

--	--	--	--

大事年表

公元 1200 年 - 1300 年

公元 1250 年 - 1260 年	1260 年 - 1270 年	公元 1270 年 - 1280 年	公元 1290 年 - 1300 年	公元 1740 年 - 1750 年
--------------------	-----------------	--------------------	--------------------	--------------------

腓特烈二世去世(1250)。 英国的亨利三世根据牛津 条款建立一个贵族委员 会,授予他们否决他的行 动的权力(1258)。 巴黎条约正式承认路易对 法国北部的统治(1259)。	爱德华王子在埃弗沙姆打败 叛乱的英国贵族(1265)。 安茹的查理接受西西里王位 (1268)。	爱德华一世登上英国王位,开始 一系列行政改革(1272)。	“西西里晚祷”叛乱,赶走了安 茹的查里,把西西里王冠送给 阿拉贡的彼得三世(1282)。 英国爱德华一世完成对威尔士 的征服(1284)。	爱德华一世入侵苏格兰 (1296)。 法王路易九世被封为圣徒 (1297)。
---	---	--	--	---

萨摩吉提亚人在德本打败 条顿骑士团,在当地引发了 一场反抗基督教在南波罗 的海地区的统治的起义 (1260)。	波罗的海南部落终于被条 顿骑士团征服(1290)。 瑞典人在与罗斯人争夺的卡 累利阿地区建立战略性的维 堡要塞(1292)。
--	---

蒙古进攻中国南宋(1253)。	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击败兄弟 成为大汗(1264)。	在中国,忽必烈汗登基,成为元朝 第一个皇帝(1271)。 蒙古首次侵略日本,以进攻部队 撤退而告终(1274)。 蒙古完成对宋的征服(1279)。	因为一场叫“神风”的台风 的袭击,蒙古第二次侵日 失败(1281)。	忽必烈汗死去(1294)。
------------------------	--------------------------------------	--	---	----------------------

马穆鲁克取代阿尤布王朝开 始对埃及的统治(1250)。 蒙古人俘虏了阿拉穆特,击 败穆斯林刺杀团(1257)。 蒙古人攻占巴格达,杀死阿 拔斯哈里发(1258)。	蒙哥大汗死后马穆鲁克在阿 因扎鲁特击败蒙古人 (1260)。 马穆鲁克苏丹在开罗另立哈 里发(1261)。 马穆鲁克从十字军手中夺回 安条克(1268)。	在十字军第八次(最后一次)东 征中,路易九世死于奥尼斯 (1270)。 马穆鲁克在小亚细亚击退蒙古 人,暂时占领凯撒里亚(1277)。 马穆鲁克苏丹夸拉温上台 (1279)。	夸拉温在霍姆斯击败蒙古人 (1281)。	马穆鲁克攻占十字军在巴勒斯 坦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 (1291)。
--	--	--	---------------------------------	---

索引

A

Abbasid 阿拔斯(伊拉克王朝), 59, 67
Acre 阿克(叙利亚城市), 65, 69, 76, 77, 80, 118, 126, 128
Adelbert 阿德尔伯特(基督教圣徒), 112
Administration 行政管理: 金雀花王朝, 153-154; 中国, 27; 英国, 153-154, 155, 156, 157, 158-159, 161; 法国, 148, 149, 151, 159, 161; 日本, 35-36, 42, 44, 48, 57; 马穆鲁克, 70, 75; 蒙古, 13, 28, 29; 普鲁士, 126; 西西里, 94-95, 101-102; 条顿骑士团, 126
Afghanistan 阿富汗, 18, 85
Agriculture 农业: 中国, 27, 英国, 158, 160; 法国, 158, 160; 日本, 35
Ahmad 艾哈迈德(伊儿汗国苏丹), 29
Aiguas - Mores 艾格-莫特(罗纳河港口), 151
al - Kamil 阿尔-卡米尔, 酋长, (埃及苏丹), 99-100
al - Nasir Muhammad 艾尔纳苏尔·穆罕默德(马穆鲁克苏丹), 80
al - Salih Ayyub 阿尔-萨利赫·阿尤布(埃及苏丹), 60, 61, 64, 70, 73
Albert of Buxtehude 阿尔伯特·伯格斯胡德的(利沃尼亚主教), 112-113, 116-117, 120
Aleppo 阿勒颇(叙利亚城市), 59, 61, 65, 67, 71
Alexander III 亚历山大三世(苏格兰国王), 160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埃及港口), 59, 75
Amida Buddha 阿弥陀佛, 51, 119. 参见佛教
Amiens Cathedral 亚眠大教堂, 130
Andrew II 安德烈二世(匈牙利国王), 119
Angvin Empire 金雀花王朝, 140-141, 153-155, 157, 158; 行政管理, 153-154
Anjou 安茹, 140-141
Antioch 安条克, 60, 69, 73
Antoku 安德(日本天皇), 33, 35, 39
Apulia 阿普利亚(意大利地区), 92, 93, 94, 95, 100, 102, 104, 105, 107
Aqay 阿克泰(马穆鲁克指挥官), 61, 64
Aquitaine 阿奎坦, 140, 141, 155
Architecture 建筑, 参见艺术与建筑
Arik - Buge 阿里不哥(成吉思汗), 24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81, 97, 101, 149, 155
Armenia 亚美尼亚, 20, 74, 76
Armour and Weapons 盔甲与武器: 中国, 14, 17, 19; 德国, 88; 日本, 42, 43, 46-47; 蒙古, 8, 14, 16-17, 29, 55, 56-57, 59
Art and Architecture 艺术与建筑: 英国, 129, 132, 136; 法国, 129, 130-137, 146-147; 德国, 129, 134; 哥特式, 129-137; 日本, 49, 52-53; 马穆鲁克, 76
Ashikaga 足利(日本部族), 57
Assassins 刺杀团(穆斯林派别), 24, 60, 68, 69
Austria 奥地利, 24
Awa 安房(源氏城堡), 38
Aybak 爱巴克(埃及苏丹), 64
Ayn Jalut 阿因扎鲁特(1260年战役), 24, 59, 60, 65
Ayyubids 阿尤布(埃及统治者), 59, 60, 61, 64, 65, 68, 75

B

Bacon 培根, R(英国科学家), 155
Baghdad 巴格达, 9, 19, 24, 31, 60, 65, 67
Bahris 巴赫里(马穆鲁克士兵), 60, 61, 64, 65, 66
Bakufu 幕府(日本政府), 42, 44, 45, 48, 50, 54, 55, 56, 57
Baldwin of Alna 阿尔纳的鲍德温(教皇使者), 117
Baltic 波罗的海, 109-128, 地图 110; 商业, 110-111, 123, 126; 民族, 110, 111; 宗教, 110
Bamberg Cathedral 班堡大教堂, 152
Bannockburn 班诺克本(1314年战役), 160
Batu 拔都(成吉思汗的孙子), 20, 21, 24, 121-122
Baybars 拜巴尔(马穆鲁克苏丹), 61, 62, 64-69, 70, 73, 76
Beauvais Cathedral 博韦大教堂, 130
Bedford 贝德福德(英国城市), 155
Bedouins 贝都因, 64, 65, 75
Beijing 北京, 9, 54
Benevento 本尼凡托(意大利城市), 107
Berke Khan 伯克汗(蒙古领袖), 69
Berthold 贝特霍尔德(利沃尼亚主教), 109
Bestiaire 动物寓言集, 149
Bethlehem 伯利恒, 99
Black Sea 黑海, 74, 116
Blanche of Castile 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奇(法国摄政王), 139, 148
Bohemia 波希米亚, 90, 136
Bojigin 勃儿只斤(蒙古部族), 11
Bologna 博洛尼亚, 81, 84, 101, 105, 107
Boniface VIII 卜尼法斯八世(教皇), 127
Bones 布尔帖(成吉思汗之妻), 12
Bourges Cathedral 布尔日大教堂, 130, 133
Bremen 布汶(1214年战役), 141, 144, 145, 152, 154
Bouvines 不来梅, 109, 111
Brescia 布雷西亚, 103
Brittany 布列塔尼, 141, 151, 153
Bruce 布鲁斯, R(苏格兰国王), 160
Bruges 布鲁日, 152
Buddhism 佛教, 31, 33, 36-37, 50-51, 52-53, 118-119
Bukhara 布哈拉(亚洲城市), 9, 18
Bulgaria 保加利亚, 9
Bulgars 保加利亚人, 20
Burg 伯格, 休伯特·德(英国首席法官), 156
Burgundy 勃艮第, 90, 105, 151
Burja 伯吉斯(马穆鲁克军队), 74
Burma 缅甸, 28, 31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地图 60, 63, 69, 100, 146, 165. 参见君士坦丁堡

C

Caernarfon 卡那封(威尔士城堡), 162, 164-167
Caesarea 凯撒里亚(小亚细亚城市), 69
Cairo 开罗, 31, 59, 60, 62, 64-67, 69, 74-77; (医院), 78-79; 大门, 65
Canterbury Cathedral 坎特伯雷大教堂, 136

Capetian Dynasty 卡佩王朝, 139, 145, 154
Castel del Monte 戴尔蒙特城堡(阿普利亚城堡), 104
Castle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王国), 118, 120
Castles 城堡, 162, 164-167. 参见各个城堡的名字
Cathars 卡特里派(基督教派别), 94, 118, 145
Cathedrals 大教堂, 129-137
Ceylon 锡兰, 31, 76
Chagatai 察合台(成吉思汗之子), 14, 18, 24
Chagatai 察合台(蒙古可汗统治地), 地图 10, 24, 25, 29
Champagne 香槟(法国地区), 151
Charlemagne 查理曼(查理大帝), 89, 98
Charles of Anjou 查理·安茹的, 107, 151, 157
Chateau Gaillard 强堡, 141, 142-143
China 中国, 9, 地图 10, 11, 14, 18, 20, 22, 24, 25-28, 29, 31, 36, 52, 55, 76; 行政管理, 27; 农业, 27; 盔甲与武器, 14, 17, 19; 文明, 27, 48; 商业, 27, 31, 49, 54; 戏剧, 27; 大运河, 27; 长城, 10-11, 15; 语言, 28, 49
Chingis Khan 成吉思汗, 9, 10, 11-20, 21, 24, 25, 27, 28, 31, 34, 64, 69, 104
Christburg 克里斯堡条约(1249年), 122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普鲁士主教), 112
Civildale Statute 锡维代尔条约, 102
Clement V 克雷芒五世(教皇), 127
Commerce 商业: 波罗的海, 110-111, 123, 126; 中国, 27, 31, 49, 54; 日本, 49; 西西里, 95; 条顿骑士团, 126
Confucianism 儒学, 36
Conrad 康拉德(腓特烈三世的儿子), 102, 105, 107
Conrad 康拉德(条顿骑士团), 104
Conrad of Mazovia 康拉德, 马佐维亚的(波兰公爵), 119, 120, 123
Conradin 康拉丁(腓特烈二世的孙子), 107
Constance 康斯坦斯(亨利六世之妻), 91-92
Constance of Aragon 康斯坦斯·阿拉贡的(腓特烈二世之妻), 103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111, 165. 参见拜占庭帝国
Cortenuova 考特诺瓦(1237年战役), 102-103
Courtrai 库尔特莱(1302年战役), 152
Cremona 克雷莫纳会议, 96
Crimea 克里米亚, 20, 29, 61, 76
Crusaders 十字军勇士, 59-61, 63, 65-66, 68-69, 71-72, 74, 76, 77, 80, 98, 143, 150. 参见剑兄弟会、条顿骑士团
Cusades 十字军东征, 151, 155; 波罗的海, 109-128; 腓特烈二世的, 93, 94, 96, 98-99; 路易九世的, 148-149; 西班牙人的, 120
Cumans 库曼人(亚洲部族), 20, 119
Carnaria 库洛尼亚(波罗的海地区), 123
Cyprus 塞浦路斯, 99

D

Dadu 大都(中国元朝京城), 27, 28, 31
Damascus 大马士革(叙利亚城市), 59, 60, 62, 65, 67, 69, 70, 74, 75; 哥里医院, 73, 78
Danes 达米塔(埃及港口), 148
Danea 丹麦人, 117, 118, 121, 122, 136
Dammoura 关门海峡, 33, 34, 36, 39

Danzig 但泽(波兰城市), 109, 127
della Vigna 戴拉·维尼阿·皮埃特罗(腓特烈二世的顾问), 95, 101, 105
Dobryni 多布林金骑士团, 120, 121
Dominic 多明我(基督教圣徒), 118
Dominican Frairs 多明我会修士, 81, 118, 120
Durben 德本(1260年战役), 123
Duna 德维纳河, 109, 110, 113, 116, 126

E

Edmund 埃德蒙(亨利三世的儿子), 157
Edward 爱德华(英国王子), 69
Edward I 爱德华一世(英国国王), 152, 158-160, 161, 162, 165, 166
Edward II 爱德华二世(英国国王), 160
Egypt 埃及, 10, 24, 29, 58-80, 148, 150; 食物与饮料, 58, 59; 文学, 77; 金属制品, 66-68; 参见马穆鲁克
Eleanor of Aquitaine 埃莱诺·阿奎坦的(亨利二世之妻), 139
Eleanor of Provence 埃莱诺·普罗旺斯的(亨利二世之妻), 156
England 英国, 9, 107, 139-145, 地图 140, 14, 152-161; 行政管理, 153-154, 155, 156, 157, 158-159, 161; 农业, 158, 160; 艺术与建筑, 129, 132, 136; 刺绣, 157; 封建主义, 139-140, 153, 160; 立法, 155, 158; 税收, 154, 155, 159; 科学, 155; 城市化, 158, 160. 参见各城市的名字
Enno 恩佐(腓特烈二世的儿子), 105, 107
Estonia 爱沙尼亚, 9, 109, 110, 113, 116-117, 11, 121, 125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24, 47
Evesham 埃弗沙姆(1265年战役), 158

F

Falconry 狩猎训练, 95, 97, 97-101
Fatimids 法蒂玛(埃及统治者), 59, 60, 67
Fallin 费林(爱沙尼亚城堡), 116, 117
Ferdinand II 斐迪南二世(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的国王), 120
Ferrand 费朗(佛兰德伯爵), 141, 144
Feudalism 封建主义, 139-140, 153, 160
Finland 芬兰, 31, 109, 111, 112; 芬兰湾, 110, 116
Flanders 佛兰德, 141, 151, 152, 155; 佛兰芒骑士, 144
Fleur-de-Lys 盾形徽章(徽章设计), 71, 73
Fuggia 福贾(腓特烈二世的宫廷), 95, 105
Fulkwin 弗克温(剑兄弟会), 118
Food and Drink 食物与饮料: 埃及, 58, 59; 蒙古, 11, 12, 24, 30. 参见马乳酒
France 法国, 9, 31, 93, 107, 139, 152, 地图 140, 154, 157, 159, 160, 161; 行政管理, 148, 149, 151, 159, 16; 农业, 158, 160; 艺术与建筑, 129-133, 136-137, 146-147; 封建主义, 139-140; 税收, 15, 152; 城市化, 158, 160. 参见各城市地区名字
Francis 方济各(基督教圣徒), 118
Franciscan Frairs 方济各会修士, 81, 118
Frankfurt 法兰克福, 91, 93
Frederick Barbarossa 腓特烈, 红胡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88, 91, 93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9, 89 - 107, 120; 蜜蜂, 95, 97 - 99; 法规, 100 - 102; 语言学技巧, 95, 96; 科学兴趣 89, 95, 96, 97

C

Gaconomy 巴斯科姆, 140, 141, 151, 152, 157, 160, 161, 162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见成吉思汗
Genoese 热那亚人, 31, 69, 76, 103, 104
George IV 乔治四世 (北美尼亚国王), 20
Germany 德国, 9, 90 - 96, 100, 102 - 105, 107, 109, 113, 114, 116 - 122, 126, 141, 144, 151; 盔甲与武器, 88; 艺术与建筑, 129, 134 - 135; 在普鲁士的定居者, 123; 参见神圣罗马帝国, 和各城市地区名字
Ghazan 合汗 (伊尔汗苏丹), 29
Ghibellines 吉伯林派, 91, 107
Gniezno Cathedral 格涅兹诺大教堂, 112
Go - Shirakawa 后白河 (日本天皇), 39, 42, 51
Go - Toba 后白河 (日本天皇), 44, 45
Gobi Desert 戈壁沙漠, 10, 11, 14, 31
Golden Horde 金帐汗国 (蒙古可汗统治地), 地图 10, 24, 25, 29, 69
Gotland 哥德兰岛, 109, 114
Government 政府, 参见行政管理
Great Canal 大运河 (中国), 27
Great Wall of China 长城, 中国, 10 - 11, 15
Greek fire 希腊圣火, 63, 77
Green Man 绿色人 (异教图像), 152 - 153
Gregory IX 格列高利九世 (教皇), 84, 94, 99 - 105
Guelphs 归尔甫派 (教皇派), 91, 107
Guruk 贵由 (成吉思汗孙), 20
Gwynedd 格温内斯 (威尔士地区), 162

H

Hakata Bay 博多湾 (日本), 54
Hangzhou 杭州 (中国城市), 27
Hansa League 商业行会, 114
Hapsburg 哈布斯堡 (德国家族), 107
Hauteville 蒙特维尔 (诺曼家族), 69, 91; 罗杰, 90; 罗杰二世, 90 - 91
Henry 亨利 (西里西亚公爵), 122
Henry II 亨利二世 (英国国王), 139, 140, 148, 153 - 154
Henry III 亨利三世 (英国国王), 139, 148, 151, 152, 156 - 158, 159, 161, 162
Henry VI 亨利六世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91, 92, 94
Henry of Livonia 亨利, 利沃尼亚的 (利沃尼亚的牧师), 117
Heraldry 徽章学, 71 - 73
Herman Balke 赫尔曼·巴尔克 (条顿骑士团), 120, 121
Herman of Salza 赫尔曼·沙尔沙的 (条顿骑士团), 118
Hohenstaufen 霍亨斯陶芬王室 (德国王朝), 89 - 94, 105, 107, 151
44, 45, 49, 50, 54, 57
Hojo family 北条家族 (日本摄政), 44, 45, 49, 50, 54, 57
Hojo Sanetoki 北条实时 (日本摄政), 48
Hojo Tokimasa 北条时成 (日本军阀), 37, 42, 44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9, 89,

地图 90, 107, 119; 王权, 95。参见腓特烈二世, 德国, 意大利, 西西里
Homs 霍姆斯 (叙利亚城市), 74, 76
Hornecourt 奥诺古尔, 维拉尔·德 (法国建筑师), 146 - 147
Honorius III 霍诺里乌斯三世 (教皇), 93 - 94, 96, 98
Honslū 本州, 33, 地图 34, 35, 36
Horsemanship 骑马术; 马穆鲁克, 62 - 63; 蒙古, 8, 11, 21 - 23, 25
Hospitaliers 医院骑士团 (十字军骑士团), 116
Hospitals 医院; 马穆鲁克, 78 - 79
Hungary 匈牙利, 9, 18, 20, 21, 25, 103, 104, 119, 120, 121, 123, 146
Hunting 狩猎; 马穆鲁克, 62 - 63; 蒙古, 14, 21, 26, 27

I

ile - de - France 法兰西岛, 140
Ilkhanate of Persia 波斯伊儿汗国, 地图 10, 24, 25, 29, 64, 65, 69, 70, 74
Illumination 插图 (手稿上的), 83 - 87
India 印度, 18, 31, 36, 76, 80, 118
Innocent III 英诺森三世 (教皇), 92 - 93, 113
Innocent IV 英诺森四世 (教皇), 105, 107, 122, 157
Iraq 伊拉克, 9, 20, 24, 59, 66, 67, 76
Ireland 爱尔兰, 141, 153
Ishibashi Mountain 石桥山 (1180 年战役), 138
Islam 伊斯兰教, 29, 31, 59, 60, 65, 68, 71 - 72, 75, 76, 77, 90, 91, 94, 96, 118, 120; 参见伊斯兰教, 什叶派穆斯林, 苏菲, 逊尼派穆斯林
Italy 意大利, 9, 31, 76, 90 - 96, 98 - 105, 107, 118, 119, 148, 151; 参见神圣罗马帝国, 西西里, 和各城市及地区名字
Ivo of Narbonne 伊沃·那旁的 (修士), 25
Izu 伊豆 (日本省), 37, 46

J

Jainism 耆那教, 118, 119
James I 詹姆斯一世 (阿拉贡王), 120
James of St. George 圣乔治的詹姆斯 (建筑), 166
Jamuka 扎木合 (蒙古头领), 12
Japan 日本, 10, 28, 31, 34 - 57 地图 34; 行政管理, 35 - 36, 42, 44, 48, 57; 建筑, 35; 盔甲与武器, 42, 43, 46 - 47; 艺术, 49, 52 - 53; 商业, 49; 饥荒, 50; 领主关系, 35, 40, 44 - 45; 语言文字, 48 - 49; 图书馆, 48; 文学, 48; 瘟疫, 50; 陶器, 49; 宗教, 36 - 37, 50 - 51, 54; 稻米耕种, 35, 42, 49 - 50; 栅栏围护的房子, 40 - 41; 武士, 37, 43, 44 - 45, 46, 47; 参见各城市及地区名字
Java 爪哇, 28, 31
Jebe 哲别 (蒙古将领), 18, 20
Jerusalem 耶路撒冷, 26, 60, 98, 99 - 100; 圣墓大教堂, 99
Jews 犹太人, 67 - 68, 96, 126
Jien 平安 (日本历史学家), 42, 44, 48, 49
Jihad 伊斯兰圣战, 67 - 68
Jin 金 (中国皇朝), 地图 10, 11, 14, 15, 20, 25, 28
Jochi 术赤 (成吉思汗之外), 12, 14, 20
Jochila 约基拉 (立陶宛大公爵), 128
John 约翰 (英国国王), 92, 141 - 145, 148, 151,

154 - 156, 157

John III 约翰第三 (里加大主教), 127
John of Plano Carpini 约翰·普拉诺·卡皮尼的 (传教士), 21, 25, 26
Jurchen 女真 (满洲部落), 10
Jutland 日德兰半岛, 109

K

Kabul Khan 喀布尔汗, 11, 13
Kaifeng 开封 (宋朝的都城), 15
Kamakura 鎌仓 (日本城市与幕府治所), 34, 38, 42, 44 - 46, 48 - 50, 52, 54 - 57
Karakoram 喀喇和林 (蒙古首都), 20, 26, 31
Karelians 卡累利阿人 (芬兰部落), 111, 112
Khadir al - Mitrani 克哈迪耳 - 艾马尔赫兰尼 (拜巴儿的顾问), 67
Khalil 克哈里尔 (马穆鲁克苏丹), 77, 80
Khwarizm 花拉子模 (亚洲帝国), 地图 10, 18, 20, 24
Kiev 基辅, 9, 20
Kipchak Turks 钦察突厥人, 20, 60 - 61, 69, 70
Kubgha 古卜恰克 (蒙古首领), 59, 65
Korea 朝鲜, 9, 20, 地图 34, 54, 55
Kourmiss 马乳酒 (烈酒), 12, 24, 59, 69
Kublai Khan 忽必烈汗, 22 - 23, 24 - 28, 31, 54, 55, 56
Kulmerland 库尔姆兰 (波兰省名), 120
Kurhul 忽里台 (蒙古首领大会), 13, 20, 24
Kyōto 京都, 34, 35, 37 - 39, 42, 44, 45, 48 - 50, 57
Kyushū 九州, 33 - 35, 54 - 57

L

Ladoga 拉多加湖, 111, 112
Languages 语言: 在中国, 28, 49; 腓特烈二世, 95, 96; 在日本, 48 - 49; 在蒙古, 28
朗格多克, 145, 161
Laon Cathedral 拉翁大教堂, 147
Lateran Council 拉特兰会议, 93
Latium 拉丁姆, 参见罗马教皇国
Latvia 拉脱维亚, 参见利沃尼亚
Lebanon 黎巴嫩, 76
Legislation 立法: 英国, 155, 158; 腓特烈二世, 100 - 102; 蒙古, 13, 28, 29; 西西里, 100 - 102
Leo II 列奥二世 (亚美尼亚国王), 76
Lelits 列托人 (波罗的海部落), 110, 113, 116, 117
Lewes 刘易斯 (1264 年战役), 158
Liegnitz 利格尼茨, 20, 122
Lincoln 林肯, 155, 159
Lithuanians 立陶宛人 (波罗的海部落), 110, 113, 116, 118, 122 - 123, 126 - 128
Liutaras 里乌塔拉斯 (立陶宛人的王朝), 127
Livonia 利沃尼亚, 9, 109, 110, 112 - 113, 116 - 117, 120, 121, 123, 126 - 127
Llywelyn ap Gruffudd 卢埃林·阿普·格拉法德 (威尔士领袖), 159, 162
Lochesh 洛赫施泰特 (波罗的海地区的城堡), 122
Lombard League 伦巴第同盟, 96, 98, 100, 102 - 103
Lombardy 伦巴第, 96, 105
London 伦敦, 155, 162;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139; 威斯敏斯特宫, 157

Lotus Seat 莲花宗 (佛教派别), 51, 52

Louis VII 路易七世 (法国国王), 71
Louis VIII 路易八世 (法国国王), 138, 139, 144, 145, 155, 156
Louis IX 路易九世 (法国国王), 64, 104, 136, 139, 145, 148 - 151, 156 - 158; 行政管理与政府, 148, 149; 税收及税务, 151
Lutbeck 卢贝克, 111
Luttrell Psalter 勒特雷尔赞美诗, 158 - 161
Lyons 里昂, 105

M

Magna Carta 大宪章, 155, 156, 160, 161
Maine 曼恩 (法国地区名), 141, 153
Mann 美因茨, 大主教, 93; 大会, 102
Malaysia 马来西亚, 28
Malik al - Kamī 马里克 - 艾尔卡米尔 (埃及苏丹), 99 - 100
Mamluks 马穆鲁克 (埃及王朝), 10, 24, 29, 31, 59 - 80, 地图 60, 151; 行政管理, 70, 75; 艺术, 76; 交流, 69, 75; 医院, 78 - 79; 耕犁, 62 - 63; 音乐, 75, 78; 税收, 75 - 76; 骑士, 69 - 70; 衣服, 75; 战争与骑马术, 62 - 63; 也参见埃及
Manfred 曼弗雷德 (腓特烈二世之子), 107
Mansura 曼苏拉 (1250 年战役), 61
Mansuri Maristan 曼苏里·马里斯坦 (开罗医院), 78 - 79
Manuscripts 手稿印刷, 81 - 87
Margaret of Provence 玛格丽特, 普罗旺斯的 (路易九世之妻), 148
Marienburg Castle 马堡城堡, 126, 127, 128
Marshall 马歇尔·威廉 (彭布克伯爵), 139, 156
Masako 良子 (赖朝朝的正妃), 42, 44
Masovia 马佐维亚 (波兰公爵领地), 119 - 120
Melfi 墨尔菲, 145, 146
Merkins 钱儿乞部 (蒙古部落), 11 - 12
Messina 墨西拿 (西西里城市), 102
Minchael VII 迈克尔七世 (拜占庭皇帝), 69
Milan 米兰, 96, 103, 104
Minamoto 源氏 (日本部落), 33 - 39, 44, 48
Mindaugas 明道加斯 (立陶宛国王), 122 - 123, 127
Ming 明 (中国王朝), 128, 31
Mishima 三岛 (日本神社), 46
Mongke 蒙哥 (蒙古头领), 20, 24, 26
Mongols 蒙古人, 9, 31, 34, 47, 54 - 57, 61, 64 - 65, 67 - 70, 74, 76, 104, 116, 121 - 122, 123; 行政管理, 13, 28, 29; 盔甲与武器, 8, 14, 16, 17, 19, 55, 56 - 57, 59; 耕犁, 16 - 17, 54; 交流, 27; 饮食与经济, 11, 12, 24, 30; 骑马术, 8, 11, 21 - 23, 25; 狩猎, 14, 21, 26, 27; 育林, 14; 内蒙古, 10; 语言文字, 28; 立法, 13, 28, 29; 外蒙古, 10, 18; 宗教, 12 - 13, 27 - 28; 印章, 28; 战争, 13 - 14, 21, 23
Montfort 蒙特福特, 西蒙·德, 156, 158
Muchaku 多向若 (佛教圣人), 53
Muhammed 穆罕默德 (在拉子模沙), 18, 20
Musashi 武藏 (日本省名), 148

N

Naiman 乃蛮 (蒙古部落), 12, 18
Naples 那不勒斯, 90, 105, 107; 大学, 95
Naumburg Cathedral 诺德堡大教堂, 134

Navas de Tolosa 纳瓦斯·德·托洛萨(1212年战役),120
Neman 涅曼河,110,121
Neva 涅瓦河,111,112,122
Nevsky 涅夫斯基,亚历山大,111,116,122,125
Nichiren 日莲(日本和尚),51,54
Nile 尼罗河,59,60,64,75
Ningxia 宁夏(西夏都城),15
Normandy 诺曼底,69,90,101,140,141,143,152,153,162
Northampton 北安普敦(英国城市),155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俄罗斯公国),110,111,116,117,121,122,125
Nori 努里(大马士革医院),73,78

O
Opedei 窝阔台(成吉思汗之子),14,18,20,24,27,122
Oron 唯唯河,11,13
Orda 窝儿达(成吉思汗之外),20,24
Oscott Psalter 圣经诗集,86
Ottar 奥特拉尔(亚洲城镇),18
Otto of Brunswick 奥托,不伦瑞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91,92-93,141,144

P
Palermo 巴勒莫(西西里城市),90,91,93,95
Palestine 巴勒斯坦,59,60,65,69,99,100,109,113,116,119,128,151
Papacy 罗马教皇统治,26,89,96,98-105,107,111,112,113,117,119,121,122,151,156,157,161. 参见罗马,及各教皇的名字
Papal States 罗马教皇国,地图90,91,92,96,100,103,105
Paris 巴黎,80,140,141,143,145;圣母院,137;圣夏佩尔小教堂,136,139,148;圣但尼修道院,129,141,151;条约,151,157;樱尚森林,148
Paris 帕里斯,马修(编年史家),9,25,107
Parliaments 议会,157,158
Parma 帕尔玛围攻,105
Peipus 佩普西(1242年战役),122,124-125
Persia 波斯,9,18,20,24,28,29,31,64,66,70,85
Phillip of Swabia 菲力普,斯瓦比亚的(亨利六世之父),91,92
Philip II 腓力二世(法国国王),139,141,145,154
Philip III 腓力三世(法国国王),151
Philip IV 腓力四世(法国国王),127,151-152
Philippines 菲律宾,28
Plock Cathedral 普洛克大教堂,123
Poitiers Cathedral 普瓦蒂耶大教堂,153
Poitou 普瓦图,141,145,148,151,157
Poland 波兰,9,20,25,104,109,112,119,122,127-128
Polo 波罗,马可,26-27,30,31
Poln 波罗,马蒂欧与尼科洛(威尼斯商人),26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波兰地区),110
Pomerelia 波美利里亚(波兰省名),127
Popes 教皇,参见罗马教皇统治
Poppo of Osterna 珀波,奥斯特纳的(条顿骑士团首领),121-122

Pottery 陶器,日本,49
Provence 普罗旺斯(法国一地区),90,103,139
Prussia 普鲁士,9,109,110,112,119-123,126-128;行政管理,126;德国人定居,123
Pskov 普斯科夫(俄罗斯城市),117,121,122
Pure Land Sect 净土宗(佛教派别),51,52,54,119
Q
Qalawun 夸拉温(马穆鲁克苏丹),70,73,74-77,78,80
Qutuz 忽秃思(埃及苏丹),24,59,64,65,66

R
Raymond of Provence 普罗旺斯的雷蒙德,139
Renaud de Dammartin 勒诺·德·达马丹,141,144
Reval 勒佛尔(爱沙尼亚城堡),117
Revenues 税收;英国,154,155,159;法规,151,152;马穆鲁克,75-76;西西里,101
Rheims Cathedral 兰斯大教堂,130,131-132,150,151
Ribe Cathedral 莱布大教堂,108
Richard I 理查一世(英王),141,143,154
Riga 里加(利沃尼亚城市),110,113,116,117,121,123,126-127
Rokuhara 六原(战役),47
Rome 罗马,31,89,90,94,103,104,116,122;圣彼得大教堂,94,103. 参见罗马教皇统治;罗马教皇国
Rum 罗姆(亚洲苏丹国),69
Runnymede 兰尼米德,155
Russia 罗斯,9,地图10,20,24,29,31,61,69,109-112,116,117,121-123,125

S
Saccadia 萨卡利亚(爱沙尼亚省名),116
Saiko 采红(日本上兵),55
Saladin 萨拉丁,59,60,80,98
Salar 萨拉(马穆鲁克苏丹),80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伯爵,141,144
Salz 萨尔沙(条顿骑士团),120
Samarkand 撒马尔罕,9,18,24,29
Samogitia 萨摩吉提亚(立陶宛地区),110,123
Sanmrai 武士(日本上兵),10,37,40-41,42,43,45,46-47,48,50,51,54
Sanetumo 实朝(将军),44
Saracens 撒拉森,102
Sarai 萨莱(钦察都城),24,29
Sauls 沙勒河,118,121
Saxony 萨克森,93,116
Science 科学;英国,155;腓特烈二世,89,95-97
Scotland 苏格兰,153,159-160
Seine 塞纳河,141,143
Senlis 桑利斯主教,144
Shajar al-Durr 萨贾尔·艾尔德(爱巴克之妻),64
Shiite Muslims 什叶派穆斯林,60
Shinto 神道(日本宗教),36
Siberia 西伯利亚,10,12,20
Sicily 西西里,9,地图90,90-96,100-107,

151,157;行政管理,94-95,101-102;商业,95;教育,95-96;立法,100-102;文学,95;税收,101;晚祷,107;妇女,106,107
Silesia 西里西亚,20,104,122
Slavs 斯拉夫人,31
Snowdonia 斯诺多尼亚(威尔士一地区),162
Song 宋(中国王朝),10,11,20,24,25,28,49
Southwell Minster 南威尔大教堂,132
Spain 西班牙,107,120
Strasbourg Cathedral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134-135
Subedei 速不台(蒙古将军),20
Sudanese 苏丹人,64
Sufis 苏菲主义(伊斯兰神秘教派),76
Sunni Muslims 逊尼派穆斯林,60,61,66-67,68
Sunqur al-Ashgar 逊克耳·艾尔阿亚克尔(马穆鲁克将领),70,74
Suomis 索美人(芬兰部落),111
Swabia 斯瓦比亚(德国一地区),91,93
Sweden 瑞典,109,地图110,111-112,122
Sword Brothers 剑兄弟会,109,110,116-118,120-122
Syon Cope 西翁法衣(英国刺绣),157
Syracuse 锡拉库扎(西西里城市),102
Syria 叙利亚,24,29,59-61,64,65,68,70,74,75,77,80

T
Taichiu 泰赤乌(蒙古部落),12
Taira 平氏(日本氏族),33-39,42,44,45,48
Takenaka Suenaga 竹崎来永(日本将领),56-57
Tamerlane 泰穆兰,29,31
Tanguts 唐古特(西藏部落),10,14,20
Tannenberg 坦伦堡(1410年战役),123,128
Tatars 鞑靼人(蒙古部落),11,12,31
Tavantiens 塔瓦提提亚人(芬兰部落),111,112
Taxation 税务,参见税收
Templars 圣殿骑士团(十字军骑士团),116,127
Temujin 铁木真,参见成吉思汗
Teutonic Knights 条顿骑士团,9,100,104,110,112,114,116,118-128;行政管理,126;商业,126;严酷的制度,120-121
Thailand 泰国,28
Thuringia 图林根,118
Tibet 西藏,10,18
Tokimasa 时政,37,42,44
Tokimune 时宗(北条摄政王),55
Ukraine 乌克兰(法国一地区),141,153
Trade 贸易,参见商业
Tripoli 的黎波里,60,76
Tunis 突尼斯,151
Tursanshab 图兰萨赫(埃及苏丹),61,64
Turkistan 土耳其斯坦,9,18
Turks 突厥人,9,24,28,31,59,60,61,74,80,参见马穆鲁克,古卜恰克
Tyrgils Knutsson 特吉尔·可努特松(瑞典贵族),112

U
Ukraine 乌克兰,20
Ural Mountains 乌拉尔山脉,116

Urban IV 乌尔班四世(教皇),123
V
Venice 威尼斯,26,31,69,76,95,103,126,127
Vietnam 越南,28,31
Visby 维斯比(德国城市),111,114-115
Vistula 维斯图拉河,109,110,121
Vladislav IV 弗拉季斯拉夫四世(波兰国王),128
Vyborg 维堡(芬兰要塞),112

W
Waiblingen 魏布林根(德国城堡),91
Waldemar II 瓦尔德马二世(丹麦国王),108,109,117,118,121
Waldensians 韦尔多派(基督教派别),94
Wales 威尔士,140,153,159,161,162-167,参见卡耶拉
Weapons 武器,参见盔甲与武器
Welsh 威尔士,91,100
Wellstream 威尔河,156
Wenno of Rhoorbarh 威诺,洛拜克的(剑兄弟会),116
William 威廉(诺曼底公爵),152
William of Holland 威廉,荷兰的,105
William of Rubruck 威廉,鲁布拉克的(西方传教士),25,26
William the Breton 威廉(布列塔尼人)(法国编年史家),145
Winchester Cathedral 温切斯特大教堂,153

X
Xixia 西夏(佛教王国),10,14,15,20

Y
Yangtze 长江,27,31
Yangzhou 扬州(中国城市),31
Yan Ji 颜季(儒家学者),25
Yaroslav 雅罗斯拉夫(诺夫哥罗德王子),111
Yeh-lu Ch'u-ai 耶律楚材(成吉思汗顾问),15,18,27
Yellow River 黄河,15,27
Yemen 也门,59
Yesugei 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11
Yorin 頼家(赖朝之子),42,44
Yoritomo 赖朝(原始氏族首领),37-39,42,45,48
Yoshitsune 义经(赖朝之弟),39
Yuan 元(中国王朝),25,28
Yurt 蒙古包,12,15

Z
Zen Buddhism 禅宗,51,52,54
Zhao Mengfu 赵孟頫(中国画家),23
Zhongdu 中都(金都城),14,15,25
Zhu Yuanzhang 朱元璋(中国皇帝),28
Zwaila Gate 苏外拉城(开罗),65

BALTIC

- Brundage, James A.**, transl., *The Chronicle of Henry of Latvi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1.
- Christiansen, Eric**, *The Northern Crusades: The Baltic and the Catholic Frontier 1100-1525*. London: Macmillan, 1980.
- Evans, Geoffrey**, *Fannenburg 1410-1914*.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0.
- Michell, Robert**, and Nevill Forbes, transl., *The Chronicle of Noygorod 1016-1471*. London: Camden Society, 1914.
- Probst, Christian**, *Der Deutsche Orden und seine Medizinalwesen in Preussen*. Bad Godesberg: Verlag Wissenschaftliches Archive, 1969.
- Riley-Smith, Jonathan**, *The Crusades: A Short Histor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7.
- Setton, Kenneth M.**, ed.,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 II.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5.
- Seward, Desmond**, *The Monks of War: The Military Religious Orders*. London: Eyre Methuen, 1972.
- Steinbrecht, Konrad**, *Schloss Lochstedt und seine Malereien. Ein Denkmal aus des-Deutschen Ritterordens Blütezeit*. Berlin: Königli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u Berlin, 1910.
- Urban, William**, *The Baltic Crusade*. De Kalb, Illinoi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5.
- Vernadsky, George**, *Kievan Rus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Zamojski, Adam**, *The Polish Way*. London: John Murray, 1987.

WESTERN EUROPE

- Anderson, William**, *Castles of Europe*. London: Paul Elek Productions, 1970.
- The Rise of the Gothic**. London: Hutchinson, 1985.
- Barlow, Frank**, *The Feudal Kingdom of England 1042-1216*. Harlow: Longman, 1972.
- Barracough, G.**, *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 Oxford: Blackwell, 1946.
- Branner, Robert**, *Manuscript Painting in Paris During the Reign of Saint Lou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Brunskill, R. W.**,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1.
- De Hamel, Christopher**, *A History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Oxford: Phaidon, 1986.
- Duby, G.**, *Le Dimanche de Bouvines*. Paris: Gallimard, 1973.
- Gotze, Heinz**, *Castel Del Monte*. Munich: Prestel-Verlag, 1984.
- Hallam, Elizabeth**, *Capetian France 987-1328*. Harlow: Longman, 1980.
- Hampe, K.**, *Germany under the Salian and Hohenstaufen Emperors*. Oxford: Blackwell, 1973.
- Harvey, John**, *The Master Builders: Architecture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 Jackson, Donald**, *The Story of Writing*. London: Barrie & Jenkins, 1981.
- Kantorowicz, E.**, *Frederick the Second*. New York: R. R. Smith, 1931.
- Lassus, M. J. B. A.**, *Facsimile of the Sketch-Book of Wilars de Honecourt*. London: Jeph Henry and James Parker, 1859.
- Leuschner, J.**, *German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0.
- Lobel, M. D. ed.**, *Historic Towns*. I. London: Lovell Johns Ltd., 1969.
- MacDermott, M.**, *Military Architecture*. Transl. from the French of E. Viollet-Le-Duc. Oxford: James Parker, 1879.
- Masson, Georgina**, *Frederick II of Hohenstaufen: A Life*.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57.
- Morris, J.**, *The Matter of Wa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Norgate, Kate**, *England under The Angevin Kings*. London: Macmillan, 1887.
- Previt-Orton, C. W.**, *The Shorter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 Robb, David M.**, *The Art of the Illuminated Manuscript*. London: Thomas Yoseloff, 1973.
- Rudrick, A. ed.**, *Wales: A History*.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6.
- Royal Commission on Ancient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les and Monmouthshire: Caernarfonshire Vol. II: Central**. London: HMSO, 1960.
- Simpson, W. D.**, *Exploring Castl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

- Castles in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Batsford, 1969.
- Swaan, Wim**, *The Gothic Cathedral*. London: Paul Elek Productions, 1969.
- Toy, S.**, *Castles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Heinemann, 1953.
- Van Cleve, T. C.**,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 of Hohenstauf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 Vaughan-Thomas, W.**, *Wales Through the Ages*. Llandybie: Christopher Davies, 1959.
- Warner, Philip**, *Siege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68.
- Warren, W. L.**, *King John*. London: Eyre Methuen, 1978.
- Wilkinson, B.**, *The Later Middle Ages in England*. Harlow: Longman, 1969.
- Wood, Casey**, and Marjorie Eyre, transl., *The Art of Falconry*. Boston: Charles T. Branford, 1955.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 Blum, Alfred**, *Shinran's gospel of pure grace*.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 Brent, Peter**, *The Mongol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6.
- Cameron, Nigel**, and Brian Brake, *Peking: Tale of Three Ci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 Chambers, James**, *The Devil's Horseme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9.
- China (Life World Library series)*. New York: Time Inc., 1963.
- Dumoulin, Heinrich, S. J.**, *A History of Zen Buddh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3.
- Duns, Peter**, *Feudalism in Japa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9.
- Frederic, L.**, *Daily Life in Japan at the time of the Samurai*. Transl. by Kileen M. Lane. London: Allen & Unwin, 1972.
- Gabriel, Ronay**, *The Tartar Khan's Englishman*. London: Cassel, 1978.
- Galt, T.**, transl. / ed. *The Little Treasury of One Hundred People, One Poem Each as compiled by Fujiwara no Sada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 Gascoigne, Bamber and Christina**, *The Treasures and Dynasties of China*.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3.
- Gibson, Michael**, *Genghis Khan and the Mongols*. London: Wayland, 1973.
- Hall, J. M.**, and J. P. Mass, eds., *Medieval Japan: Essays in Institution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Humble, Richard**, *Marco Polo*.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 Hurst, G. C.**, *Insei: Abdicated Sovereigns in the Politics of late Heian Japan 1086-118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Ipsitroglu, M. S.**, *Painting and Culture of the Mongols*. Transl. from the German by E. D. Phillip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7.
- Saray-Alben. Diez'sche Klebebande aus den Berliner Sammlungen*.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64.
- Ishii, Ryosuk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0.
- Jien**, *The Future and th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Kidder, Jr., J. Edward**, *The Art of Japan*. Tokyo: Shogakukan, 1981.
- Kitagawa, H.**, and B. Tsuchida, transl., *The Tale of the Heike*.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75.
- Kitagawa, Joseph M.**, *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 Tokyo: Kodansha, 1983.
- Kyōtarō, Nishikawa**, and Emily J. Sano, *The Great Age of Japanese Buddhist Sculpture AD600-1300*. Fort Worth: Kimbell Art Museum/Japan Society, 1982.
- Latham, Ronald**, transl., *Marco Polo: The Travels*. London: Penguin, 1958.
- Lewis, Suzanne**, *The Art of Matthew Paris in the Chronica Majora*. Cambridge: Scolar Press, 1987.
- Lu, David John**, *Sources of Japanese history*. Vol. I.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 Mass, J. P.**, *Warrior Government in Early Medieval Jap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ss, J. P. ed.**, *Court and Bakufu in Jap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Mills, Douglas E.**, transl., *A collection of tales from Uji: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Uji shūi monogatar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2000年5月25日

Miner, Earl,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court poet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Mori, Hisagshi, Sculpture of the Kamakura Period, Tokyo: Weatherhill/Heibonsha, 1964.

Okudaira, Hideu, Narrative Picture Scrolls,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3. Peking (The Great Cities series).

Amsterdam: Time-Life Books, 1978.

Phillips, F. D., The Mongol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9.

Rockhill, William Woodville, ed.,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 - 5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Sadler, A. L., transl., The Ten Foot square Hut and Tales of the Heike,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28.

Sansom, G., A history of Japan to 133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Cresset Press, 1946.

Sato, Kanzan, The Japanese Sword, Tokyo: Kodanaha International and Shibundo, 1983.

Saunders, J. J.,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

ques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1.

Shinoda, Minoru, The founding of the Kamakura shogun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Smith, Bradley, and Wang-go Weng, China: A History in Art, London: Studio Vista, 1973.

Swann, Peter C.,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s of Japan, Oxford: Bruno Cassirer, 1958.

Totman, Conrad, Japan before Perry: a shor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London: Sedgwick and Jackson, 1984.

Turn bull, Stephen, The Book of the Samurai, London: Arms & Armour Press, 1982.

The Samurai: A Military History, London: George Philip, 1988.

Samurai Warriors, London: Blandford Press, 1987.

Yule, Sir Henry, The Book of Si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London: John Murray, 1921.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shtur, E. Tiyahn,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Collins, 1976.

Attil, Esin, Art of the Arab World,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75.

Renaissance of Islam: Art of the Mamluk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1.

Coste, Pascal, Architecture Arabe Ou Monuments Du Kair 1818 - 1826, Paris: Didot Freres, 1837.

Creswell, K. A. C., The Muslim Architecture of Egypt, Vol. 2,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9.

Ettinghausen, Richard, Treasures of Asia: Arab Painting, Lausanne: Editions d'Art Albert Skira, 1962.

Glubb, John Bagot, Soldiers of Fortune: The Story of the Mamluks,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3.

Holt, P. M.,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1517, New York: Long man, 1986.

Holt, P. M., A. K. S. Lambton and B. Lewi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Irwin, Robert, The Middle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arly Mamluk Sultanate 1250 - 1382, London & Sydney: Crown Helm, 1986.

Leaf, William, and Sully Purcell, Heraldic Symbols,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986.

Lewis, Bernard, ed., The World of Isla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6.

Mayer, J. A., Mamluk Costume, Geneva: Albert Kundig, 1952.

Runciman, S.,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 III,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7.

Ruthven, M.,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Cairo (The Great Cities series), Amsterdam: Time-Life Books, 1980.

Shaw, M. R. B., transl., Joinville and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3.